

斯大林秘书回忆录

波利斯·巴让诺夫 著
洪　钢 译
闻　明 复校

知识出版社

斯大林秘书回忆录

波利斯·巴让诺夫著

洪　钢　译

阎明复　校

知识出版社

斯大林秘书回忆录

波利斯·巴让诺夫著

洪 钢译　倜明复校

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外馆东街甲1号）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字数257千

1932年8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8,000

书号：11214·4　　定价：2.20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作者巴让诺夫，1900年生于乌克兰，1919年加入联共(布)党，之后就读于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很快就到党中央组织部等机关工作。继之调到党中央政治局工作，在1923至1927年间，担任斯大林的助理兼政治局秘书要职。最后，于1928年潜逃国外，亡命西方。

在流亡国外期间，作者先后曾发表过一些关于斯大林和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文章和书，引起西方舆论的重视。《斯大林秘书回忆录》一书是他的代表作，1980年出版于法国，旋即在西方国家广为传播，被西方新闻界称为“轰动世界的事件”，视之为“克里姆林宫学”方面“不可多得”的著作之一。

本书描述了二十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各种派别力量的消长和演变，以及领导人物的沉浮、更迭。作者特别着重描写了斯大林，以及他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关系和斗争情况。由于作者的独特身份和地位，及其长期在中央领导层工作的经历，他在书中披露了一些有关的内部材料，不失作为了解和研究那一重要时期的历史和人物的一种参考资料。

不言而喻，作者是一个对共产主义由怀疑、仇恨，最终走上反共道路的叛徒，书中暴露了他的反动思想观点和言行，包括他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肆意歪曲和攻击。这对读者是显而易见的。

书中的脚注是译者加的，仅供参考。

目　录

译者的话
作者前言 …………………………………………………… (1)
第1章　入党 …………………………………………………… (3)
第2章　在组织部里　党章 …………………………………… (12)
第3章　组织局秘书 …………………………………………… (28)
第4章　斯大林的助理——政治局的秘书 …… ……………… (48)
第5章　政治局秘书的见闻 …………………………………… (65)
第6章　布尔什维克最高层领导内幕 ………………………… (86)
第7章　我成为一个反共分子 ………………………………… (107)
第8章　斯大林的秘书室　军事将领们 ……………………… (130)
第9章　斯大林 ………………………………………………… (148)
第10章　政治局的委员们　托洛茨基 ………………………… (162)
第11章　政治局的委员们 ……………………………………… (176)
第12章　斯大林的政变 ………………………………………… (192)
第13章　格伯乌　权力的实质 ………………………………… (209)
第14章　最后的见闻　要逃出社会主义天堂 ………………… (234)
第15章　准备逃走 ……………………………………………… (252)
第16章　潜逃　波斯　印度 …………………………………… (269)
第17章　流亡国外　芬兰　柏林 ……………………………… (289)
后　语 ………………………………………………………… (314)

作者前言

我的回忆录，主要涉及我担任全联盟共产党①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斯大林的助理和联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那个时期的情况。我是1923年8月9日被任命担任这些职务的。在我成为反共分子以后，于1928年1月1日偷越波斯国境，逃离苏俄。在1929～1930年间，我在法国曾以撰写报刊文章和书籍的形式，部分地发表过我的观察印象记。我写的那些东西，主要是要揭示共产党权力机关的眞相——当时西方对这一点不甚了了，——介绍一下这个权力中心的一些代表人物，描述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些历史性事件。我在叙述时，总是力求精细、准确，仅限于我所亲自目睹的事情，或者是我完全确切了解的情况。对我所写的一切，克里姆林宫当局从来没有试图进行任何争辩，实际上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而宁愿采取完全隐讳不提的策略：任何场合都不准提及我的名字。然而，我的文章的最热心的读者却是斯大林。据后来从苏联驻法国代表处逃脱出来的人们证实，斯大林曾经指示，必须把我新发表的每一篇文章迅速用飞机寄送给他。

我对事实和事件的叙述完全是准确无误的。同时，经与那些仍然留在俄国的我的朋友们商量，并且为了使他们更加安全起见，我当时仅仅对涉及我个人的一个细节，即我成为反共分子的

① 它的全称应是"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其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立于1898年。1912年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为"联共（布）"。1952年起又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时间，不得不加以改变。这一点丝毫不影响我的叙述本身，我所写的东西绝不会由于我之成为反共分子在时间上是早两年或是晚两年而有所改变。不过，或许这会使我个人的处境不大愉快（在本书末尾的一章中，我将谈及自己准备投奔国外的情况，我会说明当时我的朋友们是怎样和何以请求我这样做的）。另外，在那个时候，有许多事实和人物都不便公开写出来，因为许多人都还健在。例如，当时我不能透露出列宁的私人女秘书向我谈到的极其重要问题的情况，因为那会让她付出很高的代价。现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已经过去，这个时代的多数人物也已不在人世间，所以，几乎一切都可以写出，公诸于世了，而不致冒有会使任何人的后脑勺吃斯大林子弹的危险了。

另外，现在，当我作为见证人忆起那些历史性事件的时候，我可以向诸位读者谈谈我从直接的观察印象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和见解。我希望，这将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这些事件的实质，了解共产主义革命时代的这个阶段的全貌。

第1章 入　　党

中学　大学　示威者遭到枪杀　入党　雅姆波里市和莫吉廖夫市　莫斯科　高等技术学校　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喀琅施塔得起义　新经济政策学习

1900年，我出生在乌克兰的莫吉廖夫——波多里斯基城。1917年，二月革命①时，我是中学七年级学生。1917年春夏两季，这个城市经历了各种革命事件，首先是经历了旧生活制度的逐渐解体，十月革命加速了这个解体的过程。前线已崩溃瓦解，乌克兰被分裂出去，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在乌克兰建立的政权提出异议。但是，1918年德国军队侵占了乌克兰，在他们的支持下秩序有所恢复，并建立起相当奇特的斯柯罗帕茨基②的盖特曼政权③，形式上它是乌克兰民族主义政权，实际上是面目不清的保守主义政权。

---

① 即1917年俄国人民推翻沙皇专制政权的第二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发生在俄历2月而得名。

② 斯柯罗帕茨基——沙俄将军，1918年4～12月为乌克兰首领、德国帝国主义的傀儡，建立了反革命军事独裁政府。

③ 盖特曼是16和17世纪的波兰统帅，由国王委派。1918年德国武装者以《盖特曼》头衔授予其傀儡斯柯罗帕茨基。

生活重又走上正规，中学的教学情况又趋于好转。1918年夏天我中学毕业，9月入基辅大学数学物理系继续学习。唉，可惜大学的学习好景不长。到了11月，德国失败已成定局，德军开始撤离乌克兰。大学里革命活动沸腾起来，开群众大会，发表演说，当局便关闭了大学。这个时期，我没有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因为我才18岁，自己觉得对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缺乏认识。与多数大学生一样，我对学习的中断不满，因为我从边远的省份千里迢迢来到基辅，目的就是要学习。所以，当大学生们宣布为了抗议大学被关闭要在学校建筑物对面的大街上进行示威时，我也去参加了。

在那里，我得到了一次严重的教训。"国家警察"大队人马乘卡车赶来，迅速整队后未经事先警告就向示威群众开了枪。应该说，当群众看到枪支后就已四处逃散，留下来同持枪警察搏斗的只有三、四十人。他们认为，见到警察就象兔子一样逃跑是最丢脸不过的事。结果这些留下的人被打得落花流水，死的死，伤的伤，共伤亡四十人之多。我是负伤者之一，子弹打中我的颚骨，但是滑了过去，于是，我在医院里治疗了两、三个星期。

学习停止了，布尔什维克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斗争重又展开。我回到故乡去养病，同时思考一下我违心地参加过的这次事件的过程。在1919年夏天之前，我读了很多书，努力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革命学说和纲领。

1919年，内战开始了，白军开始从边远地区向中心莫斯科进军。但是，我们波多里斯基城这个角落，却置身于运动之外，对我们当地政权提出异议的只有佩特留拉分子① 和布尔什维克。1919年夏天，我决定加入共产党。

---

① 佩特留拉——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首领之一。1917年是反革命的乌克兰中央拉达陆军事务总书记。内战时期为反革命首领之一。1918年在德军帮助下重建中央拉达，参加民族主义政府。苏维埃政权在乌克兰重建后，他成为白俄流亡分子。

在这个时期，对我们青年学生来说，共产主义是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了不起的有意思的尝试。如果我想参加到政治生活中去，从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的现实出发，我面临的选择只有乌克兰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者必居其一。乌克兰民族主义对我毫无吸引力，因为它对我说来，等于是从我受之哺育的俄罗斯文化的高峰后退。我对自己周围目睹到的共产主义实践并不赞赏，但是我提醒自己：对那些文化水平很低、愚昧无知的布尔什维克们不能要求过高，因为他们是出身于文盲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是以怪异的方式理解和贯彻共产主义口号的；这些错误，应该由那些有文化的，认识水平高的人们来加以纠正，并由他们把新的社会建设得更加符合那些身处遥远的首都、但是确实在为人民谋福利的领袖们的思想。

我在基辅中弹受伤这件事，对我的政治意识并未产生很大影响。然而，战争问题却对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我青年时代的最后几年里，我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毫无意义的连绵战争情景所震动。尽管我年轻，但是我清楚地认识到，战争没有给任何参战国带来足以同千百万人的牺牲和巨大破坏相比拟的任何东西。我认识到，毁灭性武器的发展已达到如此高的程度，致使要以战争办法解决大国之间争端的企图已毫无意义。老的民族主义政策在一个世纪以前是适用的，那时候，从巴黎到莫斯科的旅途长达两个月之久，各个国家之间能够互不依赖地生活；而现在呢，所有各国的生活都相互联系在一起，从巴黎到莫斯科只需两天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仍然醉心于老的民族主义政策的话，那么，他们终将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他们还要对继战争之后接踵而来的破坏旧生活制度的革命承担大部分责任。这个时候，对于国际主义者从齐美尔瓦尔德① 和

① 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人在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第1次代表会议，以列宁为首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宣言指出，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号召欧洲工人展开反对战争的斗争。

昆塔尔①发出的反对战争的抗议，我信以为眞，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列宁派对战争的爆发是欣喜若狂的，因为正是战争给他们带来了革命。

我参加地方党组织以后，很快被选为县的党组织书记。饶有趣味的是，我很快就投入了同省会派来负责组建地方契卡机构的契卡分子②的斗争。这个县的契卡机构征用了公证人阿弗耶尼也夫的房子，并把这个富裕、但无害的老头子处决了。我要求党组织立即关闭这个契卡机构，并把契卡分子赶回省会维尼查去，党组织对此犹豫不决，但我很快就说服了他们。这里是犹太人聚居的城市，多数党员是犹太人。政权更迭频繁，每隔2～3个月就换上一次。我质问党组织说，你们是否晓得，契卡暴徒枪杀无辜的罪责将会被转嫁到当地犹太人身上，因而下次政权更迭时他们将会遭殃。党组织明白了，并对我表示支持。结果，契卡机构被关闭了。

苏维埃政权在这里维持的时间不长，不久佩特留拉分子来了。我在日麦林卡和维尼查市呆了一个时期。1920年1月，我在维尼查市意外地被选为省教育局长，但是，我父母患伤寒病和后来因斑疹伤寒而死去的消息，中断了我的官运。我匆忙回到故乡去，当时，佩特留拉匪帮还在那里，但是他们沒有对我动手，因为当地居民向他们担保说，我只是一个"思想上的共产党员，除了做好事外，沒有对任何人做过坏事，相反，还曾经使全市人民免遭契卡分子恐怖行为的祸害"。

---

① 1916年4月24～30日，国际主义者在瑞士昆塔尔村召开了第2次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斥责社会和平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

② 契卡，指肃反委员会，是俄文缩写"ЧК"的泽音。全称是苏联肃清反革命、怠工及取缔投机非常委员会，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1922年2月6日改组为"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人员被称为契卡人员或契卡分子。

很快，政权又更迭，布尔什维克来了。不久，布尔什维克又撤走了。苏波战争开始。但是到了1920年夏天，重又占领县城雅姆波里，我被任命为雅姆波里市革委会委员和书记。革命以来，雅姆波里从未见到过这样和平、善意的政权。革委会主席安德列耶夫，两个委员——吉莫费耶夫和我，都是温和而善良的人，至少，我们3个人住房的主人，一个官吏的遗孀持有这样的看法。她和我们一起吃饭，虽然我们掌握了全部政权，可是我们3个人仍然吃得半饥半饱，这使她感到惊奇。

1个月之后，又占领了莫吉廖夫市，我被调到那里，重新担任县党委书记。

10月，苏波战争结束，11月占领了克里米亚，内战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告终。我决定到莫斯科去继续学习。

1920年11月，我来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

当然，在高等技术学校设有基层党支部，但党的生活很弱。党认为，国家缺乏大量可靠的技术专家，所以我们党员学生的责任首先是学习，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不过，在首都我已经对党内的情况有所了解。内战结束后国家开始转入和平建设，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开始后的3年来，共产主义治理国家的办法已经明确了。然而，对于这种办法，在1920年底开展的著名的工会问题辩论期间，在党的高级领导层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对我们全体普通党员来说，情况似乎是这样的：争论的焦点是关于领导经济，更确切地说，领导工业的方法问题。看来，以托洛茨基① 为首的部分党员认为，在初期，军队应

①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十月革命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1920～1921年在工会问题争论期间是反对派领导人。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1936年苏联法庭明令通缉拿办。1940年死于墨西哥。

变成一支劳动大军，并在严格的军事纪律的基础上恢复经济；另一部分党员，施略普尼柯夫和工人反对派① 则认为，应把经济管理工作交由工会负责；最后，列宁及其一派，既反对劳动大军，也反对由工会管理经济，而主张由苏维埃经济机关负责领导经济工作，摒弃军事方法。结果，列宁的观点取得了胜利，不过也费了很大劲儿。

只是经过几年以后，我在担任政治局秘书期间，翻阅了政治局的旧档案材料，才知道这次辩论是臆造出来的。实质上，这是一场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争夺多数的斗争，因为在这个时候列宁对托洛茨基影响的过份增长感到耽心，所以力图削弱他的影响，并使他离开权力中心。至于工会问题，那是相当次要的，它被人为地加以夸张。托洛茨基已察觉到列宁装模作样地玩弄的整个阴谋诡计，因而，在几乎两年的时间里，他和列宁的关系变得大为冷淡。这一事件及其后果，在此后的权力之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1921年3月，正当党的代表大会进行的时候，高等技术学校党支部的全体成员被紧急召集到区党委去，向我们宣布，我们被应征入伍，发给枪支和子弹，并把我们分配到大部分已经关闭的工厂。我们的任务是武装保卫工厂，以防止工人可能举行反对政权的活动。当时正是喀琅施塔得起义② 的时候。

我们3个人守卫关闭了的工厂，大约有两、三个星期。同我一起的是我的朋友，共产党员尤尔卡·阿基莫夫，他和我一样也

---

① 1920～1922年俄共(布)中的一个派别集团，认为工人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是职工会，主张把经济管理交给“全俄生产者代表大会”，后被批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

② 1921年3月，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发动了叛乱，占据了海军要塞，提出“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后被红军镇压下去。

是大学生；还有一位俄国籍的德国人汉斯·林贝尔格。几年之后，当我担任政治局秘书时，我把他提升为体委的书记，后来才晓得他是一个最卑劣的阴谋家。至于尤尔卡·阿基莫夫，我两、三年后便没有再见到过。不久以前我从苏联大百科全书中得知，他现在是冶金学的功勋教授。

在3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政策的报告。所有苏联的官方历史文献中，都把这一时期称作新经济政策时期。这不完全正确，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思想并非这么早。内战时期和1920年夏天，采用暴力方法征收农民的粮食。当局大致估计一下每个区里农民应有多少粮食，拟定出征粮的数字，摊派给各区和各农户，然后用最粗暴蛮横的方式强行征收粮食(由征粮队执行)，用以供应军队和城市，这就是余粮收集制。可是，农民得不到任何工业品作为报酬，因为当时实际上没有工业品。1920年夏天，发生了一些农民起义，最著名的安东诺夫的起义(唐波夫省)，一直持续到1921年的夏天。此外，播种面积大量减少，农民不愿再生产多余的粮食，因为余粮反正要被征收掉。列宁感到，这样会导致毁灭，因而要从教条的共产主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恢复农民对经济工作的一定兴趣。以粮食税制取代了余粮收集制：农民应该交纳一定数量的粮食税，余粮则由自己支配。

喀琅施塔得的起义，推动了列宁思想的发展。因为全国已为饥荒、普遍不满情绪和工业品短缺所笼罩，要使农业的振兴，以及整个经济的恢复成为可能，只有使农民具有经济上的兴趣，也就是说，要从共产主义的幻想回到正常的交换经济上来。5月底，列宁在第10次全俄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到了10月底，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列宁才最终形成了新经济政策的提法(后面我将介绍，列宁逝世后他的秘书们告诉我的关于这一时期列宁内心的一些想法)。

我继续去学习，被选为党支部书记，这对我妨碍不大，因为当时上级是有意识地让高等技术学校里的党的生活不要太活跃。

但是，1921年秋天全国为饥荒所笼罩，沒有任何市场，只能靠定量分配的口粮过活。口粮标准是每天一俄磅，即400克面包，天晓得，这面包是用什么废料做的，简直象油腻一样；另外，每月给四条生锈铁包的咸鲱鱼。学校食堂每天发一次麦汤粥，数量很少，里面一滴油也沒有，而且不知为什么也不加盐。这样下去，人是支持不了多久的，幸好到了夏天，可以到工厂去进行夏季实习。我和3位同志选择我故乡——莫吉廖夫市的制糖厂去实习，因为我们是化学系的学生。在那里我们可加了油水：口粮是发食糖，而用食糖可以交换任何食品。

秋天，我回到莫斯科继续学习。唉，由于我的定量吃不饱，到了1月我就消瘦下来了，身体日渐虚弱。1922年1月底我决定再次到乌克兰去。

在定量分析实验室我有个邻居，着人喜爱的青年大学生萨沙·沃洛达尔斯基。他是1918年夏天被工人谢尔盖也夫杀害的彼得堡新闻委员沃洛达尔斯基的弟弟。萨沙·沃洛达尔斯基是一个很可爱的谦逊的青年，当人们知道了他的姓名时，问他："请告诉我们，你是那位著名的沃洛达尔斯基的亲戚吗？"他回答说："不，不是，是同姓的。"

我征求他的意见：让谁接替我担任支部书记好些，他对此感到十分惊奇。我解释说：我要走，不能再挨饿了。

——为什么你不象我这样做呢？——沃洛达尔斯基问道。

——怎么做？

——我是半天学习，半天在党中央工作。那里有些工作可以带回家来做。正好，党的中央机关正在大大扩充，需要有文化的干部。你也去试试看吧。

我试了一下。过去我担任过县党委书记和现在担任高等技术

学校党支部书记的事实，竟成了重要的资历。于是，负责初选的中央总务部长、前全俄肃反委员会领导成员克谢诺冯托夫把我分配到中央组织部去，被组织部接受了。

第2章　在组织部里　党章

中央组织部　地方经验调研处　卡冈诺维奇的论文　党的代表大会　列宁作报告　新党章草案　卡冈诺维奇　莫洛托夫　斯大林　我起草的党章被采纳　洛斯库特卡　沃洛达尔斯基一家　马林科夫　吉霍米尔诺夫　拉·卡冈诺维奇　“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了……”　米哈依洛夫　莫洛托夫　中央通报起草委员会　《党的工作者手册》　《中央消息》杂志

在这个时期，党的机关得到了异常的扩大和加强。组织指导部当时几乎成了党中央最重要的一个部。它很快又与登记调配局合并，成为组织调配部。下面除设有组织和新闻等几个主要的处之外，还设立了一个次要的处——地方经验调研处，它的职责很不明确。我被任命为该处的普通一员。它的成员是：处长、老党员拉斯托普钦，以及5个普通工作人员。拉斯托普钦及其5个下属中的3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看成是高薪而清闲的临时差事。拉斯托普钦本人每周到班一次，每次只呆上几分钟。当人们问他，究竟大家应该干些什么工作时，他笑笑说：“你们自己发挥主动性嘛！”5个人当中，有3个人的主动性表现在为自己找比较更

合适的工作上，而且，在这一方面他们确实很快取得了进展。赖特经过一系列阴谋诡计之后，当上了中央责任指导员，之后，又出任某个省的省委书记。基齐斯耐心地等待着赖特的任命，在任命下来以后他们一同离开了。佐尔格（不是那个到日本去的佐尔格）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任务到国外去工作。只有尼·勃戈莫洛夫一个人想做些事情，他是奥列霍瓦祖也夫斯基的工人，很富有同情心，也很精干。后来，他成了组织部的部长助理，主管党的干部选拔工作，接着升任副部长。后来，由于某种原因他出使驻伦敦的商务代表。他在1937年清党时失踪，可能是牺牲了。

初期，我几乎没有做什么事，一边观察，一边继续学习。在艰苦的1921年以后，我的生活条件急剧恶化。整个1921年，在莫斯科，我不仅挨饿，而且生活在艰苦的居住条件之中。根据区苏维埃发给的登记票，我和我的朋友尤·阿基莫夫两个人，领到一间被征用的“资产阶级”的房间。房子里既没有暖气，也没有任何家具，仅有的全部设备就是放在窗台上的洗脸盆和水罐。冬天室内的温度下降到零下5度，连水罐里的水都结成了冰。幸而地板是木制的。我和阿基莫夫两个人钻在皮袄里，为了暖一些，紧紧挤在一起，睡在屋角的地板上。由于没有枕头，我们以书为代用品。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党中央工作人员的生活条件也不同了。分配给我的住房是在苏维埃5号楼里，过去曾是洛斯库特旅馆（特维尔斯卡亚大街5号），我们通常称之为中央5号楼，其中住的全是党中央的工作人员。不过，这里住的只是普通干部，负责干部住在克里姆林宫内，或者住在苏维埃1号楼（位于特维尔斯卡亚大街和莫霍瓦亚广场的拐角）。

虽然我的工作很少，但我很快就有机会接触到组织部部长卡冈诺维奇了。

在他的主持下召开了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指导会议，由于

运气好，我被派去担任这次会议的秘书。会上，卡冈诺维奇发表了非常精彩、内容丰富的演说。当然，我未作全文记录，只作了会议的简要记录。

几天之后，《苏维埃建设》杂志编辑部请卡冈诺维奇为该杂志撰写一篇重点文章。卡冈诺维奇回答说，他沒有时间写。这话是不眞实的，问题在于卡冈诺维奇虽然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和活跃的人，但他的文化水平很低，过去他是沒有受过什么教育的鞋匠，写东西文理不通，更谈不到写象样的论文了。由于我是会议秘书，编辑部提出要我来写，我答应试试看。

我把卡冈诺维奇的演说内容回忆了一下，然后，用论文的形式写了出来。可是，文章的思想不是我的，而是卡冈诺维奇的，所以我去对他说："卡冈诺维奇同志，这是您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论文，我把您在会上的演说整理出来了。"卡冈诺维奇读过之后，表示很欣赏，他说："确实，这些都是我讲过的话，可是你整理得多么好啊！"我说，我的整理和转述毕竟是次要的，而思想出自他的演说，所以应该由他署名，然后寄给杂志社。卡冈诺维奇当时还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他难为情地说："可是，这篇论文的作者是你，而不是我呀。"我沒有费力气就说服了他：我所以代他写是为了替他节省时间。后来，文章发表了，哎，甭提卡冈诺维奇是多么高兴了，因为这是"他的"第一篇论文，他兴高采烈地把文章拿给大家看。

这件事产生了后果。3月底4月初，召开了例行的党代表大会。我和组织部的许多其他青年干部一样，也被派到大会秘书处去协助做技术性工作。大会建立了一系列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起草委员会，等等。委员会是由一些年老资历深的党员——中央委员和来自地方的著名干部组成的，但是具体工作要由中央机关的青年干部来做，特别是起草委员会更是这样，我就被安排在这个委员会里。代表们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速记员记录下

来，然后把速记稿口授给打字员。打出来的初稿往往有很多错情和歪曲，因为速记员们对许多东西听不懂，还有许多东西听不清，有些东西也记不下来。好在，起草委员会给每一个演讲人指派一个工作人员，让他全神贯注地专门负责听演讲人的演说，然后，由他校对打出来的初稿，基本上定稿后，再由演讲者本人过目，只要作不大的补充、修改就最后定稿了。这样一来，节省了演讲人的很多时间。

在大会上，由列宁作中央政治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作这样的报告。当时产生了一个问题：从大会工作人员中选派谁去听记和做校对工作。这时候，卡冈诺维奇说："委派巴让诺夫同志吧，他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结果，就这样决定下来。

大会的主席台要比大厅地面高出一米半，如果面向大厅，在主席台的右角有一个小讲台，演讲者站在小讲台后面。讲台上放了一些备用纸张。按照早年苏联的习惯做法，从来不是事先写好稿子在会上照本宣科的，都是即席发表演说，最多报告人手上有一个简要提纲，以及一些数字和引文。在这个讲台前面有一个阶梯，报告人由此上下讲台。由于在列宁作报告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沿梯子登台，我就坐在阶梯上面，距离列宁只有一米远，我相信，这样我就可以把列宁的话听得清清楚楚。

在列宁作报告的时候，宫庭摄影师（名字好象叫奥楚布）拍摄照片。列宁不允许别人在他演说时拍摄影片，因为这会影响和打断他的思路；他只是勉强地同意拍摄两张非要不可的正式照片。摄影师先是从他的左侧拍照，在这张照片的背景上可以模糊地看到主席团，然后再从右侧拍一张，这张照片上只有列宁和大厅的一角。可是，在这两张照片上都有我站在列宁前面的镜头。

这些照片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说明是："弗·伊·列宁最后一次在党代表大会上演说"，"列宁同志最近发表公开演说"。直到1928年以前，报刊发表的照片上，都是我同列宁在一起。1928年

我逃往国外，在到达巴黎后，我开始读苏联的报纸，很快我在《真理报》或者《消息报》上看到了那张熟悉的弗·伊·列宁最后一次在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的照片。但是，照片上我的镜头不见了。很显然，是斯大林下令把我从照片上挖掉的。

1922年春，我逐渐地卷入工作，但更多的是研究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哨所，所以我很快就熟悉了国家和党的生活的基本过程。有一些细节需要进行更多的、长时间的研究。譬如，我曾经出席过1922年的第11次党代表大会，但是，我能够回忆起来的东西却很少。不过，我却清楚地记得政治局委员、工会领导人托姆斯基[①]讲话的情景。他说："外国指责我们是一党专政，这种说法不正确。我们这里有许多政党，但是，与外国不同的是，我们这里是一党掌权，而其它的政党都在监牢里。"对此，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14年之后，当斯大林的监牢之门向托姆斯基打开的时候，他是否曾经回忆起自己的这次讲话？不管怎样，他最后宁愿自杀身死，而不愿跨进牢狱的门槛。

必须公正地说明，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的领袖们还是信任的，认为其它政党都在受监禁，那就说明，这样做是必要的，而且这样更好些。

这一年的4～5月间，我了解到权力是如何演变的。当时，显而易见的是，权力日益集中在党的手中，而且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党的机关的手中。同时，我注意到一个重要情况：党和党的机关工作的组织形式决定工作的效率，而这些组织形式是由党章明文规定的。可是，党章迄今仍然基本上是1903年通过的那个老

---

① 托姆斯基——1904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出版社社长。在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大起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后被宣布为右倾机会主义者。

样子。在1917年夏季举行的第6次党代表大会上，曾经稍作修改。1919年的第8次党代表会议，又作了某些微小的改动，但基本上仍然是一个适应革命前的地下党的党章；它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是完全不适合的，严重地束缚着党的工作，其中没有明确规定所需要的形式。

于是，我着手起草一份新的党章草案，对旧党章作了重大修改。经过仔细校正之后，我用打字机打印出两份新、旧党章对照稿：左边是旧党章，右边是新党章，并标出了对旧党章的修改和新的补充之处。

我拿着这份文件去见卡冈诺维奇。他的秘书巴拉绍夫对我说，卡冈诺维奇很忙，不能接见任何人。我坚持说：

——你还是去报告一下，告诉他我有很要紧的事找他。

——唉，你会有什么要紧的事。——巴拉绍夫这样劝阻我。

——你还是去报告一下，否则我就不走。

巴拉绍夫报告了，卡冈诺维奇接见了我。

——巴让诺夫同志，我现在很忙，只谈3分钟。怎么回事？

——卡冈诺维奇同志，我给您带来一份新的党章草案。

卡冈诺维奇对我的鲁莽举动大为惊讶。

——巴让诺夫同志，你多大年龄了？

——22岁。

——入党几年了？

——3年。

——1903年我们党之所以分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完全是由于党章第一条的提法而引起的，这一点你是否知道？

——我知道。

——鉴于这种情况，你还敢于提出新的党章草案吗？

——我敢于这样做。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这样做的呢？

——原因很简单，党章早已过时了，它只适用于处在地下工作时期的党，完全不适合于一个执政党的生活要求，它不能为党的工作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形式。

——那你就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卡冈诺维奇看了新、旧党章的第1条和第2条以后，思考了一下说：

——这是你自己起草的吗？

——是我自己。

他要我对草案作些说明，我照作了。过了几分钟，巴拉绍夫推门探进头来提醒说，原来答应约见的一些人在外面等着接见，而且原定召开的某个重要会议的时间已到。卡冈诺维奇把他赶走了。

——我很忙，不能接见任何人，会议也延期到明天再开。

卡冈诺维奇把我的党章看了大约两个小时，兴致勃勃地玩味着，思考着。他要我对其中的一些提法作出解释，提出论据。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卡冈诺维奇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唉，巴让诺夫同志，你捅出漏子来了。

然后他拿起电话请示莫洛托夫说，他有要事相商，能否去见他。莫洛托夫当时是中央第二书记。

——如果时间不长的话，就请来吧。

——我们去吧，巴让诺夫同志。

——你看，——卡冈诺维奇一走进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就说，——你看，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提出了新的党章草案。

莫洛托夫也为之大吃一惊。

——他是否知道1903年的事……

——是的，他知道。

——尽管知道，他竟然还……？

——是这样。

——卡冈诺维奇同志，这个草案你看过了吗？

——看过了。

——那么，你的意见如何？

——我认为相当好。

——那就拿来看看。

在莫洛托夫那里的情况也是一样。他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逐条分析这个党章草案，我作了一些说明。莫洛托夫表示很感兴趣。

——这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我自己。

——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只好去找斯大林。——莫洛托夫看完党章之后说。

我被介绍给斯大林，把我说成是狂妄的年轻人，竟敢于触动那受人尊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宝。斯大林照例询问我的年龄，是否了解1903年的情况；还问我何以认为党章需要修改；然后，他也开始审阅和讨论这个草案了。之后，斯大林问道："那么，这是你自己写的吗？"这一次紧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你是否意识到，你的草案对党的工作和生活将有多么大的推动作用？"我回答说，我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同时，说明了我是如何理解这一演变的。关键在于，我的党章草案是党的机关用以进行权力之争的重要工具。斯大林明白这一点，我也同样明白。

事情的结局是很独特的。斯大林走近自动保密电话机。"您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吗？我是斯大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在中央这里认为，党章已经过时了。它不符合党的工作的新要求。旧党章适用于地下时期的党，现在党已经执政了。"看样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电话中表示同意了。斯大林接着说："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情况，起草了一个新党章草案，我们想

正式提出来。”列宁同意了，并说，应把这个问题提到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

政治局原则上表示同意，并把问题交组织局作初步研究。1922年5月19日，组织局建立了“党章修改委员会”，莫洛托夫任主席，成员有卡冈诺维奇及其助理利西岑和奥赫洛普科夫，我担任秘书。

从此以后，我进了莫洛托夫的圈子，干了一年的时间。

党章的事，我们搞了两个月。然后把草案分发给各级地方组织征询意见。8月初召开了全俄党代表会议，准备通过新的党章。代表会议开了3～4天。莫洛托夫在会上作了党章修改草案报告，代表们发了言。最后选出了以莫洛托夫为首的起草委员会，其中有卡冈诺维奇及一些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如米高扬，他当时是中央东南局书记；我也是成员之一，并担任委员会秘书。委员会对草案又作了修改，最后代表会议批准了。在这以后，草案又经过中央正式批准。

整个1922年我还是在中央5号楼——洛斯库特卡里度过的。住在这里面的党中央工作人员，按照私人关系和工作性质结成了一个一个的小圈子。我是通过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学生萨沙·沃洛达尔斯基的关系才来到这个地方的，并参加了他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与其说是以沃洛达尔斯基夫妇为中心，勿宁说是以三位女密友——列拉·戈鲁布佐娃、玛露霞·伊格纳齐耶娃和莉达·沃洛达尔斯卡娅为中心。列拉和玛露霞同萨沙·沃洛达尔斯基一样都是组织部新闻处的“情报员”，莉达是该处的秘书。严格地说，这些“情报员”根本不是什么情报员，而是分管一、两个省党组织的办事员。情报员负责收集关于这些党组织生活情况的材料，为组织部领导编写关于这些党组织里发生的重要情况的简报和定期报告。沃洛达尔斯基夫妇很好客。波里尼亚克常到他们家去，他们以有这一关系而感到自豪。使我深感惊奇的是，我了解到，

谦虚、稳重的萨沙在内战时期竟然担任过血腥的捷姆利亚奇卡①，即罗莎丽娅·萨莫伊洛夫娜的秘书，当年她作为第8军的党的领导人，是以进行枪杀和种种残酷行为而闻名的。

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除我之外，还有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和格尔曼·吉霍米尔诺夫。

格·马林科夫是列拉·戈鲁布佐娃的丈夫，他比我小两岁，当时年仅20岁，却极力摆出一副党的老干部的架子，实际上，他入党才1年。内战时期，他作为低级政治干部到过前线，然后，象我一样，到高等技术学校学习。由于沒有受过中等教育，他是从"工人"预备班开始学的，在高等技术学校学习了3年。后来，他的聪明的妻子把他拉进了中央机关，实际上，他之所以官运亨通，要归功于她。是她推动马林科夫走上我走过的道路——初期，他担任组织局的秘书，在我离开之后，他担任政治局的秘书。

他的妻子列拉要比自己的丈夫聪明得多。马林科夫本人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平庸之辈，沒有什么天才。他的表情总是傲慢的，妄自尊大的。不过，当时，他毕竟还很年轻。

格尔曼·吉霍米尔诺夫比我大一岁，他是莫洛托夫的第二助理。情况是这样的：1905年发生第一次半个革命②时，莫洛托夫是喀山的15岁的中学生，他与格尔曼的哥哥维克托尔·吉霍米尔诺夫（顺便说一下，他的父母非常富有）是同班同学，他们两人共同组织了一个喀山中学生非常革命的委员会，一起积极参加了1917年的革命。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维克托尔·吉霍米尔

---

① 捷姆利亚奇卡——著名的女革命家，——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莫斯科市委书记，领导过莫斯科十月武装起义。1918～1921年任北线和南线一些集团军的政治部主任。后来，历任中央委员、苏维埃监委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② 指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全国各地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但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

诺夫把一大笔钱捐献给党，使《眞理报》得以出版，而莫洛托夫被提升为《眞理报》编辑部秘书，报纸之所以能出版就是由于他的努力。1917年春，在革命发生后的头几个星期，莫洛托夫作为党机关报的领导人，几乎担任起党的领导角色，但党并没有把他看成是政治领袖，所以，莫洛托夫在这里停留的时间不长。

过了不久，中央委员加米涅夫①、斯维尔德洛夫②和斯大林来到彼得堡。然后，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③也到达这里，而莫洛托夫被派到地方去。1919年他担任中央驻伏尔加流域地区的全权代表。1920年担任中央驻下戈罗斯基省党委和省执委会全权代表。之后，1920～1921年，任顿涅茨省党委书记。自1921年3月起，他成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在一年的时间里，他担任中央责任书记，虽然不是总书记，但已经不是主管技术性事务的书记，如同在他之前的历任书记，象斯塔索娃那样了。1922年4月3日，斯大林接替他出任中央第一书记。莫洛托

---

① 加米涅夫（1883～1936）——第2次党代表大会后加入布尔什维克派。1917年不同意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十月革命后历任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2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3年重新恢复党籍。1934年被第3次开除出党，以反党叛国案被捕，1936年被处决。

② 斯维尔德洛夫（1885～1919）——早年参加革命，遭沙皇迫害，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12年。党的七大以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成为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革命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第一任主席。

③ 季诺维也夫（1883～1936）——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老党员之一，1917年曾表示不赞成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十月革命后历任彼得堡苏维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1932年再次被开除出党，1933年重新恢复党籍。1934年第3次被开除出党，以叛国罪被捕，1936年被处决。

夫只差一步就可以成为，更正确地说，保住党的机关的首脑地位，而党的机关当时正自动地走向权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选择了斯大林，而不是莫洛托夫，实际上，这完全是根据一个标准——他们需要由托洛茨基的死敌担任这个职位，斯大林正是这样的人。

1917年，维克托尔·吉霍米尔诺夫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主管侦缉行政工作。后来他被派到喀山去整顿秩序，1919年死在那里，好象是死于斑疹伤寒。

他的弟弟格尔曼1917年入党，在1921年以前，在军队里服役，一度在契卡的特别处工作，当他离开那里时有一些精神失常的症状。看来，契卡的"工作"不那么容易干。莫洛托夫来到中央时，把他带到自己的秘书室工作，并且成了莫洛托夫的第二助理，连续干了许多年。由于他同莫洛托夫是老关系，素以"你"称呼。但是，莫洛托夫待他却太不公平，经常加以呵叱和申斥。

格尔曼并没有特殊的才华。在莫洛托夫那里，他是私人秘书。莫洛托夫的第一助理——瓦西里耶夫斯基比他要重要得多，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格尔曼认为自己具有做契卡人员的天赋。最初，我感到很奇怪：按照他的职位，他应当住到苏维埃1号楼去，可是为什么他却住在洛斯库特卡呢？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因为莫洛托夫和瓦西里耶夫斯基，当时正在从住在洛斯库特卡的中央机关一般工作人员中物色他们需要的比较能干的人，而格尔曼认识这批人，生活上经常接触，研究他们，使用契卡的办法对他们进行"考察"，并做出能否加以信任的结论。所以聪明的列拉·戈鲁布佐娃利用同格尔曼熟识的关系，就把自己的丈夫弄进了中央组织局，再通过组织局这个莫洛托夫的王国，爬到了上层。她的这一招用得相当成功。

自从党章的事情以后，人们对我重视起来了。直到年底我一直是同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在一起工作。

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卓越之处就在于，他是在整个斯大林时代一直当权的仅有的两、三个犹太人之一。在斯大林推行反犹太人主义的情况下，这一点之所以成为可能，只能是由于卡冈诺维奇与自己的亲人和朋友们完全脱离了关系之故。譬如，众所周知，当斯大林的契卡分子向斯大林提出关于他的兄弟航空工业部部长米哈伊尔·莫伊谢耶维奇·卡冈诺维奇案件时，斯大林就征询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意见，而后者确信，他们准备毫无根据地杀害他的兄弟时，他仍然答复说，这是"侦察机关的事"，与他本人无关。结果，米哈伊尔·卡冈诺维奇在被捕之前就自杀了。

拉扎尔·卡冈诺维奇投身革命以后，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从1917年起，一直四处奔波。后来，他在下诺夫哥洛德省与莫洛托夫相识，后者提升他担任下诺夫哥洛德省的执委会主席，这次相识决定了他飞黄腾达的官运。不过，他仍然被调来调去，到过沃罗涅什、中亚，后来又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从事工会工作。1922年，莫洛托夫又从那里把他调到中央组织部任部长，从此他就青云直上。

在这一方面，有一件事起了不小的作用。1922年，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对委员们说："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他指的是自己和托洛茨基）。而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四十来岁的人。我们应该培养接班人，培养卅来岁和廿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起领导工作。"

在这个时候，还只限于培养30来岁的干部，确定了两个人：米哈依洛夫和卡冈诺维奇。

当时，米哈依洛夫28岁，是候补中央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1923年当选为中央委员，甚至让他担任了中央书记。不过，好景不长。很快就发现，米哈依洛夫对重要的国家大事不能胜任，便逐渐把他排挤到较低的工作岗位上去了。以后，他曾是德

涅泊河水电站建设工程的领导者。1937年他与其他一些人一起被枪决，原因是1927年时，他由于一时不慎支持了布哈林。总而言之，这个"接班人"挑选得不成功。

卡冈诺维奇比他能干得多。初期，他在莫洛托夫手下工作，后来逐渐成为与莫洛托夫平起平坐的主要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之一。斯大林经常调动他的工作，都是让他担任党机关中的最重要的职务：乌克兰党中央书记，联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再次担任党中央书记，而在需要的时候还让他出任过交通人民委员。对于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他都照办不误。如果说开始时他还有良心和人的其他一些品德的话，那么，后来为了要适应斯大林的种种要求，所有这些品德都丧失殆尽，并且象莫洛托夫一样，成为百分之百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从此以后，他对一切都习以为常，甚至连对数百万人的牺牲也无动于衷。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斯大林在世时也是同样极力投其所好而适应一切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却猝然摇身一变，竟然批判起斯大林主义来了。而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则不愿意再出现斯大林式的制度之外的其他制度，这样可以把螺丝钉拧得紧到极限。他们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他们自然地认为，在斯大林式的制度下，可以睡得平静一些，没有任何危险威胁这个制度；同时，对赫鲁晓夫实行的某些自由化措施，最终对他们平静安逸的领导职位，甚至对整个制度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感到心中无数。

1922年下半年，我继续在卡冈诺维奇领导的部门工作。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开始任命我去担任中央的各种委员会的秘书。作为委员会的秘书，我对他们两个人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新人才。我具有迅速而准确地用适当的词句表述问题的能力。卡冈诺维奇是一位活跃而聪明的人，善于迅速抓住一切问题的要害，可是不能运用文学语言加以表达，因此他对我是非常器重的；在各

委员会里，莫洛托夫对我更是倍加器重。

莫洛托夫并不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是一位具有非凡工作能力的官僚，善于夜以继日地工作。他把许多时间用来参加各种委员会的会议。在委员会里，能够很快就问题的实质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起草决议时，无休止的扯皮就开始了。只要你试图写出决议的一段措词，人们就竭力要塞进一些修正或反对意见，争吵不休，乱作一团，弄得连措词的头尾都难以分清。糟糕的是，莫洛托夫虽然能透彻地看出问题的实质，但是，他却苦于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述。

幸而，我能够轻而易举地想出措词来，很快找到必要的出路。每当我想好某种解决办法时，就举手要求发言，莫洛托夫就马上把讨论停下来，让我提出措词，然后莫洛托夫立即表态说："对，对，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措词，马上把它写下来，不然就会忘掉的。"我安慰他说，我不会忘记。他说，"请你把这段措词再重复一遍"，于是，我又重复一遍。就这样，会议宣告结束，也节省了许多时间。莫洛托夫说："巴让诺夫同志，你为我节省了大量时间。"此后，他就让我担任所有由他主持的不计其数的委员会的秘书。党中央的工作是通过委员会的形式进行的：凡属重大问题，经过初步讨论之后便设立委员会，对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拟订出最后的决议草案，然后提交组织局和政治局批准。

党中央最重要的委员会之一，是中央通报起草委员会。对一切重大问题，中央都要通过指示性文件，下达到各级地方党组织，这就是中央的通报。中央通报起草委员会负责制定这些指示性文件。这个委员会，有时由莫洛托夫主持，有时由卡冈诺维奇主持，我被批准担任这个常设委员会的当然秘书。关于地方党组织是否应该在农村开展春耕运动问题，关于是否需要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和换发新党证问题，以及关于是否需要开展认购新公债的运动问题，——凡此种种问题，都要以通报的形式下达指示。

我对这项工作很快便发生了兴趣。每天都要下达一些新的通报，但是，其中哪些仍然有效，哪些已经过时，哪些随着形势的发展或由于作出了新的决定而发生了变化，——对这些谁都搞不清楚。对这些日积月累的大量通报，地方党组织怎么可能弄得清楚呢？再者，如何能在这些数以千计的通报中，及时查找到急需的东西呢？我对地方党的官僚们的组织才能不抱任何幻想。最后，我采用这样的办法：把大量中央通报集中起来，把其中已经过时的，或已被取消的文件剔出去；把一切有用的文件收集到一起，编辑成册，再按照问题、方面、部分、时间和字母，分门别类地加以分编，以便一俟需要，按照索引就立即可以找出所需要的文件。后来，我到卡冈诺维奇那里去时，他已在期待我提供很象样的东西了。于是，我有点莽撞地使用了使他感到困惑的字眼儿，我说："卡冈诺维奇同志，我建议编纂党的法典。"这话乍听起来相当郑重其事。由于这个建议，卡冈诺维奇忙得不可开交，整个机器都被调动起来。莫洛托夫也表示非常满意。结果，编辑出一部有四、五百页厚的书，书名为《党的工作者手册》，由党中央印刷厂印制，之后，这本书逐年再版。

莫洛托夫还任命我担任《中央消息》杂志编辑部秘书。这是一份期刊，在名称上虽然与《全俄中央执委会消息报》相似，但是二者毫无共同之处。《中央消息》杂志是关于党内生活的机关刊物，编辑是莫洛托夫，正因为是由莫洛托夫负责编辑的，所以这份杂志非常枯躁乏味，是一份官僚主义的刊物，党的生活在刊物上丝毫得不到反映，杂志充满了中央文件和通令。我的秘书工作也是官僚主义的。正当我开始考虑如何设法摆脱这种无聊的文牍主义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新的任命：1922年底，我被任命为中央组织局秘书。这对我个人是突然的，而对莫洛托夫和其他一些人来说，却是早有准备的事了。

第3章　组织局秘书

组织局秘书　中央书记处　组织局　中央预算委员会　中央监委的党纪事件处理小组及“取得党中央同意”　组织局办公室　改组　莫洛托夫的秘书室　权力之争的实质　列宁　托洛茨基　列宁患病　《列宁遗嘱》　三巨头开始掌权　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　列宁的秘书室　福齐也娃和格利亚塞尔　斯大林把自己的秘书安插到政治局里　遭到挫败　我的任命

我开始成为党和国家机器中的一个略为重要的螺丝钉。我整天埋头于自己的机关工作之中，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绝，对于国家发生的事情只能通过党的机关的棱镜来了解。只是经过半年以后，我才开始从这文件的海洋中脱身出来。那时候，我掌握着全部情况，因而我能够将种种事实和材料加以对比，作出判断，进行概括，得出结论；能够看出事态的眞相及其发展的实际动向。

现在我越来越多地参与党中央的机关工作，它对我来说，秘密越来越少了。

组织局秘书的职责是什么呢？我作为秘书列席组织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会议，参加专门为中央书记处会议准备材料而召开的党中央各部长联席会议；其次，还参加党中央的各种委员会的会

议，最后，我还负责指挥组织局的秘书班子，即办公室。

按照党章的规定，经选举产生的党的中央机关，就其重要性而论，排列的顺序是：由三位中央书记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它的上级是组织局，组织局的上级是政治局。中央书记处是一个处于迅速演变过程中的机构，可能还是一个正以飞跃的速度夺取国家绝对权力的机构。但是，这与其说是指书记处机构本身，勿宁说是指它的总书记而言。

1917～1919年间，中央书记是斯塔索娃①，当时这还是一个纯技术性的职务；而残缺不全的中央机关由斯维尔德洛夫领导。1919年3月他逝世后，直到1921年3月，书记是谢烈布里亚科夫②和克烈斯廷斯基③，当时的书记是半技术性、半负领导责任的职位。自1921年3月起，中央书记由莫洛托夫担任。这时，已经带有"责任书记"的头衔。但是，1922年4月，中央全会选出了3位中央书记："总书记"斯大林，第二书记莫洛托夫和第三书记米哈依洛夫④（后来，很快由古比雪夫⑤接任）。此后，开始实行

---

① 斯塔索娃（1873～1966）——1898年入党。十月革命前任中央北方局书记等职。1917年2月～1920年3月任党中央书记。1921～1938年在共产国际工作。

② 谢烈布里亚科夫（1888～1937）——十月革命后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全俄中央执委会秘书、政治保卫局长。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

③ 克烈斯廷斯基（1883～1938）——1903年入党。1919年12月～1921年3月任中央书记。1930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

④ 米哈依洛夫（1894～1937）——1915年入党，党的"十大"后任中央书记。1922年起任莫斯科市委书记。

⑤ 古比雪夫（1888～1925）——1904年入党。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2年起任中央监委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6年起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30年为国家计委主席。

中央书记处会议制度。

关于中央书记处的职权范围，党章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党章中明文规定的是，政治局负责处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而组织局处理组织方面的问题。这就意味着书记处应解决的是一些不特别重要的问题，或者为组织局和政治局解决更重大的问题作些准备工作。但是，关于这一点，一则没有任何明文规定，二则党章中的说法很狡猾："书记处作出的任何决定，只要组织局成员中没有人提出异议，就自动成为组织局的决定；组织局作出的任何决定，只要政治局成员中没有人提出异议，就成为政治局的决定，即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面前可以对政治局的决定提出异议，但是不能阻止它的实施。"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书记处擅自决定处理某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在这一方面，从党内民主和党章的角度看，都无从加以反对，因为书记处似乎并没有篡夺上级机关的权力，而且上级机关对于它的决定完全可以随时予以改变或者取消。但是，如果中央总书记已经独揽了全部大权，正如同1926年以后所发生的那种情况，他就能够毫无顾忌地通过书记处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1927、1928年以前，政治局及其成员仍然有足够的权威，使得书记处不敢于作这样的尝试，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但是，从1929年起，斯大林对政治局的控制已达到如此地步，以致于他认为没有任何必要再通过政治局以外的什么其他机构进行统治了。而几年以后，政治局和书记处都成为执行他的命令的驯服工具，而且实际掌权者也已经不是按官位等级在形式上担任最高职务的人，而是同斯大林关系最亲近的人；在中央机关里，他的秘书的身价要高于部长会议主席或任何一个政治局委员。

不过，这里暂且谈的还是1923年初的情况。中央书记处会议

的主持人是中央第三书记鲁祖塔克①，他成功地接替了古比雪夫，后者调任中央监委主席。在书记处会议上，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只是有表决权的中央书记。党中央各部部长都可列席会议，但只有发言权，如：卡冈诺维奇，塞尔佐夫，斯米多维奇（妇女部）和其他几个部长（他们人数不少，如中央总务部长克谢诺冯托夫，财务部长拉斯金，统计部长斯米特恩，还有新上任的部长，如情报部长和新闻部长等）。还有中央书记们的主要助理。鲁祖塔克主持会议的水平很高，很熟练。他对我非常亲切，还请我吃糖果，——他戒烟后一直用含糖的办法代替吸烟。

组织局会议由莫洛托夫主持。组织局的成员是：3位中央书记；中央最主要的几个部的部长卡冈诺维奇、塞尔佐夫；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这个部门相当于中央的部级单位）；此外还有2～3名被选为组织局成员的中央委员，一般是中央工会理事会书记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关心的事，是使组织局的组成人数尽量少些，只让他们在党的机关中的亲信参加。问题在于，组织局的工作对于斯大林极为重要，因为它负责选拔和调配党的干部：第一，它要为所有部门配备干部，这还不是最重要的；第二，它负责调配党的机关的全部领导干部——各省、州和边疆区党组织的书记和主要负责干部，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这可以保证斯大林在未来的党代表大会上得到多数票，——而这是取得权力的基本条件。这项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而令人非常惊奇的是，浮在高级政治云层上面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此事却没有给以特别重视，而当他们醒悟到这件事的重要性时，为时已晚。

---

① 扬·内·鲁祖塔克（1887～1938）——1905年入党。1920年起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总书记。1921～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以后历任交通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等职。

第一个组织局建立于1919年3月，即在第8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它的组成是：斯大林、别洛博罗多夫①、谢烈布里亚科夫、斯塔索娃和克烈斯廷斯基。从它的成员可以看出，它的任务是组建党的一些技术部门及其力量的配备。以后，情况完全变了：随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组织局就变成他用以排除异己，安插亲信，进而控制所有地方党组织的重要工具。

我与莫洛托夫已是老相识了。他对我深为满意。象过去一样，他仍然让我担任中央所有委员会的秘书，这使我能够迅速地掌握机关的情况。

例如，中央有个预算委员会，它是一个常设委员会，主席是莫洛托夫，我是秘书。它的组成是：两位中央书记——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但是斯大林从未参加过委员会的会议)，中央财务部长拉斯金。在这里我很快就明白了，拉斯金和我出席委员会会议只须做一件事：把莫洛托夫的决定记录下来。幸好，拉斯金发言不多，他是一个从小就侨居国外，并周游列国的俄国犹太人，他的俄语讲得实在叫人难以听懂，我想，当他讲其他语言的时候，情况大概也是如此。财务部里的工作人员们都说："拉斯金同志精通世界各国的语言，只是自己的语言除外。"

预算委员会，一方面，负责审议和批准中央各部的预算，这时各部部长都参加会议，并极力为各自部门的利益辩护，莫洛托夫同他们争论，但是最后拍板的当然还是他。另一方面，这里涉及的数字很大：预算委员会负责批准所有外国兄弟共产党的预算，但不准许任何兄弟党的代表与会，而只让共产国际总书记皮亚特尼茨基出席报告情况。莫洛托夫分配这些"天降食物"是独断专行的，不容争辩的。对他据以拍板定案的一些考虑，我并不都理

① 别洛博罗多夫(1891～1938)——1907年入党。1918年起，历任一些地区革命军事委员会要职，中央东南局书记，内务人民委员等。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0年恢复党籍。

解。拉斯金客气地向我说明了资助各兄弟党的办法——通过对外贸易垄断组织隐蔽地把资金送去。

我也很快地了解到"党的良心"——中央监委党纪事件处理小组这一机构的工作情况。

国家的制度使得全体居民毫无权利，完全处于格伯乌的魔掌之中。只要根据格伯乌一个隐名"三人小组"的一纸命令，非党公民就随时可能被逮捕、流放、处以多年监禁或枪杀。但是，在1923年，格伯乌还不能任意逮捕党员，只是在8、9年以后才能够这样做。一个党员进行盗窃、杀人、或者违反了党的法令，首先要由地方的党的监委审理，而一些地位较高的党员，则由中央监委，确切地说，由中央监委的党纪事件处理小组，即被指定专门主管此事的中央监委的几个委员处理。只有那些被党纪事件处理小组开除出党的党员，才会落入法院或格伯乌的魔掌。党员们到了党纪事件处理小组面前，都是胆战心惊。对他们一个最大的威胁是："把你的案件上报中央监委处理"。

在党纪事件处理小组的会议上，一些老喜剧演员，象索尔茨①之流，制造审讯和迫害，大唱关于党员崇高道德准则的高调，并把自己装扮成"党的良心"。实际上，存在两种作法：一种是，当案件涉及的是小人物和纯属刑事案件，譬如党员犯了严重盗窃罪的时候，索尔茨就根本没有必要出面作特别表演；另一种作法是，当问题涉及地位较高的党员时，这里有一个任何人都不晓得的格伯乌的情报机构，它的活动是在格伯乌的局务委员彼得斯、拉齐斯和曼霁夫等的帮助或直接参与下谨慎地进行的。这些人由于工作需要而成为中央监委成员。如果案件涉及的是反对派党员或斯大林集团的敌人，格伯乌的材料，不管是正确的还是专门为败坏

① 索尔茨——十月革命后担任领导工作，1920年起为中央监委委员，1921年起任监委主席团委员，后为苏联最高法院法官。

名誉而捏造的，统统隐蔽、秘密地通过中央总务部长克谢诺冯托夫（老契卡成员，前全俄肃反委员会成员）及其副手、契卡人员布里扎诺夫斯基之手，送到斯大林的秘书处，到了他的助理卡涅尔和托夫斯图哈手里。然后以同样秘密的方式指示党纪事件处理小组应该如何处理："开除党籍"、"撤销领导职务"、或者给以"严重警告"处分等。至于按照指控的罪名去具体捏造罪状，那就是党纪事件处理小组要做的事了。大唱关于党的道德准则的高调，以及对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故意吹毛求疵地加以挑剔，这丝毫也不困难。譬如，一个党员给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所得到的稿酬超过党员最高工资30个卢布，索尔茨可以就此歇斯底里地发作一番，就象在艺术剧院演戏一样。总之，得到卡涅尔的指令后，索尔茨或雅罗斯拉夫斯基[1]就会装腔作势，煞有介事地表示愤怒：一个共产党员怎么可以触犯党的金袍[2]的圣洁！然后，就把他们从卡涅尔那里收到的处分决定加以宣布（关于卡涅尔和斯大林秘书室的情况，我们后面还将谈到）。

但是，党章中有一条规定：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决定必须取得同级党委的同意，中央监委的决定必须取得党中央的同意。取得同意的办法是这样的。

每次组织局会议结束后，委员们都纷纷离去，只有我和莫洛托夫两人留下。莫洛托夫审阅中央监委的记录。其中列举出对一系列案件的决定。例如，"关于对伊凡诺夫同志控告的案件"，监委决定："把伊凡诺夫同志开除出党"，或者"3年内禁止伊凡诺夫同志担任负责工作"。对上面给党纪事件处理小组的全部指令了如指掌的莫洛托夫，在监委的决定上打上一个钩号。于是，我就在组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苏联历史学家、政论家、科学院院士。1921年任党中央书记，1923～1934年任中央监委书记。

② 指15～17世纪俄国沙皇穿的礼服，意同于宗教里的法衣、袈裟等。

织局的记录上写上："同意中央监委××日记录第××条中所述关于伊凡诺夫和西多洛夫同志案件的决定"。如果莫洛托夫对中央监委决定"予以严厉处分"这一条不同意，他便打上一个叉，并批示"开除党籍"。而我则在组织局的记录上写上："关于伊凡诺夫一案，建议中央监委对××日决定的第××条予以重新审议"。当索尔茨收到这份记录后，打电话问我："应该如何决定？"我便在电话中把莫洛托夫在报告上的批语通知他。于是，在下一次中央监委的记录上便出现了这样的内容："重新审议了××日的决定，考虑到所提控告的严重性，中央监委党纪事件处理小组决定：开除伊凡诺夫同志的党籍"。不言而喻，组织局，即莫洛托夫，对这个决定会表示同意。

我领导的组织局的办公室，是由十几名经过严格审查的忠诚可靠的工作人员组成的。整个组织局的工作被认为是机密的，而政治局的工作则更是高度机密的。因而，为使接触机密的人数尽量少些，就把编制压缩到最低限度。结果，工作人员们的工作高度紧张，实际上，大家没有个人的生活，早上匆忙马虎地吃点东西，八点开始上班，到深夜一点工作才结束。可是，工作仍然搞不好，因为整个组织局被淹没在文件的海洋之中，杂乱无章，需要什么东西都难以找到，文件是按照陈腐的收发文的方法登记的。每当中央书记需要某种参考材料或档案文件时，就得在档案的汪洋大海中长时间地找来找去。我感到，这种组织工作办法是完全不中用的，我把这一套取消，改用卡片制。我搞来几套卡片，上面写好每份文件的标题。总共建立了 3 种按字母顺序排列的目录卡片。这样，一切逐渐井然有序起来。

经过2～3个月后，中央书记提出索取文件和资料时，用不了一分钟就能够送上去。过去，中央各部都认为，同组织局的办公室打交道毫无希望；而现在，人们对它的工作效率之高感到惊讶。莫洛托夫非常满意，对我赞不绝口。可是，他自己却没有察觉

到，他这样做恰恰为我的调离准备了条件，因为政治局办公室的情况同样也是乱糟糟的，所以，斯大林开始考虑，若是调我去那里加以整顿倒不错，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关于这件事后面我还要谈到。

事情的后果对我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来说完全出乎意外。开始时，他们极力反对我搞的改革，还向中央书记们发牢骚说，他们已无法再同我一起工作下去。在我仍然坚决实行改革后，而且效果也很明显时，他们反对的声音实际上停止了。过去，他们把每天的工作时间都白白浪费在长时间进行无成效的查找之中。现在，整个工作进行得既迅速，又准确，工作量也大为减少。现在大家上午 8 点上班，到下午 5 、 6 点钟工作就结束了。这样，他们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有了，也可以有自己的私生活了。那么，他们对此满意吗？不，恰恰相反：过去，他们都把自己看成是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由于尽义务而成为蒙难者的英雄；而现在，他们觉得自己成了不过是在条件优越的机关里坐办公室的一般工作人员而已。我察觉到，他们都深感失望。

在工作中我经常与莫洛托夫的秘书们接触，同时，也已经常同斯大林的秘书们打交道了。

在莫洛托夫的秘书室里，为首的是他的首席秘书瓦西里也夫斯基。他动作敏捷，精力充沛，是个精明强干的人。他人瘦瘦的，有着一张瘦小而聪明的面孔。他负责安排莫洛托夫的全部活动，善于迅速而清晰地掌握一切事情的细节。他同莫洛托夫相当亲近，以“你”相称，受到莫洛托夫的完全信任。关于他过去的经历，我搞不清楚，好象他曾经是沙皇时代的军官，大概是陆军中尉。后来，十月革命以后，当上了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26年，在我离开党中央以后，就同他失去了联系，再也没有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莫洛托夫的第二助理是格尔曼·吉霍米尔诺夫。实际上，他是

莫洛托夫的私人秘书。他没有什么高明的点子，所以，我常常感到好奇：莫洛托夫是怎样使用这样一个私人秘书的。不过，莫洛托夫的第三和第四助理鲍罗运耶夫斯基和别洛夫也不怎么样。格尔曼同莫洛托夫也很亲近，以"你"相称，不过莫洛托夫对他的工作并不赏识，但是能够容忍他。2～3年以后莫洛托夫任命吉霍米尔诺夫担任党中央档案馆馆长，但他只能管理无关紧要的文件，因为全部最重要的文件统统由斯大林的秘书室和斯大林的秘书托夫斯图哈负责掌管。

在同莫洛托夫秘书室打交道的过程中，我更多地了解到党的上层领导的内幕，对正在进行的权力之争的隐蔽实质也开始有所了解。

在革命后和内战期间，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合作是非常融洽的。直到1920年底内战结束时，全党和全国都认为，在党的所有领导人中，列宁和托洛茨基是遥遥领先的革命领袖。其实，领导整个战争的一直是列宁，可是在国内和党内对这个情况知道得不多，而往往倾向于认为，胜利主要归功于作为红军的组织者和首领的托洛茨基。但是，托洛茨基的荣耀对列宁来说是不大能够接受的，列宁预见到，在进入和平建设时将发生危险的大转折。同时，为了保住领导权，他需要在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在中央委员会里保持多数地位。其实，无论在革命前，还是在1917年，列宁及其所建立的党曾经多次处于少数，并且费了很大气力才重新取得多数地位。在革命以后，这种情况又重演了。譬如，请回忆一下，在关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对德和约这样特别重大的问题上，他是怎样在中央遭到挫败而陷入少数地位的。

列宁想使自己摆脱危险，保证自己争取到多数。他看到，对他的领导地位的可能的威胁，只能来自托洛茨基。1920年底，在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中，列宁力图削弱托洛茨基的地位和降低他的影响。列宁还加紧玩弄手法，意欲在交通问题上置托洛茨基于

尴尬地位。当时迫切需要恢复瘫痪了的铁路交通，列宁明明知道托洛茨基完全不适于搞这项工作，同时，当时也不具备实现这个任务的客观条件，但是仍然任命托洛茨基为交通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把自己的全部积极性、热情、口才和雄辩家的本领统统倾注在这项事业中，但是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到头来还是落得个下不来台。后来，托洛茨基自己认识到打了败仗而离职。

在中央，列宁从托洛茨基的敌人当中培植了一批自己的亲信。托洛茨基最凶的敌人是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之成为托洛茨基的敌人是在1919年秋后，当时尤登尼奇[1]对彼得堡的进攻进展顺利，季诺维也夫张惶失措，放弃了领导，而托洛茨基到达该地之后，才扭转了局面，为此，他对季诺维也夫采取轻蔑和欺辱的态度。从此，他们两人结下了仇恨。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仇恨也并不少。整个内战时期，斯大林作为一些军团和前线军委会的成员，一直处在从属于托洛茨基的地位。托洛茨基要求加强纪律性，严格执行命令和使用军事专家；而斯大林却依靠地方上的无组织无纪律、自由散漫的人马，始终拒不执行军事总部的命令，拒不服从托洛茨基的领导，因为托洛茨基是个犹太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进行激烈的抨击，列宁不得不出面进行仲裁。

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并没有个人恩怨，他的功名心不那么特别强，也不善于搞阴谋诡计。加米涅夫参加了季诺维也夫一派，并追随季诺维也夫。列宁把自己这一派人的地位摆得很高。季诺维也夫被安排到共产国际首脑的位置上（当时托洛茨基对此事的反应尚较缓和，因为他自己已身居要职，在内战时期担任军队首脑），这一点自不消说。列宁还让加米涅夫担任他在人民委员会方面的首席副手，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经济（劳动国防委员会）的

---

[1] 尤登尼奇——沙俄将军。十月革命后是白匪西北军总司令。1919年曾两次企图占领彼得格勒，未能得逞。

最高领导权交给了他。在1922年中央4月全会上，根据季诺维也夫的主张，加米涅夫提出任命斯大林为党中央总书记的建议。当时，列宁虽然对斯大林非常了解，但对此建议并没有表示异议。结果，1922年3～4月间，这个集团在列宁的控制下，为列宁确保了多数的地位，使得托洛茨基已不再是个危险的人物了。

但是，1922年5月25日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使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列宁的病第一次严重发作。列宁在晚年曾不止一次地患过病：1918年8月，由于范尼·卡普兰的暗杀，使他负了伤；1920年3月他得过重病；1921年底～1922年3月底，他因病离开工作岗位。但是，他后来又恢复健康，并于1922年3月27日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政治报告。当时，他重新亲手掌管一切。但是，5月25日的突然发作打乱了全部计划。直到1922年10月，列宁实际上没有视事，而且医生的诊断结论说，这仅仅是危局的开始。当然，这是保密的，只让政治局委员们知道，而全国人民却毫无所知。在这次发作以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了“三巨头”体制。他们都把托洛茨基视为主要对手，但是还没有广泛展开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因为到了6月，列宁又出人意料地开始康复，他的健康状况日益好转，并且从10月初开始又重返工作岗位。10月20日，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他还发表讲话，11月3日又在共产国际第4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报告。列宁这次返任后，重新又把一切都抓了起来。列宁就民族政策问题把斯大林痛斥一顿，因为斯大林实行的政策比俄罗斯化还要集中，在他起草的宪法草案中规定，要建立一个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而列宁要求建立的是各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联盟，预先考虑到随着东方和西方革命的胜利，其他国家将来也可能加入这个联盟。列宁本来还准备就斯大林及其战友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同格鲁吉亚中央之间发生的冲突事件，把斯大林责骂一通，但是未及这样做。1922年10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

的情况下，通过了关于削弱对外贸易的垄断的决议。12月列宁回来以后，在新的中央全会上取消了10月全会的决议。看来，列宁自己重新又掌管了一切，而“三巨头”又重新扮演起列宁的亲近助手和执行者的角色。

但是，医生们的诊断是正确的：这种健康情况的好转只是短暂的。12月16日，列宁的病情再次恶化，到了12月23日，病情又严重加剧。

12月初，列宁知道他已危在旦夕。因此，他对维护在中央的多数地位以及同托洛茨基的竞争问题的关切就化为乌有了；同时，更使列宁感到不安的是，在他几个月患病期间，党的机关的权力，以及——与之相适应——斯大林的权力迅速增大。所以，列宁便采取同托洛茨基接近的步骤，并开始严肃地考虑如何限制斯大林的日益增大的权力。列宁决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首要的是组织方面的措施。这时候，列宁自己已经不能亲手撰写文章，需要把内容口授给自己的秘书。首先，列宁要采取一项双重的措施：一方面要大大扩充中央委员会的组成，就是说要削弱党的机关的权力；另一方面，要改组和大大扩充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组成，使之能够与党的官僚主义机关相抗衡。

12月23日和26日，他口述了第一封《致党代表大会的信》，即致订于1923年3～4月间召开的第12次党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在该信中谈到扩大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这封信送到中央，交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把它扣压了起来，并在4月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乘当时列宁已完全脱离实际工作岗位的机会，把列宁的这个建议作为他自己的建议提出，只是把它说成似乎是符合列宁思想的。结果，扩大中央组成的建议被通过，中委的人数从原来的27人增加到40人。然而，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是与列宁的思想背道而驰的：增加他自己的经过挑选的中央委员人数，从而增强他在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地位。

12月24日和25日，列宁又口述第二封《致党代表大会的信》，这就是通常被称之为《列宁遗嘱》的信件。列宁在该信中，给党的一些著名领导人作了鉴定性的评价；提到关于他逝世之后党的领导问题，总的来说，他主张实行集体领导制度，但是他仍把托洛茨基摆到首要地位。实质上，这封信还是写给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的(即订于1923年4月召开的第12次代表大会)。列宁命令把这封信密封起来，并让秘书在上面写明，此信只能在他逝世之后拆封。诚然，值班女秘书没有在信封上写明列宁逝世后拆封，但是把这一点转告给克鲁普斯卡娅[①]和其他几位秘书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受列宁这个命令约束的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十二大”之前没有将信拆开，因为当时列宁仍然在世。

与此同时，列宁在继续思考这些问题。几天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撤销斯大林担任的党的总书记的职务。1923年1月4日或5日，列宁就此事对《遗嘱》又写了一个著名的附笔，其中指出了斯大林的粗暴及其他缺点，告诫党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列宁的这段话是附加在他的《致党代表大会的信》的后面，并加以密封的。克鲁普斯卡娅在党的“十二大”前也未拆封。但是，列宁的秘书们知道《遗嘱》的内容，并且把这些都转告给了克鲁普斯卡娅。

最后，列宁在他口述的《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中阐述了他的计划的第二部分。他的这篇文章是在3月以前口述的。这篇文章未经周折地送到了中央。工农检查院在6月进行了改组，从形式上看，这是按照列宁的计划做的，但实际上，又是按照斯大林的意图行事的。

2～3月间，列宁的病情稳定。在这个时候，列宁下定决心要同斯大林及其主持下的官僚机构进行斗争。在列宁的坚持下，2

---

① 克鲁普斯卡娅——苏共著名活动家，列宁的妻子和战友。

月底建立了反对官僚主义委员会。这里，列宁首先是针对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列宁希望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能亲自领导反对斯大林的斗争，即使是卧病不起，也要在病房进行领导。

然而，在12月中旬，当列宁健康状况第二次恶化（医生们认为，这实质上是第二次中风）后，斯大林决定，对列宁已经可以不需要特别顾忌了，他开始粗暴地对待代表列宁同他谈话的克鲁普斯卡娅。1923年1月，列宁的秘书福齐也娃向斯大林索取列宁要看的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材料时，斯大林竟断然拒绝提供，宣称："没有政治局的同意，我不能给他。"3月初，他极其粗暴地辱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以致使她流着眼泪跑到列宁身旁。愤怒的列宁口授了一封给斯大林的信，宣布同斯大林断绝一切私人关系。同时，列宁感到极度焦急不安，接着，于3月6日第三次中风发作，从此以后，他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全身瘫痪，几乎不省人事。从此，他再也未能重返政治舞台，此后的10个月，实际上是逐渐死亡的过程。

上述这些情况，我是在1923年初从莫洛托夫的秘书们得到的第二手材料中了解的；几个月之后，我又从斯大林和列宁的秘书们那里了解的第一手材料中得到了证实。

从1923年1月起，三巨头开始行使权力了。在头两个月里，他们还耽心托洛茨基会与正在逐渐死亡的列宁结成联盟，但是在3月发生的那次中风以后，列宁已不能视事，因而三巨头认为可以着手策划搞掉托洛茨基的斗争了。但是，在夏季到来之前，三巨头主要致力于巩固自己的地位。

1923年4月17～25日，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当时的根本问题在于，由谁向代表大会作中央政治报告——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政治文献。过去这种报告一直是由列宁作的；而这一次，谁作这个报告，谁就将被全党视为列宁的接班人。

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建议由托洛茨基在大会上宣读报

告。其实，这是斯大林的一种阴谋手法。当时他一直在大力做工作，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可是在两年以后他才在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而当前还需要争取时间和麻痹托洛茨基。

然而托洛茨基却天真得令人吃惊，他表示拒绝由他作报告，他说，他不愿意使党误认为他是在篡夺正在病中的列宁的职位。同时，他提议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宣读这个报告。我能够想象出季诺维也夫此时此刻的内心状态。不过，斯大林也表示拒绝这样做，因为这时他清楚地估计到，全党对此将会感到不理解，也接受不了这种安排：任何人都不认为斯大林是党的领袖。

最后，在加米涅夫的帮助下，决定委托季诺维也夫宣读中央政治报告。由于他身为共产国际的主席，所以，当需要什么人在列宁患病期间暂时代替他时，季诺维也夫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这样，在 4 月的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了政治报告。

在5～6月间，三巨头继续加强自己的阵地，但是全党并不认为季诺维也夫是党的领袖，而是把他视为第一号人物。加米涅夫既是第二号人物，又在事实上代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他还负责主持政治局会议。斯大林则是第三号人物，但是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地下工作，致力于争取未来的多数地位。然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却未考虑这项工作，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从政治上败坏托洛茨基的名誉，进而把他逐出权力中心。

列宁由于失去工作能力而不能视事，但是他的秘书室却在照常进行工作。实际上，列宁有两个女秘书：格利亚塞尔① 和福齐也娃②。在列宁患病期间，在列宁身边的其他工作人员中，还有

---

① 格利亚塞尔——1917年入党，列宁的秘书。1924年以后，相继在苏共中央列宁研究院、马恩列研究院工作。

② 福齐也娃——1904年入党，1918年起任列宁的秘书。1933年后在重工业部和列宁中央博物馆工作。

沃济季切娃和萨·弗拉克谢尔曼两人，同秘书们一起担任“值班秘书”工作。他们轮流值班，以便一旦列宁要口授某种信件、指示或文章时，随时准备由他支配。后来，萨·弗拉克谢尔曼转到小人民委员会工作，这是一个使人民委员会的法令草案具有相应的法律形式的委员会，她担任委员会秘书。福齐也娃的正式职务是苏联人民委员会的秘书，后来继续同加米涅夫一起工作，并且向加米涅夫透露了一些列宁秘书室里的小的机密，以便保住自己的职位。可是，加米涅夫毕竟不是斯大林，他对列宁的日常生活琐事不大感兴趣。

列宁的两个秘书中，最主要的骨干是玛·伊·格利亚塞尔，她是列宁手下主管政治局事务的秘书。莉·福齐也娃是协助列宁主管人民委员会事务的秘书，整个俄国都熟悉福齐也娃的名字，因为她多年来一直与列宁一起签署所有的政府法令。但是任何人都不知道格利亚塞尔这个名字，因为政治局的工作是绝密的。可是，一切根本性的，最重要的问题都发生在政治局里。而在政治局会议上所有最重要的决定和决议，都由格利亚塞尔负责记录；然后，才由人民委员会“按照苏维埃的程序加以处理”，所以福齐也娃只需注意使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准确地符合政治局的决议即可，而不象格利亚塞尔那样直接参与决议的准备和起草工作。

格利亚塞尔在政治局、中央全会和政治局下设的重要委员会的所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这是一位矮小、有点驼背的女人，有一张聪明但不大随和的脸。她是一位出色的秘书，聪明绝顶的女人。当然，她自己不撰写什么，但是能深刻地理解政治局辩论的全部情况和列宁口述的一切，并能准确而迅速地记录下来。她保持了列宁的精神，而且，由于她了解列宁生前最后几个月里对斯大林的官僚机构极其憎恨，她丝毫无意投靠这个机构去为之效劳。斯大林决定，该是把她搞掉并用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的时候了，因为政治局秘书的职位极端重要，这里集中了党和权力中心

的全部机密。

1923年6月底，斯大林在征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意的情况下，解除了格利亚塞尔的政治局秘书职务。可是，要找到接替她的人谈何容易。担任政治局的秘书，要求具备许多品质：作为会议的秘书，他不仅要很好地理解所有的辩论的焦点和政治局内所发生的一切的实质所在；同时，他还必须：1)密切注意辩论的过程；2)注意及时向政治局全体委员提供一切所需要的材料；3)指挥那些由于与所讨论的每项议程有关而被召来的达官贵人们进出会场；4)每当讨论中出现某种错情，人们忘记了过去已就同一个问题作出过不同决议时，他要及时干予、提醒；5)在作好所有这些工作的同时，还要及时把决定记录下来；6)要成为政治局的记忆中心，迅速提供所需要的一切资料。

格利亚塞尔对所有这些工作都能完全胜任。而斯大林却企图用他的两个秘书——纳扎列齐扬和托夫斯图哈取而代之，指望他们两人分工合作，能够完成她的工作。

但是，这一尝试以彻底失败而告终。纳扎列齐扬和托夫斯图哈不能同时全神贯注地去完成全部任务，他们对事物反应迟钝，思路混乱不清，不得要领，不知道实质之所在。因此，政治局的工作明显受到损害。政治局委员们看到这是失败，但仍然默不作声。

最后，托洛茨基发作了。事情的导火线是讨论外交人民委员部[①]致英国政府的照会稿。这份照会稿是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在政治局讨论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秘书们在会上没有抓住意见的实质，因而就没有做相应的修改。结果，在会后不得不分别去找各位政治局委员，请他们进行修改，就照会文本进行协商等等。

---

① 即苏联外交部

托洛茨基在此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写了一张条子。这张纸条仍然保存在我这里，当时是纳扎列齐扬交给我的。托洛茨基在条子上写道：

“仅供政治局委员们参阅：李维诺夫同志说，关于照会问题的讨论，秘书们没有作任何记录。这怎么能行呢！今后必须保证要有一个正确的规矩。秘书们面前应当放一份照会稿（我事先已经分发了）并作记录。否则，会发生误会。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阅后在条子上写道：“需要有一个速记员。季”。

布哈林写道：“同意。布”。

斯大林对这次挫折大为不满，以其固有的粗暴和不诚实的态度写道：

“小事一件，不值一提。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托洛茨基和契切林自己作了记录的话，秘书们本来是会作记录的。相反，讨论这样的问题时，为保密起见，秘书们不宜再作单独的记录。斯”。

托姆斯基：“不需要速记员。托”。

加米涅夫：“速记员是需要的，但必须是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他协助会议秘书工作。加”。

这份文件上的黑线，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自己划上的。

为什么我说斯大林显然是不诚实的呢？他使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一句，意在强调说明：似乎所讨论的照会问题是高度机密的。其实，这不过是政治局的一般做法，有大量的问题是同样机密，甚至是更加机密的，说有些问题对政治局的秘书们也不能信任，不能让他们作记录，这不仅是愚蠢的，而且也是作不到的。但是，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托洛茨基之所以在纸条中写上“仅供政治局委员们参阅”一语，正是为了说明，斯大林根本不重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但斯大林却故意把这张纸条交给了纳扎列齐扬本人，而这恰恰是不该让秘书本人看到的东西。

但是，斯大林不得不作出让步。本来，对斯大林来说，若是

能让自己的亲信纳扎列齐扬和托夫斯图哈继续担任政治局秘书，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可是，这偏偏又行不通！于是斯大林考虑：有一个人，巴让诺夫，他出色地胜任了组织局秘书工作，那么，也就很可能胜任政治局的秘书工作。可是，他能否成为自己的心腹呢？这还是个问题，需要冒点风险。

1923年8月9日，中央组织局通过了下述决定："任命巴让诺夫同志担任中央书记斯大林同志的助理，解除他的组织局秘书职务"。在这个决议中斯大林只字未提关于我担任政治局的秘书工作问题。这是经过精心考虑的。我被任命担任他的助理，而对政治局秘书的任命这完全是他的特权：他既可以任命自己的助理担任这一职务，也可以任命他认为需要的任何人担任这一职务。后来，他又选中了马林科夫，不过马林科夫之成为他的助理，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第4章　斯大林的助理
——政治局的秘书

政治局会议议程的确定　三巨头权力的机制　政治局的技术工作机构　格伯乌的机要文电通讯队　绝密件　塔·哈扎诺娃　斯大林的秘书室　纳扎列齐扬　分工　卡涅尔　苏维埃1号楼　党中央办公大楼第5层　开始与斯大林共事　自动保密电话　斯大林同志“听”电话　充实骑兵和700万美元　政治局会议

纳扎列齐扬在向我移交政治局秘书室工作的时候，这样对我说：“巴让诺夫同志，你想象不到你现在担任的职务是何等重要。”确实，直到两天后我第一次汇报政治局例会议程草案时，我才真正体会到它的重要性。

政治局是中央权力机关。它决定国家管理，甚至领导世界革命方面的一切最重大的问题。它每周举行2～3次会议，列入议事日程的问题有上百个，有时甚至达150个。有时，还要召开特别的紧急会议，就某些紧急问题作出决定。凡提请政治局对某些问题审议并作出决定的各单位和中央机关，都首先把问题提到我这里，即政治局秘书室来。我把这些问题事先加以研究，拟定出政治局例会的议程草案。但是，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并非由我确定，

而是由三巨头加以批准的。在这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三巨头权力的真正机制。

通宵，在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集合在一起，先开碰头会。最初，常在季诺维也夫家里，后来则常在中央委员会斯大林的办公室里。按照官方的正式说法，这是为了确定政治局的会议议程。任何章程或规则中都没有关于确定议程问题的明文规定。因此，既可以由我来确定，也可以由斯大林来决定。但实际上是由三巨头批准的，而且三巨头会议是真正的秘密政府会议，在这个会上，他们决定，更确切地说，预先决定一切重要问题。在这种会议上，在场的只有 4 个人，即三巨头和我。我概括地报告拟由政治局下次会议讨论的每一个问题，并说明这些问题的实质和特点。从形式上看，三巨头只决定该问题是否提交政治局讨论或转交给其它方面处理。但实际上，他们商量在第 2 天的会议上应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研究决议内容，甚至分配在讨论问题时各人应担任什么角色。

这些决议我不作任何记录，但所有问题实际上已在这里决定了。次日，在政治局会议上要进行讨论，作出决议，然而，一切主要之点事先已在这个小圈子里议定，讨论是坦率的，因为都是自己人，互相之间用不着客气和拘束，大家都是实权人物。其实，这就是真正的政府。作为第一个报告各项问题、而且不可避免地知道一切秘密和幕后决定的人，我起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个政治局的普通秘书。这时，我才真正懂得了纳扎列齐扬开始时对我讲的那句话的含义。

确实，世界上的一切都不是永恒的，同样，三巨头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个权力机制在此后的两年内一直出色地发挥它的作用。

在三巨头会议上，我就每一个问题情况所作的报告，都必须做到迅速、简明扼要、准确无误。我发现，他们对我相当满意。

政治局的秘书室由我负责领导。这个机构和组织局的秘书室一样，由十多名精选出来的，忠诚可靠的，经过考验的党员组成。他们同样也是整天从清早忙到深夜，但这里混乱不堪的情况比组织局要更加严重，因为这里的文件要多得多，都凌乱地堆放在那里。要想从中找到某一份需要用的文件或是参考材料，那是难而又难。即使能够找到什么东西的话，那也只能是由于特殊的原因。这里有一个工作人员留·库雷金娜，她是一个高个子的大姑娘，她具有惊人的，令人难以捉摸的记忆力。譬如，急需查找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1～2个月以前送来的一份有关价格政策问题的报告。它可能放在那里呢？简直是无法查到。库雷金娜便专心致志地进行卜算，终于想起来了，她好象在巨大的档案室的某个角落里的某个卷宗里曾经见到过。于是翻遍了所有的卷宗，有时果真找到了这个报告。

我象以前在组织局那样，通过建立卡片索引的办法进行改组。这套改革的办法，在这里被人们更好地接受了，因为组织局的秘书室也在这同一层楼上，所以，关于组织局改革所收到的奇效，这里的人们早已知道。经过两、三个月以后，一切都走上正规，如果需要查阅任何一份文件，一瞬间就能够找到。以前中央书记们和各位部长们认为，到政治局的这个文件深渊去查阅什么材料，那是完全没有希望的，而现在，他们不仅找上门来，而且很快就查到所需要的材料了。于是他们便以我们为榜样，教训自己的部下说："为什么你们这里就这样混乱？为什么你们什么材料都查不出来？你们看看人家，政治局秘书室的文件比你们那里要多几十倍，可是总能即刻找到所需的材料。"

3个月以后，秘书室的成员已能象组织局那样，工作已经走上正规了。每天的工作已不再拖到深夜一点钟才结束，而是到了下午5、6点钟便可完成。但是，这里的人们并不因此而有任何失望，他们不可能认为自己仅仅是个普通办事员，因为他们认识

到，每天他们经手的东西全是国家的机密，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至少他们感到自己是受特殊信任的干部。

我所领导的秘书室经办的全部文件材料都属于"机密件"和"绝密件"。因此，为了分发、传阅和回收这些文件，格伯乌专门建立了一个机要文电通讯队。这是一些经过选拔的，受过严格训练的，具有专门技能的契卡人员。他们全副武装，从头到脚穿的全是皮制品，带着用加密信封装好的资料或政治局会议记录，绕过所有的秘书设置的障碍，直接送到收信人——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本人手中。信封上写着："某某同志，急件。绝密。交本人亲收。请在信封上签收"等等。譬如，有一封信是注明送给托洛茨基的，通讯队员带着信件直接进入托洛茨基的办公室找他本人面交。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转手，不得中途交给任何其他人，必须把信面交托洛茨基本人。然后，站在一旁，等着托洛茨基拆封，直到托洛茨基在信封上签收，并把这个信封交给通讯队员，否则他们是不会离开的。他们在受训时就已明确，他们必须用自己的脑袋来保证信件的安全。除非踏过他们的尸体，任何人休想从他们手中拿走这些信件。我所工作的单位——政治局秘书室，设在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的5层楼上。政治局会议一般是在克里姆林宫人民委员会会议厅召开。会前，我和我的助手们用大汽车把大批重要资料——政治局近期会议记录和其他资料等等运往克里姆林宫，由两名通讯队的武装契卡人员随车护送我们。他们的面部神情总是那么紧张，因为曾经指示他们说，世界上没有比这些资料更机密的东西了，为了保卫这些东西，他们应该流尽自己最后一滴鲜血。其实，从来没有任何人对我们采取过袭击行动。

作为收信人的中央委员，在阅读了这些政治局的记录、摘要或材料之后，无权进行复制或摘录，而是仍由通讯队人员送回政治局秘书室，在那里进行登记，办理收发手续，然后，除留出必要的份数归档之外，其它的全部销毁。

这些文件、资料、摘要等材料的传阅、复制、打印以及最后归档等，都由我手下的工作人员负责。

在我的女工作人员当中，有位漂亮的格鲁吉亚姑娘，名字叫塔玛拉·哈扎诺娃，她长着一双又圆又大、乌黑美丽的眼睛。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真正深沉的恋爱过；这一次，对于她的爱情，我也及时抑制住了自己。这个女人虽然很美，但同时也很蠢。在几年后，塔玛拉成了斯大林的夫人娜佳·阿利卢耶娃的好朋友，不过，并不是象莫洛托夫的夫人热姆丘仁娜那样的平等的朋友。塔玛拉象一位女大学生那样对娜佳崇拜备至，形影不离地追随于她之后，经常到她家里去，照看她的孩子。在娜佳自杀以后，孩子交给保姆照顾，塔玛拉仍然继续侍弄孩子们。本来，人们以为她可以趁此机会得到斯大林哪怕是短时间的特殊赏识，但她很愚蠢，所以斯大林没有长久忍受她。她当时是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党组秘书，最后，为政治局委员安德列也夫所迷恋，并终于成为他的妻子。

这个时候，我进了斯大林的秘书室。这个机构将经历很长的历史。当时，秘书室的头头名义上还是纳扎列齐扬。不过，很快他就度假去了，而且由于患病又延长了假期。到了年底他回来了，可是没过多久，又被斯大林派到《真理报》去完成一些特殊的使命（这是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下面我还会谈到的），此后他就没有再回党中央机关来。

阿·纳扎列齐扬是阿尔明尼亚人。他非常有教养，聪明能干，为人和蔼，很有风度。当年在高加索，他一直和斯大林一起从事党的工作。与斯大林以“你”相称的当时只有3个人，即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泽和纳扎列齐扬。他们3人用斯大林在党内的老绰号“柯巴”称呼他。我的印象是，当斯大林的秘书称他为“你”时，斯大林已经开始有些不那么自然了。这是因为，斯大林当时的势头是即将当上全俄国的专制君主了。所以，即使这种

细微小节也使他感到不愉快。年底时，斯大林终于甩掉了纳扎列齐扬，而且采取的办法也不那么文雅。看样子，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随之而破裂。此后，纳扎列齐扬到乌拉尔担任一个州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后来又返回莫斯科，在中央监委机关和苏维埃监委① 任职，但是，在那以后，他从未再接近过斯大林。1937年斯大林把他枪毙了。

斯大林的另一名助理是伊·托夫斯图哈，他的情况恰恰相反，直到1935年他死的时候为止，都一直在斯大林的秘书室和斯大林身边，担任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最近几个月里，他极少到秘书室来，他正在执行斯大林交办的特殊任务——负责组建“列宁学院”。这样，目前经常在斯大林秘书室里工作的斯大林助理就只有3个人了：我，麦赫利斯和卡涅尔。当我们3人确定各自的职责范围分工时，我们在私下谈话中是这样说的：“巴让诺夫是主管政治局事务的斯大林秘书，麦赫利斯——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格·卡涅尔专管见不得人的事务的斯大林秘书；而托夫斯图哈——主管半见不得人的事务的秘书。”

这里有必要作一些说明。关于我和麦赫利斯还是比较明确的；我们两人的工作，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譬如说，凡是涉及政治局的事务和函件，由我办理；凡是注明与斯大林个人有关的文件，则由麦赫利斯签收，并向斯大林报告。也可以这样说：我是为政治局服务的，麦赫利斯则是为斯大林个人服务的。格·卡涅尔正式的职责是专管日常生活方面的事务，然而任务不甚明确。他负责保卫，管理住所，调动车辆，安排休假，联系中央医疗小组，负责中央的党支部，等等。乍看起来，似乎都是一些琐碎事务。但是，这些仅仅是他的工作当中露在表面上的一部分；至于暗地里干些什么勾当，人们只能去猜测了。

① 隶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监察机关，1934年设立。

我很快就弄清了格·卡涅尔所进行的工作的主要方面。党中央总务部长克谢诺冯托夫，是一个老资格的契卡分子，早年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常委。他的副手——布里扎诺夫斯基也是一个契卡分子，他们两人的工作，正是按照卡涅尔的指示和命令进行的。

我刚被任命为政治局秘书，斯大林的助理卡涅尔和克谢诺冯托夫就立即表示，要我住进克里姆林宫，或者，至少搬进苏维埃1号楼。我所住的“洛斯库特旅馆”简直是一个真正的大杂院，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现在，“安全保卫机关”要保护我这个宝贵的要员了。住进克里姆林宫里容易进行保卫，因为要进克里姆林宫的人，必须办理各种手续，并要受到严格的监视。在苏维埃1号楼也有门卫传达室，如果有人要找你，需要从门卫传达室给你打电话，然后领取通行证，由你在通行证上签字，出门时再把通行证还给门卫传达员。他们要我搬家的另一个相当认真的理由是，搬进来以后，我可以把各种紧急的工作带回家里去作，而带回去的东西，都是政治局的极端机密的文件，因而，住在“洛斯库特旅馆”，无论如何是不适宜的。我同意搬家，但我不想住进克里姆林宫，因为在那里你的一言一行都将受到监视，甚至打个喷嚏，你要想不让格伯乌知道都是不可能的。在苏维埃1号楼里，相对地说，毕竟还要自由一些，于是我搬进了那里。卡冈诺维奇、卡涅尔、麦赫利斯和托夫斯图哈也都住在那里。

在1922年和1923年上半年，党中央委员会办公楼设在瓦兹底维仁卡大街，后来迁到老广场的一栋大楼里。大楼内的第5层专供中央书记们和我们的一些机要单位用。人们来到5楼，沿着走廊往前走，再向右转弯，那里就是斯大林及其助理们，以及政治局秘书室办公的地点；如果沿走廊向左转弯，那里是莫洛托夫、鲁祖塔克、以及他们的助理和中央组织局秘书室办公的地点。如果沿右侧走廊往前走，那么左手第一个门是卡涅尔和麦赫利斯的办公室，要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必须先经过他们的房间，而且还要再通过

一间通讯值班员的房间。那个女值班员叫尼娜·福缴柯，她是一个高大的女人，契卡分子。再往里去才是斯大林的办公室；和它相通的是一间宽敞的大房间，这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会议室；再过去，就是莫洛托夫的办公室。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在这个居中的会议室里，每天都要多次开会和商谈问题。

要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必须先通过麦赫利斯向他报告后才许可。甚至那位女值班员，也只有当斯大林按铃呼唤时才可进入。无论卡涅尔或是托夫斯图哈，每当要见斯大林时，都要事先通过电话向他请示，是否可见。有权不经通报而直接进入斯大林办公室的只有两个人，即我和麦赫利斯，因为麦赫利斯是他的私人秘书，而我主管的政治局事务需随时向他请示汇报。有关政治局的事务一向被认为是最重要、最紧急的问题。每当我进入斯大林的办公室的时候，不管当时什么人在场，也不管当时他在做什么事，我都可以立即直接同他讲话。在这种情况下，他把正在进行的谈话或会议停下来，马上就研究我报告的问题，因为有关政治局的事要比任何问题都紧急。当然，对于所有的中央书记以及所有的苏联达官贵人我都有这种权利。只要需要的话，我可以直接进入任何正在召开的会议，不管是政府的会议或是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我也可以直接进入各部、委的任何一个部长的办公室，既无需等候，也无需通报，直接去找他们，不管他们当时在做什么事，都可以立即打断他们的工作。这是我作为政治局秘书享有的一种特权。通常，我直接找上门去办的都是有关政治局的事情，这些事高于一切，重于一切，急于一切。

我在工作的头几天，每天有十多次进入斯大林办公室，向他报告政治局收到的各种文件。我很快就察觉到，斯大林对这些文件的内容和命运如何，都一概不感兴趣。每当我向他请示对某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时，他就说："那么，你认为，应该如何处理呢？"于是我就把我的想法和建议告诉他，譬如：提交政治局讨论，或

者转给中央委员会的某个下属委员会处理；或者我认为，对所提出的问题研究得不够透彻，各部门互相协商不够，我就建议由主管部门先与其它有关部门协商一致，等等。然后，斯大林便表示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好吧，就这样去办吧。"我很快就认识到，老是不断去向他请示，这都是白浪费时间；我应该更多地表现自己的主动性。于是，我就这样作了。斯大林秘书室的人对我解释说，斯大林什么文件都不看，他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因而，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么，究竟他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过了没有几天，我突然意外地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一次，我为了某一件急事，象往常一样，未经事先通报就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当时恰好碰到他正在打电话，更确切地说，当时他并没有讲话，而是在听电话，他手里拿着电话听筒，正在听着。尽管我要请示的事情很紧急，但我不愿打断他的电话，而是有礼貌地等着他把电话打完再说。我持续等了一段时间。可是，斯大林只是在听电话，自己一句话也不讲。我站在一旁等着他。然后，我突然十分惊讶地注意到一个情况：斯大林办公桌上的4部电话机，上面的话筒全都好好地挂在机上。可是，他手上拿着另外一个话筒在听着，我觉得莫明其妙：这个话筒连接的电话线，不晓得为什么是通向斯大林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的，而这部电话机是我从未见过的。我又看斯大林办公桌上的电话机，我一看，那4部电话机都原样不变地放在办公桌上：一部是党中央内部通话用的内线电话，由中央的电话员负责接线；另一部是上克里姆林专用电话，通话要通过总机接线；再一部叫下克里姆林专用电话，也是通过总机接线才能通话的。用这两部电话可以同高级领导干部本人，以及他们的家庭通话，前者主要与机关办公室通话使用，后者则主要用于同住宅、宿舍通话。它们的总机电话员都是经过格伯乌精心挑选、并在格伯乌工作的人。

最后，第4部电话机是高频自动保密机，它只限于极少数人

使用，开始是60个用戶，后来增至80个，后来又增多一些。这一部电话是列宁要求安装的，因为列宁认为，通过电话就一些重大机密问题交换意见，总有可能被某个接线的女电话员偷听，这是十分危险的事。于是安装了一个专用保密电话站。它是全自动的，不需任何电话员进行接线管理。这种电话只供高级政府官员之间通话使用。这样一来，重要谈话內容的保密就有了保障。同时，这种保密电话也成为某个人是否属于最高权力中心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使用这种电话的只有：中央委员、正、副人民委员，当然，全体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办公室，以及政治局委员们的家里也都安装了这种电话。

总之，斯大林当时并沒有使用这 4 部电话机中的任何一部讲话。我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就发现了这种情况，并且当即想到，在斯大林的办公桌里装有某种电话中心台，通过它，他可以连接上任何一个电话，可以窃听到任何通过保密机进行的谈话。所有使用保密机的政府成员们，都深信他们的谈话是不会被人窃听的，因为这部电话是自动的，因此他们在电话中的谈话都非常坦率。这样，就可以了解到他们的全部秘密。

斯大林抬起了头，用严厉的目光凝视着我的眼睛。我是否懂得我发现了什么。我当然懂得，而且，斯大林也看出了这一点。再说，由于我每天不需通报几次进入他的办公室，迟早我也会发现这个设备的，不可能发现不了。斯大林的目光表明，他在询问，我是否知道这个发现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后果。当然，我知道。在斯大林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这是他最重要的秘密之一。这使得斯大林能够窃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所有各派人物私下的谈话，以便于随时掌握关于他们的阴谋打算，而这是他极为重要的强大武器。斯大林能够洞察他们的一切，而他们却都是睁眼瞎子。而且，他们不会怀疑，若干年內也不会怀疑，斯大林一直掌握着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的阴谋；他

能够了解他们所想的一切以及为反对他而策划的一切阴谋。这对斯大林来说，是他在权力之争中取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很显然，关于斯大林的这一秘密，我只要泄露出哪怕是一个多余的字，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干掉。

我也直视着斯大林的眼睛，我们心照不宣地沉默着。最后，我做出不打算以我送给他的文件去打扰他的样子，便离开了办公室。斯大林很可能认为，我会对这个情况加以保密的。

我对这件事作了全面思考和分析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至少还有一个人，即麦赫利斯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因为他也是可以自由出入斯大林办公室的人。我选择了一个时机，对他说，我和他都知道这个秘密，而且看来，只有我们两人知道这件事。麦赫利斯当然早就料到，我迟早会知道的。但他纠正我说，除我们两人之外，还有第3个人，那就是这个阴谋的技术方面的策划人，这个人就是格·卡涅尔。现在，我们3人之间经常自由地议论这件事，这对于我们来说，已成了共同的秘密。我好奇地问到，这套技术设备卡涅尔是怎样搞成的。最初，卡涅尔用玩笑支吾搪塞，但是爱吹牛的习气还是占了上风，他开始讲了起来，渐渐地我就把一切细节都弄清楚了。

列宁提出安装自动保密电话的想法以后，斯大林便着手实现列宁的想法。由于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工作的有中央委员会的3位书记，政治局和组织局的秘书们，中央委员会书记的主要助理和主管中央委员会各重要部门的头头等，因此大部分保密机安装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电话的中心台也安装在这里。同时，从技术上来说，电话中心台设在用戶最集中的地方较为合适，而用戶中的多数是在5层楼內：中央的3位书记，政治局和组织局的秘书纳扎列齐扬和瓦西里也夫斯基，这已经是7个用戶了，因此中心台就设在5层，离斯大林办公室不远的地方了。

整个这套装置是由一位捷克斯洛伐克的自动电话专家——共

产党员制作的。除了全部线路和机器外，卡涅尔还命令他建了一个检查台，“以便在出现故障或使用效果不佳时，可以检查整个线路，找出故障之所在”。结果，就建立起一个可以接通所有的电话线路和能够听到所有的谈话的系统。但是，是谁把检查台移到斯大林办公桌抽屉里去的？是卡涅尔本人？还是那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我就不得而知了。当全套装置制成，刚刚开始投入使用时，卡涅尔就以斯大林的名义给格伯乌的亚哥达①打电话，通知他说，政治局收到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确切材料，证明捷克斯洛伐克的这位技术人员是个间谍，鉴于这一点，已让他完成安装自动电话站的工作，现在必须立即予以逮捕并处决，相应的文件以后再送格伯乌。

这个时期，格伯乌对处决“间谍”是毫不客气的。但由于此事涉及到一个共产党员，亚哥达还是有所顾虑的，他不希望以后因此而引起什么不愉快的事。为了防止万一，他给斯大林挂了电话，斯大林肯定了卡涅尔的话。结果，这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立即被枪决了。可是，亚哥达没有收到任何材料，于是几天后又打电话向卡涅尔询问。卡涅尔对他说，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由于间谍和敌人已钻进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上层，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还是绝密的，因此，还不能从政治局档案里取出。

这个解释使亚哥达感到宽慰。毫无疑问，罪名完全是捏造的，关于这个案件政治局的档案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材料。

我面前产生了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呢？我是个党员，我现在知道，有一位政治局委员能够对其他政治局委员搞特务活动，我是否应该把这件事告诉政治局的其他成员呢？

我毫不怀疑，这样做的话会给我个人带来严重的后果：或者

① 亚哥达——1920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部任领导工作。1937年被开除出中央，并清除出党。

我将成为“偶然不幸事件”的牺牲品，或者为了斯大林，格伯乌捏造一个把我打成英帝国主义的破坏分子和特务的假案件。无论如何，斯大林必定会置我于死地。固然，人们为了远大的目标，尽可以牺牲自己。但是，这样做值得吗？就是说，单纯为了阻挠一个政治局委员窃听其他委员的谈话，而作出牺牲是否值得？我决定在这一方面不要操之过急，匆忙行事。既然我已经掌握了斯大林的秘密，只要确实必要的话，我随时都可以揭发，这完全来得及。而目前，我暂时还没有感到这样做的重要性。在组织局工作的半年时间里，我已丢掉了不少幻想，我已经清楚地看到，正在进行着一场权力之争，而且是一种毫无原则的争斗。我对这一权力之争中的任何人都没有特别的好感。更何况，既然斯大林能够窃听季诺维也夫，那么，或许季诺维也夫自己也在用某种方式窃听斯大林的谈话！谁会晓得这一点呢？于是，我决定：还是等一等，看看再说。

在担任政治局秘书初期，我主要忙于改组我的秘书室的工作。在翻阅政治局各种文件时，我顺便了解到了一些令人奇怪的有趣的事件。

譬如，格伯乌的一些报告中谈到一项进行已久、但毫无结果的侦缉工作。我费了不少力气才弄清这其中的奥妙。原来，在国内战争结束时，一方面，政治局认为，骑兵在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要大力改善骑兵；而另一方面，战争期间苏维埃俄国的育马事业遭到了彻底毁坏。育马场所有的马匹，特别是良种马全部被军队征用，而且大部分已经死于前线。要充实骑兵队，首先必须搞到良种公马，恢复育马事业。但在1920年末～1921年初这一时期，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认苏维埃政权，也没有正常的对外贸易。要从国外进口商品，需要向外国银行借款，这也是根本行不通的，因为那些被布尔什维主义革命剥夺了财产的外国人会起诉。所以，即使采购到了商品，也会被人家查封、扣押。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了一种办法。通过在国外推销苏维埃政权从形形色色的资产者身上剥夺来的珠宝等珍贵物品的黑市投机商人安排了一条通道:以瑞典一育马场主的名义在阿根廷采购所需要的公马,然后,按照正常的办法把它们运到瑞典北部靠近苏联边界的地方,由于那里的边防较松,就从那里再进入苏维埃俄国。为了这笔交易国家拨了700万美元的现汇。因为不能通过银行进行交易,必须直接把这一大笔外汇带到阿根廷去。当然,把这样一大笔外汇交给黑市商人是靠不住的,于是,政治局决定选派一名完全可靠的老布尔什维克,那个人是一个中央委员,或是中央候补委员,给他准备好所有必需的假证件,格伯乌国外部派遣了一批特工人员进行严密的随行保卫,把大额票面的美元交给了他。他带上了这笔美元出发了,但是,中途在某个地方他突然失踪了。格伯乌对此事进行了精心调查,最后确信,这个人并没有突然中途死于不幸事件或遭盗匪抢劫。种种情况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个人携带这笔美元潜逃了,而且他的潜逃是经过精心策划和准备的。因此,政治局命令:必须千方百计地抓到这个人,为此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但全部侦缉工作都毫无结果,这个人象石沉大海一样,无影无踪。格伯乌在报告中用的是代号,我当时只要认真地查阅政治局的档案材料,最后肯定能够查清这个人的真名实姓,但可惜当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做到这一点。

我断定,以后总能够查出此为何许人。我需要查阅各种汇报材料和中央委员的名单等资料,肯定很快可以弄清楚,究竟在老资格的高级布尔什维克当中,是那一个人突然从这一天开始消失了。但是,我未及做这件事,因此,这个谜我只好留给某一个党史学家或者"克里姆林宫学家"去解决了。

政治局会议一般是在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会议厅举行。在窄长的会议室里摆上两排桌子,中间是过道,桌布是红呢绒做的。桌子一端是会议主席的座位,过去列宁总是坐在这个地方。后来是

加米涅夫坐在这位置上主持会议，政治局委员面对面地坐在桌子的两侧。坐在加米涅夫左边的是斯大林，右边是季诺维也夫。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之间靠近会议桌的地方，放着一张小桌子，这是我的座位。在我的桌上有一部电话，以便于我同手下的工作人员联系，他们在会议厅隔壁的一间屋子里等候。在那里，还有一些事先应召前来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当我的女助手有事找我的时候，我桌上的小灯泡就亮起来。当需要通知某些人进会议室参加对某项议程的讨论时，我就通知她请他们进入会场。我把会议决议记录在活页卡片上，从桌上递给坐在我对面的斯大林，他大致看一下，一般是又直接还给我，这就是说，他"没有意见"。遇到复杂重要的问题，他就给加米涅夫看，加米涅夫阅后打一个钩号(表示同意)，再把卡片退给我。

其他政治局委员分别坐在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两边。通常，挨着季诺维也夫坐的是布哈林，他旁边是莫洛托夫（他当时还是候补委员），再过去是托姆斯基。坐在斯大林旁边的是李可夫，他旁边通常是瞿鲁巴①，他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委员。从列宁在世的时候起，他就列席政治局会议，目的是为了让他了解会议作出的决议，而不是为了行使发言权。他确实很少讲话，主要是听会。他旁边坐的是托洛茨基。加里宁有时坐在托洛茨基旁边，有时坐在托姆斯基的旁边。会议厅最后有一道门，门外是另一个大厅，门是关着的。

在隔壁大厅里，有很多人在等待应召进入会场，他们都是一些正副人民委员，几乎整个政府的成员都等在这里。通常，每次政治局会议要讨论上百个问题，涉及几乎所有各个部门。这些等待应召与会的人们在厅内踱来踱去，聊闲天，抽烟，听拉狄克讲

① 瞿鲁巴——十月革命后历任粮食人民委员、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国内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等职。中央委员。

他自编的趣闻笑料，并利用这个机会商谈和解决各部门之间的各种问题。当会议讨论到某一个问题时，有关的人员才被请入会议室。由于政治局的时间宝贵，与会的人必须快步进入会场。一俟问题讨论结束，就毫不客气地叫他们立即退出会议室。

加米涅夫主持会议非常出色。他善于掌握辩论的进行，及时打断离题的发言，很快做出决定。他面前放着一块精确的计时表，他在纸上记下给每个发言人规定的时间，记下发言开始和结束的时间。斯大林从未主持过会议，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会上，政治局委员们不断地用互相传递纸条的办法交换意见，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小块用纸，上面标明“政治局会议专用纸”。

人们最初得到的新的印象总是令人难忘的。我作为秘书，参加过数百次政治局会议，但多数会议的情景我已很难回忆，因为它们多数是千篇一律，因循惯例的。但是，关于第1次会议的情景，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会议定在10点钟开始，我提前10分钟先到会议室，检查一下是否一切准备就绪，委员们需要的材料是否齐备。10点前1分钟，托洛茨基以其军人的准确性进入会场。3～4分钟以后，三巨头接踵而来。显然，他们在进入会场之前又就某些问题进行了协商。第一个进来的是季诺维也夫，他根本不向托洛茨基的方向看，而托洛茨基也佯作不知道他进来的样子，继续翻阅自己的文件。最后进来的是斯大林。他直奔托洛茨基，以一种特别的表情，把手挥得高高的，装出高兴的姿态与托洛茨基友好地握了手。我清楚地感到那是一种虚假的表情。斯大林是托洛茨基最危险的敌人，他对托洛茨基简直不能容忍。这里，我想起了列宁的一句话：“不要相信斯大林：他善于搞假妥协和欺骗。”但是，我必须更多地了解我这位老板的事。

三巨头的成员坐在桌子的一头，这非常便于他们互相商量，采取共同决定。他们互相传递纸条，而其他政治局委员看不到上

面写了些什么；或是低声耳语，交换意见。当时三巨头工作配合得很好，协调一致，所以，权力机构能够正常运转。

加米涅夫不但主持会议很出色，并能活跃气氛，他经常讲几句诙谐的话。这种气氛似乎从列宁时期就开创了。季诺维也夫总是带着一副厌烦和不大满意的表情，半坐半倚地靠在座位上，并经常用手理理头发。斯大林则抽着烟斗，经常站起来沿着桌子来回走动，有时还停步在正在发言的人的面前，但很少说话。

第5章　政治局秘书的见闻

德国革命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扩大　党内自由　党的官僚制度和在这个问题上的阴谋手腕　辩论　右倾反对派和左的托洛茨基　斯大林的手段　斯大林——反犹太主义者　波斯克列贝舍夫

我开始到政治局工作之后，过了两个星期，即1923年8月23日那一天，我作为秘书参加了一次绝密的政治局特别会议，会上专门讨论一个问题——关于德国的革命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此外，还有拉狄克①、皮达可夫②和瞿鲁巴。拉狄克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在会上作了关于德国革命风暴迅速发展的报告。接着，托洛茨基第一个发言。被那些惯于恶语中伤的人称之为“慢性狂热病患者列夫·达维多维奇”的托洛茨基，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强有力的，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

---

① 拉狄克——十月革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1927年和1937年两次被开除出党。

② 皮达可夫——十月革命后历任国家计委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驻法国商务代表、国家银行董事长等职。1927年和1936年两次被开除出党。

"同志们，我们如此殷切地盼望多年的，注定要改变世界面貌的暴风雨，现在终于来临了。目前正在发生的事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德国革命意味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崩溃。但是，人们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看到现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场孤注一掷地赌博，我们不仅要把德国革命的命运，而且要把苏联的生存都押在这个赌注上。如果德国革命获得成功，欧洲的资本主义是不会容忍它的，它们将竭力以武力扼杀它。至于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去斗争，因为这场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一切。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我们取得胜利，从而使世界革命的胜利得到保障；或者我们失败，从而输掉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输掉我们在俄国的政权。这就是说，我们应该鼓足干劲。可是，我们的准备工作已经抓得太晚了。现在，德国革命到来了，难道你们没有听到它那钢铁般的步伐吗？难道你们没有感到革命的浪潮如何高涨吗？我们必须加速准备，以防灾变将不致于使我们措手不及。难道你们没有感觉到，这将是几个星期之内就要发生的问题吗？"

政治局委员们丝毫没有被托洛茨基的热情所打动，并没有！对于这一切，他们既没看到，也没感觉到。当然，他们也同意认为德国革命是极其重大事件的看法，但他们根本不同意那种认为德国革命同俄国苏维埃政权的生存休戚相关的说法。此外，他们对德国事态的发展问题是否真的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这一点，也表示怀疑。

季诺维也夫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他用怀疑的语气反问道："难道确实这已成为近几个星期之内就会发生的问题吗？"。"象往常一样，托洛茨基同志的激情使他自己脱离眼前的现实"。"这个事件假如能在几个月之内发生，那就不错了。而且一般说来，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应该谨慎从事，三思而后行。"斯大林的发言并没有超出一般性的模棱两可的词句，他补充说："目

前在德国，沒有任何革命可言。或许今年秋天会发生？如果那里的革命形势明年春天出现，那就蛮好啦！”

三巨头一方面极力强调，他们根本不同意托洛茨基的预见和估计，而且，无论如何他们也不会为托洛茨基的主张所左右。同时，他们毕竟也感觉到，德国的革命浪潮正在高涨，因而也决定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便尽量促进革命浪潮的发展。

中央设立了一个由 4 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全面领导德国革命的工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拉狄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皮达可夫、格伯乌的副主席温什里希特① 和劳动人民委员瓦夏·施米特②。他们四个人携带伪造的护照，立即动身前往德国，去进行地下工作。

他们之间的分工如下：拉狄克负责领导德国共产党中央，把莫斯科的指示作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向他们传达。德国血统的施米特负责领导在工会中建立革命支部的工作，这种革命支部也就是工厂委员会，他们在政变发动之后，应当成立苏维埃，并在特别代表大会上宣告德国苏维埃政权的成立。皮达可夫的任务是负责整个工作的协调，并同莫斯科保持联系。温什里希特负责组织发动政变的武装起义队伍，人员配备及武器供应工作。他还负责组织德国的契卡机构，以便在政变成功后处决资产阶级和革命的敌人。最后，驻柏林的大使克烈斯廷斯基的任务是，把为进行商业活动而存放在柏林的一笔苏联国家银行商业基金用来资助德国革命。

皮达可夫从柏林发回的头几份报告反映说，德共领导的水平

---

① 温什里希特——1919年起担任一系列重要军职，后担任格伯乌副主席、最高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委领导工作。

② 施米特——革命后担任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劳动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很低。他认为，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政治上，党的领导都远不能胜任它的工作。据此，这些德共领导人被召到了莫斯科，但是，沒有允许这些领导人出席政治局的会议，而是由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出面做他们的工作。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德共最高领导中，除了由共产国际挑选的正式领导集团——布兰德勒集团之外，还存在一个实际上更有份量的集团——马斯洛夫-露特·菲舍尔集团。后者对共产国际的领导采取了明显的独立自主的态度。季诺维也夫对这一点很不满意，他甚至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必须向马斯洛夫提出最后通牒：或者他将拿到一大笔钱，和党脱离关系，离开德国；或者命令温什里希特把他干掉。但马斯洛夫的态度非常强硬，拒不作出任何妥协。

正当这种讨价还价还在进行的时候，情况开始明朗了：原来德国共产党根本沒有做好采取迅速果断行动的充分准备，而且，党的工作错误百出。与此相反，苏联驻德国的全权代表处①、领事馆及商务代表处等机构，却在风驰电掣般积极地行动起来，他们出色而有成效地在开展活动。因而，政治局把工作重心也随之转到这个方面。驻德国的全权代表克烈斯廷斯基被任命为中央设立的委员会的第五个成员。全权代表处和商务代表处全力以赴地担负起采购和运送武器的任务，并且负责组织工作。把在俄国所有德国血统的共产党员，以及会说德语的共产党员，全都动员起来了，并把他们派到德国从事地下工作。

这时候，皮达可夫从柏林发回的报告的调子越来越乐观了，认为德国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引起工人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精心策划和广泛展开的宣传工作，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革命浪潮进一步高涨起来。在这种形势下，政治局频繁开会，讨论德国革命工作的各种实际问题。皮达可夫发回的报告，內容非常精确，

① 即苏联大使馆，1941年5月以前的称谓。

非常详细。所花费的资金也相当可观。作出了一个决定：要不惜拨出大量经费。三巨头最初是反对托洛茨基的看法和主张的，但后来这种反对立场已被遗忘，现在他们一致认为，德国革命已迫在眉睫。

在9月底，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特别会议。这次会议十分机密，以致于参加会议的人，只限于政治局委员和我。其他中央委员中，沒有允许任何一个人与会。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确定在德国发动政变的日期。会上作出决定：1923年11月9日。

政变的计划是这样的：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工人群众上街示威游行，这时，温什里希特的赤卫队员应乘机挑起和警察的武装冲突，诱发流血事件和血腥镇压，以此来激怒工人群众，进行全面的工人起义。

按照预定计划温什里希特的队伍必须占领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成立由德共中央委员组成的苏维埃革命政府；紧接着，召开工人委员会紧急的特别大会，宣告苏维埃政权的成立。

关于政变的日期不准泄露给任何人，甚至对党中央委员也是保密的，因此我起草的纪要是这样写的：

听取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问题。

兹通过决定：另见特别卷宗。

这就是向中央委员们传达的政治局会议纪要的全部内容。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全部决议，我都存放在我的那个“特别卷宗”里了。

关于“特别卷宗”我还要说几句。我办公室里有一个保险柜，唯一的一把钥匙由我掌握。凡是只传达到政治局委员一级的绝密决定，都保存在这个保险柜里。如果中央委员要查阅这些密件，需要先经政治局批准同意，我才可以将有关的决定拿给他们看。必须说明的是，我在政治局工作期间，还沒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1923年的德国革命沒有成功。到了10月份，形势已很

清楚：准备工作动手太晚了。时机估计错误，结果，当革命的浪潮已经达到高峰的时候，就开始低落了，而必要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都没有跟上，当时至少还需要2、3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革命浪潮很快就低落下来了，致使政治局不得不指出，实际上政变的机会已不存在了，因此，必须把政变推迟到以后的大好时机去进行。托洛茨基就此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批评意见，指责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贻误了良机，致使整个工作抓得过晚。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则企图用各种借口设法说明，托洛茨基过高估计了革命形势的尖锐程度，从而归根结蒂证明正确的还是他们自己。在共产国际内部，人们则把全部过错归咎于布兰德勒集团的领导无能，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哄之后，最后在1924年4月宣布布兰德勒集团"右倾"，并把他们开除出党。德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转而交给了马斯洛夫-露特·菲舍尔集团。但是，后来，在三巨头与托洛茨基的争斗中，这个集团倒向了托洛茨基一边，因此，不久它就被宣布为托派集团，并经过了一番较量后，又把它从德共领导中清除出去了。在1927年，这个集团最终领导了德国的托派组织。

9月间，三巨头决定要给托洛茨基以第一次沉重打击。从国内战争开始的时候起，托洛茨基就一直是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担任国防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巨头企图分三个阶段把他从红军领导中搞掉。首先是扩大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组成，把一些反对托洛茨基的人安插进去，从而使托洛茨基在军事委员会中处于少数地位。第2阶段是改组陆军部的领导机关，撤销托洛茨基的副手斯克良斯基的职务，由伏龙芝取代。第三阶段是，最终撤销托洛茨基的国防人民委员的职务。

9月23日，三巨头在中央全会上提出扩大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的建议，结果被增选进军委的委员全部都是托洛茨基的反对者，在新当选的人们当中，也包括斯大林。托洛茨基对这一措施的

含义心中完全有数。于是，他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演说，指出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幕后策划的一系列旨在反对他的阴谋中的新的一环，其最终目的是把他逐出革命的领导中心。他说，由于自己丝毫不想和这些阴谋家们进行斗争，只有一个希望——为革命事业服务，他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解除他的一切职务和头衔，并准许他作为普通一兵投身于正在成熟的德国革命中去。他希望，至少他的这一点请求不致被拒绝。

这些话听起来很响亮，这使三巨头感到相当尴尬。季诺维也夫接着发言，其目的显然是想使这一切带上滑稽剧的色彩，他故意提出建议说，也把他的一切职务和光荣头衔都撤销，让他同托洛茨基一起，作为一名普通战士投身于德国革命。最后，由斯大林出面打圆场，把这一切完全变成一出喜剧。他郑重地宣称，中央委员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样两条宝贵的生命去冒险，并要求中央委员会不要放这两位"敬爱的领袖"前往德国。这一建议立即以最严肃的方式被表决通过。这一切就象是一场经过精心排练的话剧一样。但这时，在列宁格勒的中央委员柯玛罗夫，以做作的无产阶级风度，作为"人民的喉舌"发言了，他说："有一点我不明白，何以托洛茨基同志如此装模做样地进行表演?"结果，这"装模做样"一词终于把托洛茨基激怒了，他暴跳如雷地宣称："我请求把我从这出卑鄙的喜剧演员表中除名。"他说完就拂袖而去。

这是一次决裂。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整个会议大厅为一片寂静所笼罩。满腔愤怒的托洛茨基，为了造成更大的效果，决定在离开大厅时，重重地把门关上。

会议是在皇宫的登极大厅内举行的，那扇铁门又大又重。为了把门推开，托洛茨基不得不倾其全力，而这扇门却缓慢而庄严地滑开。此刻，托洛茨基本来应该立刻理智地意识到，有的门是无法使它"砰"的一声重重地关上的；但他当时是如此激动，以

致忽略了这一点。他仍然企图使劲地把门碰上，可是这扇门还象推开时一样缓慢而庄严地关上了。托洛茨基此举的意图是，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宣告同阴险的仆从们决裂，为了强调这次决裂，就同他们一刀两断，拂袖而去，并在离开时想要砰然一声把门关上，借以使这帮人的内心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结果却不然，这位极度愤怒的，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子的人，用力揪住这扇门的把手，在力不从心地同这扇既大又重的门进行着力量相差悬殊的搏斗。这个场面着实不甚雅观。

自从通过了关于扩大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的决议以后，三巨头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在1923年的最后几个月里，进行这场斗争已成为三巨头的主要工作。这个阶段的主要政治性文件，也都涉及和反映了这场斗争。因此，以后的一些党史专家们，把这一时期的党内事件理解为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派和托洛茨基反对派之间的斗争。当时的真实情况绝非如此，实际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为了了解这一时期历史的真实性，必须作出几点说明。

新经济政策，即列宁从共产主义后退到允许某些范围内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出现了对自由经济的刺激，使得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迅速的改善。农民又重新播种，私营商业和手工业使那些市场上早已脱销的商品重又开始上市，国家有了生气，开始复苏。开始实行的币制改革，用稳定巩固的金卢布代替了数百亿大为贬值的纸币。但是，呆板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构，已习惯于过去指挥吃大锅饭的共产主义的做法，这时候跟不上现实生活的发展。特别是，城市供应情况很糟糕，工人和职员生活很困难。工人是唯一敢于表示自己不满的阶级，于是在1923年出现了一系列罢工浪潮。这种情况立刻反映到党内，波格丹诺夫① 和格·米雅斯尼

① 波格丹诺夫——革命后曾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成员。

柯夫①在党内组织了“工人真理”和“工人团”。这两个集团指责党的机关发生了官僚主义蜕化，对工人的利益漠不关心。

在这个时期，政治生活没有超出党的范围。整个国家划分为两个阵营：一边是广大非党群众，他们完全处于无权地位，处于格伯乌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些被专政压制的群众逐渐意识到，他们不仅在政治生活方面没有任何权利，甚至也无权得到任何法律保护。司法的概念已不复存在。法庭是有的，但被当作专政的工具，在理论上它按照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行事，在实践上则是听任党内的小暴君们胡作非为。即使是这种可怜的法庭也不过只是审理一些细小的日常案件和刑事案件。在一切主要的，被视之为政治性领域，即“阶级斗争的范围”里，完全由格伯乌机构独断专行。它们可以随意由于格伯乌的猜疑而逮捕任何人；它们可以仅仅根据某个“三人领导小组”的决定而枪毙人，单凭他们武断作出的决议就可以轻易地判处一个人在所谓的“集中营”服上10年折磨人的苦役。全国人民在这个专搞镇压和恐怖的组织面前无不感到胆战心惊。

与此相反，在另一个阵营内，即在由几十万党员组成的共产党内，气氛倒是相当自由的。人们可以有自己的意见，可以与权力机关不一致，也可以对它们的决议提出异议。这种“党内民主”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开始了，当时这在党内是一种正常现象，那时入党也是出自党员个人的自由意愿。在革命前，党内也存在着残酷的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当时掌握了领导权，也就取得了党的经费支配权和党的刊物的控制权。当时还没有任何格伯乌之类的机关，一切都要靠说服的办法才能取胜。正因为如此，甚至列宁也远不是时刻都能做到这一点，尽管这个党是列宁缔造的，而党的

① 米雅斯尼柯夫——1921年被称为“工人反对派”，后搞了“工人团”。

基本性质——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是列宁确定的。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党内处于少数地位，随之也丧失了对党的经费和报刊的控制权。因此，他曾经费了很大的气力，有时甚至通过施展艰难的、不甚光彩的手腕，才得以化险为夷，重新夺回丢失了的阵地。这种党内的自由斗争，长期以来形成了党内民主的习惯，直到经过若干年后，当斯大林一手掌握了全部权力时才消失。

另一方面，由于政治生活只限于党内才存在，国家范围内发生的社会进程，就只有通过间接的途径，即通过非党群众及他们的生活对党员施加的影响和压力，才能反映出来。相对来说，工人阶层影响的扩大是不大困难的，因为受马克思主义词句驱使的党，需要谋求同工人进行接触。因此，1923年初，形形色色的"工人反对派"等派别，迅速地渗入党内，而且表现得相当活跃。由于同样的原因，党的领导对它们的反应相当积极。由于害怕托洛茨基会控制这个反对派，党中央多数派的成员就竭力争取主动。在政治局会议上托洛茨基开始猛烈攻击党的官僚主义制度。至今我还清楚地记着这样一个场面：有一次，托洛茨基在会上狠狠地盯了一眼坐在对面的莫洛托夫之后，紧接着便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他尖锐地抨击那些"麻木不仁的党的官僚，他们冷酷无情地扼杀了广大劳动群众自由的主动创造精神的任何表现。"托洛茨基并没有点莫洛托夫的名，本来莫洛托夫应该沉默不语，装出一副所谈的事与他无关的样子，如果再频频点头表示赞同的样子，那就更好了。但莫洛托夫没有这样做，他摸了一下自己的夹鼻眼镜，结结巴巴地说："托洛茨基同志，毕竟不能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天才人物呀。"

这个场面是令人可悲的，我为莫洛托夫感到难为情。这里，我顺便提一下历史是怎样编造的：1929年我到国外之后，我曾在报刊上描写过这个场面。但是，后来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有一个逃离苏联的外交官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在1932年写了一本书《苏联

的脸谱》。其中，作者一字不差地引用了我写的这段话，接着，他杜撰地写道，“莫洛托夫接受了挑战，他沉着地微微一笑，声音低沉地，象往常一样，稍带结巴地说：‘并非人人都能够成为天才呀，托洛茨基同志，但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嘛！’”。

当然，实际上莫洛托夫并没有补充说过这类的话。然而，对1932年的德米特里耶夫斯基来说，当时的托洛茨基被认为是一个狂热的，激烈到忘乎所以的程度的犹太革命者；而莫洛托夫则被誉为是俄国的新方针的一位坚定而出色的领导人，似乎他已走上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道路，这种臆造的补充的背景，就是如此。

为了争取主动，政治局多数派也煞有介事地批判起党内官僚主义来了，并立即成立了一个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委员会，负责研究党内的官僚主义问题，以及劳动群众不满的根源。在9月份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作了一个关于党内政策问题的报告，把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许多党组织的领导人不是经过选举产生的，而是“任命”的。

更严重的是委员会关于“价格剪刀差”问题的报告。党确定的工业品价格过高，而把农产品价格压得过低。这是一种靠损害农民利益的办法恢复和发展工业的政策。这一政策引起了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尽管农民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剩余农产品，但由于国家控制着大部分商业机构，农民被迫以便宜价格出售他们的谷物，而以高价购进工业品。全会责成政治局就这个问题采取一些“实际的措施”，其意图在于借此暂时回避这个极其重大的问题。

10月8日，托洛茨基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信中表面上是谈这类经济问题，实际上这封信的核心是对党内的官僚制度进行尖锐的抨击。他指出，现在的情况不是由党作出决定，而是党的书记，这些官僚们在指挥一切。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支持者

把这封信在党内广为散发。三巨头认为他们自己不便出面反对，而指使唯命是从的中央监委出面宣布禁止散发这封信。于是，中央监委于10月15日下了禁令。但就在10月15日这一天，中央委员会又收到一封关于党内制度问题的所谓“四十六人声明”信。这封信是由两部分人联名写的：一部分人是老的民主集中派①成员，主要人物有奥新斯基、伏·斯米尔诺夫、德罗布尼斯和萨普龙诺夫；另一部分人是以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约·科秀尔和别洛博罗多夫为首的托洛茨基的新的拥护者。

总的来说，这些信和声明中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而且也没有反映党内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央委员会决定以通过决议的办法对付他们。于是，在10月底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对这些人进行了批判，并决定，在党内就这些问题展开争论是不适宜的。为了表明中央委员会自己是带头反官僚主义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于11月5日召开了联席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关于党的建设》的决议。决议中庄严宣布，党的领导是忠于党内民主制度的，同时，以同样庄严的态度批判了党内的官僚主义。为了向党解释这一切，季诺维也夫写了一篇文章《党的新任务》。这篇文章大谈特谈关于加强党内生活问题，并在11月7日的《真理报》上发表。政治局本来期望，这样一来事态会平息下来，但结果适得其反，党内情况不仅没有平息，而且在各级党组织中开始出现了某种暴风雨般的、难以理解的情况。特别是在首都的许多党组织中，表决的结果并不是拥护中央，而是反对中央的。面对这种情况，11月中旬政治局决定，在全党展开辩论，并纠集全部力量，大张旗鼓地发动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的运动，目的是粉碎托洛茨基及其反对派。

---

① 该派产生于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其主张之一是要求党内有组织派别的自由，被联共党的九大和十大斥责为反党集团，1927年被开除出党。

于是，著名的“单方面辩论”开始了。中央动员了全部力量在报刊上和各支部的讨论中反对托洛茨基及其“托洛茨基反对派”，对他们提出了种种指责，说他们罪该万死。在这一过程中，最令人奇怪的是，托洛茨基一直沉默不语，他既不参加辩论，对向他提出的种种指责也置之不理。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一直阅读法国小说，而当某个政治局委员针对他发言时，他便佯做对此感到非常惊奇的神态。

由于大量有关党內情况的各种材料都经过我手，所以，我很快就从中得出了这个谜的答案。原来，情况是这样的：1923年秋的反对派，即所谓的第一个反对派，根本不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总的来说，纵观所有那些年代的各种反对派的情况，对于他们的政治性质应该采取怀疑态度。问题的实质往往都是权力之争。持反对态度的人通常被指责犯了这种或那种倾向性的错误：如右倾、左倾、富农倾向、对某种形势或事物估计过低或估计过高等错误，或者是忘记了某些原则，背离了伊里奇的遗嘱的错误，等等。实际上，这一切纯属捏造或是无限上纲的，而且一旦战胜对手之后，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立刻实行他们那些刚刚被批判为罪恶的，孟什维克的，和富农的政策。一般说来，托洛茨基比中央委员会“左”一些，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始终不渝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中央却给他扣上了“右倾”反对派的帽子。这个右倾反对派在思想上有点象失败了的热月党人①，他们的言行完全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和反映，他们是党內自发产生的，既沒有纲领，也沒有领袖。无论是托洛茨基也好，还是46个联合写声明信的人，或是工人反对派也好，都根本不代表右倾反对派。右倾反对派是对共

① 热月党人——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推翻雅各宾专政的资产阶级政治集团，因在法国新历共和2年热月9日发动政变，故名热月党人。

产主义的反对派。这批人主要是在革命头几年涌入党内的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他们最早认识到，他们曾经怀有的对建成一个美好社会的希望已经成为幻想，他们曾经抱有的以为革命将会造福于全体人民的期望已经成为泡影；同时，一个新的官僚阶级正在产生，他们窃取了革命的全部成果，口头上说革命似乎是为了工农的利益，实际上他们却把工人和农民置于无权和贫困的奴隶地位。于是，他们产生了疑问："大家努力奋斗，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呢？"

这种心怀反对情绪的势力，既沒有推出自己的领袖，也沒有提出恰当的纲领，而只是通过大规模地抗议行动和群众性表决反对中央的方式表现出来。托洛茨基很快就看清了反对派右的实质，不过，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地位：如果他是一个毫无原则的机会主义者，他会成为反对派的领袖，并接受他们的右倾路线，而且事态的发展很快表明，这样的话，他会有一切机会在党内取得多数地位，并取得胜利。但这将意味着在方针上向右转，意味着热月政变和共产主义的消灭。托洛茨基是一个虔诚的，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他不能走上这条路。但同时他也不能公开声明反对这个反对派，因为这样做会使他在党内——在攻击他的中央的追随者当中和在反对派里——丧失掉自己的份量，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孤立无援的将军，光杆司令。因此，他决定保持沉默和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

但是，悲剧在于，这个自发产生的，既沒有领袖，又沒有纲领的反对派，不得不接受强加给他们的托洛茨基，而且托洛茨基硬被说成是他们的领袖。这种情况不久就促使这个反对派遭到失败。

不过，那是后来的结局。当时，各党组织内的辯论和表决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形势的发展急转直下，中央面临失败的危险。托洛茨基决定设法使形势对自己有利，并把自己的口号提给反对

派。他便于12月8日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并同时在红色普列斯涅斯基区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了这封信，12月11日又将该信以题为《新的方针》的文章形式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党的上层已经发生了官僚主义蜕变。

12月中旬，格伯乌吞吞吐吐地向政治局反映，在大部分党组织里，多数党员没有站在中央一边。我要指出，甚至在中央本身的人数众多的党支部中，在表决时也是多数人投票反对中央的。我曾经向莫斯科市委书记捷连斯基了解莫斯科党组织表决结果，我得到的统计汇报表是令人沮丧的。在首都莫斯科党组织中，中央已失去了多数，而它是全国最重要的党组织，全国各省的党组织都要向它看齐的。

在三巨头讨论政治局议程的碰头会上，我报告了捷连斯基的汇报情况，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意外的打击。

当然，他们对这个问题极其重视，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问题。因此，季诺维也夫发表了长篇演说，很明显，他企图按照列宁的模式探讨并拟定一个共同的政治战略路线。但同时他又想塞进自己的私货——他想要对自己作为政治领袖的立场进行辩解，大谈其“时代的哲学”和共同的愿望（即他所认为的共同的追求平等的愿望等等）。加米涅夫接着发言，他提醒人们要注意的是，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进程，只能通过党表现出来；他显示自己具有颇为敏锐的政治嗅觉，说他怀疑反对派是右倾的。然后，他用马列主义术语上纲说，这个反对派反映了共产主义敌对阶级——富裕农民、私有者和知识分子势力的复活。他强调，必须回到列宁提出的工农联盟问题上来。

他们在高谈阔论，而斯大林则一言不发，仍在继续吸他的烟斗。其实，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他的意见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确信，一般说来，斯大林在政治战略问题上的见解是没有价值的。但加米涅夫是一个彬彬有礼而又有心计的人，因此他说：

“斯大林同志，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

斯大林说：“哦，是对哪一个问题？”当时提出的问题确实很多。

加米涅夫尽可能地俯就斯大林的水平，因此他说：“就是那个如何争取党内多数的问题。”

斯大林说：“同志们，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大家是知道的，我认为，由谁以及怎样在党内进行表决的问题根本无关紧要；而至关重要的则是，由谁以及怎样来计算表决的票数。”甚至连对斯大林深有了解的加米涅夫，听了这一席话后，也不得不故意示意地咳了几声。

第二天，斯大林把纳扎列齐扬叫到办公室，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当纳扎列齐扬走出办公室时，脸色是不愉快的，但他是个言听计从的人。当天，组织局决定任命他担任《真理报》党的生活部主任，并立即赴任。

《真理报》社收到了纷纷寄来的关于党组织会议及其表决结果的综合报告，特别是莫斯科市的报告。纳扎列齐扬的工作很简单：比如，某个党支部会上支持中央的有300人，反对票600人，他的任务就是把数字改成赞成票600人，反对票300人，然后，《真理报》就按他改的数字发排付印。对所有党组织的报告都是如法炮制。当然，某个党支部读了《真理报》发表的有关他们表决结果的假报导后，就提出抗议，给《真理报》打电话，找党的生活部。纳扎列齐扬很有礼貌地答复他们，答应他们立即进行核实，然后就回答说：“你们反映的情况完全属实，发生了令人遗憾的错误，印刷厂把数字搞混了。要知道，他们的任务太重了。《真理报》编辑部向你们表示歉意，我们准备发表更正。”每个党支部都以为，只是把他们支部的情况报导错了，因此这是唯一的错误。殊不知，对大部分党支部的报告都是采取这一做法。但是，逐渐造成了一种全面的印象，似乎中央正在全线赢得胜利。因此，各

个省都变得小心谨慎起来，并且开始仿效莫斯科的做法，投票支持中央。

然而，在政治局里却发生了大风暴，不过，这仅仅是茶杯里的风暴而已。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麦赫利斯和卡涅尔需要助手，他们便选了几个干部当助手，但未予规定明确的职责。事实上，卡涅尔自己的职责也很难明确规定。卡涅尔自己的助手是一个年轻而殷勤的犹太人，党内的绰号是爆破手。这个小伙子很可爱，大家对他都用爱称，叫他"小爆破手"。小伙子唱洛恩格林①的咏叹调"哦，我可爱的天鹅"唱得相当出色。他极力掩饰他自己和格伯乌的联系，特别要对我隐瞒自己的身份，因为当时我与格伯乌的关系很坏，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麦赫利斯找了两个助手，一个是马赫维尔，他原为共青团中央的总务部长，由于超龄而调离共青团中央，转为从事党的工作。后来，当奥尔忠尼启泽自杀的时候，马赫维尔正担任着他的忠实的私人秘书。麦赫利斯用的第二个人是尤日阿克，他是一个年轻的犹太人，长着一张圆圆的红润的脸蛋。

纳扎列齐扬是个办事认真的人，他不仅任意篡改各党组织的表决结果，而且为了使斯大林对真实情况有确切的了解，他同时把关于各地表决的真实情况和《真理报》篡改的情况的综合简报上呈斯大林审阅。

麦赫利斯及时地把这些简报向斯大林作了报告。但是，使斯大林秘书室感到完全意外的是，尤日阿克原来是一个隐藏的托洛茨基分子。他窃取了放在麦赫利斯办公桌上的综合简报，并把它们交给了托洛茨基。于是托洛茨基便大闹政治局，在会上揭发了丑闻事件。谁都知道，纳扎列齐扬是按照斯大林的旨意而进行工作的，但政治局委员们却都做出姿态，表示同意托洛茨基的愤怒

① 洛恩格林——指天鹅武士，是13世纪末德国骑士史诗中的主人公。

是公正合理的，而且斯大林本人还带头作出这样的表示，并允诺对此事立刻进行调查。但是，调查拖拖拉拉进行了一个星期，等到最后，表决已告结束，整个事情转危为安，化险为夷，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党内多数已转到中央一边，而反对派遭到了失败。

然而，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经过调查证实，纳扎列齐扬个人有过错，并提出应立即将纳扎列齐扬调离《真理报》党的生活部，同时斯大林秘书室也予以除名。结果，纳扎列齐扬被调到地方工作，担任乌拉尔边疆区的监察委员会主席。

斯大林不仅没有庇护纳扎列齐扬，相反，还把一切罪责都转嫁于他。为此，纳扎列齐扬永远不能饶恕斯大林，但是，他此后再也没有回到斯大林身边，而且在1937年被斯大林枪决了。至于尤日阿克后来的命运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我毫不怀疑，他肯定是活不过30年代的，因为斯大林的记忆力很强，他任何时候都不会饶恕和放过任何人的。

有关斯大林的事情我知道得愈来愈多。有一次，我突然了解到，斯大林还是个反犹太人主义者。这一发现使我能够理解在此后的两年里发生的许多事情。

我是偶然察觉到这一点的。当时，我和麦赫利斯正站着谈话，麦赫利斯是犹太人。斯大林从自己的办公室出来，走到我们两人面前。麦赫利斯说："斯大林同志，我们收到法依维洛维奇同志的一封来信，他对中央的做法很不满意，他表示抗议，向中央提出了警告和要求，并且认为中央执行的政策是错误的，等等。"这里，需要把情况说明一下：法依维洛维奇同志是共青团中央的第四书记。很早以前就已形成制度，共青团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青年一代的辅助性组织，共青团员及其领导人都还不是共产党员，因而他们没有任何权利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至少在共青团的范围内是如此。因而，对任何这一类的企图都要严加禁止。还说什么："你们想干什么？你们的手伸得太长了！这对你们来

说还为时过早，这些事不是你们这样的脑瓜儿所能考虑的。”

斯大林听了麦赫利斯的话后，突然大发雷霆，他说：“这个讨厌的犹太狗崽子，他想干什么？”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失言了，便转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了。

我好奇地看着麦赫利斯。我说：“哎，小伙子，怎么样，这个你吞得下去吗？”

“什么？怎么啦？这有什么关系？”他故作镇静和惊奇的样子。

我又说：“怎么没有关系呢？你毕竟也是个犹太人呀。”

麦赫利斯说：“不，我不是犹太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采取这种态度对他是有利的，正是这种态度才使麦赫利斯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始终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斯大林分子，并且对斯大林效尽犬马之劳，作到了别人作不到的事情。

我仍然很想了解，作为反犹太人主义者的斯大林，怎样会用两个犹太人——麦赫利斯和卡涅尔作他的秘书呢？不久，我就懂得了，他之所以任用这两个人，是出于掩人耳目的需要。早在国内战争时期，斯大林在前线领导由一批自由放纵的人组成的队伍，他们仇恨托洛茨基和他的副手斯克良斯基，以及陆军人民委员部里的一些犹太人干部。这个情况在党的领导上层中引起了怀疑，认为斯大林有反犹太人主义思想。在斯大林由军队转到党政工作后，为了消除人们对他的怀疑情绪，他就挑选了卡涅尔和麦赫利斯这两个人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最初，是在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在1921～1923年间，斯大林是这个委员部名义上的领导人；之后，斯大林又让他们到党中央他的秘书室工作。斯大林对这一抉择是用不着后悔的，卡涅尔和麦赫利斯始终都是他手下最忠诚的工作人员。但是，斯大林仍不大放心，为了防止万一，他在1937年还是把卡涅尔枪毙了，因为卡涅尔作为斯大林的心腹，忠实地参与了他的大量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对内幕真相知情过多了。

1923年底，同反对派斗争的事告一段落。但是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小小后果。由于在进行党内辩论期间，党中央机关的党支部里的多数，曾被反对派争取过去，于是产生了追究谁是罪魁祸首的问题，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党中央机关党支部那位无能的书记。这个人是资历很深的老党员，但被认为是个十足的糊涂虫。卡涅尔决定把他撤职。但中央机关党支部拥有党员达1500人之多，党中央机关内的全体干部都是党员，因此确定新的中央机关党支部的书记人选，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如果他事先不征得我和麦赫利斯的同意，他是不敢采取行动的。所以，他向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进行了反复考虑。麦赫利斯叹了口气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党，可是在党中央机关党支部里的人，全是一些职员，文牍主义者和官僚，竟然没有一个工人。按照党的正统思想，需要一个机床工人，或者至少找一个手工工人，可是在中央机关里，哪里有什么手工劳动呢？"

我为了寻开心，便说："大家别着急，在中央机关里还真的有一名从事手工劳动的工人。"

参加谈话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这是胡言乱语。"

"我向你们保证，确实是有的。"

"那么，这位宝贝究竟是谁？"

于是，我向他们介绍说，当我在莫洛托夫那里工作时，我曾经担任《中央消息》这个不景气的杂志的秘书。杂志在印刷所印好后，送到中央的收发科，然后再分送给各级党组织。在收发科里有一个工人，专门负责包装和搬运工作。这个人个子矮小，秃头，可是看上去倒不笨。他的姓名叫波斯克列贝舍夫。大家在哈哈大笑声中决定把这个人请来。波斯克列贝舍夫莫名其妙地来了，他心里纳闷，不知为何斯大林秘书室会找他。我们和他谈了谈，觉得这个小伙子确实并不蠢笨，而且将来肯定是个唯命是从的人。于是，我们多少有点恶作剧地决定推举他担任中央机关党支部的书记。对于大

家来说，既然这个建议出自斯大林的秘书室，自然就不费吹灰之力得到通过。结果证明，波斯克列贝舍夫是一个非常顺从的书记，他甚至过分勤快、过分多地往卡涅尔那里跑，以便去听取指示。

但是，斯大林秘书们的恶作剧，对于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官运亨通，还曾经再次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926年，斯·柯秀尔① 担任党中央的第四书记（当时的中央书记已增加至5人）。通常，新上任的达官贵人都带来一大群自己的亲信，即所谓的"自己的小伙计"。但是，柯秀尔想要表示他并没有自己的帮派，而且也不打算拉帮结派。因此，当人们问他，希望由谁担任他的助理时，他谦虚地回答说，他本人没有考虑提出任何人选，他很想让斯大林秘书室给他指定一位助理。柯秀尔是个个子矮小、秃顶的人，而波斯克列贝舍夫也同样是矮小、秃顶的人，他们两人倒可以配为相当滑稽的一对。因此，卡涅尔开玩笑似地推荐中央机关党支部书记波斯克列贝舍夫担任柯秀尔的助理，结果，事情就这样定了。

就这样，波斯克列贝舍夫开始了未来的斯大林秘书的官运。1928年他离开柯秀尔的秘书室，成为托夫斯图哈的助手。1935年托夫斯图哈死后，波斯克列贝舍夫接替了他的职位，晋升为斯大林的助理并负责领导特别科。此后，连续18年他一直是斯大林最忠实的勤务员，甚至部长和政治局委员们在他的面前都无不胆战心惊。尽管他由于不慎，和托洛茨基的儿子——谢道夫之妻的亲妹妹结为夫妻，但是，当1937年他的妻子根据疑心狂斯大林的命令而遭到逮捕时，他甚至连眼皮都没敢眨一下，仍然继续和斯大林形影不离，一直在斯大林身边工作到1953年。只是在斯大林逝世前的几个月，他才被撤职，并战战兢兢地等待着被处决，不过，斯大林毕竟没有处决他。

---

① 柯秀尔——1925年起担任俄共（布）中央书记，1927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执委会主席团委员。

第 6 章　布尔什维克最高层领导内幕

托夫斯图哈与列宁研究院　列宁逝世　重新改组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又一次打击　斯克良斯基　斯维尔德洛夫一家　政治局的金钢石基金　检查政治局决议执行情况　最高体育委员会

1923年整个下半年，斯大林的秘书托夫斯图哈的任务，就是完成斯大林交给他的"半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斯大林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这件事起了相当不小的作用。

由于列宁即将逝世，在三巨头和托洛茨基之间围绕着继承问题的斗争加剧展开。三巨头在党内大肆宣传，把自己打扮成列宁的忠实的、杰出的学生。官方的宣传把列宁捧为圣人——天才的领袖，党的一切都应归功于他；把列宁的著作视为圣经，是眞正的眞理。实际上，列宁的著作涉及的方面很广泛，内容很丰富，人们可以各取所需，断章取义地随意加以引用。对于斯大林来说，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仅仅是列宁著作中的一个部分。在革命前流亡国外期间的争论中，在革命期间及内战时期，列宁曾经不得不对这些或者那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发表一些尖锐的评论和意见。当然，列宁的这类言论，主要还不是见诸于公开发表的文章中；而是反映在私人信件和札记里，这种情况屡见不鲜；而在革

命以后，则主要反映在政府的工作实践中，见诸于各种决议、文件和公文函件之中。在斯大林看来，千载难逢的时机到来了：现在可以从老的历史卷宗里，把列宁尖锐批判某个著名党的领导干部的言论摘录出来，并予以公开发表，从而对这个人的官运施以致命的打击，并借刀杀人地说："请看，伊里奇对他的看法是这样的！"

然而，可以援引的东西多得很，不仅可以援引列宁写过的东西，而且，也可以援引列宁的对手们在激烈争论时发表的一些批评列宁的话。只要回忆一下革命前列宁与托洛茨基论战中的情况就够了：当时，列宁曾经指责托洛茨基犯下了滔天大罪；而托洛茨基也在文章中愤怒地把列宁说成是靠群众的落后性过日子的职业剥削者和不诚实的阴谋家。在列宁写给政府高层领导成员和自己的工作人员的私人信件中，内容又是何其多啊！如果把这些统统都收集起来，这将是斯大林手中何等厉害的武器啊！

当三巨头讨论如何进行这项工作的问题时，我当然是在场的。我明显地感觉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非常短见，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仅仅想到同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的搏斗。而斯大林虽然沉默寡言，但却在深谋远虑地思考着，怎样在更大的范围内利用列宁的威力。最后，他们决定拐弯抹角地怂恿梁赞诺夫①，由他出面向政治局提出一项建议。梁赞诺夫是一个资历很深的老党员，在党内被认为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又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领导人。他整天埋头于研究马克思的书信和手稿。后来，他果然真心实意地向政治局建议，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改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政治局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认

① 梁赞诺夫——十月革命后从事工会工作，1931 年前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1930年被开除出党。

为当务之急是先成立一个专门的列宁研究院，其任务是，用几年的时间研究列宁的著作，并先把有关列宁的一切材料集中起来，以后再考虑两个研究院合并的问题。政治局还决定，这项工作必须立即着手进行。于是，1923年11月26日政治局通过决议：列宁研究院应该成为集中收藏一切列宁手稿资料的唯一机构，并以党的纪律相威胁，规定所有党员必须把个人或单位档案中收藏的列宁笔记、信件、决议案及其它出自列宁之手的一切材料，全部移交给列宁研究院。

政治局以决议是根据架赞诺夫的建议而作出的这一点为借口来遮人耳目，使中央委员们在看到政治局会议记录后会认为，政治局决议的目的确实是为了研究列宁的著作。

托夫斯图哈当上了列宁研究院院长的助理。他早已着手翻阅政治局的档案，把列宁的笔记抽出来分类编排。现在各种大量的材料纷纷送到他手里，他根据斯大林的需要进行分类，凡是对斯大林不利的列宁的笔记就永远消失了，而对其他人不利的全部材料，则被精心地汇集到一起，按姓名进行分类整理。斯大林要求作好准备，一旦需要，应把列宁对每一个有名望的党的领导人的责骂性的材料随时提供给他使用。

1924年1月14日和15日，在中央全会上对党内辩论做了总结，三巨头满意地指出，反对派已被粉碎。现在可以采取进一步同托洛茨基斗争的步骤了。这些步骤是逐步而审慎地进行的。于是，有个别中央委员向中央委员会反映说，红军里的情况很糟糕。因此，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研究红军状况”的“中央军事小组委员会”，由古谢夫①任主席。小组委员会的成员是精心挑选的，从

---

① 古谢夫——十月革命后担任一些军职，如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等，另任中央监委书记、中央报刊部部长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等职。

它的组成就可以清楚地预见它将作出的结论：参加委员会的有温什里希特、伏罗希洛夫、伏龙芝，以及俯首听命的安德烈也夫和什维尔尼克。

全会以后，立即于1月16～18日召开了党的第8次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机关干部会议，代表都是各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干部。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报告发出号召，要党的官僚们提高警惕，指出，"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企图搞垮党的机关"，并要求停止任何辩论。

几天后，即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了。在此后混乱不堪的几天里，人们可以观察到许多有趣的事。斯大林继续进行阴谋策划。当时托洛茨基正在高加索疗养，斯大林给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故意把列宁安葬的日期弄错，致使托洛茨基认为，时间过紧，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时赶到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样，他就留在高加索。结果，三巨头在葬礼中装出一副列宁的继承人的样子，一手垄断了在葬礼中庄严地发表效忠演说和宣誓的角色而托洛茨基却被人们认为他故意不出席列宁的葬礼。我注意观察着这件事引起的反应。

在全国，人们对列宁逝世的态度带有两面性。一部分人感到满意，尽管他们极力掩盖自己的这种心情。对于他们来说，列宁是共产主义的发明人，既然他逝世了，那是命中注定。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列宁比其他人要好一些，因为当他看到了共产主义遭到挫败时，他急忙恢复正常生活的某些因素，采取了新经济政策，从而保证了人民能勉强维持生活。与此相反，党内大多数人却对列宁的逝世感到震惊，特别是基层，因为列宁是公认的领袖和领导人。他们大有茫然若失、不知所措之感，觉得列宁不在了，这可怎么办啊！党的上层领导中的态度则各有不同：有些人，如象布哈林和列宁的副手瞿鲁巴等人，他们和列宁的关系极为密切，因列宁的逝世而大为震动；加米涅夫对列宁的去世也感到有

些难过，因为他毕竟还有点人情味。但是，斯大林给我的印象却是沉重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对列宁的去世是幸灾乐祸的，因为列宁是他取得权位的主要障碍之一。当他独自在办公室里，或在秘书们面前，他的情绪好极了，兴高采烈，喜出望外；而在各种会议上，他则故作虚假的悲痛状，发表虚伪的演说，慷慨激昂地宣誓要忠于列宁。当看着他的这种伪善面目时，我不由自主地在想："你这个家伙是何等卑鄙啊！"在这时候，斯大林本人对于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这颗炸弹的事还全然不知。克鲁普斯卡娅一丝不苟地严格遵照列宁的遗言行事，她想，既然这封信是写给党的代表大会的，而这个大会定于5月份才召开，只有到了那时，她才能予以启封，并把列宁的遗嘱交给政治局。关于这个遗嘱的事，加米涅夫已从继续担任人民委员会秘书的福齐也娃那里闻到一点风声，但他保持缄默。

由于列宁的逝世，以及因而引起的混乱局面，中央接连召开全会。继一月全会之后，由于列宁的逝世又紧接着紧急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之后，1月份还开过另一次全会。1月初，对全苏各人民委员的任命和调整工作刚刚结束，接着又对一些重要职位重新作出安排。究竟由谁来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呢？在政治局里，甚至在三巨头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三巨头害怕的是，如果任命他们当中的某个人担任这个职务的话，这将是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个人已最终成为列宁的继承人，即成为整个政权的第一号人物。但是，这种安排对三巨头中的其他人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最后，大家在一点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由李可夫作为这个职位的人选，因为在政治上他是一个平淡无奇的人物，让他出任政府首脑的职务，这与其说是个名符其实的职位，莫如说只是起一种点缀作用的花瓶，正如同加里宁的角色一样，他身为全俄中委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形式上他是共和国的大总统，而实际上却毫无实权。在这以前，李可夫的职务是最高国民

经济委员会的主席。

随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①的建立，对劳动国防委员会也进行了改组，主席是加米涅夫，实际上他领导了所有的国民经济部门，如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部、商业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等等，这些部门全部统一归口由劳动国防委员会领导。这样一来，也就大大限制了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的职位的重要性。对格伯乌也进行了改组，改名为联盟格伯乌，把它的权力扩大，使之成为一个凌驾于全国之上的机构。它的形式上的头头仍是捷尔任斯基，但由于他同时接替了李可夫原来的职务，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因此，实际上联盟格伯乌的实权落到了它的第二副主席亚哥达的手中，甚至它的第一副主席明任斯基②也没有实权。亚哥达和斯大林秘书室关系极为密切，但和我的关系则不然。

2月3日，新的中央全会讨论关于召开例行的党代表大会问题，但全会主要听取了"中央军事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会上进行的尖锐批评，表面上是针对军事人民委员部的，而实际上矛头则是针对托洛茨基的。然后全会作出决定，其中指出，全会"认为红军的现状是没有战斗力的"，因而必须实行军事改革。

3月初，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终于又给托洛茨基以新的打击，撤销了他的副手斯克良斯基③的职务，因为斯大林对他一直怀恨在心；同时确定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新的领导班子。虽然托洛茨基仍留任主席，但任命伏龙芝为他的副手，并兼任红军总参

① 自1922年12月30日起，正式改为这个名称。

② 明任斯基——十月革命后曾任财政人民委员、驻柏林总领事。1919年起在格伯乌工作，1923～1926年任副局长，1926年起任局长。

③ 斯克良斯基——十月革命后任陆军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18～1924年任副陆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委会副主席。

谋长的职务；一些同托洛茨基敌对的人也潮水般地涌入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其中有伏罗希洛夫、温什里希特、布勃诺夫，甚至连布琼尼也进去了；撤销了原由沙皇军队上校谢·加米涅夫担任的有名无实的总司令的专家这个职位。

三巨头开会，研究如何处理斯克良斯基的问题时，斯大林不知出于什么考虑，竟然提议把斯克良斯基派往美国，担任苏美贸易股份公司①的经理。这个职位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时苏美之间还没有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在美国既没有全权代表机构，也没有商务处，苏美贸易股份公司是一个仅有的机构。它是一个贸易团体，负责经办贸易事务。实际上，它不仅行使全权代表机构的职能，又起着商务代表处的作用，同时又是共产国际和格伯乌在美国进行一切地下工作的基地。就它在贸易方面的职能而言，也是相当重要的。当内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被破坏而瘫痪的铁路交通运输之所以得以恢复，完全是由于及时从美国进口了大批蒸汽机车。这一使命当时是通过一个名义上以罗曼诺索夫教授为首的专门的贸易使团进行的，而且这种进口采购之所以成为可能，完全是由于得到了一些财力雄厚的，对苏维埃革命怀有好感的犹太人团体的支持。在这一方面需要运用许多外交艺术和智慧。

对斯大林的建议感到惊奇的并不仅仅我一个人。由于在整个内战期间斯克良斯基一直使得斯大林不痛快和对他粗暴地嘲弄，斯大林对斯克良斯基的仇恨甚至超过对托洛茨基的仇恨。连季诺维也夫也不能容忍这个人，因而斯大林的建议就更加令人不解。

我还记得，在这以前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当提及斯克良斯基时，季诺维也夫的脸色变得很轻蔑，他说："有些来自穷乡僻壤的校外考生，居然异想天开地梦想充当伟大的军事统

---

① 1924年设于纽约。

帅，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这一招数，不仅是对斯克良斯基的打击，而且也是对托洛茨基的一次打击。托洛茨基愤怒到了极点，但他极力抑制住自己，没有发作，只是对季诺维也夫投以尖锐的一瞥，然后一言未发。

斯克良斯基被任命为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经理后，便启程到美国去了。但是，在此后没过多久，从美国发回一份电报说，斯克良斯基在乘坐摩托艇游湖的时候，由于发生了不幸而落水淹死。不过，发生这个不幸事件的现场情况极其不寻常，说什么他一个人驾驶摩托艇出游，长时间未回，于是派人出去寻找，发现那条船翻了，人已被淹死了，而且没有任何证人说明这是一桩偶发不幸事件。

得悉此消息后，我和麦赫利斯立即去找卡涅尔，我们两人异口同声地说：“格里沙，斯克良斯基游湖而死，这是你干的事。”

卡涅尔软弱无力地为自己辩解说：“是呀，那当然是我干的啰。反正不管什么地方出了事，罪魁祸首永远是我啰。”我们坚持自己的看法，而卡涅尔则竭力否认。

最后，我说：“你要晓得，我作为政治局的秘书，需要知道一切情况。”

对此，卡涅尔回答说：“算了吧，我看，有些东西，即使是政治局秘书也是以不了解为最好。”

尽管总的来说他并未承认此事，但我和麦赫利斯坚信不移：斯克良斯基之死肯定是斯大林下令干的，而所谓的“不幸事件”，则是由卡涅尔和亚哥达一手策划的。在尤日阿克事件发生之后，在斯大林秘书室里工作的人都变得格外小心谨慎了。

我结识了斯维尔德洛夫一家。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家庭。老斯维尔德洛夫已经死了，他过去住在下诺伏哥罗德市，生前是个雕刻师。他具有很高的革命热情，因而同一些革命组织有联系。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地下革命工作者刻制用以伪造证件

的假图章。这个家庭充满了革命的气氛。但是，他的大儿子季诺维依由于受了某些复杂的精神刺激，导致了心灵深处的急剧转变，因而他断绝了同革命人士和家庭的关系，也摒弃了犹太教。为此，他的父亲以传统犹太教的诅咒方式郑重其事地诅咒了自己的儿子。后来，季诺维依被高尔基收为义子，并且改了姓名，叫季·别什柯夫。但由于精神变化继续发展，他也脱离了高尔基的革命环境，只身前往法国，并为了同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他在法国参加了外籍军团。不久之后，当有消息说他在战斗中失去了一只手臂时，老斯维尔德洛夫极为激动地问道："他失去的是那一只手臂？"当他得悉儿子失去的是右臂时，老头子高兴到了极点，因为犹太教的诅咒仪式有一条公式，即一经为父亲所诅咒，那么，被诅咒的儿子必将失去右臂。后来，季·别什柯夫入了法国籍，继续在军队服务，一直晋升到将军。他和自己的家庭彻底断绝了关系。我到法国后，本想向他介绍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在俄国的生活情况，但他回答我说，那不是他的家庭，因而关于他们的情况他根本不想知道。

他的第二个儿子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参加了列宁的党，并且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里一名著名的委员。十月革命后，他成为列宁的得力助手，担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也就是形式上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元首。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组织工作和干部分配工作。他当时担任的工作，后来扩展为党的中央机关，特别是它的组织调配部。1919年雅·斯维尔德洛夫因患肺结核病而死。

雅·斯维尔德洛夫死后，乌拉尔的首府，一个拥有百万人的大城市，被命名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我在下面要讲到，斯大林由于某些个人的原因，很不喜欢斯维尔德洛夫，而斯大林是永远不会忘记这些事由的。可是，斯大林上台以后，不知为什么，他竟然没有改掉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这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原名

是叶卡捷琳娜堡，斯大林之所以让它继续延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名称，可能是出于下面的考虑：1918年7月，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沙皇家族遭到残杀，雅·斯维尔德洛夫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国家元首对这一屠杀事件是有部分责任的，因为他当时根据列宁的指示通知乌拉尔的布尔什维克地方政权说，关于沙皇家族如何处置的问题，交由他们作出决定。列宁是想通过这种狡猾的手法来推卸官方应负的责任。

老斯维尔德洛夫的第三个儿子维尼阿明·米哈依洛夫·斯维尔德洛夫由于不愿从事革命活动，而侨居美国，并在那里成为一家不大的银行所有人。在俄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急忙要他的弟弟回国。维尼阿明关掉了他的银行，回到彼得堡来。在这个时期，列宁还没有摆脱诸如“每个厨娘都应学会治理国家”这类蛊惑人心的荒谬想法。列宁一度曾试图把这种想法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因而作出了一些纯系宣传性的荒唐的人事任命。譬如，他为了刺激资产阶级，故意任命一个准尉克雷连柯担任军队的最高统帅；让一个半文盲的水手出任国家银行的行长；任命了一个同样没有多少文化的司机叶姆沙诺夫任铁道部长(即交通人民委员)。结果，那位可怜的叶姆沙诺夫在部里干尽了蠢事，把一个部搞得一团糟，上任不到两个月，他就哭哭啼啼地去请求列宁开恩，把他从无法胜任的工作中解救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就向列宁推荐那个刚回国的非党员弟弟担任这个职务。后来，他被任命为交通部长。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维尼阿明感到在这个岗位上毫无作为(后来，托洛茨基和捷尔任斯基曾先后担任这一职务，同样也都很不顺利)，他提出要求转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担任主席团委员，从此以后，他仕途缓慢，而且不断走下坡路。不过，他很明智，一直没有入党。令人奇怪的是，他哥哥去世后，他竟然没有立即被赶下台，而且在1923～1925年间，他仍然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

委员会委员，主管科学技术局的工作。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莫斯科艺术剧院出现了一位非常年轻（年龄大约仅17岁），才华出众的女演员薇拉·阿列克山德罗夫娜·捷列夫斯卡娅，而且，她长得非常漂亮。

由于缺乏舞台经验，当时她还不能扮演主要角色，但是她酷爱这个艺术剧院，专心致志地醉心于剧院的工作。但是，这家艺术剧院不仅是契可夫的，也是高尔基的剧院，而在高尔基的周围，总是有一批非常革命的人。有一次，剧院里的一个同事请求这个没有经验的小姑娘帮忙把一些革命读物藏起来。她感到不好意思拒绝，加之对这种事她也全然不懂，所以未加思考就欣然接受。可是，她干得很不巧妙，很快就被警察发现。为此，她被逮捕并被流放外地。人们知道，对被流放的革命者，沙皇警察一般都保证经常发给津贴费，以便被流放者用于食、住等生活开支。这些革命者在流放中整天无事可做，便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其实，他们的生活是自由的，只是要受到警察的监视。但实际上，这种监视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想从流放地逃跑是轻而易举的事。不过，逃出去以后就必须转入非法的地下状态，这当然就有所不便。可是，究竟有那些不便之处，我不太清楚，因为当他们重新被捕时，又被遣送回流放地，但流放期并不因此而延长。沙皇警察对被流放者是如此照顾，以至让这些人按照他们所属的党派分开居住，把孟什维克分到一个地方，而把布尔什维克安排到另一个地方。这种安排非常便于他们聚在一起，团结友爱地过自己的党的生活，他们的时间都是在会议和就党的纲领和策略问题进行讨论中度过的。此外，他们还给党的刊物撰写文章，并开展讨论这类文章的活动，等等。

在薇·阿·捷列夫斯卡娅被流放的地方，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显然，她好心为人收藏的那些革命读物，是布尔什维主义读物。在这批布尔什维克中，有3个人是中央委员：斯

潘达里扬，斯大林和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两人都对这个年轻美貌的女演员着了迷，两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向她献殷勤。薇·阿·捷列夫斯卡娅毫不动摇地拒绝了阴郁的，不讨人喜欢的，没有教养的斯大林，而看中了举止文雅、受过欧化教育、知识渊博的斯维尔德洛夫。

从流放回来以后，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家中有妻子克拉夫季娅·诺夫戈罗德采娃和一个儿子安德列，并且重又担任了更高的国家领导人的职务，而薇·阿·捷列夫斯卡娅转而过上所谓单身的生活。当维尼阿明·斯维尔德洛夫看到她的时候，一见钟情，立即拜倒在她的脚下，于是他们便成了婚。他们婚姻上的结合一直在延续着，直到我同他们相识后仍是如此。

老斯维尔德洛夫的第四个儿子格尔曼·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对自己的兄长来说，是一个同父异母的小弟弟。他们的父亲在第一个妻子去世后，又娶了俄罗斯女人柯尔米里采娃为妻，格尔曼就是他们生下的孩子。他的年龄小很多，1923年时只有19岁，他没有参加革命，是个共青团员。他是一个绝顶聪明，思维敏锐的男孩子。我比他大4岁，他跟我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到我这儿来，对我很友好。当我逐渐成为一个反共分子的时候，他对我内心深处发生的变化毫无所知。我们两人之间无话不谈，唯独政治除外。

斯维尔德洛夫四兄弟有个姐妹，她嫁给了俄国南部某城市的一个富翁阿维尔巴赫，他们生有一男一女，儿子列奥波里德是个机灵的，惯于阿谀奉承的青年，他自诩有领导俄罗斯文学界的天赋，一度曾经通过"纳帕斯托夫"派在文学界实行强硬的契卡式的监督。在这方面，他主要是依仗亲戚关系的权势——他的妹妹伊达嫁给了格伯乌的领导人，不无名气的格·亚哥达。

亚哥达之所以能青云直上，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斯维尔德洛夫家族。事情是这样的：亚哥达过去根本不是药剂师，象他

自己宣扬和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当年，他曾是老斯维尔德洛夫雕刻作坊里的一名小学徒，在干了一阵子之后，他认为，可以独立单干了，于是他盗窃了整套工具逃走了。他当时断定老斯维尔德洛夫绝不会到警察局去报案，因为他害怕暴露地下活动。可是，独自营生的尝试没有成功，过了一段时间他便回到老斯维尔德洛夫跟前俯首请罪。老头子原谅了他，再次接受他参加工作。然而没过多久，惯偷亚哥达故态复萌，又一次偷窃了作坊的全部工具潜逃而去。

革命成功后，这个丑闻已被人遗忘，亚哥达追上了这位国家元首的侄女儿伊达，这个关系对他以后的官运亨通帮了大忙——他终于挤进了克里姆林宫的圈子之中。

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遗孀科·诺夫戈罗德采娃没有参加工作，她过着隐居的生活。

有一次格尔曼·斯维尔德洛夫来找我，顺便告诉了我一件事。他说，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15岁的儿子安德烈对他母亲书桌里的一个匣子很感兴趣，这个匣子总是上着锁。有一次，安德烈问他妈妈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她严厉地说："不许你动它。不管你的事，别问了！"有一天，她偶然把钥匙忘在家里，安德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趁着这个机会把匣子打开一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原来是一堆假宝石，样子很象大粒的钻石。他想，这当然是伪造的宝石，因为，妈妈那里会有这么多真正的钻石呢？然后，他重新把匣子锁上，把钥匙放回原处。

格尔曼也认为，这是一些玻璃制的玩意儿。是的，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从来不贪财，他也从来未曾有过珍贵的珠宝。我也表示同意格尔曼的看法，说那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玩意儿。

但是，我知道，这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早在这以前，我在翻阅政治局档案时发现了一个线索说，大约在3、4年前，即在1919～1920年间，正当出现了严重的军事危机，苏维埃政权处于

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曾经从全国金刚石储备中拨出一部分，设立了一个“政治局金刚石基金”，其用途是，一旦丧失政权，得以此保证政治局委员们的生活和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所需的经费。档案中留有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指示的线索，但关于这笔基金究竟存放在何处却只字未提，甚至在我的保险柜里的特殊卷宗里也没有文字记载。显然，当时就基金存放的地点作出的决定，只限于政治局委员们知道。这次我终于偶然找到了答案。确实，一旦真的丧失了政权，这笔基金存放在其它任何地方都是危险的，最好的办法是交给受到政治局绝对信任的某个私人保管，而且这个人还应该完全不是政治角色，应当是毫不显眼的人。这就说明何以克拉夫季娅·诺夫戈罗德采娃没有担任任何工作，何以她不露声色地过着隐居生活；同时也说明，她何以不用丈夫斯维尔德洛夫这个响当当的名字（尽管用这个名字，对她的生活各方面都大有好处），而继续沿用自己姑娘时代的名字。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显然，她就是负责保存这笔基金的人。不过，我不认为，她会继续保管很多年，因为，苏维埃政权垮台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

关于斯维尔德洛夫一家人的情况，我还需要补充几句。维尼阿明·斯维尔德洛夫牺牲于1937年，阿维尔巴赫1938年被枪决；众所周知，亚哥达也在同一年被枪决；关于薇拉·列克山德洛夫娜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至于有关格尔曼的情况，我以后还要谈到。

我作为政治局秘书的地位很快就得到了巩固。在初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带着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我的，他们怀疑我是“斯大林的人”。但他们过了不久就得出了结论，我之所以担任这个职务，并不是由于得到斯大林的垂青，而是由于我个人具备一些优点。在我到政治局工作的头3、4个星期里，我仍然继续沿用过去惯用的做法：开始时是列宁，后来是加米涅夫，他们先把

政治局的决议草拟好，然后口授给女秘书格利亚塞尔，后者记录下来。但过了不久，我便决定延用过去我在莫洛托夫手下和组织局工作时的办法，由我一个人把大部分决议案的草拟工作担当起来。我过去的经验和做法，不仅使莫洛托夫节省了许多时间，而且在问题的实质方面也是助了他一臂之力，因为他本人起草决议案既慢又吃力。加米涅夫是一个出色的会议主席，他在草拟决议时既快又准确，因此对他来说，主要是节省时间的问题。我去会见加米涅夫，并对他说："我在每次会议前，对会议都充分作好准备工作，因而对各部、委提出的建议的色彩及其意义也了解得十分清楚。同时，对问题的来龙去脉也了如指掌。所以，没有必要总是把拟定的决议口授给我，我能够自己根据已通过的决议起草成为文件。"听罢，加米涅夫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他的这种眼神的含义是："你这个年轻人，看来，要管的事太多了。"但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在这以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某个复杂的国民经济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还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以及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意见都不一致。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加米涅夫总结说："好了，据我看来，政治局倾向于李可夫的观点，我们现在进行表决。"

果然不错，会议表决的结果是批准了李可夫的主张。这时，加米涅夫迅速地瞥了我一眼，说："好吧，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于是便转入了下一项议程。这就带有艰难的考试性质了，我把所讨论的许多不同的问题，写成长而复杂的决议，并象往常一样，是抄写在两面可用的卡片上，然后交给斯大林。斯大林阅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便转给加米涅夫。加米涅夫仔细审阅后，未作任何改动便又退回给我，并对我投以激动的目光，意思是"好极了"。从此以后，我所建议的新做法便被采纳并付诸实践，这使得政治局节省了许多时间，不再为决议的提法浪费时间了。

以往，政治局委员们对会议主席拟定的决议案经常争论不休，往往提出一大堆修改补充意见。现在，在大多数情况下，只需在会上确定并通过某项决议的总的精神，至于决议的具体文字，则委托秘书去草拟，当然，是在主席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我可以说，几乎在所有最复杂、棘手的问题上，加米涅夫对我起草的文稿都没有进行过改动。

显然，我使自己的工作更加复杂化了。一方面，我要管一些会议的技术性工作，诸如安排那些被召来参加会议的人及时进入会场；保证给政治局委员们提供会议必要的材料等。另一方面，我还要密切注视会议的进行情况，防止出现错情，使政治局不要把过去已经通过决议的问题，重新讨论并再次作出决议；或者相反，通过一些与不久前刚刚通过的决议相抵触的决议。只要出现以上这些情况，我就请求发言，提醒政治局注意。此外，我还要全神贯注地跟踪会上争论的全过程，掌握住争论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微妙细节，同时就刚刚讨论过的问题起草决议草案。季诺维也夫看到，我能够胜任所有这些工作，他说："巴让诺夫同志就象尤里·柴扎里王子一样，能够同时做5件事。"我不知道尤里·柴扎里是否具有这种才能，但我对于季诺维也夫的褒奖之词却不能无动于衷地淡然处之。

不久以后，我在自己飞黄腾达方面又迈出了一步。一次，在三巨头的碰头会上，我提出："你们在政治局通过了许多很好的决议，但你们对于这些决议执行情况如何并不了解，甚至往往对它们是否得到贯彻执行也不清楚。当然，单纯为了检查决议的执行情况而增设一个新的机构是不适宜的，因为政治局工作的全部情况都是绝密的，不能因此而扩大接触机密人员的范围。其实，可以通过一种简单的办法来进行，哪怕是对政治局所讨论过的问题和决议进行一般性的监督也好。我对政治局的决议的精神和文字都非常熟悉，因为会议的纪要是我写的，而且，会议的文件也往往

是由我起草的。请你们委托我去检查政治局决议的落实情况吧，由我去同那些被责成执行决议的有关部门领导人联系。不管人们怎样评价这种监督的份量，但对那些领导人经常加以提醒，使他们牢记政治局的耳目是在注视着他们执行的决议落实情况的，使他们不致掉以轻心。这种做法不可能不产生积极的影响。”

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认为这个建议完全合乎逻辑，因而都表示同意。而斯大林却一声不吭。其实，他十分清楚，由他的助理负责监督检查所有部长和中央委员们的活动，这恰恰是加强了他的权力，因而也更加突出强调了他的作用。他用那种奇异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这种眼神除了具有其它含义之外，似乎在对我说：“嗯，小伙子，看起来，你很有前途！”

关于督促检查政治局决议落实情况的工作，我是这样进行的。首先，准备好一个大笔记本，其中在左边贴上政治局的各项决定，在右边写上我对每项决议的检查结果的意见。这项工作我是独立自主地进行的，不需要向任何人请示汇报，我自己可以随时用高频保密电话机给有关的部委领导打电话。例如，我说：“卢那察尔斯基同志，我是巴让诺夫，某天某日政治局通过的那个决议，你们是如何落实的，请你谈一下情况如何。”于是，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便象一名小学生那样报告起来。一般来说，苏维埃制度的特点是办事普遍散漫拖拉，杂乱无章，上级的决定只能部分得以执行。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便要竭尽全力向我申明，虽然任务完成得很少，但这完全不是他本人的或是他领导的部门的过错，而是由某种客观原因造成的。

由于我负责检查监督工作，我自己的地位很快就变得特殊起来了。我成为对所有人的一种威胁，甚至对一些布尔什维克上层领导的高级干部也是如此。这是显示权势的一个典型例子，因为我既可以认为对方作出的解释是令人满意的，这样，事情便到此结束；我也可以认为对方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并因而向三

互头或政治局报告。当然，问题并不在于政治局根据我的报告是否会匆忙撤掉某个有过失的人的职务。这类人事的任免是根据其它的考虑，即根据权力之争和幕后阴谋诡计的情况而决定的。但是，如果当时已经酝酿或倾向于要摆脱或撤销某一个重要人物的职务的话，那么，这样做的最好的借口，莫过于政治局秘书的报告，其中可以用事实证明这位大人物经常是不执行政治局决议的。我在政治局工作的整个期间，一直负责这项检查工作。

当时我很年轻，精力很充沛，所以自己又很快找到了一种个人喜好的业余活动。当我在组织局作秘书时，我曾经出席组织局批准最高体育委员会成员和这个部门活动的指导原则的会议。那时候，我就感到这个部门的工作是荒诞的，但是，由于当时我还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没有敢提出批评意见。

人们认为，体育可以增进劳动人民的健康，通过体育活动还可以对劳动者进行训练。于是，搞起了一种几乎是人人都必须参加的群众性活动，要大家集合起来进行挥臂甩腿的运动。简言之，体育成了增进健康的"集体化运动"。有些人还想把这种做法推广到各个工人俱乐部，他们甚至用强迫命令的手段驱赶劳动者去参加这些表演。自然，这未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且使人感到象上政治课一样枯躁乏味，弄得人人都想方设法逃避。按照"体育"理论家的观点，运动项目是资产阶级文化不健康的残余，它促进个人主义的发展，因而，它与无产阶级文化的集体主义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他们要搞集体化的体育，其结果却使人人都感到无聊至极，最高体育委员会也只能勉强存在下去。

在担任政治局秘书以后，我曾向斯大林进言说，这种"体育"简直就是胡闹，根本引不起工人的兴趣。应该改为搞运动，搞比赛，这样，工人才能对之感兴趣。最高体委成员中有一个党中央的代表，即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可能是由于觉得最高体委这个单位毫无意思，所以他连一次都没有去过。

于是，我向斯大林提出："委派我去作党中央的代表吧，我一定要使它改变现状，我将按照中央的路线，从体育转向运动。"斯大林接受了我的建议。斯大林最关心的是权力和权力之争，因此，对我所提出的，而他又根本不感兴趣的问题，他一向是同意我的意见的。于是，我立即通过中央的必要的机构被任命为最高体委中的党中央代表，遗憾的是，这个机构仍保留了原来的"体育"的提法。

体委的最高委员会根据章程是由许多部门的代表组成的，而且亚哥达作为格伯乌的代表也成了最高委员会委员。体委的工作由最高委员会主席团领导，主席团由5人组成：由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科担任主席，副主席是军事部门的代表麦霍诺什恩；3个委员是——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共青团中央代表，青年医生伊金；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谢纽什金。

在体委召开的最高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我作了关于改变体委的政策问题的报告，强调发展运动项目以及劳动群众对这一点的兴趣。我提出，首先必须恢复各种因革命而受到破坏或被关闭的运动团体，通过它们把被驱散的运动员重新召集起来，让他们当教练，振兴运动项目的开展，然后再把工人群众吸收进来。

亚哥达立即发言表示反对。他说，革命前从事技巧性运动的主要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那些运动团体过去和将来都是一大批反革命分子集中的地方，如果让他们重新集结和联合起来的话，那是十分危险的。而且，任何技巧运动都是和集体主义原则相违背的。

我接受了挑战。我发言指出，中央规定的新路线要求必须贯彻竞赛的原则，否则就无法激起劳动人民的兴趣，更无法吸引他们参加。关于老运动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是没有必要的。更何况在进行足球赛和百米赛跑的时候，也不可能进行任何反革命活动。此外，党的政策一贯注重使用专

家、工程师和各种专门技术人员。这些人绝大多数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但是在国民经济部门中目前正大量使用这类干部，甚至红军之所以得以建立和取得胜利，也是由于吸收和使用了军事专家——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尽管这些人在政治上往往同我们保持相当的距离，甚至是对立的。

体委完全支持我的观点，因为这是"中央的路线"。当亚哥达一味强调说，那些运动俱乐部都会变成反革命的黑窝，对他们必须倍加警惕，谢马什柯打断他的话说："唉，这是你们单位的事，和我们有什么相干。"

结果，运动事业发展得很快，各种运动俱乐部纷纷恢复起来，群众热情洋溢，积极参加各项运动项目。1924年夏季，举行了首次全国田径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开得十分成功。我担任主要裁判，工作十分紧张。

但是，格伯乌对我们的工作不断进行刁难干扰。在他们看来，所有的老运动员都是敌人。的确，有个别运动员对共产主义并不怀有特殊好感。为了保护他们，我们不得不经常和格伯乌进行斗争。结果，我们把一些人从格伯乌的魔爪中解救出来，譬如，安·安·别列谢连采夫，他是俄国优秀的划船运动员，1911～1912年间，他曾赢得单人小艇比赛的欧洲冠军，但由于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格伯乌就揪住他不放，并企图逮捕他。由于我的庇护，由于我威胁说，如果格伯乌敢对他动手，或是无端制造反对他的案件的话，我就要向中央报告。这样格伯乌才未敢动手，这个运动员总算得救了。直到1927年，别列谢连采夫一直都受到我的保护。他本人知道这个情况，对我十分感激。1927年我准备逃往国外时，我和他在运动俱乐部会面，我告诉他说，我要到地方上去工作，由于他将得不到别人的保护，格伯乌一定会立即将他吃掉。因此我劝他抛弃一切，不要再在格伯乌面前活动，赶快到边远的穷乡僻壤躲避起来。他答应接受我的劝告。不过，他是否

真的那样做了，以及他以后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

不久以后，布尔什维克上层领导成员也开始参加体育运动了。当然，他们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过，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运动项目却从来不予重视。卡冈诺维奇冬季经常滑雪。我和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索科里尼可夫和财政人民委员部预算局长莱因戈尔德结成了网球伙伴，有时，索科里尼可夫的妻子格·谢列布良柯娃也来参加我们的行列。1941年索科里尼可夫在奥尔洛夫监狱中被枪决；而莱因戈尔德则早在1936至1937年间就被枪决了；格·谢列布良柯娃被流放去服苦役，关在苏联的集中营里，在那里经受了长期的折磨之后，直到斯大林死后才被释放。后来，可能因为心有余悸她写了一本很不好的回忆录。

第7章　我成为一个反共分子

列宁的遗嘱　　我的官运　　我成为一个反共分子　　真正的列宁　　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和实践者　　马克思主义　　一切都充满了谎言

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临近了。在会议开幕的前几天，办事很有条理的克鲁普斯卡娅拆开了列宁的遗书，并把它寄给了中央委员会，列宁的信如同炸弹一样爆炸了。当麦赫利斯将列宁信中告诫要撤销斯大林的职务的内容报告给斯大林时，斯大林用最不堪入耳的粗野语言大骂特骂克鲁普斯卡娅，接着便急忙去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讨对策。

在这个时期，斯大林还很需要三巨头体制，因为当务之急是要除掉托洛茨基。如今，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的联盟，对斯大林本人也成为有救命作用的了。当然，早在此事发生之前，三巨头就商定，仍然由季诺维也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宣读中央政治报告，借以做出他处于党的领袖地位的样子，而且，为了进一步突出他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三巨头甚至决定，下一次，即第14次党代表大会将在季诺维也夫的世袭领地——列宁格勒举行。后来，由于三巨头的分裂，这个决定未能实现。目前，由于列宁遗嘱的出现，对斯大林来说，首要的是争取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同意斯大林继续留任党的总书记。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幼稚到了极点，他们以为，列宁的遗嘱已大大削弱了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因此，现在更不必对斯大林担心了。于是，他们同意挽救斯大林，为此，在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1924年5月21日，专门为宣读列宁的遗嘱而召开了紧急中央全会。

全会是在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大厅举行的。主席台不大，很低。加米涅夫坐在会议主席的位子，季诺维也夫坐在他的旁边。象往常一样，我作为中央全会秘书，坐在主席台旁边的一张小桌旁。中央委员们，分别坐在主席台下一排排的椅子上，面对主席台。托洛茨基坐在第三排靠中间过道边上的座位上，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坐在他两边。斯大林坐在主席台右侧第一排，面对窗口和主席台，这样，中央委员们看不见他的面部表情，而我却可以随时细致地观察他的表情。

加米涅夫宣布开会，并宣读了列宁的信。这时候，会议厅为一片寂静所笼罩，斯大林面如土色，神色紧张。接着，按照会前拟定的脚本，季诺维也夫立即要求发言。他的发言大意是：

"同志们，大家都知道，对我们来说，伊里奇的遗愿，伊里奇的每一句话都是法律。我们大家不止一次地宣誓，要继承伊里奇的遗志，实现他的遗言。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一定要履行自己的誓言。但是，这里我们可以幸运地指出，在一点上伊里奇的担心没有得到证实。我们大家都是近几个月来共同进行的工作的见证人，所以，大家能够和我一样，满意地看到，伊里奇所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所指的是，对于我们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分裂的危险的担心并没有发生。"

不言而喻，季诺维也夫的讲话是不真实的。中央委员们都很清楚地知道，党中央的分裂已是明显的事实，但大家全都沉默不语。季诺维也夫提议全会再次选举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托洛茨基也保持沉默，但以他那强有力的表情，表现出他对这场彻头

彻尾的丑剧的无限藐视。

加米涅夫也挺身而出，极力说服中央委员们同意让斯大林继续留任总书记的职务。这时候，斯大林仍然面向窗外，双唇紧闭，神色紧张。这是决定他的命运的关键时刻。

由于大家都默不作声，加米涅夫便建议通过表决作出决定。他问道："谁赞成斯大林留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请举手。""谁反对？""谁弃权？"表决是用简单的举手方式进行的。我在座位之间来回走动，统计表决票数，最后我只是把表决总的结果报告加米涅夫：多数人同意斯大林留任，反对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托洛茨基集团，但是，还有几个人弃权。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因忙于点举手的人数，以致于未能注意弃权的是哪些人。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获胜了，殊不知，他们的这种做法恰恰是确保了以后自己遭到吃枪弹的命运。

在一年半之后，当斯大林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逐出权力中心的时候，季诺维也夫回忆起这次全会以及他和加米涅夫当时如何拯救了斯大林，致使他的政治生涯得以免遭毁灭的情况，季诺维也夫痛心地说：

"斯大林同志，你懂得什么叫感恩吗？"

这位斯大林同志从嘴上取下了他的烟斗，回答说："哦，怎么会不懂呢，我懂，而且十分清楚地懂得，那是狗才得的一种顽症。"

结果，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此外，全会还决定，在代表大会上不宣读列宁的遗嘱，遗嘱的文本也不向代表们散发，只是由各代表团团长分别在各代表团范围内把内容传达一下。全会这项决议措词故意写得含糊不清，以便使各代表团长只要向代表们简单地提及列宁的信和全会决议的要点就够了，而不让大家认真地了解列宁信的全文。

俄国共产主义政权史中的谎言和形形色色的伪造已经如此之多，若是那些比较正直的历史见证人和当事人，由于自己陷入错误之中，再把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也搞得面目全非的话，那就更是错上加错了。譬如，关于列宁遗嘱这件事本来就已经被搞得混乱不堪；可是，作为对这一事件的事实和日期可靠见证人的托洛茨基，在描述这一事件时，竟然也犯了不应有的错误。

托洛茨基在逝世前最后几个月写了一本关于斯大林的书。托洛茨基在描述为宣读列宁《遗嘱》而召开的那次中央全会时，写道："事实上，结果并不象列宁所希望的那样，遗嘱不仅未能结束内部的争斗，反而使之进一步加剧。斯大林再也不怀疑：一旦列宁重新恢复工作，这将意味着宣告总书记政治上的死亡。"

从这一段话，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宣读列宁遗嘱时，似乎列宁还活在人世。在他看来，既然遗嘱是在代表大会前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宣读的，那么，这就是指1923年4月15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和1923年4月17～25日召开的第12次代表大会了。其实，这种说法是个严重错误。实际上，遗嘱是在1924年5月21日中央紧急全会上宣读的。接着，于1924年5月22～31日召开了第13次党的代表大会，也就是说，这已是在列宁逝世4个月后发生的事情了。很明显，这里弄错事实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我，这一点从下述情况中就可以得到证实：托洛茨基在同一本书中描绘当时的全会和宣读遗嘱的情景时，指出我是事件的一个见证人，并引用了我的一段叙述："巴让诺夫，斯大林当时的另一位秘书，对加米涅夫宣读遗嘱的那次中央全会是这样描述的：'到会的人无不感到极度尴尬神痴，茫然不知所措。斯大林坐在主席台的台阶上，显得既渺小，又可怜。我注意地观察着他……'"。从托洛茨基本人的这段话和他所引用的我的一段话来看，也说明他和我都出席了那次全会，我当时是全会的秘书。确实，我出席的是1924年5月21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因为当时我已是政治局的

秘书。可是，我不可能出席1923年的4月中央全会，因为那时我还不是政治局的秘书。所以，毫无疑问，遗嘱是在1924年5月21日的中央全会上宣读的，此事发生在列宁逝世以后。因此，是托洛茨基把情况弄错了。

季诺维也夫在代表大会上宣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大会开幕前的最后几天，他要求我写一份对政治局一年来工作的分析材料，以供他在报告中使用。我照做了，把政治局名目繁多的数以千计的决议加以分类排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几点结论，当然，这些结论还是初步的，相对的。

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用上了这些材料，并在报告中曾经3次提到我的名字，对我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他之这样做，有其暗含的目的，对此我心中完全有数。

我在自己的仕途中，达到了某种高峰。前面我曾经说过，在同斯大林一起工作的初期，我经常去找他请示问题，但很快便感到，我这样做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对这一切都不感兴趣。对于我的请示，他总是这样回答："那么你认为该怎么办呢？""你的意见是这样么？啊哈，好吧，你就那么办吧。"很快我就习以为常了。我意识到，大可不必去惊动他，没有他也可以把一切事都办得很好。于是，我开始自己大显身手，积极发挥主动性。可是，问题在于各部委的领导人——他们都是政府的成员，不得不经常向斯大林或政治局提出问题，请示报告。他们很快也都感觉到，直接请示斯大林本人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斯大林对这些国家大事全然不感兴趣，对这些问题他也不大懂行，也不去研究，所以，除了给以一般性的形式主义答复之外，他讲不出什么东西。如果人们请求他解决某个问题，他总是无动于衷地回答说："那好吧，你们把问题提出来，我们到政治局讨论一下。"

自从我负责检查政治局决议的执行情况以来，我通过高频保密电话经常同各部委领导人保持联系，处理他们的各种问题。很

快我使他们意识到，有一个对他们的一切事情都了如指掌的政治局秘书，有事最好直接去找他，因为从他那里可以得到各种消息：这个或那个问题的解决处在什么阶段；政治局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如何，倾向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最好采取什么行动等。我逐渐做到了这种程度，即实际上我所作的工作，正是斯大林应该作的工作：向各部委的领导人指出，对某个问题他们未同其它单位充分协商不应匆忙提到政治局去，在把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之前，首先应作些什么事情。换句话说，我向他们提出实事求是的建议，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促进了工作；同时，这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推动了国家事务的运转。人们越来越经常地同我联系。最后，我发现，我已明显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我做了实际上应该由中央总书记做的事。于是，我去找斯大林，对他说，看来，我走得太远，抓的事太多了，我所干的，实际上是他的工作。对此，斯大林回答说，中央书记助理的制度是按照列宁的思想建立的，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央书记能摆脱一些次要的事务，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抓主要工作。我表示反对，我说，问题恰恰是在于，我现在经办的并不是次要的事务，而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当然，我心里明白，国家大事对斯大林来说是不关紧要的，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事情莫过于权力之争，搞阴谋诡计，窃听对手和敌人的谈话。斯大林对我说："你干得很出色嘛，就这样继续干吧。"

这样一来，我的工作扩大到了某种不可思议的范围，可是，我当时年仅24岁。这一切的结局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想起了列宁的创议："同志们，我们已是年逾半百的人了；你们，诸位同志也已经40出头了。我们应当培养领导的接班人：要培养30来岁的，20来岁的同志。"我已经说过，过去曾经选拔了两个30来岁的人——卡冈诺维奇和米哈依洛夫。现在又决定，该是选拔两名"20来岁"的接班人的时候了。被选中的这两人就是拉·沙

茨金和我。当然，我们两个人并没有得到正式通知，但是，季诺维也夫的秘书善意地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沙茨金；加米涅夫的秘书穆泽卡和巴巴汉则把消息告诉了我。由此看来，季诺维也夫之所以在当年最重要的政治文献——中央向党的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 3 次提到我的名字，是有其新的含义的。

沙茨金和我，两个人互相都愿接近，增加了解。沙茨金出身于一个非常资产阶级化的犹太人家庭，是一个绝顶聪明，有教养和有才干的青年。建立共青团的想法源出于他，他是共青团奠基人和组织者。开始时，他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但是后来，他效法列宁不正式担任党的首脑的做法，便退居幕后领导共青团，他和自己的副官塔尔汗诺夫连续多年领导着共青团。沙茨金参加了共青团中央常务局，但形式上共青团的领导是团中央书记，而这些书记则是沙茨金从团员中选拔出来的一些并不十分出色的人。后来，到了1924年，沙茨金由于超龄而离开共青团，并到红色教授学院去学习。在1937～1938年间的叶若夫清洗期间，他被枪决。在此之前，他在共产国际工作。

我仕途上的灿烂前程不仅未能使我感到满足，反而使我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这是因为，这一年我在政治局工作期间，我的身心经历了巨大的，急剧而深刻的演变，结果，我达到了尽头——从一个共产主义者逐渐变成一个坚定不移的反共分子。

共产主义革命引起了巨大的变革。有产的统治阶级丧失了政权并被驱逐，他们的巨额财富被剥夺，他们遭到肉体消灭。全国的经济转移到一批新人手中。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我19岁时加入了共产党。当时，象数万名这样的理想主义的青年一样，我也毫不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造福于人民。除此之外，绝不可能有其它目的。如果说，一个职业革命家集团之所以通过牺牲和鲜血的海洋，其目的是为了攫取全部国家财富，是为了自己谋私利，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并以此为社会革命的

目标——这种想法对我们来说就是亵渎思想，为了进行造福于人民的社会革命，我们准备赴汤蹈火，甚至在必要时，为此而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

确实，在内战时期和改造整个生活制度的过程中，革命引起了巨大的变革，从中我们时时遇到一些我们对之格格不入的，甚至十分反感的东西。我们把这些解释为革命的必不可避免的花费，正象谚语所说："既要伐木，就必然有碎片纷落"。由于人民愚昧无知、粗野和没有教养，行为过火在所难免。我们对许多事物进行谴责，但在纠正我们所谴责的事物方面，我们却无能为力，因为这不取决我们。比如，整个乌克兰到处流传着关于残酷的红色恐怖行动的骇人听闻的消息，说契卡的刽子手，或者经常是一些匪徒和吸毒者，残无人道地枪杀了数以千计的人。我当时以为，这是混入镇压机构的地方上的坏人和犯罪分子滥用权力干出来的，而这与革命的中央领导机关毫不相干，甚至中央很可能对于地方用革命的名义所干的勾当一无所知。

当我到了中央委员会以后，我就接近拥有一切情报的中心了。在这里，我终于得到了对那些问题的确切而彻底的答案，这种令人信服的答案是基层的共产党员所无法得到的。早在组织局工作期间，我已经开始接近各种事件的中心，因而懂得了许多东西，譬如，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首的党的官僚集团，千方百计地，系统地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目的是为了一手控制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也就是说，控制整个权力中心。但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部分——权力之争，而我需要得到对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的总的答案，即这一切所作所为是否真的是为了造福于人民？

在我担任政治局秘书之后，我终于有机会找到所需要的答案了。这几个手中掌握整个大权的人，过去干革命，今天还在继续干革命，但是，过去和现在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和怎样干革

命的呢？在一年的时间里我极其审慎和细心地观察和分析了他们的活动动机，他们的目的和方法。当然，最理想和有趣的做法是从布尔什维主义革命的奠基人列宁开始，去了解和研究列宁本人。但遗憾的是，当我来到政治局的时候，列宁已经倒于瘫痪，实际上他已不存在了。但是，他仍然处于人们普遍注意的中心，所以我可以从那些晚年时期和他共事的人那里了解到许多关于他的情况，也可以通过我手中掌握的政治局的全部机密材料中了解他的情况。我可以毫不困难地戳穿领导集团对“天才的”列宁所进行的虚假伪善的颂扬，他们企图把列宁捧为圣像，以便自己借用他的名义，并以他的忠实学生和继承人的身份进行统治。更何况这样做并不困难。我认清了斯大林的虚伪面目，他在所有的公开演说中，口口声声发誓要忠于天才的导师，而实际上他内心充满了对列宁的仇恨，因为列宁是他窃取最高权力的主要障碍。斯大林在他的秘书室内部并不掩饰，我从他的片言只语以及他的言谈语调中，能够很明显地觉察出他对列宁的真实态度。而且，其他人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例如克鲁普斯卡娅在此后不久，在1926年就曾经这样说过：“假如列宁还活着的话，他现在肯定会坐牢的”（引自托洛茨基论斯大林一书）。

当然，采用“假如……就会……”的说法毕竟总要带有想象的色彩，但是我仍然多次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假如列宁真能晚10年去世的话，他的命运又会如何呢？不言而喻，在这一方面，一切都取决于列宁是否会在1923～1924年间及时地把斯大林从政治舞台上搞掉。我个人的看法是，即使列宁活着，他也不会这么做。在1923年，列宁确实想要撤掉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但是他的这个想法是由两个原因引起的：首先，当时列宁感到自己已经病危，因此他所考虑的已不是个人的领袖地位，而是关于继承问题，所以一切关于自己在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地位和搞掉托洛茨基等考虑，都已烟消云散。其次，当时斯大林看到列宁已危在旦

夕，便放肆嚣张起来，开始以粗暴蛮横的态度对待克鲁普斯卡娅和列宁。如果当时列宁身体健康的话，斯大林决不会有如此放肆的行为，相反，肯定会装成一个列宁热忱而恭顺的拥护者，同时，他会不露声色地暗中培植自己在中央机关中的多数势力，一俟时机成熟，他就会抛弃列宁，就象他对待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所作的那样。

如果进一步设想一下此后还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在那种情况下，列宁就会被指控犯有种种偏差和错误，列宁主义就会和托洛茨基主义一样，被宣布为异端邪说，而且宣布列宁本人被查明是奸细，譬如说是德国帝国主义的间谍，宣布他是受德国帝国主义用密封的车厢派遣打入俄国从事间谍及其它活动的；同时宣扬，由于斯大林的功劳，俄国革命终于取得胜利，因为斯大林及时拨乱反正，及时揭露并清除了列宁和托洛茨基这两个“叛徒加间谍”。请看，这么一来，列宁就不再是世界革命的领袖，而成为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物。这种结局是否可能发生呢？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托洛茨基的例子就够了。托洛茨基到头来被说成并不是十月革命的中心人物，也不是红军的缔造者和领袖，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外国间谍。既然可以这样对待托洛茨基，那为什么就不能以同样的做法对待列宁呢？再说，在斯大林逝世后人们还会为列宁“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嘛。可是，人们是否已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了呢？

当我开始熟悉一些关于列宁的真实材料的时候，我惊讶地感到列宁与斯大林具有某些共同点：他们两个人都具有强烈的权力欲。列宁的一个主导动机以一条红线贯穿于他的全部活动之中，即：“不遗余力地去夺得权力，不顾一切去维护既得的权力”。人们可以认为，斯大林对权力的追求完全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象当年的成吉思汗那样随心所欲地运用这个权力，很少再有其它的考虑，例如：“取得这个权力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列宁之所以追

求权力，则是为了使之成为自己手中用以建设共产主义的强大的无可取代的武器，并为此目的要牢牢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接近真实的。若与斯大林相比，个人因素在列宁对权力的追求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其作用至少是不同的。

我曾试图使自己认清列宁的道德面貌，不是按照整个马克思主义宣传中所描绘的“历史性的”、“伟大的”的列宁，而是按照他的本来真实面目去认识列宁。根据最为真实可靠的材料，我可以指出，他的道德水平不很高。革命前，他是一个不大的极端革命派系的首领，经常与其它一些同样的派系勾心斗角，争吵和谩骂；为了争夺兄弟的社会主义政党或资产阶级慈善家资助和恩赐的捐款，而进行不甚光彩的、无休止的争斗；竞相掌握小的期刊，不择手段地驱逐和侮辱自己的对手。他的这一切，引起了在道德方面比较纯洁和正派的托洛茨基的厌恶。遗憾的是，革命后，列宁的性格也决定了党的上层领导的性格，我从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性格。

可是，对列宁的伟大又怎样解释呢？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慎重的。众所周知，当一个人杀害或抢劫一个受害者时，他就成为一个罪犯。然而，当一个人劫掠了整个国家，并杀害了上千万人的时候，他却被誉为伟大的，传奇式的历史人物。有多少个渺小的，令人作呕的矜矣分子，一旦他们得以在一个大国掌权，不管他们使自己的国家并间接地使其他国家遭受多少损害，都成为伟大人物。

我更多地认为列宁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之所以能在一个大国取得政权，只要对这一事实稍加考虑，就暴露出他的敌人许多弱点，说明他们的无能和缺乏政治经验。在出现了全面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情况下，一批人数不多，但组织有素的列宁式的职业革命家集团，就显得更加精明强干，它几乎是唯一的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组织。至于说列宁的特殊天才，我似乎未能发现这

一点。

列宁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当然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在夺取政权以后，列宁和他所领导的党曾不顾一切地蛮干，结果，在3、4年之内就导致了全面性的灾难。事后党内提起这段历史时，不是实事求是地承认这是一举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企图的破产，而是羞羞答答地将这一切描绘成是“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这当然是惯用的谎言和伪造的伎俩。其实，那几年里是整个共产主义的失败。那么，列宁是怎样对待这一挫败的呢？

列宁的一些正式讲话表明，面对这一挫败，列宁不得不提出党的退却策略。我所感兴趣的是，列宁对于这一挫败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很明显，能够较多地了解列宁内心的思想的只有那些在列宁身边工作的人，特别是他的两位女秘书格利亚塞尔和福齐也娃，因为列宁整天同她们一起工作。我很想向她们了解，列宁在私下同她们坦率的交谈中，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法是什么。

要作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起初，列宁的秘书们认为我是“斯大林的人”。过了不久，在几个月之后，由于我们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她们的印象发生了变化：我是“政治局的人”，只是在形式上是斯大林的助理。这样，我才逐渐地和她们谈及列宁的事，最后，我终于向她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究竟列宁对于新经济政策的想法是什么？他是否认为，我们已面临共产主义理论的破产？女秘书们对我说，她们曾经向列宁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当时列宁回答她们说：“当然，我们是遭到了挫败。我们本来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简直就象童话一样，随便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但是，这是一个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党不致于丧失灵魂、信心和斗志，我们必须向全党提出，作为某种暂时的退却做法，要重新采取交换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尝试已经失败，想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理，改变他

们世世代代所形成的生活习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可以试图以暴力手段把人民驱赶到新的制度中去，但是，在整个俄国这个大绞肉机里，我们是否能够保住政权还是个问题。”

数年以后，当斯大林把整个俄国变成绞肉机；并用暴力把人民赶入共产主义时，我一直不断地思考列宁的这番话。事实证明，如果不惜以数以千万计的人的牺牲为代价的话，这是会成功的，而且政权还是可以保住的。喀琅施塔得①和安东诺夫叛乱②促使列宁刹了车，然而，斯大林甚至在古拉格岛③面前也并未停步。

有一件有趣的事。我曾经想了解列宁最常用的书籍是那些，据格利亚塞尔说，在列宁最常用的书中有一本是古斯塔夫·勒邦④的《群众心理学》。对此，我们现在只能进行猜测，究竟列宁是把这本书作为用以影响群众的不可取代的最实用的指南呢，还是他从勒邦的这部杰作中得到了这样一种启示：与卢骚的天真理论相反，幻想家和教条主义者企图用一纸法令来改变世世代代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生活方式，那真是谈何容易。因此，每次光辉的革命过后，总是要重现“春风吹又生”的局面。

很显然，托洛茨基象列宁一样，是一个狂热地信仰共产主义教条的人，只不过不那么灵活而已。建成共产主义也是他所追求的唯一的目标。至于人民的福利问题，对于他来说，只不过是遥

---

① 喀琅施塔得叛乱——1921年2月28日在喀琅施塔得发生叛乱，提出的口号是“没有布尔什维克参加的苏维埃”，后被红军镇压下去。

② 安东诺夫叛乱——1920～1921年间社会革命党人A·C·安东诺夫利用农民不满情绪在唐波夫省等地组织了反苏维埃的叛乱，后被红军镇压下去。

③ 索仁尼琴揭露苏联集中营内幕的同名小说，曾获得诺贝尔奖金。

④ 古斯塔夫·勒邦（1841～1931）——法国医生，社会心理学家。

远将来的某种抽象的要求而已，至于究竟他是否考虑过这个问题，还值得怀疑。

这里，我在内心中把俄国的统治者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是教条的狂热信仰者，在1917～1922年间，他们曾处于主导地位，不过，现在他们已成为历史的代表了。处于掌权地位并参与权力之争的有另外两类人，他们并不迷恋于教条，而是共产主义的实干家。其中一类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派，另一类则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派。对于他们来说，共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方法，是一种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夺取政权并进而实行统治的方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流就是运用权力的实干家，他们自己并没有作出任何创新，只是竭力地沿袭列宁的方法。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流是逐步抓权，进而充分地运用权力的领导机关实力派的首领，按现在流行的说法，他们是属于党内的"官僚主义蜕化"或者是"退化"集团。对于代表着党和政权的现在和未来的这两种类型的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人民的福利问题可言，即使随便提及这个问题也显得极不自然。在日常工作中，我有机会整天观察他们的言行，我深感痛心地断言：他们对于人民的福利是漠不关心的，甚至连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也仅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因而绝对不能放弃的方法而已。

人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革命并不是为了人民而发动的。最好的情况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是按照理论教条行事的；其次是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类人，他们的目的是让人数有限的集团享受权力的好处；最坏的情况则是斯大林之流，其目的几乎是为了让那些品德不良的掠夺者，能够赤裸裸地利用权力进行罪恶活动。

就最好的情况而言，革命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进行的。可是政治局本身又是怎样对待这个教条的呢？我在政治局担任秘

书工作的初期，就曾经听到“博学多才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术语，并仔细捉摸它的讽刺性寓意。原来情况是这样：当人们谈到“博学多才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那就应该理解为“糊涂虫和空谈家”。

有时，说的更加露骨。财政人民委员索科里尼可夫为了实行货币改革，提名尤罗夫斯基教授为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兼货币局局长，并提请政治局批准这项任命。尤罗夫斯基不是共产党员，政治局不知道这个人的情况。在会上有一个政治局委员问道：“我希望，他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吧？”索科里尼可夫匆忙回答说：“当然，当然啰，这怎么会呢！这是部里的货币局，那里需要的不是空谈专家，而是有能力的实干家。”

于是，政治局在沒有任何人反对的情况下，一致批准了对尤罗夫斯基的任命。

我努力提高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水平。使人注目的是，俄国实行的社会革命，与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和预见完全背道而驰。在“资本主义”西方，这些预言已经被现实生活彻底推翻，因为在那里，实际发生的情况并非象所预言的那样——无产阶级残酷无情的贫困化，而是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的，空前未有的提高。这里，我忆及波旁元帅写给路易十四的著名的报告，其中说，当时法国有五分之一的人民不是死于衰老，而是死于饥饿。我把这种状况同20世纪初叶西方的工人水平相比较。马克思无论如何也沒有预见到在俄国会发生社会革命，因为俄国85%的人口是小私有者——农民，至于工人，说来可笑，才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一稍多一点。1921年，在当时苏俄的领土范围内的人口总数有13,420万，其中产业工人为140万人。这些数字引自1970年苏联官方出版的苏共党史第4卷第8页。

老实说，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得愈深，对这些冒充经济科学的胡言乱语就愈加反感。然而，这个问题仍然需要谈清楚。

我们可以先从亚当·斯密[①]谈起。在19世纪下半叶，亚当·斯密怀着善良的愿望想找出经济学的科学基础，然而，他的这种尝试为时过早，也不够完善。所以说它为时过早，是因为精密科学的方法当时还刚刚被确定下来，就想过早地把它应用到象经济现象这样复杂而艰深的领域中去。所以说它不完善，是因为亚当·斯密赖以分析他所研究的经济现象的方法，根本不是精密科学的方法，而是现代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辩证法、本体与现象论等诸如此类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根本不可能产生出任何对经济的科学认识。然而，亚当·斯密正是从这种荒谬的哲学出发，创立了劳动价值论，这完全是德国哲学观点的畸形产儿。究竟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找出真正的因果关系，这并不是哲学家应有的态度。价格是现象，就是价值，这才是应该予以研究的对象。而价值决定于劳动，决定于为生产商品所消耗的体力劳动。可是，头脑清醒的观察家们对此提出异议说："对不起，你的这种说法不对。有成千个事例可以说明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试问，用以进行这种工作的机器怎么算呢？不花费任何劳动而在海边拾得的金刚石的价格又怎么算呢？如此等等。"于是，亚当·斯密自己更正说，决定价值的不是靠简单的劳动，而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这种妄图称之为科学，实则绝对荒谬的理论，只是在一种意义上是出色的，即它足以表明，人的智慧创造出来的一部不成功的作品，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因为亚当·斯密所生下的那个先天不足的低能儿，靠自己的理论而活命了。继亚当·斯密之后又来了一个李嘉图[②]，他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得出了全部的逻

---

① 亚当·斯密（1723～1790）——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创始人，他首先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理论。

② 大卫·李嘉图（1772～1823）——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他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

辑结论：既然只有体力劳动，只有工人才能创造价值，那么怎么会形成资本呢？很显然，资本家对工人劳动所偿付的报酬是不充分的，他们侵吞了一部分价值——剩余价值，而这部分被资本家窃取的剩余价值积累起来，便构成了资本。因而，马克思便宣告说：每一个资本家都是窃贼和骗子，任何资本都是从工人身上窃取和剥夺的财富。因此，全世界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用暴力夺回被窃取的东西。

乍看起来，人们甚至会觉得奇怪，这种胡言乱语竟然会被认为是什么科学的东西。按照这种理论，似乎只有工人们的双手运动才能创造价值、有用的东西和商品，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那么科学家的工作、发明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以及企业的组织管理人员的工作怎么算呢？他们不是用手，而是用脑工作，难道这种工作就什么也创造不出来，就不起任何作用吗？人们的手一直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当学者和技术人员以他们的脑力发明了如何利用双手和机器达到无可比拟的最好劳动成果的时候，各种社会的和群众的财富才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可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要你不动手劳动，你就是窃贼和寄生虫。这一切是何等可悲的谬论呀！在这种冒充为科学的谬论中，一切都是本末倒置，是非颠倒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却成为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力量的因素。这里，需要再次忆及勒邦的天才公式："理性产生认识，感性推动历史"。马克思的理论在认识经济生活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但在调动人的激情方面却起了甘油炸药的作用。它告诉所有贫穷和备受压迫的人们说：你们之所以一贫如洗，沦为乞丐和遭受不幸，就是因为富人把你们洗劫一空，而且他们还在继续进行抢劫。这样，就可以燃起世界性的熊熊大火，激起人们产生即使倾尽血的海洋也无法扑灭的极度的嫉妒和深仇大恨。马克思主义是谎言，但是，这是一种具有异常强大爆炸力的谎言。列宁

正是在这块基石上在俄国建起了自己的"教堂"。

我很快就感到，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微妙态度。作为治理国家的实干家和实用主义者，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认识和组织国家的经济生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因而他们对那些"博学多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持怀疑和讥讽的态度。但同时，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巨大精神力量，却给予极高的评价，因为正是这种力量使他们夺得了权力。而且他们还不无根据地认为，这种力量还将使他们在全世界登上权力的高峰。总括起来，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是荒谬的，而作为领导群众革命的方法则是一种无可取代的武器。

我决定更深入地考察一下，这些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究竟如何。在正式的公开场合下，马克思主义是碰不得的禁区，对它只能加以"解释"，而且还必须按照最正统的含义去"解释"。

我经常到索科里尼可夫家去。索科里尼可夫（真姓是勃里连特）以前做过律师。他属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他无疑是最有天才、最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之一。不管交给他任何任务，他都能完成得很出色。内战时期，他成功地指挥过军队。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他担任财政人民委员，出色地实行了货币改革，建立了金卢布硬通货币制，使布尔什维克混乱不堪的货币迅速地得到整顿。1924年5月党的第13次代表大会以后，他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1926年的党代表大会上，他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站在一起，是当时唯一敢于挺身而出在大会发言中提出要求撤销斯大林总书记职务的人。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被撤销了财政人民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当斯大林在第15次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实行集体化的罪恶方针时，索科里尼可夫表示反对这种政策，要求实行正常发展经济的办法，首先发展轻工业。

1925年，有一次，我去索科里尼可夫家看望他，当时他有病在家里休息。往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话题总不外是财政与经济问题，而这一次我决定冒险，谈起关于马克思主义问题。我在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作用的情况下，谈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我说，考虑到这个理论创立以来几乎过去了一个世纪，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鲜事物和变化，这些都要求对这个理论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同时也考虑到，政治局事实上也并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这个已明显落后于现实生活的理论，我在要改善这个理论的借口下，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驳。索科里尼可夫细心地听了我的长时间的谈话，未作任何反驳，等我讲完后，他说："巴让诺夫同志，你所谈的东西，有许多是正确的，很有意思的。但有些东西是不能触动的禁区。我向你提出一个友好的忠告：你对我谈的这一切，以后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再谈了。"当然，我接受了他的忠告。

总而言之，我的结论是：共产主义的领袖们，对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作为赖以保护自己权位的方法加以运用的，而对于人民的利益却漠不关心。当他们忙得不可开交地宣传共产主义，并不遗余力地点燃世界共产主义的熊熊烈火的时候，他们自己对这个理论和教条却是不相信的。这里我又有了新的发现，这成为我赖以理解一直使我迷惑不解的一个重要问题的钥匙。

问题是这样的：周围充满了谎言，整个共产主义的实践都浸透了谎言。我苦思冥想，这是为什么？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问题之所在。领袖们自己根本不相信被他们宣布为真理和圣经的那些东西，这些对他们来说，仅仅是手段而已，而他们的目的是见不得人、不能公开承认的。由此，撒谎就成为充斥一切的、屡见不鲜的常规做法，这不是一种偶而采用的策略，而是一种永恒的本质。

按照马克思主义教条，我们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共产

主义革命胜利7年之后，全国人民被劫掠得一贫如洗，都是无产者。当然，全国人民同权力毫不相干，专政的建立是针对他们，针对无产阶级的。在名义上我们建立的是工农政权，但是，就连任何一个孩子都知道，权力掌握在党的手里，甚至已经不是在党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党的机关手里。全国到处布满了名目繁多的苏维埃政权机关，而实际上，它们都是党的机关决议的无权的执行者和登记员。我本人也是这部谎言机上的一个小螺丝钉。我所在的政治局，是最高的权力机关，但这一点是绝密的事，这一点必须向全世界保密。凡是与政治局有关的东西都属于绝密：它作出的全部决议，以及摘录、证件、资料等。对泄露机密者要绳之以各种惩处。但是谎言不断蔓延，它渗透于一切之中。工会在名义上是保护劳动人民的机构，而实际上却是监督和宪兵式的强制机构，其唯一的任务是迫使劳动人民多干活，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用以维护奴隶制式的政权。所采用的全部术语都是虚假的。致人于死地的苦役营被称之为“劳动改造营”。数以百计的谎言家们，在报刊上象古希腊人唱赞颂酒神之歌那样，大肆颂扬对凶恶的敌人进行劳动改造的无比英明和人道的苏维埃政权。

当我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我经常反躬自问，我是在什么地方？我是在出席一个大国的政府会议呢，还是置身于阿里巴巴①的山洞里呢？或者是在参加凶犯集团的集会呢？

譬如说，政治局每次会议首先讨论的议题是外交人民委员部提出的问题。讨论时，一般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契切林②及其副手

---

① 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故事中的主人公。

② 契切林——苏联外交家，参加过布列斯特和约的谈判，1918～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

李维诺夫[1]出席会议，并由契切林报告工作。他讲起话来畏葸地，低三下四地，对政治局委员发表的每一条意见都洗耳恭听。在这种情况下，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在党内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在革命前他还曾是个孟什维克。而李维诺夫的表现则完全相反。他举止放肆傲慢。这不仅是由于他天性蛮横无理，而且，更主要的是他自恃"敝人是老布尔什维克，在这里就如同在我自个儿家里一样"。确实，他是列宁的老战友，曾在国外侨居多年。是的，他在革命前进行党的活动中最著名的篇章是从事货币投机的鬼蜮伎俩，例如，把武装袭击高加索的地方金库抢劫的大笔沙皇纸币带到西方去兑换。这些巨额货币券的号码都记录在案，在俄国不能兑换，因而列宁委托一些来历不明的个人，其中包括李维诺夫，让他们在西方暗中兑换。李维诺夫就是在进行这种兑换交易时落网被捕，并进了监狱。

看来，李维诺夫一家全是这种类型的人。他的一个兄弟参加了苏联在法国进行的一些活动，他利用自己的兄弟是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地位，对苏联的机构干尽了欺诈舞弊的勾当，结果迫使苏维埃不得不向法国资产阶级法院提出上诉，控告李维诺夫的这个兄弟是诈骗犯和坏蛋。

契切林和李维诺夫之间关系紧张，互为仇敌。几乎每个月，我都收到他们两人分别送来的告状信，上面注明"绝密。政治局委员亲启"的字样。契切林在信中抱怨说，李维诺夫非常蛮横无理，不学无术，是个粗暴肮脏的畜生，让他从事外交工作无疑是错误的。李维诺夫则在信中写道，契切林是个好男风的色鬼，白痴，暴躁狂，是个神经失常的家伙，专门在夜间工作，因而扰乱了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此外，他还补充了一些生动的细节

---

① 李维诺夫——苏共老党员，外交家，1921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和苏联驻美国大使。

说，格伯乌警卫部队挑选了一个“品德兼优”的红军战士，整夜在契切林的办公室门口守卫。政治局委员们看了这些信后，一笑置之，从未理睬。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对外政策问题，议及将要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时，李维诺夫发言说：“我建议对沙皇的债务要予以承认。”我十分惊讶地望着他。列宁和苏联政府曾经数十次宣布过：拒绝偿还沙皇政权时期俄国欠下的外国债务，是革命取得的主要成果之一。这里我顺便再提一点：对于那些法国银行家们来说，并没有遭受任何损失，因为在签订贷款合同的同时，他们已把事先议定的佣金塞进了自己的腰包；真正吃亏的倒是那些中下层职员，因为，由于他们相信银行的保证可靠，而把自己的储蓄存入银行，以备自己的晚年不时之用。

在讨论中，有一位政治局委员，似乎是加里宁简单地问道：“这里指的是哪些债务？是指战前的还是战时的债务？”

李维诺夫不以为然地很冲地说：“两者都有。”

“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弄到这笔款子来偿还债务呢？”

李维诺夫嘴角叼着卷烟，脸色咄咄逼人，带着藐视的神情说：“是谁对你说我们将要偿还债务呢？我所说的不是偿还，只是予以承认。”

加里宁也不示弱，他说：“但是予以承认的含义是说承认我们的债务，从而也就是准备偿还的承诺嘛。”

李维诺夫居然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怎么会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得！于是他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里谈不上任何偿还的问题嘛。”

这样一来，倒引起了加米涅夫的兴趣，他说：“那么，怎么办才能做到既表示承认，又不偿还，而且还不致于丢脸呢？”（应该公正地说，加米涅夫确实还担心丢脸的问题）。

李维诺夫解释说：“其实，再也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我们向

全世界宣布说，我们承认沙皇的债务。这样，那些心地善良的白痴们就会大喊大叫地说，布尔什维克变了，说我们象个国家的样子了，如同其它国家一样，等等。由此我们便可以得到种种可能的好处。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党内的渠道，向各地方机关下达秘密指令：在各地方建立起外国侵略受害者协会，负责把受害者提出的赔偿要求收集起来。大家都很清楚，只要我们按党的系统发出相应的通报，'受害者'的申诉想要多少就可以收集到多少。我们的胃口也不要过大，只要把要求赔偿的数字定得略高于沙皇的债务数额就够了。这样，当就偿还问题进行谈判时，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反赔偿要求，这笔赔款将抵销掉我们的债务，并且还要求他们向我们支付差额呢。"

会议对这个方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主要的一个障碍是，列宁发表的关于拒绝偿还沙皇债务的庄严声明，人们仍然记忆犹新。大家担心，这将会引起各国兄弟党思想混乱。加米涅夫甚至还捎带说了一句："这正是被凯尔佐恩称之为布尔什维克玩弄猴子把戏的东西。"会议最后决定暂时不接受李维诺夫提出的建议。

第8章　斯大林的秘书室　军事将领们

斯大林的名单　　托夫斯图哈和麦赫利斯　　权力之争继续进行　　托洛茨基被解除红军的领导职务　　伏龙芝　　伏罗希洛夫　　布琼尼

第13次党代表大会开过了。托夫斯图哈加紧进行另一次“见不得人的勾当”。他把代表大会的全部材料收集起来进行“研究”，但是，人们很快就明白了：他所感兴趣的并不是全部材料，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是和一个契卡人员一起鬼鬼祟祟地进行“研究”的，原来，那个人是一个笔迹专家。

当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前来报到时，他们先要到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去，委员会审查他们的当选证书，发给大会代表证（有表决权的或者只有发言权的）。同时，每个代表要亲笔填写一份项目繁多的表格，其中包括几十个问题，所有代表都有义务按照规定填写。

在大会进行期间，资格审查委员会对代表们填写的表格加以分析统计，在大会后期提出报告：关于参加大会的人数，其中男性多少，女性多少；关于代表们的社会出身、年龄和党龄等情况。代表们都理解，要他们填写的详细表格是必要的。

但是有一个情况是他们沒有预料到的。

代表大会结束前要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中央检查委员会等。选举之前，中央委员会领导人与莫斯科、列宁格勒和乌克兰等各主要代表团的领导人一起开会。这就是所谓的"元老会议"，大家用俗话称之为"蓝色的信封"①，会议经过一番争吵，拟定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名单草案，然后，印发给所有有表决权的代表们人手一份。这份名单就是选票，当以秘密投票方式选举时，再把选票投入票箱。虽然只有一份候选人名单，但这并不是说，代表们必须对它投赞成票。党内选举有别于苏维埃的选举：在党内还有一定的自由，每个代表有权划掉名单上的任何一个名字，并代之以自己任意选择的任何另外的名字。这里要指出的是，新加上的候选人的姓名必须由选举人亲笔写在上面。然后，计算选票。结果，"元老会议"提出的名单通不过的可能性是极小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首都和其他各主要代表团之间进行串连，而这是靠不住的事。不过，尽管通常整个名单会获得通过，但每个候选人得票数差别的幅度可能很大。譬如，假设与会代表为1000人，党内德高望重的人可能得到950～970票；而不大受欢迎的人连700票也得不到。这种情况会显得很突出，人们对此必须加以考虑。

然而，人们完全考虑不到，而且任何人都不了解的是托夫斯图哈的工作。托夫斯图哈（实际上是斯大林）最感兴趣的是，代表们当中有谁在选举票上划掉了斯大林的名字。如果仅仅划掉了斯大林的名字，那么，就等于是被一个隐名的人划掉的；但是，把名字划掉以后，还要写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从而就提供了他的笔迹资料。托夫斯图哈和契卡的笔迹专家一起，把这个笔迹和代表们亲手填写的表格上的字迹加以比较，就可以确定：是谁投

① 系借用资产阶级议会的各议会团或各党团领袖会议的叫法，这个词的英文发音与俄文的"蓝色的信封"相近。

了反对斯大林的票，因此这个人就成为斯大林隐蔽的敌人；同时也可以了解到，是谁投票反对季诺维也夫，谁反对托洛茨基，以及谁反对布哈林。所有这一切，对于斯大林是十分重要的，都会被他加以认真地考虑，特别是被认为是斯大林隐蔽敌人的那些人，一旦时机来到——例如经过10年以后，他们的脑袋统统都要吃子弹。托夫斯图哈所干的就是准备将来对之进行迫害的人员名单。而斯大林同志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事情，也不会饶恕任何人。

为了更充分地揭示出托夫斯图哈干的这种勾当，我还必须提及以后一个时期的情况。第13次代表大会以后，在1925～1927年间，过去那种党内自由仍然继续存在。在党委里，在支部里，在党组织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上，对反对派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反对派的领导人公开邀请自己的支持者尽量多的发表讲话，攻击党中央，借以显示出，反对派拥有雄厚的实力和举足轻重的份量。

使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甚至在第14次党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及其在中央的新的多数派，根本不反对党内的这种自由。这一点似乎完全与斯大林的习惯做法相背；其实，更简单的做法是，宣布禁止在党内进行辩论，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指出辩论有损于党的工作，涣散有益的建设活动的力量。

不过，我已经很了解斯大林，因而能够悟出其中奥妙之所在。从与斯大林和麦赫利斯的一次谈话中，我得到了最后的证实。麦赫利斯拿出一份关于一次党的积极分子大会的简报，读了会上反对派的一些最尖锐的言论。麦赫利斯愤怒地说："斯大林同志，难道你不觉得他们的言行过份放肆吗？中央怎么能容忍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破坏中央的声誉？加以禁止是不是更好一些呢？"斯大林微笑着说："让他们讲嘛！让他们去讲吧！把自己的面目公开暴露出来的敌人并不危险，危险的倒是我们还不知道的隐蔽的敌人。这些跳出来的敌人，被记录在案，跟他们算账的日子总会到来的。"

托夫斯图哈在继续进行他的“半见不得人的勾当”。他在设在“列宁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拟定出一份份的名单，这是反对斯大林的那些人的长长的名单，这些人天真地认为：“现在我们反对斯大林，将来我们或许又会拥护斯大林。在党内，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会有党内的自由。”其实，他们不懂得，斯大林大权在握，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就是宣判了自己的死刑，果然，几年以后，将按照托夫斯图哈现在所拟定的名单，分期分批地，成百成千地对他们进行杀害。试想，人们是何等天真呀！

那么，我身在斯大林秘书室这个少有的重要岗位上作何感想呢？对于卡涅尔和托夫斯图哈这两个人，我没有任何好感。关于卡涅尔，我认为他是一条危险的毒蛇，因而，我同他完全是公事公办。他看到我官运亨通，所以，竭力对我客气一些；可是，我对他并没有抱任何幻想：假如有朝一日斯大林认为把我干掉是必要的，他就会让卡涅尔去执行，而卡涅尔会找到相应的办法。对我来说，卡涅尔是个罪犯。斯大林之对他如此器重，这一事实本身也恰好印证了他的“主人”的面目。麦赫利斯和卡涅尔都喜欢用“主人”称呼斯大林。从外表看，卡涅尔总是愉快的，与人为善的，他的个头不高，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穿着大筒靴，留着平头，头发黝黑。

伊万·巴甫洛维奇·托夫斯图哈是个子高大，非常干瘦的知识分子。他和他的妻子都是结核病患者。1935年，当刚开始按照他所拟定的名单进行枪杀的时候，他因结核病而死去。他的年龄是三十六、七岁。革命前他流亡国外，革命后才返回俄国。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在1918年成了民族人民委员部的秘书。当时斯大林是这个部的人民委员，然而，他没有在部里作什么工作。斯大林在担任总书记之前，就把他从那个部调到中央机关工作。1922年，斯大林成为党的总书记以后，他让托夫斯图哈作他的秘书，实际上托夫斯图哈一直到死之前都在斯大林秘书室工作，专搞“半见

不得人的勾当”，虽然这个时期，正象我已说过的那样，他还兼任列宁研究院院长助理，以后又担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助理。1927年，斯大林让他担任他的首席秘书（此时，我已不在秘书室了，麦赫利斯也到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去了）。当时，在他领导下的斯大林秘书室里，还来了一个波斯克列贝舍夫，负责所谓的“特别科”，而在托夫斯图哈死后，就接替了他的职位。还有一个叶若夫[1]，他领导斯大林秘书室的“干部科”，继续编写托夫斯图哈的名单。几年以后，他成为格伯乌的头子，按照这些名单进行迫害活动，使全国成为新的鲜血的海洋。自然，这一切是在他的上司，伟大的天才的斯大林同志的崇高倡议下进行的。还有一个马林科夫，政治局的秘书，大概出于慎重把他称为“政治局的记录秘书”，他同时在“特别科”作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助手，然后他又取代叶若夫担任“干部科”的头子。

随着斯大林日益成为独断专行的独裁者，他的这个秘书室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今后这样的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候，在权力机关中，担任部长会议主席或者政治局委员，都不如作斯大林的秘书重要，因为后者可以经常同斯大林接触。

托夫斯图哈是个阴险的人，他总是皱着眉头看人。他咳嗽很深重，因为他只剩下半叶肺。斯大林对他完全信任。他对我的态度是谨慎的，因为他感到，我“这小子真是官运亨通”，但他不能宽恕我的是，我居然接替了他和纳扎列齐扬两人担任的政治局秘书职务，并且一直处在事态发展的中心地位，而他却不得不在幕后阴暗的角落里为斯大林进行肮脏的勾当。有一次他企图整我，他对斯大林说：“为什么巴让诺夫被称作政治局秘书？斯大林同志，您才是真正的政治局秘书。巴让诺夫只有权被称为政治局的

① 叶若夫——1924年以前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国库管理局长，后在建筑部门工作。30年代任格伯乌的头目。

技术秘书。”斯大林回避地回答说：“当然，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政治局责任秘书是我，但是巴让诺夫做的工作很重要，他使我减轻了不少负担。”当时，我并不在场，但麦赫利斯在场，后来他把全部情况告诉了我。

我不喜欢托夫斯图哈这个人，他为人阴险，嫉妒心重，是个阴谋家。他甚至心甘情愿地执行斯大林交办的最卑鄙的任务。

列夫·扎哈罗维奇·麦赫利斯与托夫斯图哈年纪相仿佛，内战结束后他转入工农检查院，这是名义上由斯大林领导，而实际上他在那里不做任何具体工作的又一个部。1922年斯大林从这个部把麦赫利斯调进中央做他的秘书。麦赫利斯比卡涅尔和托夫斯图哈为人要正派一些，他回避进行那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他甚至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思想坚定的共产党员”的假面具，但我对这一点不甚相信，我认为他是一个善于随机应变，随波逐流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后的情况正是如此。他对以后斯大林的任何罪行都不觉得反感，他至死服服贴贴地为斯大林效劳，但同时却装出似乎是相信斯大林的优点的样子。他担任斯大林的私人秘书，是一个出色的机会主义分子，他接受一切，服从一切，他对我青云直上的官运也是接受得了的，并努力同我建立友善的关系。1927年，托夫斯图哈把他撵出斯大林秘书室，他到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了3年。1930年他去见斯大林，轻而易举地使斯大林相信这种说法：党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向全党宣传斯大林个人领导的巨大作用。斯大林立即任命他担任《真理报》总编辑。在那里，他为斯大林效尽犬马之劳，作了别人作不到的事。《真理报》为全党和各级党组织定调子。麦赫利斯在《真理报》开始不断地宣传伟大而天才的斯大林，宣传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最初，人们感到奇怪，因为党内任何人都不承认斯大林是天才，特别是对那些了解他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1927年，我曾不止一次到红色教授学院的党支部去。这里是

储备党的年轻官迷的地方。他们在学院里，与其说是研究科学和提高业务水平，莫如说是研究和窥测今后在升官发财方面应把赌注押在何处。我同他们开玩笑地说："有一点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当中沒有人撰写论述斯大林主义的书？我倒想看看哪一个国家出版社敢不立即出版这种书。此外，我敢担保，过不了一年，这本书的作者就一定会当上中央委员。"这些官迷心窍的年轻人皱着眉头说："什么？论述斯大林主义？哎，你这话说得未免太过分了，你是言不由衷的。"应该说，我讲这些话完全是恶作剧，因为这个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了，而且正在准备逃往国外。

在1927年，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会使人感到不大体面。可是到了1930年，这样的时机到来了，麦赫利斯在《真理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为党的各级组织定调子，宣扬什么"在我们伟大的、天才的领袖和导师斯大林的英明领导下"。党的机关干部在支部里也不得不跟着喊这一套。这样做了两年工作之后，在全国全党每当谈到斯大林同志时，已经不能不冠之以"伟大的，天才的"字样了。之后，形形色色善于阿谀奉承之徒还发明了许多其它提法："各族人民的父亲"，"人类最伟大的天才"，等等。

1932年，斯大林重新把麦赫利斯调回到他的秘书室，但是对斯大林来说托夫斯图哈毕竟更顺手一些，所以斯大林逐渐把麦赫利斯派到苏维埃机关去工作。战前，麦赫利斯担任过红军政治部主任，然后出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战时，担任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那时候，他已是一个真正的斯大林主义分子，在任何困难面前他永不退缩，是许多红军战士生命的不可遏止的吞沒者。战后，他重新担任国家监察部部长。在斯大林死的同一年他死在自己的床上。

斯大林的秘书室不断扩大，日益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可是斯大林夺权的主要战役尚未取胜。1924年5月，正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刚刚挽救了斯大林之后不久，斯大林已在考虑如何把

他们出卖的问题了。

在第12次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一件饶有趣味的事。为了向全国表明，似乎劳动人民都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和拥戴党的英明领导，在大会上首次组织一些非党代表团发言（在以后的年代里，这已成为传统节目了)。开头，先由莫斯科纺织厂非党工人代表团，著名的三山纺织厂代表在会上发言。找了一名善于讲话的胆大的妇女，事先对她加以训练，最后她上了讲台。她的口才倒不坏，既谈到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党的英明领导，也讲了“我们非党工人完全拥护和支持我们老一辈党的领导同志”，等等。但是，当时让她上台是另有一番打算的，要她讲的并不是这些话。本来应该向全国人民强调，现在领导国家的是新的领袖。过去一般的口号是：“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现在需要表明的是，群众是紧跟新的领袖的。虽然对这位老练的妇女进行了训练和帮助准备，原以为她会把这些套话背得滚瓜烂熟，但结果还是砸了锅。“最后我要说：我们的领袖们，季诺维也夫同志(有点无把握地）……（想了一下之后对着大会主席团说）对不起，大概还有加米诺夫同志万岁！”于是，会场上哄堂大笑，特别是斯大林。加米涅夫在主席团里酸溜溜地笑了一下。在组织者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想到要把斯大林列入“领袖”之列，否则，这会显得更加可笑。

不过，托洛茨基本人不管是在大会前的全会上，还是在大会上，都没有发表反对斯大林的言论，因此，斯大林考虑不妨玩弄一个花招：既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被广泛利用来排挤托洛茨基，那么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利用托洛茨基去削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呢？斯大林曾经试图这样做，但是未能实现。

6月17日，斯大林在中央举办的县委书记训练班上作了报告，其中他相当明确地对未来的机关干部们说明，现在，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已被党的专政所代替。同时，他又在不点季诺维也夫和

加米涅夫名的情况下，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他们，指责他们犯了各种错误。

季诺维也夫作出了极其强烈的反应。在他的要求下，立即召开了由政治局委员和25名中委参加的"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谈了对他们的攻击，指出斯大林关于"党的专政"的说法是明显错误的。当然，会议批判了斯大林的提法，也谴责了斯大林反对三巨头体制中其他两个成员的言行。斯大林感到由于自己操之过急而犯了错误。他声称，要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但是，会议认为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表示，所以没有接受他的辞职。

另一方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穿了斯大林对托洛茨基要的花招，所以加紧了对托洛茨基的攻击，他们要求把他开除出党。但是，在中央内部赞成开除托洛茨基党籍的不足多数。季诺维也夫就通过亲信唆使共青团中央登台表演，要求开除托洛茨基的党籍，但是，政治局立即表示坚持自己的教条，说干预政治不是共青团的事，解散了共青团中央，并把10多名领导干部开除出中央。

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斯大林在中央阻止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对托洛茨基的攻击。可是，共产国际被季诺维也夫一手控制，在1924年6月底～7月初召开的第5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反对托洛茨基的《关于俄罗斯问题的决议》，保加利亚人科拉洛夫在攻击托洛茨基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因而被季诺维也夫提拔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总书记之一。

但是，在年底以前，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表面上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沉静。夏季发生了旱灾，收成很糟。8月，格鲁吉亚发生起义。政治局内部在对农民的政策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严格地说，政治局不知道应对农民采取什么政策。政治局想使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但是，靠什么来实现呢？也就是说，靠牺牲谁的利益去进行呢？问题的提法是典型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要搞点什么名

堂，就必须剥夺一些人。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首的正统派共产党人提出，靠牺牲农民利益的办法实行“原始社会主义积累”，政治局犹豫不决。10月底，中央全会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没有结果，尽管通过了关于“面向农村”的冠冕堂皇的声明。难道借助集体化，把农民赶进集体农庄，就能把农村控制到自己手里吗？这时人们记起，不久以前，列宁在后期的一篇文章中，即在1923年1月4日和6日口述的，并在5月底发表在《真理报》上的文章《论合作社》中，曾提出了集体农庄问题，但是，他当时指的是自愿建立的农庄。1923年6月26日在中央全会上讨论了这个问题，并通过了列宁的指示。但是，在这个时候，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认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会带来特别的结果，而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任何主张。

但是到了年底，党的生活的注意中心竟然意外地又转向同托洛茨基的斗争。斯大林放弃了利用托洛茨基反对自己同盟者的念头。托洛茨基写了一本名为《1917年》的书，他在题为《十月的教训》的序言中，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进行了激烈的攻击，证明他们在1917年10月的表现并非偶然：众所周知，当时他们反对十月武装政变。托洛茨基指出，这些人根本不具备革命领袖的品德。他把《十月的教训》以文章的形式在报上发表了。此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重又提出与斯大林和好并结成同盟，斯大林欣然同意了，因此，三巨头体制暂时又恢复了。顺便说一下，这时候的斯大林自己有一种危机感，他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了信心。他感到，自己犯了一系列过错，使斗争转到了政治战略路线上，而这方面恰恰是他的弱点；他在格鲁吉亚推行的民族政策直接导致了起义，这对他也有所影响。斯大林深信，他赖以战胜自己对手的东西，并不是在如何对待农村等大的政治方面，而是在行之有效的挑选自己的亲信和在中央夺取多数地位方面，只要这一点没有做到，就必须随机应变，拖延时间。

相反，季诺维也夫在三巨头会议上强烈要求彻底打倒托洛茨基。1925年1月召开了中央全会，会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斯大林表示反对这一建议，扮演了和事老的角色。

斯大林说服全会，不仅不要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而且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当然，托洛茨基的行动和政治立场受到批判，但是，重要的是，把他赶出红军的时机已到。接替他的人选早已准备就绪——他的副手伏龙芝。斯大林不大欣赏伏龙芝，但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支持他。三巨头经过长时间的私下交易，斯大林同意任命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的陆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由伏罗希洛夫任副手。

内战后，在托洛茨基反对的情况下，伏罗希洛夫被任命为二级军区——北高加索军区的司令，但是斯大林一直注意他的提升，由于最近军事部门改组的结果，这一年伏罗希洛夫已被任命为最重要的军区之一——莫斯科军区的司令。斯大林向全会建议，保留托洛茨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同时对他发出警告："如果他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就将他开除出政治局和党中央。"全会解除了他的陆军人民委员的职务，任命他为租让总委员会①主席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产品质量特别会议主席。

这些任命既是挑衅性的，也是可笑的。作为租让总委员会的领导人，托洛茨基要同西方资本家讨论向他们提出的苏联境内的工业租让企业草案。可是，在政治局内部早就知道，并且作了硬性规定，实际上租让企业是个大圈套。向西方资本家建议的租让企业，从表面上看条件是很有利的。当承租者向俄国输入并安装机器设备，使企业投产时，合同的条件是得到很好遵守的。之后，借助于任何一种手法（而当局的这种手法多得很），使承租者处境

① 苏联人民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成立于1923年。

困难，以致无法完成合同，结果合同遭到破坏，从而使进口的设备和已投产的企业变成苏维埃国家的财产。后面我将详细介绍这种戏法之一——列纳·戈尔德费尔茨事件，因为这一事件产生了意外的有意思的后果。其实，租让企业这套把戏的目的也就在于此。托洛茨基很不善于进行这种诈骗活动，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任命他到那里去的。

托洛茨基更不适合于去监督苏维埃工厂产品的质量。让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和雄辩家，艰难的转折时期的政治家去负责监督苏联出产的裤子和钉子的质量，真是可笑至极。不过，他确实是诚实地想要完成党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他建立了专家委员会，同委员会成员们一起视察了一些工厂，并把研究的结果送给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但是这些结论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这是可想而知的。

伏龙芝成为军事机关的首脑。应该说，早在1924年5月，就已经增补了3位政治局候补委员：伏龙芝、索科里尼可夫和捷尔任斯基。

伏龙芝作为老革命家，内战时期著名的指挥员，是一位非常有才干的将领。他是一个沉默寡言而谨慎的人。据我的印象，他是一个善于玩大牌而不露底牌的能手。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很少发言，把精力完全集中在军事问题上。

早在1924年，他作为中央红军状况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就已向政治局提出报告说，红军目前完全没有战斗力；与其说这是一支军队，毋宁说是一伙毫无军纪的强盗集团，因此应予以全部解散。结果，就照这样办了，而且是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留下来的只是军官和士官。到了秋天，重新建立起一支新的，由应征入伍的农民青年组成的军队。实际上，在整个1924年，苏联根本没有军队，显然，当时西方不知道这一点。

伏龙芝实行的另一个深刻改革是，他成功地废除了军队的政

治委员制度，政委被指挥员的政治副手所代替。后者的责任只是作些政治宣传工作，无权干预指挥员作出的决定。1925年，伏龙芝又对军队干部实行了调动，并重新加以任命。结果，军区、兵团和师一级的领导干部，大多是按照军事专业水平高低，而不是单凭共产党员的忠诚原则挑选出来的优秀、能干的军人。

那个时候，我已经是隐蔽的反共分子了。当我看到伏龙芝提出任命高级指挥人员名单时，我反问自己："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我作为反共分子，我会把什么样的干部提到上层军事领导机关呢？"我给自己的答案是："也就是这样的人"。这些干部，一旦发生战争，完全可以实行政变。当然，从表面上看，他们是一些优秀的将领。

我未曾有机会同斯大林谈论这个问题，而且我也根本不想引起他对这个问题的注意。有一次我问过麦赫利斯，他是否听到过斯大林对任命这些新的将领有何看法。同时，我装出一种无可指责的样子问道："斯大林不是一贯对军事事务非常关心的吗？"对此，麦赫利斯说："你问斯大林的看法吗？他对此没有任何好的想法。你看看名单，所有这些图哈切夫斯基①、科尔克②、乌博列维奇③、阿夫克先季也夫斯基④式的家伙算得上什么共产党员。所有这些人对搞雾月18日⑤倒是很合适的，而对红军则不适用。"

① 图哈切夫斯基——1921年起担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后为红军副参谋长，1931年起任苏联陆海军副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苏联元帅。后被处死。

② 科尔克——苏军高级将领。

③ 乌博列维奇——苏军高级将领。

④ 阿夫克先季也夫斯基——苏军高级将领。

⑤ 指1799年拿破仑实行政变的日子，这一天他推翻政府后，建立了自己的专政。

我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又问他："这是你自己的意见，还是斯大林的看法呢？"麦赫利斯神气十足地说："当然，这既是他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

但是，斯大林对伏龙芝的眞实态度究竟如何，还是一个谜。我曾经亲眼看到，他在三巨头会议上对伏龙芝的任命问题坦率地表示不满。可是他在同伏龙芝接触时，却表现出很友好的态度，对伏龙芝所提出的建议也从未加以批评。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是否又是乌格兰诺夫①事件的重演呢？（关于这个事件我以后再谈。）会不会是斯大林表面上装作反对这个季诺维也夫的走卒，而实际上已经同他结成了反对季诺维也夫的亲密同盟呢？看来，这一点还不太象，因为伏龙芝并不是那类人，他和斯大林毫无共同之处。

这个谜直到1925年10月才得以澄清。当时，伏龙芝的胃溃疡病发作，这种病是革命前他在监狱里得的。后来，他的身体完全恢复了。斯大林对他的健康表示异常关心。他说："我们这些优秀干部的健康是很宝贵的，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很不够。"结果，政治局几乎是强迫伏龙芝去作了溃疡切除手术；同时，医生们根本不认为手术是危险的。

当我了解到，这次手术是由卡涅尔和中央的医生鲍戈群茨安排的时候，我对这一切就有了不同的想法。后来，我对这件事模糊的怀疑和耽心完全得到了证实：作手术时，他们巧妙地使用了一种伏龙芝无法忍受的麻醉方法，结果，他死在手术台上，他的夫人确信他是被杀害而死，所以她自杀了。众所周知，皮里尼亚克所著《没有熄灭的月光的故事》一书，正是专门写这个事件的，作者由于写了这本书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

① 乌格兰诺夫——1920年起担任彼得格勒省委书记，1924年起任莫斯科市委书记和中央书记。1932年被开除党籍，后恢复党籍，1936年再次被开除出党。

何以斯大林策划了对伏龙芝的暗杀？难道仅仅是为了让自己的亲信伏罗希洛夫取而代之吗？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因为再过2～3年，当斯大林独揽大权之后，他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这种换马的目的。我认为，斯大林有与我同样的感觉：伏龙芝认为自己将来要扮演俄国的波拿巴的角色，因此斯大林立即断然把他干掉。伏龙芝这一派的其他一些将领，如图哈切夫斯基等，也先后遭到杀害。

托洛茨基在其《斯大林》一书中断然否认我对伏龙芝的猜测，但是他歪曲了我的想法。他把关于伏龙芝是军事政变阴谋首领的说法强加于我。我从来没有这样写过，而且，在这个时期，要在苏维埃俄国实行任何政变，都是不可能的事，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我写过的是，我认为伏龙芝饱尝了共产主义的苦头，他已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军事将领，并等待自己时刻的到来。这里根本没有谈及任何政变的意思。

但是，为了这件事而同托洛茨基辩论未必是必要的。因为他的特点是，对人惊人的不了解和惊人的天真。后面，当我专门谈到他的时候，我还要叙述与此有关的一些事实。

当然，在伏龙芝死后，就安排伏罗希洛夫负责领导红军。第14次党代表大会之后，在1926年1月，伏罗希洛夫成为政治局委员。他是一个才疏学浅的人，早在内战时期就投靠了斯大林。每当斯大林的同伙们奋起反对托洛茨基这个强有力的组织者的时候，他都是支持斯大林的。他眼界狭小，智能有限，这在党内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他，红色教授学院历史部的学员们尖刻挖苦地说："整个世界史，以克·伏罗希洛夫为分水岭，划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他一直是斯大林顺从的、唯命是听的走卒，甚至在斯大林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还起了装璜门面的作用。

在内战时期形成的斯大林的整个军事将领集团成员们都是青云直上，但是，从这个集团里难以找出象样的精明强干的将领。

可是精心组织的宣传机器却把其中一些人，例如布琼尼，吹捧成为了不起的人物。

布琼尼是一个神态活现的人物。他是沙皇军队里一个典型的骑兵司务长，一个优秀的骑兵和马刀手。内战期间他成了反对白卫军的骑兵匪帮的首领。在形式上，这个匪帮为首的是几个共产党员。他们不断扩大，捷报频传，因为在那些年代里骑兵就等于坦克。在一段时间里，莫斯科完全寄希望于骑兵，因而对他简直都是赞不绝口。

在那个时期，托洛茨基提出了“无产者，骑马去战斗!”的口号，这个口号听起来很可笑，它是夸张的，不现实的。问题在于，草原上的牧民是天生的骑士，只有他们才能组织起一支好的骑兵。当然，也可以让农民当骑兵，他们虽然不是骑士，但是毕竟知道马性，也习惯于骑马，知道如何驾驭它们。但是，硬要城市里的工人“无产者”去骑马，实在不中用。所以托洛茨基的这个口号荒谬可笑。

有一次，为了表示对布琼尼的关心，莫斯科给他送来了礼品：一辆汽车和一个党证。为此感到不安的布琼尼，把自己匪帮的头头们召集到一起，向大家报告说：“弟兄们，你们瞧，莫斯科给我送来了一辆汽车和这个玩艺儿。”他象对待娇脆的中国瓷瓶一样，小心翼翼地把党证放到桌上。弟兄们绞尽脑汁地考虑这件事，最后，在思考成熟后，他们决定：“汽车嘛，谢苗，你就收下，汽车是个好东西；可是，党证这玩艺儿，就放在那里吧，反正也不需要喂它……”就这样，布琼尼成了共产党员。

很快，布琼尼匪帮扩大为骑兵旅，以后又发展成为骑兵集团军。莫斯科给他委派了政委和优秀的参谋长。布琼尼的官衔越来越高，当上了司令员，但是他从不过问部队的战斗指挥。每当指挥部征询他对某个战役布署有何意见时，他的回答总是一样：“这是你们的事，我的任务是挥舞马刀，冲锋陷阵。”

在内战期间，他手持马刀一直冲杀在前，温顺地听从委派给他，同时又指挥他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战后，他被任命为相当于骑兵总监的职务。最后，有一次，还决定让他参加赫赫有名的政治局的一次会议。我的脑海里准确地留有关于这个有意思的事件的记忆。

当政治局会议讨论到军事部门的问题时，我指示人们，请包括布琼尼在内的应召前来的将领们进入会议室。布琼尼踮着脚步入会议室，但他的马靴声音仍然很大。在会议桌和墙壁之间有一条很宽的过道，而布琼尼却紧张地挺着身子，好象怕碰倒或碰坏什么东西似的，直到人们告诉他，他的座位在李可夫旁边，他才坐了下来。他的胡须向上翘着就象蟑螂的须子一样。他两眼向前直视着，显然他对会上说的话什么都没听懂。他似乎在想："我的天哪，原来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政治局呀！人们都说它是万能的，甚至能把男人变成女人！"

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问题讨论结束了，加米涅夫宣布："战略问题讨论结束，军人们可以自由了。"但是，布琼尼仍然坐着不动，他不懂得这种含蓄微妙的语言。加米涅夫也古怪，他还是说："军人们可以自由啦。"当时，他如果这样说就好了："布琼尼同志，立正！向右转，开步走！"那样的话，他就会听得一清二楚了。这时候，斯大林摆出一副殷勤好客的主人的架势说："坐吧，谢苗·布琼尼，坐吧！"就这样，布琼尼依然两眼直视，一直坐在那里。大约又讨论了2、3个问题，最后，我向他解释说，他可以退席了。

以后，布琼尼成为元帅，1943年甚至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当然，这是斯大林式的中央。假如斯大林具有幽默感的话，他甚至可以按照卡利古拉①的办法，把布琼尼的那匹马也一同牵进中央委员会。但是，斯大林并没有幽默感。

---

① 卡利古拉——罗马皇帝（公元37～41年），疯狂的暴君。

还要补充的是，在苏德战争期间，经过头几次战役之后，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的毫不中用已经暴露无遗，致使斯大林只好把他们派到乌拉尔去培养后备力量。

第9章 斯大林

斯大林　性格　品质和缺点　仕途　品德不正　对工作人员和对我的态度　娜佳·阿利卢耶娃　雅什卡

现在该是谈谈关于斯大林同志的时候了。我现在对他已经很了解，甚至可以说是了解得非常透彻了。

对于斯大林的外表，人们是相当熟悉的。不过，人们从任何一张照片上都看不出他面部的麻斑来。他面无表情，中等个子，走起路来大摇大摆，总是抽着烟斗。

不同的著作家都说，斯大林有一只手臂负过伤，因而举动不灵活；而且，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还说，他的右臂不大灵活；一个布尔什维克舒米亚茨基在苏联报刊上写道，斯大林的左臂不能弯曲。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发现斯大林有任何这类毛病，至少，我有时看到他伸展和摇动右臂。不管怎样，我从来没有见过斯大林做任何耗费体力的工作。我不知道，或许他的左臂真的有点毛病？但我从未有机会发现这一点。

斯大林的生活方式很不健康，他不爱活动。他从来不进行体育锻炼，也不作任何体力劳动。他既吸烟，又喝酒，喜欢抽烟斗，爱喝卡赫津的葡萄酒。在他掌权的后半期，每天晚上都是在饭桌

旁度过的，同他的政治局委员们一起吃吃喝喝。按照这种生活方式过日子，他竟然能够活到73岁，真是令人惊奇。

他一向举止稳重，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他善于伪装，老奸巨滑。他的报复心异常严重，对任何事都从不宽恕，耿耿于怀，即使时隔20年之后，他也要进行报复。要想从他的性格上找到某种令人喜欢的特点，那是难上加难，我始终未能做到这一点。

逐渐出现了一些臆造的关于他的神话。例如，说他毅力非凡，坚定而果断。这些都是神话。其实，斯大林是一个谨小慎微，优柔寡断的人。他常常不知所措，只不过他对此不露声色而已。我曾经多次看到，他处事是何等动摇不定，犹豫不决。他宁愿坐待事态的发展，而不是主动去加以引导。

他是一个聪明人吗？他并不愚蠢，也没有丧失天赋的理智，他很善于运用自己的理智。

譬如，政治局会议上总是讨论各种国家大事。斯大林的文化水平很低，他对所讨论的问题谈不出什么在行的、有水平的话。这一点使他尴尬，但他素有的狡猾和理智使他能够找到适当的出路。他注视着辩论的进程，当他看到政治局多数成员已经倾向于某种解决办法时，他就发言，用简单的几句话以自己的名义提出，建议采纳他所看到的多数人倾向的办法。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只是寥寥数语，因为这样不致暴露出他的愚昧无知。例如，他说："我认为，季科夫同志的建议应当被接受。至于皮达可夫同志的建议是行不通的，同志们！这行不通。"到头来，结果总是：虽然斯大林是个平庸之才，口才也不行，但是他所建议通过的东西，却总被人们所接受。由于对斯大林的狡猾缺乏了解，政治局委员们就开始觉得，在他的发言中，包含着某种"内在的英明"，甚至是一种"神秘的英明"。我是不上这个当的。我发现，他的思想毫无系统，他今天可以提出与昨天所提的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我看到，他不过是在猎取多数人的意见。从我同他在"家里"、即

党中央的谈话就可以发现，他对这些问题不甚了了。但是政治局委员们陷入了神秘化，最后，他们开始从斯大林的发言中去寻找实际上根本沒有的意思。

斯大林的文化水平低，他不读书，不看报，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对科学及科学方法他格格不入，毫无兴趣。他是一个蹩脚的演说家，讲话时格鲁吉亚人的口音很重。他的演说，內容空洞无物。他讲起话来很吃力，眼睛看着天花板，字斟句酌。实际上，他沒有撰写过任何著作。至于他的文集，那是他就某些问题所发表的讲话，让秘书们利用速记稿整理出来，在文字上再加以润色后而成。而他自己甚至连结果如何都不闻不问。最后，再使之具有论文体或书籍的形式——这都是秘书的事。一般说，这种事由托夫斯图哈负责。

斯大林从来讲不出任何有风趣的话来。在整个我同他共事期间，我只遇到一次他想要诙谐一点。情况是这样的：托夫斯图哈和我两人，在麦赫利斯和卡涅尔的办公室里聊天，斯大林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他的样子神气十足，装腔作势，而且还伸出右手的一个手指头。我们顿时安静下来，以为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斯大林说："托夫斯图哈，我妈妈饲养的一只山羊，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不带夹鼻眼镜而已。"说完以后，他就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托夫斯图哈悄声嘻嘻地笑了。

斯大林对于艺术、文学、音乐都不感兴趣。他偶然去欣赏一次歌剧，而且多半是那部歌剧"阿伊达"①。

关于女人，斯大林对女人毫无兴趣，也不乱搞女人。有了自己的妻子，他感到就足够了。对妻子他也很少关心。那么，斯大林的欲望是什么呢？

他的欲望只有一个，但那却是一种排斥其他一切的、绝对的、

① 维尔蒂的作品。

吞没了他整个身心的欲望——权力欲。这是一种疯狂的、亚洲野蛮人的欲望，是远古时期亚洲的总督所具有的那种欲望。他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时刻都被权力欲所驱使，在他看来，唯有这个才是他生活目的之所在。

当然，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这种欲望是有用的。但是，乍看起来，人们毕竟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如此平庸之辈，才疏学浅的斯大林，怎么会窃取了绝对专政的权力呢？

让我们看看他飞黄腾达的经历吧。使我们更为惊奇的是，他身上素有的恶劣品质要比好的品德对他更加有用些。

开始，斯大林还是一个小小的地方革命鼓动员时，他就觉得，列宁的职业革命家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倒是完全合乎他的口味，因为在这里他无须象别人那样为生活而工作，他可以靠党的经费生活。斯大林从未专心致志地做过什么工作。当然，要担一定的风险：会遭到当局逮捕，被流放到北方，受到警察的监视。对待社会民主党人，镇压手段就到此为止了；而对那些到处投掷炸弹的社会革命党人，当局的惩处要严厉得多。在流放期间，沙皇当局发给生活必需品，在指定的城市或地区之内，生活还是自由的，甚至还有机会逃走，但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转入地下活动。尽管如此，老是当一个普普通通的鼓动员，毕竟是很不舒畅的，而且长此以往，也没有出路；这远远不如列宁和马尔托夫一类领导人在日内瓦和巴黎那样的好地方去过流亡生活舒服。而且，这些高贵的领袖们绝不会置身于不舒适的环境。

党的领导人流亡国外，成年累月地忙于筹措经费，这既是为了自己高贵的生命，也是为了党的活动。提供经费的有兄弟的共产党，但是他们很吝啬，捐款很勉强；也有资产阶级慈善家。例如，在莫斯科艺术剧院周围兜圈子的海燕（指马克西姆·高尔基），曾帮助该剧院女演员安德列耶娃用她的美色把百万富翁萨瓦·莫洛佐夫勾引住了，这样，金钱就通过安德列耶娃之手流进了列宁

的钱柜。可是，光是这些钱不敷使用，经费总是不够。于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人又找到了新的筹措经费的手段——干脆对资本家和银行家实行武装抢劫。用特定的革命行话来说，这就叫做“剥夺”，即没收财产。但是，各兄弟社会民主党一向以举止高尚自居，并且经常参加政府，所以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俄国的孟什维克也反对这样做。在此情况下，列宁也不得不做出类似的表态。不过，斯大林很快就意识到，列宁的表态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实际上他对任何钱财，即使是抢劫来的，都是求之不得的。斯大林想方设法拉拢一些高加索匪徒，使他们转而信奉布尔什维主义。在这一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不顾死活的亡命徒卡莫·彼得罗斯扬。他的匪帮搞了几次武装抢劫，就使列宁的钱柜装满了钱，困难仅仅在于还需要兑换这些货币。列宁得到这些钱自然很高兴。彼得罗斯扬匪帮抢劫活动的幕后组织者是斯大林同志。至于斯大林自己，出于谨慎小心，倒未直接参与其事。

这里随便说说，斯大林是不是一个胆小鬼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过，综观斯大林的一生，可以说，没有任何事例能够表明，他曾经有过奋不顾身的勇敢行为的记录——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内战时期，他总是从遥远的后方指挥战斗的，在和平时期，也是这样。

列宁对斯大林的活动非常赞赏，因而很想在党内提拔他，譬如提到中央来。不过，在党代会上不能这样做，因为代表们会提出异议：“他为了党而组织了武装抢劫，这很好，但这并不能成为把他提升为党的领导人的理由。”后来，列宁找到了适当的办法：1912年，斯大林同志没有经过任何选举而“遴选”为中央委员。从此以后，直到革命发生之前，斯大林被流放在外，所以党内也没有人提到他的问题。可是，随着二月革命的开始，他从流放地回到首都时，竟然以一个老中央委员的面目出现。

众所周知，无论在1917年第一次革命中，还是在十月革命时

期，斯大林都没有起任何作用，他躲在后面，等待事态的发展。过了一段时间，在夺取政权之后，列宁任命他为两个人民委员部①的人民委员。按照当时列宁的设想，这两个部很快会被撤销：列宁考虑把死在胎里的产儿——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加以改组，将其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以后正是这样做了；同时，将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撤销，而把它的职权交给中央执委会的民族委员会。至于列宁对斯大林的看法，从一次会上人们对列宁提出任命斯大林担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而展开的争论，就可以看出。在那次会上，当列宁建议通过这项任命时，有一位代表提出了另一个候选人，并说明他提名的人是精明强干和聪明的人，列宁打断他的话说："其实，那里并不需要派很聪明的人，我们派斯大林去就够了。"

斯大林的人民委员职位是有名无实的，他从来没有到人民委员部去露过面。人们对他在内战时期在前线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是很有争议的；他在波兰战争时期的活动更是极为有害的，当时，由于他和他的部队没有执行总司令部的命令，整个华沙攻势遭到挫败。斯大林真正的官运是后来才开始的：当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了争夺继承列宁的权位，策划了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为此，他们选中斯大林作为他们在党的机关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同盟者。但是，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都不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党的机关正自动地走向权力的顶峰。他们把斯大林放在这辆车上，只要他能坐稳，这辆车本身就会把他带到权力的顶峰。同时，说句实话，除此之外斯大林还意识到，这辆车正在把他带向高峰，所以他自己也主动地做了为此而需要做的一切。

由此自然引出一个结论：在1925年以前，斯大林在党内之所以青云直上，他自身的缺点比他的优点所起的作用更大。当列宁把

① 指工农监察人民委员部和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

斯大林拉进中央参加他的多数派时，并沒有担心，这个文化水平低，政治上名气不大的斯大林会有任何竞争力。由于同样的原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让他当上了总书记。他们认为，在政治上斯大林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们把斯大林看成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而绝不会是一个竞争者。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大林是一个毫无道德的人。列宁已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而且他以一种藐视的态度认为，对他和他的职业革命家们说来，正派、正直、忠于誓言、容忍和真诚等道德品质，都是不能接受的；而按照我们古老的基督教文明的传统，我们则认为，所有这些品质，是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和美好的不可缺少的基石。

在列宁看来，这一切都是应予摒弃的资产阶级道德，只有那些有利于社会革命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有利于共产党的东西，才是有道德的。斯大林是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学生。当我们对他的一生及其言行进行认真剖析的时候，很难从中找到一些有人性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能够指出的唯一的一点是，他对自己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还有某种作为生身父亲的感情，而且这一点也只是在某个时期以前才存在。除此以外，可以说是别无其它。

谈谈斯大林的粗暴。它是一种自然的表现，源出于他的文化水平低。而且，斯大林很善于控制自己，所以，当他表现粗暴之际，正是他认为不需要对人有礼貌之时。我在他的秘书室里的见闻是很有意思的。他对自己的秘书们并不故意表现出粗暴的态度；但是，比如说，如果当他按铃唤人时，女传达员恰好出去送文件不在值班室，于是麦赫利斯或卡涅尔听到铃声就进入他的办公室，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只说一个字："茶"或"火柴"。助理们称呼他为"您"，不称他的名和父名，或称呼斯大林同志。他对托夫斯图哈、麦赫利斯和卡涅尔三人都以"你"称呼，他只对我以

"您"相称，虽然我比他们都年轻。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中，他对谁都沒有好感，对每个人他都根据其有用程度而给予评价。应该说，所有的人对他服务的态度都很周到：卡涅尔负责几乎是刑事方面的问题；托夫斯图哈主管的也是相当见不得人的事务；麦赫利斯初期沒有受到他的器重，但他却为使斯大林成为"伟大的和天才的人"而做了需要作的事。我作为政治局的秘书对他还是很需要的。尽管如此，他对我的态度却与别人不同。其他的助理都是"他"的人，都是些忠心耿耿，牢牢抓住自己的地位不放的人。而我对他说来并不是"自己人"，我对他沒有任何忠诚或尊敬可言，而且我对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个谜，因为我既不追求名位，也毫无权欲。

只有一次，他曾试图粗暴地对待我，那是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象通常一样，我把会议决议内容写在卡片上，越过桌子递给他，而他看过之后又把卡片退还给我。当时，由于与我毫无关系的原因，他同政治局委员们发生了分歧，他生气了，因而想向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表示他的不快。为此，他沒有找到别的更好的办法，而是采取了这种做法：他不是把卡片沿着桌子递还给我，而是扔了过来。我马上做出了反应，把另一张卡片也照样扔了过去，而不是递过去的。他惊奇地瞪了我一眼，立即停止扔卡片了。

当我经过内心的思想斗争成为反共分子后，我再也不愿意继续作为政治局这部机器上的有益的螺丝钉了的时候，他对于我的心情是毫不理解。有一天，我对他说，我想调到人民财政委员部去工作。那时，索科里尼可夫建议我去主持财政人民委员部的经济财政局，这是取代沙皇时期财政部的统计委员会而设立的一个机构。斯大林惊讶地问我："为什么？"当然，我沒有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只是回答说，很想提高一下自己管理国家经济财政事务的水平。他答复我说，我可以在继续担任目前工作的同时，去

提高这方面的水平，而且，这对我的工作只会更加有利。“此外，以后党会委托你去担任非常重要的负责的工作，你沒有任何理由拒绝这一工作。”就这样，我开始兼任人民财政委员部工作（以后我还要谈及这件事）。但是，对于认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斯大林来说，我对权力的冷淡态度和想要离开权力中心而出走一事成了一个谜。他感到对我有些不理解。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对我的态度总是相当客气的。

在20年代那个时期，斯大林的生活很简朴。通常，他身着朴素的半军服、皮靴和军大衣。他毫不奢侈，不讲排场，沒有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在克里姆林宫，他住在过去宫內佣人住过的一间狭小、设备简陋的房间里。而加米涅夫，当时已经对各种汽车非常熟悉了，并且自己挑选一辆高级的罗斯罗依斯牌汽车作专车。斯大林却乘坐一辆马力大，但很一般的俄式巴尔特汽车。由于当时沒有公路，实际上汽车只能在莫斯科市內使用，要出城时，几乎只能走列宁格勒大道这一条路。当然，对他来说，正如对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钱的问题沒有任何实际作用。沒有錢他们可以占有和享受一切：住房、汽车、乘火车、到疗养院休息，等等。苏联人民委员会的食堂把饭菜做好，送到他们家里去。

政治局的例会一般是早上开始，午饭以前结束。政治局委员们散会后回去吃午饭，而我要留在会议室里，把最后讨论和通过的各项问题的决定写成文字决议，记录在案。这项工作完成后，我就到斯大林家里去。通常，这个时候他已开始午餐，同他一起就餐的有他的妻子娜佳和大儿子雅什卡（第一个妻子斯瓦尼泽所生）。斯大林把卡片审阅完毕，我再回到党中央，把会议记录整理好。

我第一次到他们家时，正值他们在吃午饭，斯大林斟满一杯葡萄酒让我喝，我说：“我不会喝酒，斯大林同志。”

“来吧，就一杯葡萄酒，可以嘛，而且这是好酒——卡赫津酒。”

“我是从来滴酒不进的。”

斯大林惊奇地说：“那么，为我的健康喝一杯。”即使是为他的健康，我也没有喝。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请我喝酒了。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散会后斯大林走出政治局会议室，但不是直接回家去，而是在克里姆林宫里散步，一边走路，一边同某一位与会者继续交谈。遇到这种情况时，我到他家后需要等到他回去。利用这个时间，我结识了他的妻子娜佳·阿利鲁耶娃，并同她谈话，我称呼她娜佳。我们结识后彼此相当亲近，甚至相当友好。

娜佳为人与斯大林截然不同。她是一个正派、诚挚的人。她长得并不漂亮，但面貌可爱、大方，讨人喜欢。她的年龄与我相仿，但看上去比我大，所以最初我还以为她比我要大好几岁。众所周知，她是彼得堡的工人、布尔什维克阿利卢耶夫的女儿。1917年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前，列宁曾经躲藏在他家里。娜佳同斯大林生了个儿子叫瓦西里，当时只有5岁，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叫斯维特兰娜。

当我与娜佳相识时，我的印象是，她被一种空虚的气氛所包围：当时她好象没有女朋友，而男子又害怕同她接近，万一斯大林疑心别人在追求他的妻子，那就不会有好下场。我深深地感到，这位独裁者的夫人所需要的，是最普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然，我甚至连追求她的念头也未曾有过，况且当时我自己正在全身心地同另一个人谈恋爱。娜佳逐渐对我谈起她的生活情况。她的家庭生活是很艰难的，斯大林在家里是个霸主。在同外人的工作关系中，他总得克制自己，而对家人却毫无顾忌。娜佳曾不止一次感叹地对我说：“他默不作声已经第3天了，他不愿意同任何人讲话，别人同他打招呼，他也不理睬；他是一个非常难

处的人。"但是，我极力回避谈论斯大林的为人，而可怜的娜佳，显然是刚刚发现他品德不好和沒有人情味，但她仍然不愿相信自己的发现是正确的。

过了一段时间，娜佳消失了，后来才知道，她是到列宁格勒的父母家度产假去了。当她回来后我再见到她时，她对我说："你瞧，请欣赏一下我的小宝贝吧！"当时这个"小宝贝"刚满3个月，是个皱着眉头的小家伙，这就是斯维特兰娜。娜佳允许我抱抱她，以表示对我特别信任。我抱的时间不长，只有3～4分钟，因为男人总是笨手笨脚的。

在我离开斯大林秘书室以后，我就很少再见到娜佳了，只是偶尔遇到过。在奥尔忠尼启泽担任中央监委主席后，他要娜佳去担任他的第三秘书，首席秘书是心地善良，个子高大的特拉依宁。有一次我到奥尔忠尼启泽那里去，见到了娜佳，我同她进行了长时间友好的谈话，这是我同她的最后一次会面。她在奥尔忠尼启则那里工作期间，变得朝气蓬勃，因为那里的气氛使人非常愉快。谢尔戈①是一位非常好的人，他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他对我以"你"相称，这使我感到局促，因为他比我年长20岁。而且，他只有对那些怀有好感的人才以"你"相称。此后，我再也沒能见到娜佳了。

关于娜佳的悲惨结局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人们对这个结局的细节并不完全了解。她曾在工业学院学习过，尽管工学院的名气很大，但那不过是一种对工农出身的地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和提高文化水平的学习班，他们是一些曾经担任工业企业的领导职务，但由于文化水平低而不能胜任工作的人。

事情发生在1932年，当时，斯大林开动起巨大的全俄绞肉机，强迫实行集体化，数百万戶农民遭到非人的待遇，他们被逐

---

① 奥尔忠尼启泽的名字。

到集中营去受迫害。工业学院的学员们都来自各地方，他们亲自目睹农民被毁灭的可怕遭遇。当然，当他们得悉这位新学员是斯大林的夫人时，他们都守口如瓶了。但他们逐渐感觉到，娜佳是个极好的人，她心地善良，待人亲切；因而大家认为，她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人们又开口讲话了，开始向她讲述国内的眞实情况。在这以前，她只能从苏联的报刊上读到一些关于农业战线取得辉煌胜利的报导。娜佳听了大家介绍后，深感震惊，觉得情况很可怕，她匆忙回去对斯大林讲述了她听到的情况。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斯大林是如何对待她的。每当他同娜佳发生口角时，他常常放肆地骂她是笨蛋和白痴。显然，斯大林会硬说她所讲的情况都是虚假的，是反革命宣传。

"可是所有的目睹者都是这样说的。"

斯大林追问道："眞的是所有人都这样说的吗？"

娜佳回答说："不，只有一个人硬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眞实的。但是这个人显然是昧着良心，胆小怕事才这样讲的。他是我们学院的党支部书记，叫尼基塔·赫鲁晓夫。"

斯大林记住了这个名字。他们在家里争吵不休，斯大林硬说，娜佳谈的都沒有根据，因而要求娜佳把这些人的名字告诉他，以便核实一下他们的证据的眞实性。娜佳把同她交谈的人的姓名告诉了斯大林。这一次，如果说娜佳当时对斯大林的为人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这已是最后的怀疑了。结果，工业学院里认为娜佳是可以信赖的那些学员全部被捕，然后都被处决了。至此，深受震动的娜佳终于觉醒过来，她终于认清了这个与之结合的人的眞面目，而且，很可能她也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了。于是，她自杀了。当然，对上述情况我不是当场的见证人；但是，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我对她的这种结局是非常理解的。

可是，赫鲁晓夫却从这个时候起扶摇直上了。在莫斯科党组织进行区委及其书记改选的时候，斯大林告诉莫斯科市委书记

说："你们那里有个出色的干部——工业学院的支部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应该提拔他当区委书记。"在这个时期，凡是斯大林的话都是法令了，所以赫鲁晓夫很快就当上了区委书记，记得好象是红色普列斯涅区的书记。不久，又晋升为莫斯科市委书记。这样，尼基塔·赫鲁晓夫青云直上，直至最后爬到了权力的金字塔的顶峰。

斯大林前妻生下的长子——雅可夫，也同他生活在一起。不晓得什么缘故人们只称他为雅什卡。他是一个举止稳重，沉默寡言和不大外露的青年。他比我小4岁。看上去他是个深受压制而敢怒不敢言的人。他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点，可以称之为神经性的迟钝，他总是沉浸于某种不可言状的内心苦楚之中。人们对他打招呼，同他说话——而他好象没听到，总是精神恍惚，心不在焉。然后，他突然觉察到别人在同他谈话，顿时醒悟过来，对一切都听得一清二楚了。

斯大林不喜欢他，并且想方设法欺负他。雅什卡想要去读书，而斯大林却把他送到工厂去当工人。雅什卡把对父亲的仇恨深深地埋藏在他的心灵深处。他总是力求不出头露面，直到战争爆发他一直没有担任任何角色。战时，他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后来，被德国人俘虏。当德国方面建议用被他们俘虏的斯大林的儿子同一名被俘的德国高级将领交换时，斯大林答复说："我没有儿子。"结果，雅什卡继续当俘虏，在德国崩溃前秘密警察把他杀害了。

我几乎从未看到过斯大林同娜佳生的儿子——瓦西里。当时他还年幼，长大成人后，他成了酒鬼，是个嗜酒成癖的人。至于斯维特兰娜的经历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斯维特兰娜象她的母亲一样，她懂得了斯大林意味着什么，也懂得了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所以，她叛逃国外的行动，对共产党人的宣传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人们自然会感到："唉，这个制度简直糟透了，甚至斯大

林的亲生女儿斯维特兰娜都觉得无法忍受了，所以才叛逃。”

当然，如果把上述关于斯大林的话加以综合，就可以断定，他是一个品德不正，作恶成性的人。但是，我想，斯大林事件提出了另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的人竟然能够充分施展他的全部罪恶的习性，竟然能在四分之一世纪内无法无天地杀害数百万人呢？唉，对此只能有一个答案：正是共产主义制度造就了斯大林，并使他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正是这个全面地、无休止地煽动仇恨心理，并鼓吹毁灭人民中整个集团和阶级的共产主义制度，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掌权者可以把他的全部活动都描绘成为同无中生有的敌人——阶级、反革命、破坏分子而进行的斗争；而把自己荒谬的，没有人性的制度的失败，解释成为是一些虚构的敌人的阴谋和反抗的结果，进而不遗余力地鼓吹实行迫害和枪杀，号召对一切——思想、自由、真理、人类的感情等都实行压制。只有在这样的土壤上，斯大林式的人物才能成为盛开的花朵。

当高层领导确信，即使这样，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在子弹上膛、枪托底板的情况下生活的时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螺帽稍微拧松，但又不能太松；同时，警惕地注视着，使这个制度中的全部基本的东西都维持现状。斯大林逝世以后所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第10章　政治局的委员们
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　他的品质　演说家　勇敢　装腔作势　组织者　交通人民委员　红军　理论家　不断革命论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基本问题　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　社会主义狼一般的嘴脸　托洛茨基的天真

当托洛茨基写到我的时候，他的说法几乎总是不公正的：既然我是一个反共分子，这就意味着我是敌人，是“反动派”，因而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法规，就可以毫不客气地对待我。我不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而我在对他评述时还要力求客观。

在布尔什维克领袖人物当中，托洛茨基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有天才的大人物。但是，这里需要公正地说，他的天才并不是全面的。他具有杰出的品质，同时也有不少缺点。

他是一位杰出的演说家，是一位革命类型的演说家，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鼓动性。他善于发现和提出所需要的口号，他的演说热情奔放，慷慨激昂，激动人心。同时，他也完全能够控制自己，在一般不需要任何激情的政治局会议上，他的发言心平气和，实事求是。

托洛茨基文笔很锋利，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活跃的，热情

饱满的评论家。

他是一位勇敢无畏的人，他对于因自己从事革命活动而带来的一切风险都毫不畏惧。只要提一下他的这样一个事迹就足够了：1905年他在主持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会议时，他自始至终表现出勇敢的大无畏精神，斗争性很强，最后他直接从主席台上被揪走，投入监狱，并流放外地。

但是，更加突出的，还是1927年的"克列孟梭纲领"事件。当时整个权力已掌握在斯大林手中，但斯大林仍然继续同反对派争吵不休，其目的是想使隐蔽的敌人公开暴露出来，正如前面我所说过的那样。在1927年的11月全会上，斯大林终于提出了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党的建议。托洛茨基要求发言，除其它内容之外，他面对斯大林集团的人讲了一席话，大意是这样的："你们这一伙——是一个平庸无能的官僚集团。一旦出现苏维埃国家的命运面临考验的问题时，一旦爆发战争，你们将无力组织全国人民奋起抵抗和赢得胜利。当敌人打到离莫斯科仅100公里的地方时，我们就会象当年的克列孟梭① 所做的那样，把这个无能的政府推翻。但所不同的是，克里孟梭只是满足于取得政权而止步，而我们，除此之外，还将把这个叛变革命的微不足道的官僚匪帮处以死刑。是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做的。你们也极欲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但是你们没有这个胆量。而我们却敢于这样做，因为这将是取得胜利的完全不可缺少的条件。"当然，这个演说中包含有许多天真的东西，以及对斯大林缺乏了解的成份。但是，在这样激动人心的演说面前，人们怎能不肃然起敬，而情不自禁地脱下自己的帽子呢？

毫无疑问，由于托洛茨基的热情奔放，以及他那勇敢无畏和坚定不移，他已成为一位危急关头的关键人物，在这样的时刻，

---

① 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

他勇于挑起责任的重担，勇往直前，坚持到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十月革命时期担任了重要角色，成为列宁夺权计划的不可取代的执行者；而斯大林式的人物，却躲藏起来；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式的人物，也临危退却了，采取了反对的态度。托洛茨基却坚持到底，并且勇敢地领导了这次行动。这里要顺便提一下：当时，伊里奇并未表现出突出的勇敢精神，他很快听从了身边人让他不要拿自己的宝贵生命去冒险的忠告，匆忙躲开了。可是，托洛茨基在这种忠告面前毫不畏缩。甚至在此之前，在六月起义遭到挫败时，列宁立即隐蔽起来，但托洛茨基却没有逃走，而是毅然走进了克伦斯基[1]的监狱。

但是，这里也应当指出托洛茨基的一个严重缺点，他是一个过份装腔作势的人。由于他深信自己是一个载入史册的人物，所以，他随时都为这部史册摆好姿势，准备摄影留念。然而，这种做法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候，这确实成为一种很高的姿态，是与托洛茨基及其倡导的社会革命在国际事件中所成功地担当的角色相称的。例如，在内战时期，当苏维埃政权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他庄严地宣称："我们即将退出舞台，但是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将把自己身后的这扇门如此用力地关上，以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这一席话也是一种姿态，是为载入史册而做出的姿态。可是，有的时候，这种姿态不太协调，不过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有一次，托洛茨基站在装甲车上，庄严地检阅自己的红军队伍。

但也有的时候，他的姿态同他的身份并不相称，反而令人可笑；而托洛茨基自己却不觉察。作为例子，请回忆一下我前面已经叙述过的托洛茨基在一次中央全会上甩门的情况。

---

① 克伦斯基——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后，任苏维埃副主席，后加入社会革命党，参加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并任总理和总司令。

当然，在对国内战争的战略领导方面，列宁所起的作用要大于托洛茨基；但是，在组建红军方面，托洛茨基无疑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里要指出一个不仅托洛茨基一个人具有的特点。在治理国家，组织斗争和经济建设某些方面的过程中，那些精明强干的人能够得到迅速成长和学习到很多东西。那些诸如克拉辛、索科里尼可夫和塞尔佐夫式的人物，经过锻炼，逐渐地成为日益成熟的国务活动家。在国家这所大学校里，甚至连那些才干不高的人也可以得到成长，学到东西。譬如，那位不无名气的米·加里宁，列宁之所以吸收他进入政治局，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多数派，另一方面是为了经常在手下有一个熟悉农村和农民心理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加里宁无疑是帮了他的大忙。但是，当他试图参加那些要求具备某些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的辩论时，开始在他发言中竟能讲出一些非常荒唐的事，致使政治局的委员们情不自禁地发笑。后来结果怎么样呢？经过 2～3 年的时间，加里宁变得相当聪明了，懂得了很多东西，而且他也不是完全沒有天资。所以，后来他的演说往往是很有水平的，他也不再是剧团里的一个滑稽演员了。

精明强干的托洛茨基，最初，只是一位天才的宣传鼓动员，后来也是在担任组织领导工作的岗位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他也曾不止一次跌过跤子。内战结束后，全部交通线遭到破坏，当时实际上领不到任何薪水的铁路员工们，为了不致被饿死，而不得不去种菜和做些“背口袋的买卖”①，他们沒有工夫去维修火车，因此，火车就无法开动了。于是，列宁任命托洛茨基担任交通人民委员，列宁这样做，其中也不是沒有暗算：要置托洛茨基于被动的境地。托洛茨基上任伊始，就发布了一项充满激情的命令：“铁路员工同志们！由于交通断绝，国家和革命面临毁灭的危险。我

① 内战时期用口袋从农村把食品背到城市贩卖的投机买卖。

们必须使火车开动起来，为此不惜牺牲在自己的铁路工作岗位上！”这项命令中的惊叹号，比一个书记员毕生中由于命运的捉弄而不得不用的惊叹号还要多。当时铁路员工同志们需要的不是牺牲在铁路工作岗位上，而是要设法活下去，为此就必须去种土豆和搞“背口袋的买卖”。结果，铁路员工们继续搞“背口袋的买卖”，火车也沒有开动起来。列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撤销了托洛茨基交通人民委员的职务，不要他再出洋相了。

可想而知，在组建红军时，托洛茨基初期也是靠高呼口号和发表演说行事的，他大谈关于士兵委员会，选举指挥员，秩序混乱，蛊惑人心的宣传和流寇主义等。但是，托洛茨基很快就认识到，不掌握起码的军事知识，沒有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就不可能建立起任何一支军队。于是，他起用了专家——沙皇军队的旧军官：对一些人是用高官厚禄收买来的；对另一些人，则是动员他们来的，并迫使他们在共产党政委的严格监督下发挥他们的本领。在整个内战时期，托洛茨基为了在军队里建立起军纪，不得不同斯大林分子和伏罗希洛夫分子进行斗争。托洛茨基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逐渐从一个宣传鼓动员而成长为组织者。但是，在这一方面他仍然未能达到高峰：且不说铁路的事件，就是在当时进行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就组织工作来讲，托洛茨基的建树也不多，而不大高明的莫洛托夫式人物却全线出击，对他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诚然，托洛茨基认为，在这种政治斗争中，最重要的是要抓住重大的政治战略问题，即“具有远程目标的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在这一方面，他显然是在追随列宁，力图仿照列宁的模式和列宁的药方，但是与列宁相比，他有着明显的弱点：当然，列宁对政治战略问题是重视的，而且以极大的精力从事于政治战略问题的研究；但同时列宁对组织工作问题也并不忽视，例如在1917年的彼得堡政变中，组织工作发挥了比政治工作更大的作用。

这里，还要提及托洛茨基的另一个弱点——他作为理论家和

思想家的弱点。

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托洛茨基是具有狂热信仰的人物。托洛茨基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也信奉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他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终生不变的。他对这些教条毫不怀疑，也从未发生动摇，他遵循自己的信仰，坚定行事。托洛茨基只有在全党面前才会投降，因为他把这个党看成是赖以进行世界革命的最完善的工具；但是他从来未曾放弃自己的思想，而且直至自己的生命完结之日，他都一直对之坚定地、狂热地信守不渝。从这种类型的人当中产生过方济各会修道士，彼得苦行僧，也出现过托洛茨基式的人物和希特勒式的人物。对人类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的，既不是理论家，也不是思想家，而是这种狂热的信仰者。他们的影响较之理智和英明的柱石要大得多。

要试图按其本来面目弄清托洛茨基的基本政治思想是什么，这是不那么容易的事，因为那些季诺维也夫分子、斯大林分子以及斯大林的继承者们，不间断地对托洛茨基提出各种纯属捏造的指责。要澄清这些堆积如山的指责谈何容易。即使当年在党内进行这一斗争的时候，对于我这个见证人来说，正如对于所有布尔什维克上层人物来说一样，大部分分歧的虚伪性和臆造性是一清二楚的。当时需要的是击败对手而独揽大权，但是又不能造成这样的印象：这一切如同罐子里的蟋蟀之间的搏斗那样谈不上什么原则性、思想性。必需要佯装出这场斗争带有很高的思想性，存在的分歧关系重大：存在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二者必居其一，而且似乎这将决定整个革命的前途。

然而，通常这都是一些关于用词的模糊不清的争论。特别是围绕托洛茨基的著名“不断革命论”和斯大林的“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展开了许多这类空泛的、别有用心的争论。实际上，托洛茨基的思想是：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个世界性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这种革命也必将在其它国家里陆

续爆发。人们必须牢记这一目标，因而应该把共产主义的俄国看成是赖以在其它国家进行并继续做好革命准备工作的跳板和基地。要牢记世界革命这个目标，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轻视俄国将要发生的事情。相反，按照托洛茨基的思想，应该在俄国积极地进行共产主义建设。但是，他认为，一个孤立的俄国革命，未必能够长久地顶住那些企图诉诸武力对之进行镇压的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而且，应该说，在革命前列宁一直完全赞同这种看法。

因而，非常明显的是，虽然托洛茨基遭到驱逐、杀害和批判，并被革出教门，但不断地进行世界革命这个共同思想，却始终为俄国共产主义所遵循，并将继续被遵循下去，而且将永远是共产主义的基本战略方针。

确实，在事实和经验的压力下，俄国共产主义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初期作出的某些悲观估计作了修改。各"资本主义"强国的领导人，不仅违背了任何明智，没有为推翻俄国的共产主义而诉诸武力，而且叛卖了西方文明。正如邱吉尔和罗斯福所作的那样，正当共产主义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为拯救共产主义而极尽其能事，从而使得共产主义得以占领半个世界，并成为对人类的一个主要的世界性威胁。当时，要事先估计到叛卖行为和政治呆子病会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那委实是非常困难的事；这里，我必须为列宁和托洛茨基进行辩护：他们当时做出自己的估计的出发点，是认为他们与之打交道的敌人是一些正常的、思想健全的人。写到这里，我怎能不援引天才的俄罗斯诗人乔治·伊万诺夫的诗句：

向你们介绍

　　一切世界性的蠢货，

而人类的命运

　　被他们一手掌握。

向你们介绍

　　一切世界性的坏蛋，

而他们被载入史册

　　头戴金光闪闪的皇冠。

关于斯大林"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也具有完全相同的虚构性。斯大林极欲煞有介事地表明，他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基本上也是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1925年初，斯大林指责托洛茨基说，他不重视，"不相信"在一个国家里，即在已经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俄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糟糕的是，这个时候(1925年3月)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之间再次发生内哄：季诺维也夫对斯大林竟企图跻身于总战略领域是不能容忍的，认为他企图扮演理论家和战略家的角色是很可笑的。在三月全会上，双方发生了冲突，斯大林对季诺维也夫进行报复，对他表明，在中央掌握了多数，这要比任何战略的价值都更大。在全会上，季诺维也夫起草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提纲遭到拒绝，其理由是荒谬的关于用词上的争论——究竟是否可以采用社会主义"彻底"胜利的提法。4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加强了对斯大林关于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攻击，他们决意不让斯大林毛遂自荐地成为革命的战略家和领袖。4月底，斯大林召开了第14次党的代表会议，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又是一场关于用词上的争论，这种争论是凭空虚构的。究竟能否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呢？归根结蒂，问题在于敌人能否以武力把它推翻。当时，革命已经进入第8个年头了，已经可以看清楚，暂时任何人也不想推翻它。那么，是否要由此而形成一种象征性的信仰而公诸于世呢？这样作有什么意义呢？或者，认为当前应当加强自己的力量，至于将来会怎么样，再走着瞧嘛，这在实质上毫无意义。此后，季诺维也夫集团与斯大林吵得不可开交，他们用大量文字来攻击斯大林，证明他不是一个革命者，抛

弃了世界革命，而埋头于局部性事务之中，等等。

除了这些人为地制造的东西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宏观问题。在1925～1926年间，出现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究竟新经济政策是否应该继续执行下去？究竟是实行“资本主义”成分（即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和发挥主动性）和共产主义成分之间的和平竞赛呢，还是重新回到1918～1919年间的政策上去，即用暴力去推行共产主义呢？权力机关究竟要选择那条路？这是关系到亿万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这首先是一个关于农村的问题。究竟是给农民及其经济以逐渐进化的机会，而不使之遭受破坏呢，还是不择手段地消灭农民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农民是小私有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成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是否有可能做到的问题。列宁耽心的是，权力机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因而主张采取在自愿的基础上逐步地、缓慢地把农民吸引到集体农庄，即合作社中来的循序渐进的解决办法。而根据斯大林的估计，现在既有庞大的警察机关，再加上军队的支持，已经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因而梦寐以求的全俄罗斯大兵营的建立已成为可能。

但是，哪条道路最好呢？经过一定实际工作锻炼的布哈林和李可夫认为，应该继续走列宁新经济政策的道路。1925年4月，布哈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集体化——不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应当依靠农民经济的发展，甚至向农民提出“发财吧！”的口号。严格地讲，存在着两种选择，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走有人性的，明智的道路，这将是非共产主义的道路；或者是走共产主义绞肉机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才华出众的布哈林、索科里尼可夫、克拉辛、塞尔佐夫式的人物已经认识到，看来，列宁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共产主义面临失败的危险，应该走明智的道路。但是，象托洛茨基那样的极端狂热分子，象季诺维也夫那样可耻、诡计多端、权迷心窍的人物，以

及象斯大林那样品德不正的人物——他们各自的考虑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继续用暴力推行共产主义。

然而，这并未很快付诸实施。1925年，季诺维也夫集团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反对布哈林反对派。1926年这个集团面临被逐出权力中心的威胁，于是它便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赞成托洛茨基关于超级工业化和对农村施加压力的主张。而斯大林并不想特别深入地考虑思想问题，更多的是要使一切都服从于他的阴谋诡计。1926年，为了清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主张而反对他们。在1927年底以前，斯大林在攻击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集团过程中，一直采取这一立场。但是到了1927年底，他决定排除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那时候，他又毫不脸红地全盘接过了他曾经对之进行批判和猛烈抨击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政策。这时候，他既主张实行超级工业化，也主张强行推行集体化和摧毁农村的政策。1927年12月的党代表大会，终于使他在中央取得了牢固的，不可动摇的多数，这是多年来他不遗余力做工作的结果。这时，他开始推行这一套政策，抛弃了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从而放心地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走向他的共产主义。

实质上，在这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道路合二为一了。托洛茨基也是共产主义者，是一位坚定不移而不明智的共产主义者。

同时，应该忆及的是，列宁在遗嘱中曾谈到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问题，而且，列宁还劝告人们不要为此而特别责怪他。事实上这意味着，在革命以前，托洛茨基从未属于列宁的职业革命者的党。众所周知，他在二月革命以后回到俄国，先是参加了"区联派"，1917年夏季，他同这些人一起最终合并到列宁的组织中去。这就是说，革命前的托洛茨基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应该说，这一点对他倒是很高的褒奖。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成员们，是一些诡计多端，互相倾轧，造谣成性的人，是一伙品德不

正的寄生虫。托洛茨基忍受不了这些人的作风和道德，他甚至不象列宁那样依靠党的经费和资产阶级慈善家们的施舍而生活，而是靠自己当记者的劳动收入过活(早在战前我就曾经读过他在《基辅思想》上发表的文章)。他对列宁的那种独特的道德格格不入，他与列宁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一个正派的人。尽管他是一个有着狂热的信仰，并对自己的信仰虔诚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的人，但是他并未丧失一个人的情操——对友谊的忠诚，为人热忱和起码的正直。的确，托洛茨基不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当我对他已经相当熟识的时候，我才惊讶地获悉，原来他还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不管这多么令人奇怪，但在前个世纪的80年代里，在俄国确实曾经有一批靠种田和从事农业劳动而谋生的犹太农民。托洛茨基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好农民，照布尔什维克残忍的说法叫作富农，而按照有人性的说法，则是一个勤俭的，爱劳动的生活富裕的农民。这种对农村的熟悉和对大自然真实的亲切感，究竟对托洛茨基产生了多大影响？对这一点只能猜测了。

但是，托洛茨基同时也把一个严重的人性问题提到我的面前。虽然我脱离了共产主义，但仍然在继续探讨着共产主义问题，因而我情不自禁地对自己提出了一些共同性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吧。我们的时代充满着共产主义与古老的基督教文明的斗争。我对这一斗争的社会实质的看法是这样的。在20个世纪以前，在罗马帝国时期，人与人的关系是互相残杀的豺狼关系。以后，基督教来了，它提议："何以我们不把人类社会安排成使人对人不再是狼，而是朋友和兄弟呢？"基督教的全部社会意义也就在于此，这里我暂时完全不涉及它的极其重要的宗教方面。20个世纪以来，不论是好还是坏，这些思想毕竟已渗入人们的意识之中，成为一种需要对之追求的理想。而且，基督教所派生出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也源出于此。当然，这里指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但是，人的本性不善：这些思想的长期发

展，甚至到了20世纪仍然未能阻止先进的基督教民族互相残杀，造成数以百万计的伤亡。无论如何，我们整个历史悠久的文明竭力引导我们去实现这个理想，而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对它的直接否定。在这里，杀人、暴力、群众性的迫害已成为合法的事。人与人的关系重又成为豺狼的关系，而且作为建设这个新的社会，或者还可以说是建设具有狼一般嘴脸的社会主义的工具的共产党，它本身也是按照狼群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这里既沒有朋友，也沒有兄弟，有的只是“同志”。何谓“同志”？这就是同你并肩前进的人（狼与狼的关系也是同志关系），不过只能同你走到一定的时候；他可以连续20年同你并肩前进，与你共同战斗，同甘共苦。但是，一旦你违犯了狼群的法规，或者出于某种原因开始疏远狼群，那么他们就会向你迎面猛扑过来，并且一瞬间就把你咬死，因为你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兄弟，仅仅是一个“同志”，如此而已。难道这些丝毫不能使你忆起共产党历史上的类似情景吗？

何以共产主义如此坚决地拒绝接受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兄弟关系的思想呢？何以它硬是热衷于建立豺狼的王国呢？何以它正在取胜，并且有人追随于它呢？这些疑团开始搅扰我那缺乏经验的青春。或许，关于兄弟情谊的理想，从根本上完全是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许，伽俐略的大地上产生出来的光辉理想，也只不过是一种为历史所批判的幻想？

我知道，男子从来是粗鲁的动物和暴力主义者，世世代代以来不管他作为一个战士、猎人、野蛮的游牧人，甚至是农夫，他始终都是在为反对危险、敌人、野兽和邻居而斗争，一向都是一个杀手。基督教思想得到了妇女的直接响应。就其生理特征而论，孕育生命并使之继续生存下去的妇女，注定要响往爱情，关怀弱者；她的一生，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子女而自我牺牲的一生。

她们对于基督教的博爱和怜悯的思想颇有亲切之感。我深信，基督教反对罗马铁骑军团的斗争之所以获胜，应该归功于妇

女。也许，这种暴力，这个共产主义正在如此顺利建造的豺狼世界，可能更加适合于男性？

就拿托洛茨基这个具有坚定信仰的、真诚的人来讲吧。当共产党人企图要人们相信，他们之所以要推翻这个世界，似乎是为了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的时候，他们是在扯谎，这一点清楚到令人可笑的地步。他们一旦有了可能，就会毫不客气地以工人过去作梦也不会想到的社会主义剥削，取代他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剥削（似乎对工人的劳动报酬支付不足）。这里已不是报酬支付足不足的问题，而是千百万苦役犯人进行着无偿劳动的问题，是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灭绝的问题。但是，托洛茨基作为一个真诚的并对自己的思想信守不渝的人，他明明知道这一切纯系谎言，可是，他何以会同列宁一道成为恐怖主义的鼓舞者？他何以会主张建立一支具有铁的纪律的，只要拒绝干活就立即会被处决的“劳动大军”呢？

然而，托洛茨基并未丧失人的品德。他是一位关怀家庭，非常喜爱自己子女的人；而且子女们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忠于他并盲目地追随于他。我认识他的女儿济娜，她长得很像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瘦小，脆弱，身患结核病的年轻女子。象她的父亲一样，济娜是一个热情奔放，感情容易激动的人。父亲对于她就是一切。当然，后来她死在斯大林的监牢里。

托洛茨基还有一个特点始终使我感到惊奇——他那惊人的天真和对人的不了解。可以想象，他终生看到的仅仅是些抽象的事物，而看不到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人们。特别是，他虽然写了一本厚厚的关于斯大林的书，但是他对斯大林的为人毫无认识。

1930年，我在国外就托洛茨基被驱逐出苏联一事写道：我感到很惊讶，我竟认不出我的斯大林了，虽然我对他的为人是了如指掌的。如果他象对待伏龙芝那样来处置托洛茨基的话，那倒是更符合斯大林的性格的。斯大林手中有无数可以毒死托洛茨基的

手段。自然不会是直接的暗害，这会留下痕迹，而是使用病毒、微菌、放射性物质。然后再到红场举行盛大的葬礼，并发表演说。然而斯大林沒有这样做，而是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国。当时我的书是这样结束的："总之，令人不解的是，何以斯大林沒有沿用他惯用的伎俩。但是归根结底，完全可能的是，斯大林认为不在苏联国内，而是在国外杀害托洛茨基更为有利。"

这些话写于1930年。1940年托洛茨基写的最后一部书是关于斯大林的，但他的突然死去使他未能写完，他写了584页。由此可见，其中的第579页和580页，很可能他是在生前最后几天或最后几周内写成的。他在这两页书上写道："关于1929年2月我被驱逐到土耳其这件事，巴让诺夫写道……"接着他从我的书中引用了占半页篇幅的话。接着托洛茨基写道："1930年，当巴让诺夫的书问世时，我把它看作是简单的文学习作。在莫斯科接二连三地进行公审以后，我才更认真地看待它了。"然后他猜测说，在我于1926年已经离开了的斯大林秘书室里，我对这件事已有所风闻和了解。这就是说，早在1930年对我来说已经清楚的和毫无疑义的事，即在必要时斯大林会将他杀害，而且随着战争的爆发，对斯大林来说，这就具有了更大的急迫性。但是，托洛茨基只是在临死前不久才"开始认真看待"它，而且为此竟然还要设想，似乎在1926年巴让诺夫在斯大林秘书室对此已有所风闻。难道不能考虑一下，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吗？这是何等惊人的天真幼稚，是何等缺乏对人的了解呀！

第11章　政治局的委员们

季诺维也夫　加米涅夫　李科夫　布哈林
“平反”　加里宁　莫洛托夫

格·季诺维也夫连续3年是共产主义的第一号人物，在以后的10年中，他的地位逐渐下降，最后降到了鲁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里，并在那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接替列宁担任领袖职务以后，仍然沒有成为全党公认的眞正领袖。乍看起来，人们会认为，这种情况会使他失败。实际上，决定这种权力之争胜负的，既不是一个人的声誉高低，也不是人们对他的优势地位承认与否，而是其它一些因素。在这些因素当中，有的是极其重要、但迄今很少为人们所考虑的因素。下面就要谈到这一点。

季诺维也夫是一个聪明而有教养的人，是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在革命前，他经过了长期的列宁布尔什维克派的锤炼。作为一个十足的懦夫，他从来不甘愿去冒险搞地下活动，所以在革命前，他的全部活动几乎都是在国外进行的。1917年夏天，他也不热心于革命政变的冒险，而采取了反对列宁的立场。但是，革命以后列宁很快就原谅了他，并在1919年初让他主持共产国际。

从这以后，季诺维也夫明智地采取了作为列宁的学生和追随者的立场。这种立场是得体的，有利于他继承列宁的地位。但是，

不论在任何方面，在理论和重大政策上，或者在斗争的组织才干上，季诺维也夫都是不高明的。作为一个理论家，他毫无建树，譬如，在1925～1926年间，季诺维也夫提出一种理论说，时代的哲学就是追求平等的哲学。这个论断，既不符合共产主义目标，也不符合共产主义实践，因而全党的反应是淡漠的。在重大政治战略方面，他把一切都置于从属于权力之争的细小策略的地位；他对托洛茨基所提出的一切主张都嗤之以鼻，而在他被逐出权力中心之后，旋又全部接受了截然相反的托洛茨基的立场，以便同他结成反对斯大林的同盟。最后，在组织领导方面，他仅仅能够把第二首都——列宁格勒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但单靠这一点远不足于最后取胜。虽然他还控制着共产国际，但这在当时是比较次要的，因为谁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谁就能够随时指派任何人去领导共产国际，有一个时期，斯大林甚至把莫洛托夫安插在这个位置上。

1922年春，季诺维也夫之所以把斯大林提到党的总书记地位，是由于他当时持有这样一种看法：他自己在共产国际和政治局所占据的地位，显然要比党的机关首脑的地位更加重要。其实，这是一个失算，说明他对当时党内正在进行着的把大权集中控制在党的机关手中的过程缺乏认识。特别是对那些争权夺势的人来说，有一点应当是高度明确的：想要掌权，就必须在中央委员会里拥有自己的多数。而中央委员会是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因而，要选出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就必须在代表大会上取得多数。为此，需要掌握参加大会的各省、州和边疆区党组织代表团的多数。而这些代表团，与其说是选举产生的，毋宁说是由地方党的机关领导人——省委书记及其亲信挑选出来的。若能挑选和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省委书记和要害部门的领导，那么对党代表大会的多数就稳操胜券了。多年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有计划、有步骤进行的工作，正是这种培植亲信干部的工作。当然，这件

事并非在任何地方都进行得一帆风顺，譬如，拥有好几个省委的乌克兰党中央，它所走过的道路就是坎坷不平、复杂而艰难的。这需要进行阴谋策划，对领导干部重新任免和调动：时而把卡冈诺维奇安插到乌克兰中央出任第一书记，让他去整顿党的机关；时而要调动、提升或搞掉顽固执拗的乌克兰干部。但是，到了1925年，这种安插亲信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当季诺维也夫发现这一点时，已悔之晚矣：本来应该及早认清斯大林进行这项工作的含义。

在1924年的党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作为领导人，第2次，也是最后一次做了政治报告。可是，直到大会开幕的前几天，他自己还不晓得他应该报告些什么。他问我能否给他整理一份分析一年来政治局工作的材料。我照做了，整理出一份提交大会的详细材料。当时我根本沒有设想这会起到比材料更大的作用，因为很显然，这些材料本身毕竟起不到多大作用的。但是，后来使我感到十分吃惊的是，季诺维也夫居然抓住这些材料，把报告大致搞成这个样子："同志们，一年来我们进行了以下几项工作……"。

我为此感到惊讶。真正的领袖和领导人，应该善于对全国的现实情况进行高度概括，从中提出一些要害的和关键性的问题，革命的道路问题。但是，他未能做到这一点，而是作了一个肤浅的报告。由于偶然的机会由我提供的资料，竟然成为这个会计表报或报告的大纲。由此，我感到季诺维也夫的视野缺乏广度，思想沒有深度。

在党內，大家不喜欢季诺维也夫，其原因何在，很难说。他有自己的缺点，他追求物质享受，身边总有一批亲信侍候着；他是个懦夫、阴谋家，在政治上是个小人。不过，周围的其他人也并不比他好一些，而且许多人比他还坏得多。在党的上层流传着一些对他不利的说法，例如说："对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要警惕：在关键时刻，斯大林将叛变，季诺维也夫会开小差。"试问，这样

的说法对斯大林是否有利呢？

尽管如此，他具有与列宁和斯大林相同的特点：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当然，他在这一方面，还不是象斯大林那样权迷心窍，甚至达到整个身心全被吞噬的地步。虽然他不肯放弃物质享受，但是，权力欲之于他毕竟是他终生追求的最主要的方面。这一点，与不爱出头露面的加米涅夫形成鲜明的对照。

列·加米涅夫的不幸在于，他在一切方面都听命于季诺维也夫，季诺维也夫拖着他参予了全部政治阴谋活动。他本人并不是一个权欲熏心的人，而是心地善良的，"资产阶级"气味相当浓厚的人。确实，他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但不是懦夫；他敢于冒险从事革命的地下活动，并不止一次被逮捕过，革命才使他获释。就在这时候，他进入季诺维也夫的圈子，之后一直追随于他，特别是一起进行反对列宁的夺权计划；然后，他提议同其它政党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并宣布辞职。但是，不久之后，他继季诺维也夫之后又重新露面，成为莫斯科苏维埃的首领，以后，又成为对列宁颇有帮助的，主管全部经济事务的副手，在列宁卧病后，他事实上肩负起领导国家全部经济生活的重任。同时，由于季诺维也夫又把他拉进三巨头的小集团，从而使他在历时3年多的时间里在实际领导工作中代替了列宁：既主持政治局，又主持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

加米涅夫是一个聪明而有教养的人，具有卓越的国务活动家的才华，用现在的说法，称之为"技术官僚"。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话，他肯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位杰出的社会党的部长。

他娶了托洛茨基的妹妹奥莉加·达维多夫娜为妻。他的儿子柳吉克虽然还很年轻，但是已经沿着在党内被称为"资产阶级腐化的道路"走得很远了：聚众酗酒，滥用权势，与年轻女演员们鬼混。党内一些思想坚定的人，对他的行为感到愤慨。甚至有人写了一部《人民委员之子》的剧本，其中描写了柳吉克·加米涅

夫。这个话剧在莫斯科的一家剧院上演，从剧中一些情节人们不难猜出，剧中的主角是谁。中央宣传鼓动部打电话请示卡涅尔，卡涅尔又去请示斯大林对话剧如何处理，斯大林说："让它演下去。"加米涅夫在三巨头会议上提出禁止上演这出话剧的问题，认为显然是在败坏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名誉。季诺维也夫说，最好采取不予重视的态度，因为如果加以禁止的话，这就等于说加米涅夫亲自签字承认这出话剧确是影射他的。为此，季诺维也夫还提起过去的关于《诸位骗子先生》这部小说未被禁止的事件：在战前沙皇政权时期，革命作家阿姆费加特洛夫发表了一部尖锐攻击沙皇家族——罗曼诺夫一家的小说，尽管从剧中大量情节可以看出它的针对性，但是当时沙皇认为，如果禁止小说出版有失自己的尊严，因为这等于承认小说里指的正是他的家族。因而这部小说仍被允许自由发行。

"感谢你，亨利"——加米涅夫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作为回答。加米涅夫还说："而且，大家知道它的结局如何。"最后，决定不禁止这个剧本，但要施加必要的压力，把它从剧目中撤销。

在搞阴谋诡计、狡猾和奸诈方面，加米涅夫是很弱的。他是正式"坐镇莫斯科"的人物，首都被认为是属于他的世袭领地，正如列宁格勒之于季诺维也夫一样。但是，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搞起了自己的帮派，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各个要害部门，从而把第二首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可是，对加米涅夫来说，这一套手法是格格不入的，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帮派，只是按照惯性坐镇莫斯科。很快我们将会看到加米涅夫是怎样失去莫斯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其它东西的。

奥莉加·达维多夫娜负责领导对外文协——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它资助一些受到当局信任的苏联文学家们，诸如马雅柯夫斯基和爱伦堡之类的人出国揩油，同时邀请一些外国作家和其他一些革命的"文化界人士"，到苏联捞点油水，参观苏联那些专

为外宾准备的农村。对外文协的工作就象演戏一样。奥莉加·达维多夫娜出色地胜任了这一工作。

在政治局其他委员们当中，李科夫①和托姆斯基都不是领袖人物，而且他们本人也没有当领袖的欲望。革命前李科夫在俄国从事地下工作，也曾和列宁一起流亡国外。革命后，他出任内政部长，可是这项工作显然对他不适合，因为革命需要的是契卡、枪毙、“金钢石”式的铁腕人物。而李科夫却是一个为人和睦的、有才华的、精明强干的技术专家。后来，他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在列宁逝世后，他成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他的弱点是喜欢酗酒，为此人民把伏特加酒称为“李科夫酒”。这一点使他感到不快。有一次，他同一些苏联的达官贵人们一起喝酒，酒醉后他结结巴巴地说：“我真不……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把这玩艺儿叫做‘李……李科夫酒’？”李科夫没有特殊的天才，也没有突出的缺点。无疑，他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而这一点却毁了他自己：当斯大林策划搞残酷的集体化时，虽然李科夫为人处世谨慎克制，但仍表示不能同意这种摧毁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做法。因而，他走上了反对派的道路，而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这条路只能把人引向鲁比扬卡监狱的地下牢房。1938年，他在受尽了侮辱人格的丑剧的折磨之后，也沦落到那个地方，而对于斯大林说来，观看摧残他的牺牲品的丑剧却是一种欣赏。

米·托姆斯基是苏联工会的首领。从1919年起他进入中央委员会，从1921年起进入中央组织局，而进中央政治局是1922年的事。他属于处事谨慎的中央委员之列，他不参与权力之争，当胜负已经完全分晓的时候，就站到胜利者一边。他的弱点是听觉不

① 李科夫——十月革命后，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委员。1937年因被指控进行反党、反苏活动被开除出党，后被判刑。

婷，耳朵变聋，因此参加政治局会议时，每当讨论到他特别感兴趣的问题时，他就站在发言者身边，以便听到他的发言。他是一个平凡的人，正如同他所代表的机关在苏维埃制度下平淡无奇一样。尽管他后来及时地转到了斯大林一边，但是，他被斯大林认为碍手碍脚的时刻终将要到来的，因为他作为列宁时代的老资格政治局委员，自然对斯大林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一事实本身就使斯大林感到尴尬不快。虽然托姆斯基在表面上是顺从的，但在内心深处却不承认这位"伟大的和天才的"领袖有任何突出的品质。尽管托姆斯基竭力对反对派的大喊大叫保持距离，但是1936年斯大林仍然决定要把他搞掉。不过，托姆斯基不愿沿袭斯大林的其他牺牲品所走过的老路，因而，当人们去逮捕他的时候，他宁愿自杀而死。

尼·布哈林①，是中央政治局中最有才干的委员之一。他有一张萝卜形的脸。他富有朝气，聪明，诙谐，在党内很受拥戴。甚至列宁在"遗嘱"中还把他称为党的"宠儿"。他也是一个早期就有资历的布尔什维克，在国外时就同列宁有交往，但是他很明智，有意识地不使自己陷入阴谋诡计和低级的幕后斗争之中。他首先是，而且更多的是一位笔杆子、新闻记者、政论家。作为党的机关报《真理报》的总编辑，他把报纸办成一份经常为整个领导工作定调子的报纸。他虽然是老资格的中央委员，但直到1921年第10次党代表大会之后，才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当时他被选为政治局的第3名候补委员。在大会后的第2年，他晋升为第1名候补委员。而且，由于从那个时候起，列宁实际上离开了政治局，不能出席政治局的会议，所以，布哈林就以一个享有全权的委员资格参加政治局的工作。1924年列宁逝世后，他正式成为政治局

① 布哈林——十月革命后，任《真理报》总编辑，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37年因被认为是"反党"而被开除党籍。

委员。

在党内流传着一种对布哈林不正确的评语，说他是个经院哲学家和教条主义者。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也完全不是一个理论家。在实行共产主义的头两年，布哈林象所有其他领袖人物一样，深信是正在建设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因而，他作为一个优秀的通俗作品的著作家，曾写过一部阐述马克思主义糊涂事的著作《过渡时期的经济》，其后，又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了一本有名的通俗读物《共产主义入门》。全体党员，特别是新入党的青年党员，都根据这本书学习共产主义。实际上，这些书的内容，也是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其他领袖人物所讲过的东西。但是，当共产主义很快出现破产的迹象，列宁不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的转折的时候，其他一些领袖人物对这段历史处于比较超脱的地位，因为他们沒有写过这类著作，并且不得不表示不同意布哈林及其急于求成的共产主义社会，甚至悄悄地把这两本书收购回来，加以销毁。而布哈林则被戴上了沒有主见的理论家和教条主义者的帽子。实际上，他只不过是运气不佳而已。写作是他的职业，他只是把别人的思想和言论写成了文字的东西。人们做过的事，随时可以改变；而用白纸黑字写下的东西却不能任意改动，正如俗话所说的，“用笔写上的，斧子也砍不掉”。于是，反对派尖刻地挖苦说：“瞧瞧咱们的政治局多好呀：两个结巴（指莫洛托夫和李科夫，两个人都是结巴）一个一贯错误（布哈林），还有一个打手（当然，这是指斯大林同志）。”

然而，布哈林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在政治局会议上，他根本不讲任何马克思主义的蠢话，相反，他的发言有条有理，实事求是。他既能讲清道理，又很幽默，富于幻想。他所竭力巧妙地加以掩饰的东西，是埋在他心灵深处的对权力的追求，在这方面，他是列宁的门生，而他在列宁的学校里并沒有虚度年华。但是，在当前这个只有夺取了党的机关领导权才能决定一切的时期，对

布哈林来说，没有任何机会可言，只好甘心于扮演二流角色，参与党的上层阴谋活动。不管怎么样，第一次面临在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之间必须作出困难抉择时，他还是比较容易地过了这一关，站到了胜利者营垒之内。

红色教授学院是培养党的青年野心家的场所，他们在这里专心致志地钻研自己该把赌注押在那一匹马身上的问题，其中的多数人倾向于站在布哈林一边。布哈林善于以自己的才干哗众取宠。托洛茨基也是才华出众的，但是他已经遭到明显的失败。在人们心目中，不认为季诺维也夫是领袖；而对斯大林，大家毫不尊重，也不信任。在布哈林周围集聚了一批年轻有为的，相当有教养的，而且大都是有才干的党员。在布哈林接近于登上领导顶峰的那几年里，这批人当中许多人得到了提拔，被安插在需要有文化水平的干部的岗位上。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干部有：党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出版部部长、《真理报》的编辑，以及苏联史学和哲学界的领导权威，等等。这些人是斯腾，斯列普科夫兄弟、阿斯特洛夫、马列茨基、斯捷茨基、卡列夫、洛米纳泽、波斯别洛夫、米丁等。反对派轻藐地把他们统称为“捷兹基、列兹基之流”。几年来他们在新闻界都是定调的人物，但是，随着布哈林的垮台，他们也遭到残酷的清洗。1932年，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被开除出党，而在1937～1938年间被枪决。

在1925～1926年间的一场决定性斗争中，布哈林没有站在季诺维也夫一边，因而受到了奖赏，他取代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首脑的地位。对斯大林来说，这个任命是暂时的。斯大林感到不悦的是，一个俄罗斯族的政治局委员出任共产国际首脑，而共产国际形式上是全世界共产主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因而在形式上处在高于斯大林的地位。不久之后，布哈林被言听计从的莫洛托夫所取代，最后又由保加利亚人季米特洛夫接替。

这里需要指出，布哈林应该引以为荣的是，他不赞成斯大林

的绞肉机办法——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不择手段地蛮干，特别是毁灭农民。本来，他也可以象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之流那样，随着新主子笛子的调子跳舞。更何况，实质上他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并无好感，认为他们的政策与斯大林的一套如出一辙。

所以，当斯大林最终选择了取消新经济政策而采取摧毁农村的道路时，布哈林挺身而出，表示强烈反对。斯大林把他从权力中心撵出去，这样布哈林就转而成为反对派。然而，尽管斯大林的帮凶们千方百计地妄图给他扣上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但这种强加的结盟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实际上，布哈林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是格格不入的，当然，他同斯大林的政策更是势不两立。多年来，斯大林对布哈林的迫害还算是温和的，直到1937年2月才把他撵出中央委员会。但是，最后，恶运终于落到了布哈林头上。1938年3月，在斯大林导演了司空见惯的，卑鄙的审讯丑剧之后，布哈林终于也被投进鲁比扬卡监狱的地下牢房。

那些读过1976年版本的官方撰写的苏共党史的人们，不禁会感到迷惑不解和惊奇：既然斯大林的雕像早已被人们从高大的台座上推倒在地，斯大林格勒也早已改名为伏尔加格勒，那么，何以没有把斯大林强加给布哈林，以及许多其他著名共产党人的一切愚蠢的、荒谬绝伦的罪名统统加以推倒呢？更何况，对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已经“平反”，即公开承认斯大林的帮凶们对他们提出的罪名是虚构的。

何以只给一部分人“恢复名誉”，而对另一部分人则拒不这样做呢？要了解这一点，关键的原因何在？

既然党已经一劳永逸地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党是从来不犯错误的，是一贯正确的，那么，它就绝对不会从这个原则后退，而且党的全部官方历史也完全建筑在这条原则之上。让我们就以著名的，才华出众的党的活动家布哈林事件为例吧。我们假定，

在党史的各个重要转折关头，布哈林都提出了正确的、高瞻远瞩的告诫，而他的这些意见都遭到了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的"谴责"，换言之，一群在斯大林面前吓得胆战心惊的奴仆们，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举手通过了斯大林强加给他们的决议，而这些决议就是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正式决议。当时，即使斯大林任意地把一些截然相反的决议强加给他们的话，这一群俯首贴耳的人们，也同样会"热情高涨地"，以"经久不息的掌声"予以通过。也就是说，实质上，把这些决定说成是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党的领袖们和党史专家们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但是，在那些共产党赖以建立和存在的形形色色的、方面众多的谎言当中，这一点起着辅助性的作用，其任务就是，证实党是一贯正确的，永远不犯错误的这样一个原则。至于说这并不是党，而是一群胆小如鼠的被恐怖手段吓坏了的奴才们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举手通过的，是无关紧要的。为了遵守这个虚伪的原则，就需要说，这是党的绝对正确的决定。既然当时布哈林对此持有反对意见，那么就要把他"革出教门"，因而布哈林在党史上就永远成为敌人。请你去拜读一下党史吧，其中连篇累牍地向你解释说，布哈林是不正确的，是一贯错误的，一贯反党的，等等。当然，斯大林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些年代里，这一切都以极端荒谬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形形色色的二流的爱森斯坦们① 为了对斯大林阿谀奉承，拼凑出这样一些"历史性"的影片：在银幕上，天才的、英明的斯大林正在威严地沿着史册的篇章前进，而渺小的，微不足道的，卑鄙无耻的叛徒布哈林，却尾随在他的后面跑来跑去，并用叛徒的口吻低声对旁边某个人发牢骚说："只能依靠富农，否则我们将要毁灭……"，还说了其他一些类似的怪话。现在风气不同了，但是要想给布哈林"平反"，即承

① 苏联的电影导演。

认确实把党的大量卑鄙的谎言强加于他，这仍然是不可能的事。

由于同样的原因，要想给斯大林时代遭到党的决议谴责的任何一个著名的共产党人进行“平反”，都是不可能的。

相反，倒也有这样的情况，例如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和叶戈罗夫① 事件。不过，他们都是军事将领，是一些远离党的生活，而且在党内不起任何作用，对党的事务从未进行干预的人。斯大林认为把他们枪决是应该的。他们象托洛茨基一样被宣布为德国间谍、日本间谍或者还有其它什么国家的间谍。但是，历次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并未指责他们犯有任何一种倾向性错误。因此，后来，当承认斯大林同志在“个人崇拜”方面走得太远的时候，没有什么足以妨碍给图哈切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平反”。那是搞错了：是斯大林搞错的，或者是叶若夫搞错的，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搞错的，也就是说是某一个人或者某个机构的错误，而不是党的错误。换句话说，可以对案件重新审理，可以承认某个人犯过错误，如果能说成是小人物犯下的错误就更好些；但是这一切都丝毫无损于党是一贯正确的这个基本原则。

这就是为什么对一些没有积极参加公认的反对派的人可以平反，而对于其他一些象托洛茨基或季诺维也夫等人，则根本不能予以平反的原因所在。所以，不管是红军的缔造者，或是共产国际的第一任主席，都继续被算作是外国的间谍和共产主义的敌人。

一旦有朝一日这种情况发生变化，在某个美好的日子，在党内能够谈论他们，允许把关于他们的真象写出来，公诸于世，——到了那个时候，你将会有一切理由认为，这个党已经不是共产党了。

现在，我们再对列宁政治局的另外两个候补委员——加里宁

① 均为苏联著名的高级军事将领，早期的苏联元帅，后均被处死。

和莫洛托夫的情况稍稍加以介绍。

其实，关于米·加里宁[①]没有必要多谈，因为这个人物毫无特色，他是一个装璜门面的"全俄罗斯的元首"，列宁把他弄进政治局是多此一举。在这里，人们对他抱容忍的态度，但毫不予以重视。在官方仪式上，他担任柔情脉脉的农民角色。他从未提出要有自己的独立性的任何要求，他永远是驯服的追随掌权者。格伯乌为了掌握败坏他的名誉的材料以备不时之用，从莫斯科大剧院找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女芭蕾舞演员悄悄塞给他。这种做法肯定是经过卡涅尔同志批准的。加里宁由于缺乏经验，搞到三流的货色就心满意足了。其实，对他搞这种败坏名誉的勾当是多余的献殷勤，丝毫没有必要，因为加里宁是根本不会允许自己有任何反对掌权者的言行的。甚至到了后来，当斯大林推行广泛地毁灭农村政策的时候，熟悉农村情况的加里宁，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佯装似乎一切都平安无事的样子，最多也不过是象一个好心肠的老人那样唠叨一两句。对此，政治局早已习以为常，根本不加理睬。简言之，尊敬的加里宁是个无足轻重的、胆小如鼠的人物。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一帆风顺地度过了斯大林时代，最后平静地死在自己的床上，得到了把原来的柯尼斯堡市命名为加里宁格勒的奖赏。1937年，当斯大林下令逮捕他的夫人的时候，加里宁连眼皮都不敢眨一下，因为那个时代是艰难的。

关于维·莫洛托夫的情况，在前面我已不止一次谈过了。斯大林之所以能飞黄腾达，青云直上，甚至爬到了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在这段历史上，莫洛托夫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是，他自己从来未曾试图谋求充当第一提琴手的角色，虽然他曾经非常接近于这个角色。1921年3月，他当选为中央责任书记和政治局候

① 加里宁——十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市长、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全苏中央执委会主席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26年起任政治局委员。

补委员，在一年的时间内他一手掌握了整个党中央机关的权力。但是1922年 3 月，季诺维也夫策划设立了三巨头体制，意欲把斯大林安插到党的中央机关内，让他担任了总书记，从而置莫洛托夫于中央机关的第二位——中央第二书记。当时季诺维也夫的如意算盘是：当务之急是需要把托洛茨基搞掉，而斯大林是托洛茨基公开的劲敌，所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宁愿选择斯大林。莫洛托夫不仅服从于斯大林的领导，而且还成为斯大林的忠实副官，他从未试图从斯大林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至于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莫洛托夫以后将有机会任意地加以报复；同时，对由于某种原因不赏识莫洛托夫的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同样要寻机加以报复。这里要顺便交待一下：其实，并不是由于"某种原因"，而是因为托洛茨基生活在抽象思维之中，他把莫洛托夫说成是"党内官僚主义蜕化"的典型化身。

从此以后，莫洛托夫一直永远追随斯大林，他在为党的机关配备领导干部——边疆区党委和省委书记方面，以及为在中央委员会内建立斯大林的多数方面，承担起全部艰巨的工作。他担任中央第二书记达10年之久。当斯大林需要时，他就出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主席；一俟斯大林需要他，他又出任共产国际的首脑；一旦斯大林需要时，莫洛托夫就成为外交部长。

引人注目的是，斯大林对待莫洛托夫也采取了象对待许多其他副官相同的手法——逮捕了他的夫人，同时斯大林的这位亲信本人，却继续受到庇护和宠信。前此我们已经看到，斯大林对待加里宁和波斯克列贝舍夫的做法正是这样。莫洛托夫的妻子是犹太人，党内的假名叫珍珠。她是一位著名的党务活动家，担任香料和化妆品工业的领导。斯大林逮捕她之后，把她流放到边远的外地，殊不知，这种流放的残酷性与沙皇时代的流放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当然，莫洛托夫容忍了这一点。但是，这件事不足为奇，饶有趣味的倒是另一个情况：在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夫人从流放中

释放出来，可是她和莫洛托夫两个人却一如既往，都是坚定的斯大林分子。莫洛托夫不赞成赫鲁晓夫实行的非斯大林化。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都是信守不渝的、坚定的斯大林分子。他们窥测时机，一俟有机会，就企图推翻赫鲁晓夫，1957年的情况就是如此。然而他们没有得逞，为此付出了代价，丧失了他们在党内官场中的全部职位，最终落得个不中用的废物的下场。

何以莫洛托夫希望恢复斯大林的方法呢？是否由于对那独揽成吉思汗式权力的时代，对所有人都为之胆战心惊、任何人都敢怒不敢言的时代的恋恋不舍所致呢？或许，还有一种更现实的如意算盘：要使共产主义制度站住脚跟，就要求对全国人民施以暴力，要求有庞大的警察机关，恐怖体制。恐怖越是严厉，权力就越加牢固。在斯大林时代，人民甚至害怕自己头脑中会偶然浮现出某种异端思想，至于进行某种反对政权的行动，那更是根本谈不到了。后来，赫鲁晓夫松动了螺丝钉，人们开始思考问题，敢于讲话和表示不同意见。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这种危险的。

同时，莫洛托夫可能还是一个说明共产主义会使一个人变成什么模样的奇特的例证。我本人与莫洛托夫共事多年，我知道他是一位心地善良、为人诚挚的人。他虽然不很出色，但是一位具有非凡才干的官僚。他举止文雅，镇静沉着，有很强的自制力。他对我的态度极为和善，相当客气，在私人关系上对我也非常亲切。而且，他对所有接近他的人，一向都是彬彬有礼，平易近人；他为人从不粗暴，毫无盛气凌人之感，对人毫无凶残表现；他从来无意侮辱或者压服任何人。

10年之后，斯大林不仅自己批准被逮捕和枪毙的人员名单，为了实行某种连环保，这些名单也要经过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之手。当然，莫洛托夫是在斯大林之后签名的。但是，如果某个

名字引起他的特别注意，他便在旁边注上“BMH”的字样，意思是“量以极刑”。仅此一笔，就足以置人于死地了。

对这种行为应该怎样看呢？这是他在斯大林面前盲目的投其所好呢？还是一种醉心于自己的淫威的感情流露呢：瞧，我只要写上3个字母，一个人就完蛋了。而在这个沉着的、从容不迫的官僚所圈阅赞同的名单中，列有数以万计的死者的名字。他对此竟然毫无婉惜之感，相反，在斯大林死后竟然还妄想重新回到斯大林时代。

难道人果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吗？只要把他交给斯大林任意摆布，并在人对人如狼的制度下予以封官进爵，他就会对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悲惨遭遇中死去漠然视之，无动于衷。若是把他置于一个好的、富有人性的社会制度里，让他担任一个普通的官员，他就会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并为救济阿列克辛县涅洛伏卡村遭受灾荒的农民而进行募捐活动。这个疑团，在我飘泊于布尔什维克上层期间，曾经多次浮现在我面前。关于莫洛托夫个人，我自己还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在20年代，我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权力中心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见证人。经过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如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今的地球上仍然健在的人们当中，有谁曾经目睹过这一切并且深知内情呢？那么，对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这个人就是莫洛托夫。当然，还有一个卡冈诺维奇，但是同莫洛托夫相比，他在这些年代里，并未处于这些事件的中心地位。这里我仅仅是指20年代而言。从那以后，我未曾继续置身于布尔什维克权力中心，而莫洛托夫则相反，他在此后的30～40年当中，一直继续处在事件的中心地位。因而，如今，任何人都没有他更好地了解这些事件的发生和演变过程。但是，关于这一切，他既无法写成文字，更不能公开发表那怕是一页与官方的谎言不一致的东西。这就是说，他无法说出任何事情的真相，以公诸于世人面前。

第12章　斯大林的政变

第一次国外之行　财政人民委员部　财经局　康德拉吉耶夫　1925年　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之间的斗争　党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政变大会　政变的另一种含义

我除了在党中央工作之外，还兼任最高体育委员会和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在最高体委，与其说是工作，莫如说是一种娱乐。我参加体委主席团的会议，并负责领导两个部：夏天是田径运动部，而冬天——冬季运动部，包括滑冰和滑雪运动。主席团内工作顺利，关系融洽。体委主席谢马什科，还兼任卫生人民委员。他是一个聪明而有教养的人，同他一道工作并不困难。此外，他清楚地知道，工作中要执行中央的路线，而这条路线是由我制定的。与会者还有克雷连柯①，他曾任总司令，后来是极残忍的共和国检察长，现任司法部长。他是个象棋迷，所以我们让他担任象棋和跳棋部的头头。他来开会就是为了这个部的事。当讨论其它问题时他觉得闲无聊赖，我就拿出一张纸，写上：1·

① 十月革命后任陆海军事务委员，后任最高总司令。1918年后在司法部门工作。

e2-e4，然后把这张纸递给他，于是我们两人不用棋盘就下起象棋来。但是，走上七、八步之后，他不看棋盘就不能再走下去了，于是从皮包里掏出微型棋盘来继续走下去。谢马什科用责备的目光盯着我们两人，但是比赛一旦开始，想要让克雷连柯中途停住，这几乎是办不到的。当他的棋败局已定时，他觉得非常沮丧。

冬季运动部的工作使我有机会首次出国。当时，苏联自制的冰鞋和雪橇质量糟透了，所以决定到挪威去采购一批外国的冰鞋和雪橇。体委要我到挪威去出一次短差，就地看看材料并选购一些。1924年12月我进行了一次短暂的，印象深刻的旅行。我是初次出国，亲眼看到正常的人的生活情况，这里的生活与苏联完全不同。此外，在我所访问和路过的三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瑞典和挪威，都有一种在实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的苏俄所没有的气氛。这是具有惊人的诚挚和真实感的国家。我无法立刻适应这种气氛。在挪威，我想参观一下首都的郊区，因为奥斯陆郊区有座高山叫霍里明克伦山，这里是冬季运动和游览的地方。我和使馆派来为我做向导的一个工作人员一起登上这座山，觉得这里气候相当温暖，只有零下2度。本来我们穿得很暖，由于爬山很快就觉得身上更暖，而且热了起来。那个使馆工作人员把自己的针织上衣脱下，放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并在一张纸上写了点什么，然后把这张纸放在衣服上用石头压住。我好奇地问他："你在做什么？"

我的同路人说："太热了，我把上衣放在这里，下山时再来取。"

我说："你那件上衣算完了，你快向它告别吧。"

使馆人员说："不，我已经留下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上衣不是丢失的，请勿动'的话。"

我看着这种情况就如同看魔术一般。这条登山路上非常热

闹，来往游人很多，当我们过了两个小时下山来时，那件上衣依然放在原地。

这位使馆人员向我解释说："这里从来是路不拾遗的，如果城里发生了盗窃，最后总会搞清，那肯定是外国海员干的事。"在芬兰，农村里家家户户门不上锁也不插闩。总之，这里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在瑞典期间，我在大使馆曾同参赞阿斯穆斯及其夫人科罗廖娃谈过话，他们是不久前带着7岁的儿子从俄国来到此地的。有一个星期天，使馆附近有些工人为了反对什么正在举行示威，参加示威的人衣着整洁，都是身穿西装，头戴礼帽；示威队伍也很整齐，走得很慢，也很平静。那个7岁的小儿子在窗口看了很久，最后问他的妈妈说："妈妈，这些资本家要到哪儿去？"

在返国途中，我在距列宁格勒30公里的别洛岛入境。列车员提醒大家说："公民们，你们现在已进入苏维埃俄国，请你们注意关照好自己的行李。"当我欣赏着窗外的景色时，我一只手戴着手套，另一只手套放在座位上。过了一分钟我一看，发现那只手套已经不翼而飞了。

我重新回到习以为常的苏维埃制度下的生活当中。财政人民委员部有一项经常性的巨额开支——采购新灯泡。人民需要的灯泡市面上奇缺，于是，部里有些干部把公家的灯泡摘下带回家去。部长索科里尼可夫想出一个聪明办法：指示灯泡工厂，在所有出厂的灯泡上面都印上"偷于财政部"的字样。结果，盗窃立即停止了。否则，把灯泡偷回家去的人就要自投罗网了。

在我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返回祖国时，心里充满着一种奇怪的印象，就好象我把自己的头伸出窗外，呼吸到一股新鲜空气一样。

与最高体委的情况不同，我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对我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在革命前，财政部里设有由一批优秀的财政专家，多数是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索科里尼可夫，在部里新设立了一个财经局，它的职责与过去的学术委员会相同。这个局，分设两个所——经济研究所和行情研究所。索科里尼可夫邀请了一些优秀的专家，其中多数人是革命前财政部的老顾问。他们当中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索科里尼可夫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对他们所提出的意见也予以高度重视。由于听取了他们的忠告，出色地进行了困难复杂的货币改革，建立了硬金币卢布。财政情况趋向正常。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米·布龙斯基负责主持这个局工作。可是，当我问索科里尼可夫，布龙斯基是否确实是位教授时，索科里尼可夫微笑着回答我说："每个人都可以自认为是教授，因为没有证明说他不是。"布龙斯基的真姓是华沙斯基。他是一个波兰犹太人，很有教养，知识渊博，是一个老侨民，并且曾经与列宁在一起。他也当过记者。他的布尔什维主义精神极少，也毫无行政领导才能。他的主要任务和他感兴趣的唯一事情，是编辑一本厚厚的月刊《社会主义经济》。按照布龙斯基的设想，这份杂志应该办成全苏俄最好的一种经济学刊物。看来情况正是如此。此外，布龙斯基还负责编辑一份日报《财政报》。实际上财经局无人领导，并未因此而遭受任何损失。索科里尼可夫建议由我来领导，除了其它原因之外，他特别考虑到我在政治局工作，因而熟悉全部经济问题。同时，他希望我能使财经局的工作更密切地同当前的经济工作实践结合起来：确实，教授们由于脱离实际决策机关，一般更擅长于从事抽象的理论工作，而不是实践。

其实，当我来到这个岗位的时候，已是一个反共分子了。实质上，这里的所有教授也都是反共分子，他们以为既然我是受当局信任的党员，自然就该对我表示敌视态度。最有趣的是，他们有一种幻想，以为可以与共产主义政权共事，从而为国家作些有

篇的工作。不过，在这一点上，我掌握的情况要比他们多得多。

无论如何，任命一个年纪轻轻的共产党员担任他们的领导，这在他们看来，对他们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是一种威胁。为此，经济研究所所长施麦列夫代表他们通知索科里尼可夫说，教授们想要离开财政人民委员部，因为他们觉得，不能在新任命的领导人造成的气氛下进行工作；同时，论年龄和资历，这个青年党员对他们来说也毫无威信。索科里尼可夫微笑地说："这件事让我们一个月以后再谈吧，你们对新领导的看法完全错了。"

此后，在头两个星期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些曾经在沙皇时代财政部里担任顾问的资深博学、经验丰富的教授们——根泽里、索科洛夫、施麦列夫等人，在研究所的会议上惊奇地发现，我不仅熟悉各种财经问题，而且我比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优越之处：由于我在政治局的工作性质，我知道哪些东西是现实的，哪些是符合政府政策的，应该如何和按照什么方针去安排工作。在行情研究所的会议上，我也提出了必须把研究所的工作引上正常轨道的问题；而且在那些他们自己认为是权威专家的一些专业问题上，实际上我也不比他们逊色，譬如，在第一次会议上我就提议，在预测市场变动的行情指数中，需要增加一项畜力车辆运输路线货运指数，结果，这一点很快就成为预测食品市场变动情况的最重要指数之一。同时，我很快就同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党支部和青年党员们吹毛求疵地找他们的茬，用党的警惕性的眼光看待这些"行为可疑的专家"。我制止了党支部的做法，并禁止他们去干扰教授们的工作。由于我是来自党中央机关的干部，所以我在他们面前还有权威性。

这样，经过两个星期之后，施麦列夫又去找索科里尼可夫说，教授们决定把他们提出的关于新领导问题的声明全部收回，因为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

工作进行得一直非常出色，我同布龙斯基的关系也很融洽。

他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在他身上几乎毫无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他的住宅是维·斯维尔德洛夫夫妇住的一所大房子中的一部分，我经常到他们那里去。

行情研究所所长尼·康德拉吉耶夫教授，在我的新部下当中几乎是一个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他是一位著名的大学者，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他创建了行情研究所，行情事业对于俄国说来还是一个新开辟的领域；他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对经济发展动向的监督工作，对国家的经济领导机关，首先是财政人民委员部帮了大忙。自然，他工作的动机中仍有那种天真的幻想，即可以同布尔什维克政权合作，他们并不完全是笨蛋，他们应该会认识到，有学识的人和专家还是需要的，有用的。象财政人民委员部其他一些著名行情专家一样，他也相信自己干的工作是有益的，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豺狼本质认识不够。他同时还兼任国家计委农业局的工作。

很快他就进一步认识到，他与之打交道的政权是怎么回事了。在国家计委，他提出希望执行合理的农业政策。他所以提出这样的忠告，是因为考虑到国家必须增加农产品的生产，为此需要让农民在平静的气氛下劳动，而不是无休止地唆使农村的懒汉和寄生虫们去反对劳动农民，干扰他们的工作，可是这恰恰是农村进行的布尔什维克的"阶级斗争"的实质。

但是，国家计委的党支部表现出很高的警惕性，他们揪住专家们不放。由于那里没有一个能够以自己的声望镇住这个党支部的巴让诺夫，所以，那些党员们就大喊大叫起来，叫嚷什么康德拉吉耶夫主张放弃布尔什维克在农村进行的斗争，说什么"康德拉吉耶夫分子"要求依靠富农，因此，"康德拉吉耶夫主义"就是今天农村的反革命。他们兴风作浪，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宣告向"康德拉吉耶夫主义"开火。有一群共产党的小小野心家，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自己的警惕性去进行投机，一心想要挖出一个

隐蔽的阶级敌人来，把他打倒，从而自己捞到个一官半职。但是，可怜的康德拉吉耶夫面对人们在报刊上对他的陷害诬蔑之词，无法为自己辩护，那怕是在报上答复两句话！因为《真理报》不承认他有这种发言权。为此，他感到非常苦恼。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党支部也对他揪住不放，因为《真理报》已经发出了进攻的信号。

我不能容忍他们在财政人委部搞政治陷害，我向党支部解释说，现在的问题仅仅涉及到农业和发生这一事件的国家计委农业局。而康德拉吉耶夫在我们财政人民委员部从事的完全是另一个领域的工作——行情研究工作，这与他对农村的政策问题是两码事，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他在这里的工作是无可指责的，是有益的。因此，这里任何人都不应该打扰他。我在财政人委部期间，那里的人们确实没有敢于对他下手，但是陷害他的言论已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开来，而且斯大林的集体化开始后，这种集体化破坏了农业经济，缺粮和饥荒的时刻终于到来。这时，按照共产党的做法，就要把敌人揭发出来，并把一切过错都转嫁到他们身上。

1930年，格伯乌“揭露”出一个秘密的“劳动农民党”，这完全是契卡一手捏造的假案。他们宣布说，这个党的领导人是康德拉吉耶夫教授，和他一起的还有齐阿亚诺夫教授和尤洛夫斯基。尤洛夫斯基是个犹太人，经济学家，是货币和货币流通问题专家，他根本与任何农民和农村从来都毫无关系。

格伯乌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硬说这个“劳动农民党”拥有10万党员，有的甚至说拥有20万之多。因此，正在策划搞一场大肆渲染的公开审讯，借此向全国人民宣告：国家之所以没有粮食吃——这完全是康德拉吉耶夫分子们进行破坏活动的恶果。在这个审讯中，要迫使康德拉吉耶夫本人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但是，到开庭前的最后时刻，斯大林断定，这套做法看来不能令人信服，因而决定取消公开审讯，并命令格伯乌以“秘密方式”对

"劳动农民党"领导人和党员加以宣判，这就是说，要按照契卡的某个三人小组的宣判书，把他们弄走，让他们死在苏维埃的杀人监狱——集中营里。结果，这位大科学家和杰出的人物康德拉吉耶夫教授，就这样含冤而死。当然，他之所以死去，首先是成为那种认为可以和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合作，从而为国家做些好事的幻想的牺牲品。其实，这完全是一种糊涂观念。只要当局认为有利，它就可以对抱有幻想的人加以利用；而一旦需要时，就把那种毫无意义的，荒谬的，破坏性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责任，转嫁到别人头上，并把他们作为替罪羊残暴地加以杀害。

1925年是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进行权力之争的一年。一度重新恢复活动，以便完成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的三巨头体制，到了3月份最后宣告崩溃瓦解了。4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猛烈抨击斯大林的"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此后，三巨头不再单独开会了，而政治局会议的议程则由斯大林一人确定。在几个月时间里，政治局作为集体领导机构表面上似乎是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主持下工作的。这种表面现象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出于无知，往往很少参加对各种问题的讨论；加米涅夫仍一如既往地领导着全国的经济，而经济问题在政治局工作中一般要占用许多时间。托洛茨基佯装出规规矩矩地参加日常工作的样子。整个政治局为一种最糟糕的和平的气氛所笼罩。

斯大林由于对多数中央委员是否追随于他没有很大把握，便决定不在中央全会上摊牌决战，而等待时机，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再作出最后决定；同时，他悄悄地暗中进行准备工作，对党代表大会的日期，他不仅不愿意提前，而且相反，他极力拖延。在一般情况下，在夏季里政治上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到了秋天，托洛茨基发表了《走向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小册子，从而又恢复了反对中央委员会中多数派的政治斗争。这个多

数派当时已经开始分化。季诺维也夫为了维护自己作为政治领袖的地位，立即发表了《列宁主义》的小册子，予以回敬。其中阐述了他的平等哲学。10月伊始，政治局会议上就讨论决定关于代表大会的会期问题，以及由谁向大会作中央政治报告问题。最后，代表大会决定于12月中旬召开；同时，根据莫洛托夫的提议，政治局多数赞成委托斯大林向大会作中央政治报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政治局里的多数地位已经丧失，于是，他们立即在政治局提出，要求举行辩论。随后召开的中央全会的情况表明，斯大林事先进行的全部准备工作已经奏效：全会批准了委托斯大林向大会作中央政治报告的决定，并拒绝接受关于展开辩论的建议，而季诺维也夫认为，辩论对他自己是一次重要的机会。此外，全会还佯作似乎现在非常重视"党在农村贫农中的工作"的样子；同时，为了及早着手准备掀起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集团的运动，全会谴责了右的"富农"倾向，和左的"反对中农"的倾向。在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党的领导机关开始加强对"新反对派"的攻击。当然，象往常那样，代表大会之前，中央应当另行公布向大会的报告提纲，并就此展开讨论。由于斯大林害怕进行政治辩论，他和莫洛托夫完全取消了这场讨论，而代之以对十月全会的决议进行简单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大会选举。12月15日，在大会召开之前举行了中央全会，全会批准了向大会的报告提纲。12月18日大会开幕。但是，12月在党组织内和党的代表会议上都展开了辩论。12月初首先在边疆区和省的党代表会议上进行的大会代表的选举，就预先决定了大会代表的组成和季诺维也夫的失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未能控制全部地方党的机关，这一点只有坐镇党中央的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才能够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三个主要的党组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两个首都的党组织，以及全国省组织中最重要的乌克兰党组织的支持。被委派前去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的卡冈诺

维奇，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致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失去了乌克兰党组织。与此相反，季诺维也夫把列宁格勒党组织仍然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虽然斯大林得以撤销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扎鲁茨基的职务，因为他过早地激烈反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及他们的多数派，指责他们象"热月政变者一样蜕化变质"；但是，作为季诺维也夫左右手的中央西北局书记叶夫多吉莫夫，仍然领导列宁格勒党组织追随季诺维也夫。

但是，莫斯科这个最重要的党组织最后倒向斯大林一边，这次倒戈，完全出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料，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导致这一转变的基本原因，是斯大林狡猾地事先阴谋策划了乌格拉诺夫的叛变。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1923年年底，当右翼反动派突然崛起的时候，政治局对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捷连斯基①很不满意。1924年夏，三巨头协商采取一致行动，把他调离莫斯科，调到中央中亚局担任第一书记。因为三巨头一致认为，对莫斯科来说他太弱，很不得力。可是，派谁去坐镇莫斯科这个最重要的党组织呢？加米涅夫，象往常一样，对这些组织调动问题，宁愿把主动权让给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很想把卡冈诺维奇安插到莫斯科党组织里；而当时作为党的第一号人物拍板定案的季诺维也夫，也很想让他自己的亲信出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所以，他建议由乌格拉诺夫担任这一职务。在我总是作为第四个人出席的三巨头会议上，曾经议过此事。

1922年，乌格拉诺夫在列宁格勒工作时是季诺维也夫的部下，也是他的一个心腹。当提及需要任命一位下新城省委书记问题时，季诺维也夫坚持派乌格拉诺夫前往担任这一职务。当时还

① 捷连斯基——从1918年起就在莫斯科市担任领导工作，1920～1924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

是在三巨头体制的初期，斯大林还不能一味固执，坚持己见，不得不同意这项任命。但从此以后，莫洛托夫就开始做拉拢乌格拉诺夫的工作。1924年夏，有一次我到斯大林办公室去，发现他不在那里，我想他一定是在旁边的会议室里。于是我走进位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人办公室之间的会议室。我一开门，看到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乌格拉诺夫 3 人在那里。乌格拉诺夫一看到我，脸色顿时发白，表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于是，斯大林安慰他说："这是巴让诺夫同志，政治局的秘书，不要害怕，对他无需保密，他对一切事情都了解。"这样，乌格拉诺夫才平静下来。

我当即意识到这其中的奥妙所在。在前一天召开的三巨头会议上，季诺维也夫提名由乌格拉诺夫担任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斯大林对此反对，他表示怀疑：乌格拉诺夫是否如此坚强有力，以致可以让他去领导首都这个最主要的党组织呢？季诺维也夫坚持自己的建议，斯大林佯称反对，而且装模作样地表示，虽然他同意了，但他这样作是违心的，相当勉强的。其实，事先莫洛托夫已经对乌格拉诺夫做了工作，所以，实际上在斯大林和乌格拉诺夫之间已经达成了反对季诺维也夫的密约。

为了执行这个密约，乌格拉诺夫在几乎一年半的时间里玩弄两面手法，一方面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忠贞不渝；另一方面，在1925年下半年又表白自己仇恨斯大林。实际上，他已经培植和任用了一批亲信干部，并于1925年12月 5 日，在代表大会前，莫斯科党组织召开的代表会议上，突然携带全部行囊，率领莫斯科全体党的上层领导干部，投奔到斯大林一边。这一行动给季诺维也夫以最后的打击，并决定了季诺维也夫的失败。

12月底以前结束的第14次党代表大会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会上，斯大林宣读了中央政治报告，这是一个枯躁乏味、黯然失色的报告。列宁格勒代表团提出，要季诺维也夫做一个副报告，后来季诺维也夫作了。但是，即使作了这个副报告，也丝毫没有

能使情况发生变化。整个大会顺从地投了斯大林的票，而投票支持季诺维也夫的，只有一个列宁格勒代表团。原定由加米涅夫做的《关于当前经济建设的迫切问题》的报告，被从议程上撤销。发言支持反对派的人，除季诺维也夫之外，还有加米涅夫、索科里尼可夫、叶福多吉莫夫、拉舍维奇等。其中的叶福多吉莫夫在1936年被枪决，拉舍维奇于1928年自杀。

但是，甚至在列宁格勒代表团中，也有许多人匆忙“更换路标”，转而追随胜利者的凯旋车转动了。这批人中包括：列宁格勒市委书记什维尔尼克，中央西北局副书记莫斯克文，列宁格勒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卡马洛夫。

在党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沉默不语，幸灾乐祸地袖手旁观他的主要敌人季诺维也夫陷入伏乞的境况。4个月之后，即1926年4月，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当选为中央委员。当然，代表大会以后，在1926年1月召开的第1次中央全会上还是作出了种种“组织结论”：加米涅夫被撤销苏联经济的领导职务，也撤销了他的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从政治局委员降至候补委员。李科夫被任命为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政治局的组成扩大了：莫洛托夫和加里宁从候补委员晋升为委员；伏罗希洛夫直接升为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仍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中，除了加米涅夫和原来就是候补委员的捷尔仁斯基外，还有鲁祖塔克、乌格拉诺夫（作为对他在这场战役中所作贡献的奖赏）和彼特洛夫斯基（乌克兰苏维埃政权的形式上的首脑）。斯大林再次当选为总书记，莫洛托夫任第二书记，乌格拉诺夫是第三书记，斯·柯秀尔任第四书记。斯大林把阿塞拜疆中央书记基洛夫安插到列宁格勒。

1926年是逐渐吃掉“新反对派”的一年。全世界都了解，共产主义俄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领导发生更迭。但是很少有人看到和认识到，这是发生了一次真正的政变，新的集团和阶层掌握了

俄国和共产主义的领导权。对此，需要加以说明。

在革命前的俄国，犹太人的权利受到限制，他们当中多数人倾向于反对派，因而犹太青年为各个革命政党和组织提供了大量干部。所以，在这些政党的领导层中，犹太人总是担任重要角色。在这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也不例外，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里犹太人约占半数。

革命以后的情况发展相当之快，政权机关的主要职位都集中在党中央的这批犹太人手中。背井离乡的犹太人，世世代代形成了团结友爱和相互支持的传统，而俄国人的中央委员们却没有这种习惯。结果，政权机关的所有重要关键职位均为犹太人占据：托洛茨基担任红军的首领和第二号政治领袖，他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在形式上是苏维埃政权的首脑，直到去世前一直是列宁的左右手和主要副手；季诺维也夫担任共产国际的首脑，实际上还是第二首都——彼得堡的万能的总督；加米涅夫——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第一副手，苏联经济上的实际领导人，此外，还是第一首都莫斯科的总督。这样，犹太人在中央委员会里大约占半数，他们在党中央委员会和政权机关的影响要大大超过非犹太人。

这种情况从1917年持续到1925年。1925年年底，在第14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不仅把党内犹太领导人从中央权力中心排挤出去，而且在把党的上层领导中的犹太人完全逐出中央权力中心方面也采取了重大步骤。但是，被排挤出主要领导地位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党代表大会上仍然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在1927年的代表大会上，他们被开除出党，当选中委的犹太人已是个别例外了。从此以后，上层犹太人再也未能重返领导地位，而且个别人留在中央委员会已成为屈指可数的例外了。他们就是那个卡冈诺维奇和那个麦赫利斯，他们公开扬言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在此后的30年里，斯大林有时把某些最顺从、最

能忠实执行其旨意的犹太人（如亚哥达）提拔为中央候补委员，但是后来，即使这些被提拔的人也被枪毙了。结果，最近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犹太人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而随着麦赫利斯之死（1953年）和卡冈诺维奇之被撵出中央，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没有犹太人。目前，在400个中委和候补中委当中，好象只有1个候补中委迪姆希茨[1]是个犹太人。

从本质上说，斯大林是实行了一次政变，把过去占主导地位的犹太帮永远逐出领导班子。

但是，这一切进行得很谨慎，以便不使人们产生这种打击完全是针对犹太人的印象。第一，在这里看不出有俄罗斯民族反动派的迹象，因为权力是转移到一个格鲁吉亚人手里；第二，人们一直故意强调说，这是一场同反对派的斗争，而且问题仅仅涉及思想上的分歧：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之所以被撤职，是由于他们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

这种假象不仅被很好地维护着，而且以后也为两方面的特点所证实：一方面，斯大林在把犹太人逐出中央委员会以后，并没有继续彻底进行自上而下的大清洗，甚至中止进行清洗，而且在那些年代里犹太人仍然占据着一些不大重要的职位——副部长、部务委员会成员、中监委委员等；另一方面，从30年代中期开始，在对党的领导干部进行广泛的枪杀的时候，在大量被害者中，既有犹太人，又有非犹太人。

在对这一切进行观察的时候，人们可能会认为，作为一般的权力之争，斯大林整肃的是竞争的对手，至于他们同时又是犹太人，那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原因有二：

---

① 迪姆希茨——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第一，因为斯大林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当需要对此加以隐瞒时，斯大林就竭力加以掩饰，只是偶而才突破这一界限。例如，我在前面已谈过的法依维洛维奇事件。1931～1932年间，斯大林之所以要对这一点加以掩饰，是有他的重要的政治考虑的：当时在德国，希特勒这个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已经上台掌权，斯大林由于预见到同他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便不愿引起犹太世界对他的仇恨。

采取这种手法在战前和战后都是很有益处的。只是在1948～1950年间，继续这样做的必要性不存在了，所以，斯大林才为党制订了几乎是公开的反犹太主义的路线，1952～1953年间又制订了一项在俄国完全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仅仅是由于他突然逝世，俄国的犹太人才得以免遭毁灭之灾。此外，斯大林的反犹太主义也得到了斯维特兰娜的证实。这里我们只要回忆一下这样一个事实就够了：他曾经把一个追求他女儿的犹太人发配去服苦役；而当他得悉他的女儿已嫁给另一个犹太人时，对她的态度又是何等的冷酷无情。至于犹太人的"白衣阴谋"事件①，更是尽人皆知的。

第二，因为在观察斯大林如何准备在第14次代表大会上实行的政变时，我处于特殊的地位：我能够看到，斯大林隐蔽进行的勾当是沿着特别的，非常独特的路线进行的。

应该说，自1917年以来，党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仍在继续不断变化中。如果说，在1917年犹太人在党内还是相当一大批人，那么这批人反映了犹太人自己的社会成分：他们是手工业者，商人，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当中几乎没有工人，而农民则根本没有。从1917年开始，党员的人数大量增加，首先是由于广

① 指斯大林逝世前发生的医生事件，一批医学专家和保健医生被指控妄图谋害苏联领导人。

泛吸收了工人入党，其次是农民。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是往后，党内的犹太人越是被淹没在这个人海之中。可是，犹太人继续占据着领导地位，造成一种他们是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印象，党内对这一点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于是，斯大林巧妙地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当犹太帮分化为互相厮杀的托洛茨基派和季诺维也夫派时，斯大林得到了一种迷彩的伪装：他把一些被占据领导地位的犹太帮所"排挤"的不满分子安插到党的机关的岗位上，但在表面上是以提拔公开的反托派分子的形式进行的，而其中反犹太主义者并不多。我仔细观察过，在这些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究竟选中哪些人担任省委和边疆区党委书记，因为这些人都是未来的中央委员，也可能是明天的政治局委员。所有这些人都迫切要求抛弃领导上层的犹太人，取而代之。很快就拟订出必要的提法：斯大林的领导中心给各级党的机关下达了指令——真正的党员干部只能来自工人和农民，党应当实行工人化。一个人的社会出身对入党和提升日益起着重大作用。很显然，那些出身于知识分子、商人和小工业者的犹太人的领袖，已被看作是某种同路人。在对"托洛茨基集团"进行迫害的过程中，已经培养和训练了一批干部。1925年年底，为了打击第二个犹太人上层集团——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已经培养出一批需要的干部。

所有在进行这种打击迫害方面为斯大林效劳的著名的党的机关干部，都满意地占据了空缺出来的职位。

政变进行得很成功，直到1947～1948年，这种迷彩伪装仍在继续，只是在最后几年才开始摊牌。初期是谨慎从事的，先是进行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然后进行了反对"世界主义者"的运动，最后实行在护照上注明民族"犹太人"的办法，以便彻底地置犹太人于特殊的内部敌人的地位。

很有意思的是，直到大战以前，犹太社会对斯大林的反犹太路线是缺乏认识的。粗暴的反犹太主义者希特勒是公然杀气腾

腾，而小心翼翼的反犹太主义者斯大林却把一切都隐蔽起来。直至“白衣阴谋”之前，犹太人的社会舆论还简直不相信：共产主义政权居然会是反犹太主义的，而且把这个“阴谋”完全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又经过了不少年之后，最后人们终于认识到斯大林继承人的政策的这种含义。这些继承人认为沒有任何理由去改变斯大林的路线。

拉狄克编了不少苏联的和反苏的笑话。我曾经有幸亲自听他讲过笑话，即得到了所谓第一手材料。拉狄克的笑话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下面引述两个典型的拉狄克关于犹太人参与领导上层问题的笑话：

第一个笑话：有两个犹太人在莫斯科看报纸，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阿布拉姆·奥西波维奇，有一个布留哈诺夫被任命为财政人民委员，他的眞实姓名是什么？”

阿·奥西波维奇答道：“这正是他的眞实姓名——布留哈诺夫。”

前者惊叹地说：“什么？眞正的姓是布留哈诺夫？那么他是俄罗斯人吗？”

“是的，他是俄罗斯人。”

第一个人又说：“哎，你听着，这些俄罗斯人，是令人惊奇的民族：到处他们都是有空子就钻。”

当斯大林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撵出政治局时，拉狄克在同我会面时问道：“巴让诺夫同志，斯大林和摩西的差别何在？你不知道。差别很大：摩西把犹太人带出了埃及，而斯大林则把他们撵出了政治局。”

尽管这是离奇的现象，但确实如此：现在，除了老的反犹太主义形式——宗教的和种族的形式之外，又增加了一种新的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反犹太主义。可以预言，它有着远大的前途。

第13章　格伯乌[1]　权力的实质

格伯乌　捷尔任斯基　格伯乌的局务委员会　亚哥达　万达·兹韦德莉　安娜·胡塔廖娃　我应该做些什么？　权力的演变　权力的实质

格伯乌……在俄国人的心目中这个词的含义是多么深广呀……

当我1919年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我的故乡是由布尔什维克掌权。4月里，在复活节那天，当地共产党的报上出现了《耶稣复活了》的大字标题。报社的编辑是共产党员索宁，他的真姓是克雷梅尔曼，是当地的犹太人。他很年轻，心地善良。这种表现出宗教的宽容甚至是善意精神的范例，我非常欣赏，我认为这是共产党人的一份资产。而当几个月之后，契卡分子进了城，并开始枪杀时，我大为愤慨，因而对我来说，共产党员分为两类：一

① 格伯乌系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俄文缩写“ГПУ”的音译，其前身是契卡（ЧК），即肃反委员会。1922年2月6日改组为格伯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又改组为国家统一政治局。1934年并入苏联内务部，成为该部所属国家保安总局。现为“КГБ”——国家安全委员会。

类是心怀善意的，有高度"思想性"的党员，他们的期望是建成一个富有人性的社会；另一类是具有凶狠、仇恨和残忍特征的刽子手和暴徒。当然，问题不在于人，而在于制度。

此后，我在乌克兰期间，曾经了解到许多关于契卡分子残酷的血腥恐怖行为的事实。当我来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对这个机关怀有很深的敌对之感，不过，直到我到组织局和政治局工作以前，实际上并没有同它打过交道。在这里，我首先见到的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拉齐斯和彼特尔斯，他们同时兼任格伯乌的局务委员会委员。大名鼎鼎的拉齐斯和彼特尔斯，就是内战时在乌克兰和其它地区丧尽天良地进行大规模残酷屠杀的人，当时的死难者多达10余万人。我本来设想他们是疯狂的，阴险的，杀气腾腾的刽子手，但是，使我吃惊的是，这两个拉脱维亚人原来是最平庸的败类，是善于阿谀奉承的卑鄙之徒，是按上级的旨意和眼色行事的人。我曾耽心，同这些杀手会面时，我会无法忍受他们的狂热，可是会见时我没有发现有任何狂热行为，他们是那种官迷心窍、谋取私利的人，是灵敏地按照斯大林秘书室指挥棒行事的刑警队官员。我对这个机关的敌对感已经变成为对其领导成员的厌恶之感。

但是，格伯乌主席捷尔任斯基的情况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是一位波兰的革命家，从契卡建立之初直到他死为止，在形式上，他一直是契卡的首领。然而在列宁逝世后他接替李可夫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席，李可夫担任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捷尔任斯基实际上很少参与契卡的工作了。在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我看到他时，他以自己的外表和谈吐的风度使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外表很象唐·吉诃德，言谈的风度表明他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思想性很高的人。他身着一件破旧的，袖子打了补丁的军便服，这使我惊讶。很显然，他并不是一个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谋取个人物质生活、享受的人。他的发言充

满热情，开始时这一点也使我颇感钦佩。他使人产生一种他是全心全意地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的印象。他的这种热情洋溢的表现，同一些政治局委员们的那种冷若冰霜和厚颜无耻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不过，后来我对捷尔任斯基的看法有所改变。

在这一时期，党内还有自由，这是国内生活中所没有的。每个党员有权维护和坚持自己的观点。政治局在讨论各种问题的时候同样也是自由的；至于象托洛茨基和皮达可夫这样的反对派的头面人物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毫不留情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同多数派的观点形成尖锐对立；即使在多数派内部，对任何原则问题和事务性问题的讨论，也都是在一片争论声中进行的。推行货币改革的索科里尼可夫，对政治局就国民经济问题通过的各种决议持反对态度，他说："你们是在破坏我进行的货币改革。如果你们硬要通过这个决议，那就请撤销我的财政人民委员职务。"在讨论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问题时，前外贸人民委员克拉辛，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了当地指责政治局及其委员们说，他们对所讨论的问题一窍不通，并慷慨陈词，在会上给他们上了一课。

但是，很快我就注意到，捷尔任斯基总是追随掌权者，所以，他所积极热情坚持的意见，都是为多数已经接受的东西。同时，这种积极热情的表现，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们看来，是一种装腔作势的表演，因而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每当他慷慨激昂地发言时，政治局委员们都是不以为然地东张西望、看文件，会议为窘促的气氛所笼罩。有一次，会议主席加米涅夫冷冰冰地说："费立克斯①，你在这里参加的并不是群众大会，而是政治局会议。"顿时，出现了奇迹！捷尔任斯基不但没有为自己的激情进行辩解，譬如可以说"我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感情是全心全意的"等；相反，刹那之间，他马上改变了热情奔放的声调，而采用了最平常的、平

① 捷尔任斯基的名字。

心静气的语气。在三巨头会议上，当谈及捷尔任斯基时，季诺维也夫说："当然，他患有心绞痛的病，不过，他过份做作了，滥用自己的病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这里应该补充的是：当斯大林实行了政变以后，捷尔任斯基又以同样的热情为斯大林的立场进行辩护，正如同过去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处于掌权者的地位时，他积极地支持他们的立场一样。

我对捷尔任斯基总的印象是这样的：他从来没有丝毫偏离过多数派通过的路线，尽管有时候是可以保留个人意见的，他采取这种做法是有利的；而当他积极卖力地、上气不接下气地为这条正统路线进行辩护时，这是否正如季诺维也夫所说的，他是在利用自身的心绞痛，意在产生影响别人印象的效果呢？

这种印象对我来说是相当不愉快的。1923年，当我还是个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认为，身为格伯乌首脑的人，较之其他任何人都更需要享有为人真诚和正派的声誉。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在追求物质享受方面他是无懈可击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他是非常廉洁正派的人。也许，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政治局才仍然保留了他作为格伯乌首脑的职位，以便不使他的格伯乌下属为所欲为，因为，对于掌握苏维埃制度下的非党人民生杀大权的格伯乌说来，来自各方面的引诱比比皆是。不过，我并不认为捷尔任斯基真正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因为他身在这个庞大机构之外，对它的实际活动情况很不了解。所以，在这方面，政治局感到满意的，与其说是真实情况，莫如说是虚假的愿望。

捷尔任斯基的第一副手明仁斯基① 也是一个波兰人。他身患一种奇怪的脊髓病，成为一个靠躺在沙发上度日的唯美主义者。

---

① 明仁斯基——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驻柏林总领事，1919年起在契卡工作，1923至1926年任格伯乌副局长，1926年起任局长。

所以实际上也很少能领导格伯乌的工作。这样一来，格伯乌的第二副局长亚哥达就成了这个机关实际上的领导人。

我从三巨头会议上的坦率谈话中，很快了解到党领导人的意图是：由于格伯乌以其实际进行的恐怖活动，把全国人民控制在它的手中，因而，一般地说，它能够窃取过份大的权力。三巨头故意让不大了解格伯乌实际情况的捷尔任斯基和明仁斯基担任格伯乌形式上的领导人，而把格伯乌的全部工作交由亚哥达掌管，因为亚哥达是一个名气不大、在党内沒有什么份量的人，因而他是意识到自己必须绝对服从于党的领导机关的人。必须把整个格伯乌时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使之对于权力沒有任何野心。

党的领导人的这个意图，顺利地得到了实现，格伯乌从未越过党的领导机关的雷池一步。领导人所关切的只是格伯乌同党的关系，至于它对非党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则完全漠不关心。而且，实际上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置于备受格伯乌任意摆布的地位。领袖们关心的是权力，他们忙于党内权力之争；在党外，他们委派格伯乌作为对付人民的掩护队，使之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禁止人民有任何政治生活的机构。自然，通过它足以消除任何对党的权力的威胁，那怕是最微小的威胁。这样，党的领导就可以平安无事地睡大觉。至于人民越来越严紧地被束缚在共产主义专制制度赋之以无边权限的庞大的政治警察机关的桎梏之中，领导们是毫不关心的。

我第一次看到亚哥达并听到他的发言，是在中央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当时我担任委员会会议秘书。那次，亚哥达是被中央召来与会的人员之一。当委员会成员还沒到齐，早到的人正在闲聊的时候，亚哥达在与当时的宣传鼓动部部长布勒诺夫谈话。他大肆夸耀格伯乌遍布全国的情报网所取得的成就，布勒诺夫回答说：

“这个情报网的主要基础是全体共产党员，一般地说他们永

远应该是格伯乌的情报员；至于非党人士，那么你们格伯乌自然要从中挑选最靠近和最忠于苏维埃政权的人。”

亚哥达表示反对说：“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们有办法使任何人成为密工人员，特别是那些非常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

布勃诺夫好奇地问道：“那你们采用什么办法呢？”

亚哥达解释说：“办法嘛，很简单。试问，谁愿意活活地饿死呢？如果格伯乌想要让一个人成为情报员，那么，不论他如何反抗，最终他必将落到我们手中：一旦我们使他被开除出工作单位之后，不经过我们机关私下的允许，任何地方和单位都不会接受他去就业任职。特别是如果这个人有自己的家庭，妻子和儿女，他就不得不立即屈膝投降。”

亚哥达给我留下了令人厌恶的印象。老契卡分子克谢诺冯托夫，过去是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会务委员会成员，后来是党中央总务部部长，他负责执行卡涅尔下达的一切见不得人的指示。还有拉齐斯和彼特尔斯。再加上格伯乌局务委员会秘书长，厚颜无耻的，举止放肆的格·别连基[①]等人。这个群魔谱使得格伯乌这幅罪恶的图画更加充实，——格伯乌的局委会是在捷尔任斯基的名义掩护下专干黑暗勾当的一个坏蛋集团。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位朋友，鲍道里亚铁路机务站站长的助手，到莫斯科来看望我。这是个出色的，最正派的人，他娶了我的姑母为妻。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他对我一直以“你”相称，尽管我的官级很高，可是我仍然对他以“您”相称。当时有件事使他很苦恼，所以来找我征询意见和请求帮助。当地的格伯乌机构要他当密工人员，也就是说，要他作密探，对自己的同事进行告密。他们原来以为这个人是垂手可得的俘获物，因为他有家庭包袱，本人又很温顺。但是，他却拒绝当格伯乌的密工

---

① 别连基——1927年被划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因而曾几次被开除出党。

人员，于是，地方契卡分子向他摊牌，威胁说："我们会使你被开除公职，你就去对铁路叹息地说一声'完蛋了'，以后任何单位都不会要你的，等到你们全家人都饿到患浮肿病的时候，你还得同意干。"

他来找我，问我该怎么办？他的运气很好，恰好找到我这个高级干部做为他的保护人。我拿出一张印好的党中央公函用纸，写了一封便函给铁路的契卡分子，要他们不要再找我的亲戚的麻烦。结果，这张用党中央公文纸写的便函果真起了作用，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去动他。这件事说明，亚哥达系统的情报网是怎样布满全国各地的。

过了一些时候，在最高体委理事会的会议上，我同亚哥达直接发生了冲突。由于我是最高理事会中党中央的代表，所以，正如前面我已经写过的那样，我毫不费劲地执行着与格伯乌的意见相背的路线。结果，亚哥达吃了败仗，觉得受了侮辱。此外，由于我对格伯乌局务委员会有一定的看法，因而，我也没有掩饰自己对这号人的极不友好的态度。这一点在格伯乌局务委员会内部引起了混乱：格伯乌局委会认为，与斯大林的助理，同时又是政治局的秘书这样的人为敌，那对它是极端不利的事。于是，他们研究了对策，最后他们决定：要把这种双方互相敌对的情况正式公开出来，从而使别人对我可能对他们进行的任何打击预先便有所怀疑，从而对他们更为有利些。当然，他们的耽心是有理由的：鉴于我是三巨头会议和政治局会议的秘书，能够经常接触到各位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因而认为我对他们可能成为一个很危险的人物。此外，他们还决定利用斯大林的高度疑心狂做文章。于是，亚哥达以格伯乌局务委员会的名义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格伯乌局务委员会认为有义务提请斯大林和政治局注意，他们一致认为，政治局秘书巴让诺夫是暗藏的反革命。但是他们感到遗憾的是，自己还提不出任何证据来，而更多的是根

据契卡分子的嗅觉和经验作出的判断。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认为有义务把他们的判断报告党中央。这封信是由亚哥达本人署名的。

斯大林把这封信递给我，并且说："你看看吧。"我看了这封信。当时我年仅23岁。自恃善于洞察他人内心活动的专家的斯大林，仔细地看着我的表情。在他看来，如果这其中确有真实的成份的话，一个青年人会感到局促不安，并且要立即开始为自己辩解。而我呢，恰恰相反，我微微一笑，把信还给了斯大林，什么话也没有说。斯大林问道："你自己对这件事有何想法？"

我用带有轻度责备的语气回答说："斯大林同志，对于亚哥达的为人，您毕竟是了解的，这是一个坏蛋。"

斯大林说："可是，他究竟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信呢？"

"我想，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企图挑起人们对我产生某种怀疑；其二，我和他个人在最高体委理事会会议上曾经发生过冲突，在那里，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执行中央的路线，力争取消了他的一些有害主张。他不但企图用这种手段对我进行报复，而且由于他感到我对他毫不尊重，也无任何好感，所以他就想恶人先告状，预先防备我可能在您面前或者政治局委员们面前说他的坏话。"

斯大林认为，我作出的这种解释很有道理。此外，我对斯大林的为人是了解的，我丝毫不怀疑，这种事态发展对他是称心如意的：使政治局的秘书与格伯乌的局务委员会两者之间公开对立，这样可以一举两得：无疑，格伯乌将密切监视政治局秘书的一言一行，一旦发现可疑的情况，格伯乌会立即向斯大林报告；另一方面，一旦政治局秘书了解到格伯乌局务委员会的工作有何可疑之处，也绝不会放过任何向他报告的机会。

我同格伯乌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亚哥达不时地向斯大林报告说，他们坚持对我的看法；而斯大林则不以为然地把

这些小报告转告给我。

但是，我还应该说明，当我看到亚哥达的第一封告密信的时候，我感到很满意。

问题在于，公开的敌视态度反而使我在一个方面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格伯乌手中掌握有一切手段可以制造不幸事件——汽车车祸案，冒充强盗策划为抢劫目的而进行的谋杀案，如此等等。而在把格伯乌的公开敌对行动讲明之后，所有这些手段也就失灵了：如果现在他们胆敢针对我制造一场不幸的车祸事件的话，亚哥达就必须以自己的脑袋作为代价。

在这封信之前不久，我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件。在党中央机关里，为中央工作人员设立了外语学习班，我参加过英语和法语班。在英语班里，我结识了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出色的拉脱维亚姑娘万达·兹韦德莉。当时我根本没有对象，于是我和万达互相爱慕起来，但是我们两人都把这种关系当作是有趣的冒险行动。万达已经嫁给一个高级契卡分子，他们夫妇住在鲁比扬卡的格伯乌大楼里，楼内设有契卡高级领导干部的住宅。万达经常到我的住处来。有一次，她邀请我到她的鲁比扬卡的住宅去。我好奇地想去看看大楼里契卡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所以，晚上下班后我就到她家里去了。万达对我解释说，她的丈夫出差在外，建议我在她家里过夜。当时我感到这件事很可疑：如果她的丈夫“突然”出差回来，并发现我同他的妻子同床的话，他就会用手枪对我射击，然后，这一切将被当作一般争风吃醋的悲剧事件加以处理，她的丈夫可以为自己的行动表白，说他不了解我是何许人，当我想到这些时，我就借口还要加班搞些紧急文件而予以拒绝了。但是，应该说，我所耽心和怀疑的并不是万达本人，而是格伯乌，因为他们可以不择手段地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

但是，如今，在亚哥达写了那封告密信之后，发生不幸事件，或者由于争风吃醋而搞杀人案件的可能性就可以排除了。从此以

后，在我工作的整个期间，我同格伯乌的关系一直是敌对的，而且所有的人对这个情况多少都是了解的。斯大林对这些已习以为常，所以他对象安娜·胡塔廖娃所发生的那类事件根本不以为然。

我在高等技术学校学习时有一个朋友，非党大学生帕什卡·季马柯夫。他完全不问政治，而且对政治毫无兴趣。他的母亲安娜·胡塔廖娃在前夫逝世后，改嫁给一个很富有的人——伊·胡塔廖夫。他是莫斯科近郊萨拉鲍瓦亚奥霍塔的一家大型细呢绒工厂的所有人。内战期间，胡塔廖夫由于惧怕布尔什维克而逃往南方，从那里又流亡国外，1924年定居在维也纳附近的巴德纳。他的妻子带着4个小孩子留在俄国，由于她是"资本家的婆娘"，过着非常贫困而艰难的生活。

帕·季马柯夫告诉我说，他妈妈很想见我一面，我就去了。原来情况是这样的：安娜·胡塔廖娃由于过份幼稚，请了一位熟悉的医生为她出具证明说，她最好能到维也纳附近的巴纳德休养区去治病，因为那里的水对她的身体健康极有益处。她带着这一证明去找苏维埃的行政局，要求发给她出国治病的护照。一位苏维埃官员看了她的申请后说：

——你申请办护照，是要同你的4个孩子一起出国吗？

——是这样。

——这位公民，你这个人究竟是疯子呢，还是假装神经不正常？

——这怎么会呢？我是想出去治病的。

——好吧，1个月之后再来吧。

签发护照的事，是由格伯乌负责的，申请书都必须送到那里审查。当然，到了那里，他们立即就查出：这个女资本家竟敢明目张胆地提出申请，她想要叛逃到流亡国外的白匪军和资本家那里去！一个月后，当她再次到苏维埃行政局去时，人们让她进到一个办公室里，那里有三个契卡分子开始对她进行别有用意的审

问。从审问的情况立刻可以看出，他们对于她丈夫的情况了如指掌，甚至知道他住在巴德纳。契卡分子们问道：

——你想干什么，想要愚弄我们吗？

这个可怜的女人灵机一动，想出一个挽救自己的办法，她说：

——你们知道，我不是党员，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是，假如找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为我担保的话，是否可以呢？

契卡分子用嘲笑的口吻问道：

——你说的那位著名的党员是谁？

——他是斯大林同志的秘书。

——你说什么？你这是耍什么花样？这位公民，你是神经失常了吧？

——是的，我向你们保证，他能够为我担保。

于是，契卡分子们彼此使了个眼色，说：

——那好吧，把你的担保书拿到这儿来，到时候我们再说吧。

安娜·胡塔廖娃对我叙述了发生的这一切。我简直是听得着了迷，我想，这个人竟然幼稚到如此地步，这样的人我还从未见到过。我说：

——你的意思是说，你想要我为你担保：在治疗一个月后，你还会携带孩子们返回苏联。是这样吗？

——是的。

——可是，你之所以要到丈夫那里去，目的是带着孩子们留在那里，而不再返回苏联，是这样吗？

——是这样。

——真是妙极了。

安娜·胡塔廖娃又说：

——你是知道的，我带着孩子留在这里过是毫无希望的，迟

早要完蛋的。而到丈夫那里去，对我才是一条生路。

我说：

——那好吧，把你的证件拿出来，我在上面签字。

安娜·胡塔廖娃说：

——我将会一辈子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

此后，事情进行得一帆风顺。人们立即把我出具担保书的事向亚哥达作了汇报。我可以想象到，当时亚哥达是如何幸灾乐祸地拍手称快的。因而，他迅速签发了出国护照。就这样，这位安娜·胡塔廖娃带着所有的孩子出国到奥地利去了。不言而喻，一个月之后，当苏联驻奥地利领事馆提醒她说，她的护照签证已经到期，她应该回国的时候，她回答说，她宣布退出苏联国籍，并决定侨居国外。

亚哥达期望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所以，事后，他立即给斯大林写了一份详细报告，说明巴让诺夫是怎样帮助这个女资本家叛逃外国的。斯大林把亚哥达的告密信交给我，问我说：

——这又是怎么回事？

——斯大林同志，我是想借此检查一下亚哥达愚蠢到何等地步：既然这个女资本家确实想叛逃，而且亚哥达本人又知道这一点，那么，他为何要给她签发出国护照，放她叛逃呢？反之，如果认为放她出国没有任何坏处的话，那他又指责我什么呢？亚哥达一心想要为我制造被动不愉快的局面，为此目的他是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他不懂得，这样一来，他把自己置于何等愚蠢的境地。

这个事件就以此而告终，斯大林对这件事丝毫未加理睬。

我很快了解到，格伯乌对非党的人民群众拥有何等巨大的权力，它对待人民群众可以为所欲为。同样清楚的一点是，何以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任何个人自由：一切都被国有化了，所有的人为了活下去和吃饱肚子，就必须为国家效劳。只要有一点自由的思想，有一点要求个人自由的愿望，这个人立即就会遭受失去

工作，因而也丧失生活的威胁。周围到处是密工人员的庞大情报网，他们对所有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格伯乌控制着一切。与此同时，在窃取这一权力，并开始建立一个庞大的古拉格帝国的时候，格伯乌又想方设法少向党的高层领导报告它的所作所为。他们的集中营——巨大的杀人系统——正在不断发展扩大；可是他们却向党报告说，这是一种使反革命成为五年计划建设项目所需要的不付报酬的劳力的巧妙办法。至于所谓"进行再锻炼"，——把集中营说成是"劳动改造营"，而其中的真实情况如何呢？没有任何特别的东西。党内流传着一则关于耐普曼[①]的荒谬可笑的犹太笑话，这些耐普曼们说："宁愿要麻雀之山，也不要夜莺的寺院"。我的印象是，党的上层领导只满足于格伯乌这个掩护物干得还不错，至于格伯乌私下干了些什么勾当，他们根本不愿意了解。他们只要在官方《真理报》上看到关于格伯乌这把革命的钢剑正在时刻机警地保卫着革命成果的胡言乱语，就感到满意了。

有时候，我曾经试图告诉政治局委员们说，人民已被置于格伯乌完全的，不受监督的权力控制之下。可是对这种说法，任何人都不感兴趣。很快我就确信，幸运的是，我的这种说法依然被认为是我对格伯乌的敌视关系所致，因此他们并不把反对的矛头指向我，否则，我早已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人们会说我有"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对敌人缺乏真正布尔什维克的警惕性"(而还有谁不是敌人?)，等等。经过长期不断的训练，共产党员的脑子被坚定地指向一个特定的方面。布尔什维克，并不是那种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并且接受了他的主张的人，实际上这些人确能刻苦学会这种单调的、毫无希望的谰言；而是那些在无休止地猎取和迫害各种名目的敌人当中训练有素的人。所以，格伯乌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扩大，对全党来说已成为正常的事。不间断地掐住别人的喉咙，

① 即"НЭПМАН"，意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本主义分子。

共产主义的实质也就在于此。在格伯乌能出色地胜任这一任务的情况下，怎么可以对它吹毛求疵地挑剔呢？我终于懂得了，问题并不在于契卡人员是败类，而在于这种人吃人的制度要求并允许这群败类去执行这种职责。

我多次说过，亚哥达是一个罪犯和恶棍，他在创建全俄罗斯的古拉格岛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如此的明确和众所周知，以致人们一致认为，对这种人没有任何好话可言。不过，在他的一生中，唯有一件事是使我十分欣赏的，这件事对他是有利的。

事情发生在1938年1月，斯大林审讯亚哥达"法庭"的丑剧终于开场了。在"法庭"上履行检察长职责的，是披着人的外衣的维辛斯基①。

维辛斯基说："卖国贼和叛徒亚哥达，你说，当你在进行这一切卑鄙的叛卖活动的时候，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过哪怕是微小的遗憾之感，哪怕是微小的一点后悔之感吗？今天，当你终于在无产阶级的法庭面前，要对你的全部卑鄙的罪行承担责任的时候，难道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丝毫不感到遗憾吗？"

亚哥达："是的，我感到遗憾，感到非常遗憾……"

维辛斯基："请注意，审判官同志们。卖国贼和叛徒亚哥达说他感到遗憾了。那么，间谍和罪犯亚哥达，你回答，你所遗憾的是什么呢？"

亚哥达："我感到很遗憾，……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当我能够这样做的时候，我没有把所有你们这些人统统枪毙掉。"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别人姑且不说，而亚哥达，这个亲手策划过一系列这样的审讯的人，对于"法庭"审讯的结果是不会

---

① 维辛斯基——193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检察长，1935年起任苏联检察长。1939—1953年历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联外交部副部长，部长等。

抱有任何幻想，哪怕是最微小的幻想的。

我个人的处境是离奇的：格伯乌对我怀恨在心，而具有疑心狂的斯大林对格伯乌的告密却丝毫不予理睬，权力中心的全部机密都掌握在我的手中。而我则在认眞地研究一个问题：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推翻这个政权？

不过，我不抱任何幻想。不管这个奴隶制度会走多么远，人民群众要推翻这个政权是无能为力的；而用街垒和长矛进行巷战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当局不仅拥有坦克，而且拥有庞大的、威力空前的警察机关；此外，当权者将要不择手段地去维护这个政权——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这可不是那个不愿让臣民流血的路易十六。对于当权者们来说，人民的鲜血流成河也是在所不惜的。

政变只能从上面，即从中央发生。但是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要这样的话，那些想要消除共产主义的人们，必需隐瞞自己反共分子的身份，并且要在中央委员会内取得多数地位。我曾经看到布尔什维克上层领导的全体成员，但是沒有看到倾向于这样做的人。

那么，我自己又怎么样呢？历史性的机会，为我这个共产主义的敌人提供了解它的全部机密的可能性，甚至使我能够出席所有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我本来可以自己制造出具有相当威力的炸弹（我有时还到高等技术学校的量子分析和定量分析化验室工作，那里有硝酸和甘油），然后把它放在公文包里带进会场去，而任何人都不会对政治局秘书的公文包里装有什么东西感到好奇。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会立即选出另一个政治局，另一个中央委员会来，而且与原来的相比，它们既不会更好，也不会更坏些。一个制度用炸弹是炸不掉的。对于当权的上层的各种派别，我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托洛茨基派也好，斯大林派也好，同样都是推行共产主义的。

最后，想要在党的上层领导中挑选和组织起自己的派别，这

也是毫无希望的事，因为其中总会有人，第 5 个人或者第10个人去向斯大林告密。除此之外，我也丧失了进行隐蔽活动的可能：格伯乌暗中密切地监视着我的一言一行，以期找茬来反对我。

究竟我能够做些什么呢？只有一点：继续隐瞒我的观点，继续按照布尔什维克的阶梯往上爬，以期有朝一日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到了那个时候，就可以使一切来个大翻个儿。以后的事态发展表明，这不完全是一种假设，因为马林科夫继我之后当上了政治局秘书，他还是做到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他完成了计划的第一部分——正常地进入斯大林接班人的行列，到斯大林逝世的时候，他已经成为全国的第二号人物——党中央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相反，他不愧为斯大林的学生和斯大林主义者，他对我的这一计划的第二部分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即占据斯大林的地位，让一切都来个大翻个儿。

这种可能性我也排除了。我了解斯大林，也看到他在向何处去。他还在伸展的势头上，但是我已看到，他是一个品德不正、残酷无情的亚洲式的总督。不管他还将对国家犯下多少罪行，我都需要全部参与其事，我相信，这一点我是做不到的。要想在斯大林身边干下去，要想同斯大林一起共事下去，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布尔什维克品质提高到最高的水平：不讲道德，不要友谊，没有人的感情，总之，要使自己成为一只狼。而且，为此还需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我不愿意这样做。试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个国度里应该怎么办呢？使自己成为这部机器上的螺丝钉，并且去帮助这部机器转动起来？这样做我也不愿意。

这样一来，剩下的唯一出路是到国外去，或许，在那里我将会得到进行反对这个狼一般嘴脸的社会主义斗争的可能性。但是，要实现这一点也不那么简单。

首先需要离开政治局，离开斯大林秘书室和中央委员会。我坚决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提出调离的请求，而斯大林拒绝了我

的请求。我自己懂得，问题根本不在于我是不可代替的人，对斯大林来说，不可代替的人或者是非常需要的人是不存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知道他的全部秘密。所以，如果我离开的话，就要让另一个新手接触这些秘密，正是这一点使他感到不愉快。

作为达到离开目的的一种策略，我要寻求托夫斯图哈的帮助，而且他对我要求离开的愿望非常高兴，他巴不得要一手掌握斯大林的整个秘书室；但是，只要我担任政治局的秘书，那么全部最重要的职能就都掌握在我手里，包括整个机构，以及政治局的办公厅等，都由我一人控制。托夫斯图哈感到，我的离开对他完全是称心如意的事。尽管他没有担任政治局会议秘书的才能，但是，一旦我离开，他就会把政治局办公厅抓到自己手中，把政治局秘书的工作重新加以相应的调整，以使他自己变成整个机构的主人。后来的情况就是这样发展的，当我夏季去度假时，由组织局的秘书季莫欣来代替我的工作。为了填补组织局秘书的空缺，当时在组织局干部调配处工作的马林科夫的妻子列·戈鲁布佐娃，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利用同莫洛托夫的第二秘书盖·吉霍米尔诺夫的熟识关系(我在本书开始时曾经谈到这一点)，把她的丈夫提升为组织局的临时秘书。托夫斯图哈研究了马林科夫的情况以后，决定调他到政治局工作，于是马林科夫被任命为政治局的记录秘书——只是担任会议秘书工作，同时另外调一个速记员协助他。不过，他的职权范围是有限的，而且他和整个机构都归属于托夫斯图哈的领导。至于政治局决议执行情况的监督工作，由于与我个人的关系甚大，就停止进行了。暂时，马林科夫还不能够得到接触斯大林机密的机会，而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一直未能接触这种机密。这种安排对斯大林来说是相当合适的，因此，这种改革根本没有引起斯大林的反对。

马林科夫有幸被调到政治局工作以后，由于经常与政治局委员们接触，时刻都在斯大林面前，所以他逐步地、稳妥牢靠地为

自己的官运创造了条件，而且他还是一个忠实可靠的，百分之百的斯大林分子。1934年，马林科夫成为斯大林的助理，1939年晋升为中央书记，1947年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49年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在斯大林逝世以前的几年里，他是斯大林的第一副手，既是中央第一书记，又兼任部长会议主席，也就是说，他在形式上成为全国的第 2 号人物和斯大林的接班人。不过，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接班没能搞成，政治局没有接受他作为接班人，所以他只是继续留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3 年之后，在1957年，他在企图抛弃赫鲁晓夫的时候，自己丧失了权力，被调到某个地方担任发电站的站长。

当我离开政治局的时候，我仍然在斯大林秘书室的编制之内，但是，我尽量少做工作，并摆出似乎我的主要工作是在财政人民委员部的样子。直到1925年底，我继续担任中央的一系列委员会、主要是一些常设委员会的秘书工作。很长时间里没有解除我担任的这些工作，因为担任这些委员会的秘书，需要对它们过去工作的全部内容非常熟悉。只是到了1926年初，我可以说，我完全离开了中央。斯大林对我的离开是漠不关心的。

饶有趣味的是，任何人也不能确切地知道：我是否仍然属于斯大林秘书室的人？我究竟是调离了还是没有调离？如果是离开了，那么是否还会回来？其他的人也有类似的情况，例如，托夫斯图哈好象是到列宁学院去了，可是过一阵子，他又回到了斯大林秘书室，甚至他的地位比过去更加稳固。但是，我对自己是非常明确的：我的离开是彻底的，不仅如此，我还打算离开这个国家。

现在，我是以一个思想上的流亡者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的。我要总结一下。

在布尔什维克上层领导中，我结识了许多人，他们当中有些是天才人物和才华出众的人，还有不少是为人老实、正派的人。当我提到后一种人的时候，怀有一种惊讶不已的心情。我毫不怀

疑，这些人未来的命运将不会是令人羡慕的，从本质上看，他们对于这个制度是不适应的。说句真心话，我也应该估计到，所有其他人的命运也不会更好一些。他们也象我一样，都是被错误地卷进这部庞大的机器之中，之后成为这部机器的螺钉。但是我已经是大开眼界，看清了他们几乎都还没有看清楚的东西：这种主义付诸实施，其进一步逻辑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

我是怎样看待和理解目前权力和权力机关的演变过程及其发展途径的呢？

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权力的机制问题。我所指的是真正的权力机制，而不是出于策略考虑，被冒充当作权力的东西。列宁派的职业革命家实行了政变，他们夺得了权力，肩负起治理国家的责任，实行了国有化，占有了一切。他们需要有庞大的、为数众多的管理机关，自然，也需要有大量党的干部。党的大门是敞开的，强有力的共产主义宣传很容易争取和吸引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国家还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党的宣传员和鼓动员们，对那些从来未曾考虑过政治问题的一般群众最初所作的宣传讲话，被群众视为启示，使得他们对所有最重要的事物耳目一新。与此同时，任何持不同说法的宣传机构都被查禁和关闭，并作为反革命宣传而加以追究。党的队伍迅速壮大，那些政治上不老练的人们被作为新的信徒吸收入党。他们充斥一切形形色色的权力机关——民政的、军事的、经济的和工会的机关，等等。在中央，领导着为数众多的部门和组织的列宁派，居于核心地位。在形式上，它是通过一些对群众称之为苏维埃政权的机关实行管理的：人民委员部、执行委员会、及其司、局等分支机构。但是，这种机关的数量太大，所以中央不仅需要统一指挥合唱团的一切声部，而且还要把其中容纳不下的一切方面——共产国际、工会国际、军队、报刊、工会、宣传机关、经济

等都统筹掌管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囊括所有各方面主要领导人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的机构臃肿庞大，涉及的面又很广泛，因而需要有一个不大的领导集团，为此设立了一个政治局，它代替了头两年里由列宁及其两、三名助手（斯维尔德洛夫和托洛茨基）进行领导的状况。1919年3月选举产生的政治局，很快就变成一个真正的政府。从实质上看，对于列宁及其一派来说，这些暂时未引起什么改变，只是使治理国家的工作程序更加条理化。管理工作仍然是通过被称为苏维埃政权的机关进行的，在整个内战期间，这种模式的变化很小。当时，党的机关还处于萌芽状态，它的职责还只是服务性的，而不是领导管理性的。随着内战的结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真正党的机关建立起来，并日益得到扩展。结果，负责集中统一领导全部管理工作的机关，在中央是政治局；在各州和边疆区，是州和边疆区的中央局；在各省，是由省委常委会负责。在省委会里，省委书记居于首位，他开始取代省执委会主席和各种中央派驻的全权代表，成为全省的主人。1922年通过的新党章，把这种变化用法定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开始了“书记专政”的时期，唯有莫斯科的情况例外，在这里，统帅人物不是党的总书记，而是列宁。但是1922年列宁患病在身，使他不能坚守工作岗位，于是，政治局在没有列宁参加的情况下就成为中央的权力中心。这就意味着一场争夺继承权的斗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取得权力之后，自以为他们的权力由于一手控制了政治局而得到了保障。可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则更有远见，他们看到，政治局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因此，只要你手中能够掌握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你就可以任意挑选政治局的组成。只要你能够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担任省委书记，那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委员会里的多数地位，就是属于你的。

不晓得由于什么原因，季诺维也夫不愿看清这一点。他是如

此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按照列宁的老一套办法，即用在中央内部搞内哄的办法为搞掉托洛茨基而斗争，以致于使他没能及时察觉斯大林在为整个党的机关安插自己的亲信方面进行的活动，而且这种活动在1922～1925年间，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进行。结果，在1922～1924年间，统治全国的已是三巨头。1925年由于三巨头的分裂，改由政治局统治。但是，自从1926年1月党的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就开始享受他苦心经营多年而取得的丰硕果实了：如今，他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自己的政治局，他本人已成为领袖。不过，暂时他还不是主宰一切的主人，因为当时政治局委员在党内还有份量，中央委员们还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当中央的权力之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地方书记专政的状况已经最终巩固下来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全省的主宰，全省的一切问题都要由省委常委会决定。这样，统治国家的已经不仅是党了，还有党的机关。

以后的情况怎么样呢？发展的趋势如何？

我对斯大林非常了解，后来他已在稳步地、有把握地朝着加强个人独裁专制的方向前进。在理论上，只有通过党的代表大会才能把他推翻；但是，他在一手控制了全部权力之后，就不再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样，全国就只有一个中心了，这个中心已经既不是党，也不是党的机关，而是斯大林，而且仅仅是斯大林一个人了。至于具体管理工作，他可以通过自己认为得心应手的任何人去进行，通过政治局或者是通过自己的秘书进行。

至于所有上述那些在革命后吸收入党的党员群众命运如何，我们只能在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分析以后再加以猜测。

第二个问题——关于权力的实质何在，以及这种实质演变的问题。

当你对列宁或者斯大林的个性有了很好的了解之后，使你感到大为震惊的是，似乎在这两个人一生中，占居主宰一切地位的

是疯狂的权欲。实际上，这种权欲也没有什么令人特别惊奇之处。列宁也好，斯大林也好，都是笃信自己的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们的思想体系决定了他们的一生。这种主义的要求是什么呢？它要求变革社会的整个生活，这种变革只能而且应该通过暴力来实现。它所要求的是由某些积极的、有组织的少数人对整个社会实行的暴力，但是要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预先把国家政权夺取到自己手里。这是最根本的东西：这个主义中说，不取得政权就一事无成；掌握了政权就可以达到一切，改变一切。他们的毕生活动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上。

权力之所以落到列宁之手，然后又落入斯大林之手，这不仅是由于他们有着疯狂的，无止境的权欲，而且是因为他们在党内是党的主义基本行动的最充分、最典型的体现者。权力，就是一切，既是开端，也是结局。列宁和斯大林都是这样度过他们终生的。所有其他人都不得不步他们的后尘。

但是，这批积极的少数人之所以能够取得政权，是由于他们借助于暴力；这批少数人之所以能够维持政权，也是依靠对绝大多数人施以暴力。少数派，也就是党，只承认实力。固然，人民对于党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尽可任意采取恶劣的态度，但是，当局只有在它确信其警察系统对国家的控制已不够强有力，其权力面临得而复失的危险的时候，才会对人民的这种否定态度感到恐惧，才会因而采取机动灵活的策略行动，譬如列宁采取的新经济政策。当警察的恐怖系统确信它已完全控制了国家时，它就可以毫不客气地使用暴力，譬如，斯大林实行的集体化、30年代实行的白色恐怖等。同时它还会迫使全国人民按照党的指令去生活，哪怕为此付出数以百万计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权力的实质就是暴力。对谁使用暴力呢？按照学说，首先是针对某种阶级敌人，针对有产者、资本家、地主、贵族、前军官、工程师、神甫、富裕农民(富农)、持不同政见者；还有那些不能

顺应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例如反革命分子、白卫军、破坏分子、坏分子、社会叛徒、对阶级敌人趋附奉迎的白吃汉、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同盟者，等等。

一旦消灭了所有这些类型的人以后，还可以制造出一批又一批新的类型：中农可以变成下富农，农村的贫农可以变为集体农庄的敌人，因而也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分子；失去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工人会成为阶级敌人的代理人。那么，党内的情况如何？偏差主义分子、偏差分子、宗派主义分子、卖身投靠的托洛茨基分子、右倾反对派、左倾反对派、叛徒、外国间谍、淫荡的恶棍，——不断地进行消灭、枪毙，使人在监牢、集中营里遭受久禁的痛苦，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实质和热情之所在。

然而，在革命初期，成千上万的人们之所以入党，目的并不是为了这个，而是相信会建成一个美好的社会。人们不是立即，而是逐渐懂得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欺骗上。但是，有信仰的人们继续坚持自己的信念，即使周围发生天晓得是什么样的鬼事，也认为这可能是粗野、愚蠢的执行者的过错，而思想本身是好的，领袖们的愿望是好的，所以要为纠正缺点而斗争。如何进行斗争呢？表示抗议，参加反对派，在党内进行斗争。但是，走党内反对派的道路，是死路一条。瞧，所有这些信徒逐渐成为被当局宣布为敌人，或者是阶级敌人的代理人的那些类型的人；而且所有这些信徒也都难以倖免——他们的道路是进入共同的、由斯大林同志如此熟练操纵的那台绞肉机。

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逐渐分化为两种类型的人：消灭别人的人和被别人消灭的人。当然，所有那些首先考虑个人生命安危和只图谋取个人私利的人，削尖脑袋想挤进第一类人中去，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能如愿以偿。绞肉机既可以向右转，也可以向左转，碰到谁算谁；那些具有一定信仰，并愿意为人民谋福利的人，迟早会陷入第二种类型之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只顾个人安危的人和坏蛋们，都能够称心如意地如愿以偿。只要指出下列情况就够了：多数契卡的杀人专家们自己最后也落入绞肉机里，只不过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他们离绞肉机太近的缘故。而那些为人比较正派的，还有点良心和情感的人，是必定要牺牲的。

由于我担任政治局秘书的职务，我同所有党的高层领导人都有过接触。我应该说，其中有许多是富有同情心的人。当然，这不是我做出的最后判断，我所说的，仅仅是当时我对他们的印象。是魔鬼把克拉辛[①]这个天才的组织者和工程师推到列宁的职业寄生虫匪帮中去。我极少遇到比塞尔佐夫[②]更富有才干的组织者，他善于及时抓住和理解事物和问题的全部本质。革命前的陪审官，律师勃里连特（索科里尼可夫）能够出色地胜任任何工作。

另外一些人虽然不那么杰出，但他们老实正派，平易近人，与人为善。奥尔忠尼启泽[③]是一个直言不讳，忠诚老实的人。鲁祖塔克[④]是一位出色的干部，谦虚谨慎，为人诚挚。斯·柯秀尔坚贞不屈地坚持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天真信仰，他被契卡分子逮捕后，尽管受尽了种种折磨，他仍然拒不承认对他的捏造性控告，于是契卡分子把他十六岁的女儿带到他面前，当场予以奸污，女儿自杀身死，但是柯秀尔却仍然拒绝按照他们的要求签字，并把

① 克拉辛——苏联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十月革命后任交通人民委员，工商人民委员，1919年起从事外交工作，曾任德、英、法等国大使。

② 塞尔佐夫——1921至1926年在党中央机关工作，1929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

③ 奥尔忠尼启泽——十月革命后历任中央高加索局主席，中央监委主席，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政治局委员等。

④ 鲁祖塔克——革命后曾任工会主席，俄共中央书记等职。

他们的那些东西撕得粉碎。

我几乎同党的所有高级领导人都有着极好的个人关系，友善的、令人愉快的个人关系。甚至我对那些斯大林式的自觉的官僚主义者——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古比雪夫，也没有任何可以指责之处，他们一直是非常和蔼可亲的人。

可是，即使那位为人态度和蔼的，有教养和令人愉快的索科里尼可夫，当他统帅军队的时候，在内战时期，难道在俄罗斯南部没有进行过群众性枪杀吗？而奥尔忠尼启泽在高加索的行为呢？

狼一般的学说和对它的信仰，是很可怕的事。只有当你很快地搞清楚这一切，并对所有这些人有了透彻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出，这种宣扬暴力、革命和消灭“阶级”敌人的学说，必然会把人变成何等模样。

第14章　最后的见闻　要逃出社会主义天堂

文艺　马雅可夫斯基　爱森斯坦　同"资产阶级运动员"比赛　出访挪威　第一次逃跑的尝试　阿廖卡　通过正常途径出国已不可能

1925年6月，政治局决定要整顿文艺。党中央专门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决议，并且经过政治局批准。它的实质是强调"中间的文学是没有的"和苏维埃文学必须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工具。委员会的组成颇有意思：主席是在这以前同文学毫无关系的人——红军首脑伏龙芝；委员是卢那察尔斯基①和瓦赖基斯②。瓦赖基斯是个文化水平不很高的人，他在某个省（可能是沃龙涅什省）担任省委书记时，曾经为当地省的党报写了一篇抨击新反对派的社论。社论结尾时，他针对反对派引用了勃洛克的诗《斯基福人》中的一句："听吧，你

① 卢那察尔斯基——苏联文化界名流。十月革命后任教育人民委员，中央执委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是科学院院士，政论家和剧作家。

② 瓦赖基斯——十月革命后任一些州委和省委书记，党中央报刊部部长等职。

们的骨头正在我们沉重而温柔的脚掌下咯咯作响。"季诺维也夫把这一事例作为党的干部极端平庸无能的笑料，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介绍。而这一点恰恰促使斯大林把瓦赖基斯提升到中央担任报刊部部长职务。瓦赖基斯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在思想上成为流亡者以后，很想结识一些全国著名的、而又不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家和诗人，我对他们深感尊敬，例如：布尔加柯夫、阿赫玛托娃。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我已决定要逃往国外，担心在我出走后，由于我和他们关系密切会使他们招致严重的麻烦。相反，我倒可以毫无顾忌地与共产主义作家们自由交往，因为他们不致遭受任何风险。

当然，我对革命前的早期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是不了解的。根据百科全书的说法，他从1908年起就已成为布尔什维克，当时他年仅14岁。从他革命前那个阶段的诗歌内容来看，至少，他是正确踏上了未来成为职业革命家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他写道，他曾经深入思索过一个问题：

"……

设法不从事劳动，

也不施诡计，

而去掏他人的腰包，

倾其囊底。"

就这样，在马雅可夫斯基身上形成了对职业革命家来说是正常的劳动态度：

"当人们对我谈起劳动，

谈得喋喋不休，

就象在生锈的擦板上擦洋姜，

发出单调烦人的响声。

我便亲切地用手搭着他们的肩膀，

回敬他们一声：

那么，除去那张五个卢布的钞票之外，

你们是否肯额外补偿？”

我是在第二阶段，即革命后认识诗人的。当时，他口袋里装着党证，正精神饱满，朝气蓬勃地按照共产主义的方向写出一首又一首诗篇。1921年进行了清党，马雅可夫斯基便发表了《当代诗歌的清洗》。这是一首宣传诗，一首对那些没有得到共产主义恩惠庇护的诗人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挖苦的诗。当时，我还是高等技术学校的学生，“清洗”是在学校的理工博物馆大教室里进行的。在场的清一色是大学生。“清洗”按字母顺序进行，很快便轮到了阿赫玛托娃。马雅可夫斯基表示与阿赫玛托娃划清界线，分道扬镳，因为她似乎在革命中所看到的只是“一切都被洗劫一空，被出卖，被叛卖。”马雅可夫斯基甚至还扯到不久以前逝世的勃洛克头上。一个女大学生哭诉地抱怨说：“马雅可夫斯基对死者的评论，‘或者是好得很，或者是一钱不值。’”。

马雅可夫斯基说：“是的，是这样，我正是要这样去做：对于死者我要说的，是那些没有什么意义，但同时又能很好反映他本人特点的东西。当故事发生的时候，我的家住在离勃洛克不远的豌豆街。我们有些人聚在一起烤薄饼吃，我不愿在厨房烧饭，便打赌说，我能在薄饼烤好之前到勃洛克那里跑一趟，并从他那里带回来一本有他亲笔题词的诗集。我便去了。我跑到勃洛克那里，如此这般地对他说，尊敬的勃洛克，我高度评价您惊人的天才（你们要知道，只要我愿意的话，我也会给他戴高帽的），您当然会赠送我一本有您的题词的诗集。勃洛克说：‘好的，好的。’于是，他取出一本诗集，走进隔壁房间，坐下就思考起来。过去了10分钟，12分钟……可是我与人打了赌，还有薄饼在等着呢。我把头探进隔壁的门说：‘尊敬的勃洛克，您是否能给我一点……’他终于题了词，我马上抓起诗集，飞奔回家。结果，我赌赢了。我翻开一看，勃洛克的题词是：‘赠给引起我深思的弗·马雅可夫

斯基。'我当时想，就题这样一句话，竟然需要深思17分钟之久！

我也曾经遇到这样的事：诗人库西可夫到我这儿来，向我要一本有我亲笔题词的书，那好办，我立即拿起《马雅可夫斯基创作全集》，并在上面题诗一首：

世界上人们的鉴赏力有高也有低；

有人喜欢我，

也有人欣赏库西可夫。

弗·马雅可夫斯基。"

我和马雅可夫斯基相识较晚。他无疑是一位天才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个作风下流，厚颜无耻的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他为了获得奖金，曾给苏联的一些贸易机构写了一些广告标语，诸如：

"莫斯科农副业公司就是好

——独家经营，别无分号。"

"请君先去橡胶托拉斯，

然后再去幽会未婚妻。"

而且，他由于热衷于追求创作风格，以同样的手法给亲友题诗：

"无意中的熟睡——火灾的根源，

劝君睡前勿读乌特金和让罗夫的诗篇。"

诗人对乌特金这个人是讨厌的。一次，乌特金在诗人之家朗诵他用意极好的新作：

"茫茫的迷雾仿佛一层轻纱，

覆盖着左岸的斜坡。

有一位苏联哨兵迈着清晰的脚步，

沿着河岸在巡逻。"

有一个苏联哨兵在德聂泊河岸上巡逻时，被一个白卫军射手从罗马尼亚彼岸开枪打死。乌特金满怀着苏维埃的爱国主义仇恨，把这个白卫军打死在河中。

当乌特金朗诵刚一结束，正当人们要报以掌声的时候，突然，马雅可夫斯基发出低沉浑厚的声音说："乌特金，鼓足干劲，多卖力气，你会成为古谢夫第二的。"（古谢夫是中央委员，当时任中央报刊部部长）。

我最后一次见到诗人，是在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当时我是去找奥·加米涅娃办一件事。人们已同意让马雅可夫斯基再次到国外揩点油水，但是，为了节约外汇，发给他的生活费少了些。诗人认为发的太少，因此，他用不大文雅的语言发泄自己的不满。

我也会见过爱森斯坦。当时，西欧的一些进步人士硬是虚伪地把他捧为天才。我同他相识于1922年，那时他是无产阶级文化剧院的负责人。

爱森斯坦把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作«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任意改编成各种粗俗的民间戏剧。奥斯特洛夫斯基原剧本中的文字被篡改得面目皆非；演员们象一群小丑，在舞台上扭捏作态地走钢丝，进行政治性的反宗教宣传。整个演出，不仅编导，甚至连台词全都成了爱森斯坦的作品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整个剧本除了表示布尔什维克的忠诚以外，沒有任何精彩可取之处。演员们在咒骂反苏的侨民的同时，高声歌颂道：

"巴黎座落在塞纳河上，
我们也生活在塞纳河畔。
我们唯一的生路，
是在普安卡拉之巅。
过去我们曾经是人，
现在我们变成废残，
这是因为有人，
把我们的牙齿打乱。"

为了进行反宗教宣传，人们用巨大的盾牌，把一位身穿伊斯兰教士服的演员抬上舞台，用«上帝维尔达»的曲调唱道：

"商人犹大眞是好：

出卖了耶稣，买到一双套鞋了。"

当时我已经形成一种印象：爱森斯坦对于犹大做买卖的天才，与其说是尊敬，莫如说是妒忌。从爱森斯坦身上再也找不出任何其它才能。

爱森斯坦转向电影以后，他向中央宣传鼓动部了解当前需要什么，那里的人们说："现在沒有宣传性的革命影片，你快搞出一部来吧。"于是，他就拼凑出《波将金号装甲舰》这部相当一般化的宣传品，西方左派（是否还有右派呢？）电影工作者称之为杰作；既然影片是"革命的"，不言而喻就是杰作了。这部片子我是在首次上演时看的，如果我沒有记错的话，是在梅因霍尔德剧场，而不是在电影院看的。而且那次恰巧同鲁祖塔克坐在一起，因此，我们对这部电影交换了意见。鲁祖塔克表示同意说："当然，这是一部宣传品。不过，很久以来就需要一部百分之百的革命影片了。"因此，这项订货是完成了，而且影片中应有尽有：凶残的战士，卑鄙的沙皇爪牙，勇敢的海员——未来"革命的荣耀和骄傲"（只不过，仅仅是在金刚石时期，而不是在喀琅施塔得时期）。

爱森斯坦此后的整个官运都是在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情况下取得的。当斯大林暴君式权力日益加强的时候，爱森斯坦搞出了一部《总路线》，对不了解內情的人们来说，是指党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志的天才路线。影片中描写在领袖的天才领导下，整个俄国呈现出一片繁荣和安居乐业的景象（应该说，在当时的1928～1929年间，还有反对派存在，本来可以不必如此阿谀奉承，布哈林派和李可夫派公开宣布他们不同意斯大林开始推行的毁灭农村的政策。所以，只有个别善于阿谀奉承的人，才迫不及待地宣扬斯大林的天才）。低级的阿谀奉承的桂冠也表现在影片《伊凡雷帝》中。在国外，人们竟然对此信以为眞。未必有必要说明，爱森斯坦所塑造的伊凡雷帝的形象，目的在于宣扬斯大林，并为他的恐

怖行为进行辩护，说明历史是可以重演的：正如伊凡雷帝出于对伟大俄国的关怀，而对贵族施用古代的刑法，把他们插在木橛子上，然后砍头而死一样，斯大林之所以把自己的布尔什维克贵族们枪毙，也是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叛逆。唯一能够对所有这些卑鄙行为进行辩护的理由，就是爱森斯坦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他终生是一个胆小如鼠和最下流的阿谀奉承的人。可是，即使他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一条命，本来也可以用另外的办法：在30年代，他曾被允许去好莱坞，然后他到墨西哥放映了革命的影片。他本来完全可以留在国外而保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返回苏联，不惜在斯大林刽子手们面前卑躬屈膝。

1925年底，最高体委接到挪威的邀请。他们邀请俄国滑冰运动员参加速度滑冰世界冠军赛。当时，俄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几乎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关于这一点，完全可以从当年各种距离的比赛成绩上作出准确的判断。在这以前，由于领导一切革命工人体育运动组织的红色运动国际的规定，在“资产阶级”运动员和“红色”运动员之间从来不允许进行比赛。我决定，现在该是改变这一规定的时候了。

运动国际的领导人是波德沃依斯基①。在政府上层领导中，提到这个姓名时一般都冠之以“老糊涂”的外号。革命前，他是一个军人，布尔什维克。十月政变时，他参加了领导起义的彼得堡革命军事委员会。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性人物。但是，由于他愚蠢，没有能力担任任何有益的工作，所以，当局对如何安排他的工作感到头痛。最后，给他找到一个薪高而清闲的差事——普遍军训局局长，这个部门是专管对人民群众进行军事训练的。

① 波德沃依斯基——十月革命时任彼得堡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员，乌克兰陆海军人民委员，中央监委委员等。

波德沃依斯基为此感到自己受到伤害和屈辱，因为他希望担任更负责的领导职位。后来，当运动国际成立时，就任命他为领导。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的自尊心。

波德沃依斯基在普遍军训局任职期间，亚哥达曾在他手下担任军训局的总务处长，但他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长。后来，亚哥达利用自己同雅·斯维尔德洛夫的亲戚关系，调到格伯乌去担任总务处长，并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真正的道路。但是，他仍念及旧的友情，他同波德沃依斯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对波德沃依斯基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他说服了波德沃依斯基：红色工人组织不应该同"资产阶级"运动员进行比赛，因为，似乎这会给革命工人力量带来资产阶级腐化。运动国际宣扬这一指令，因而各兄弟党把这看成是莫斯科的指示，当然，都原原本本地按照这一指令行事。

主办世界滑冰冠军赛的委员会对这个情况是了解的，但是他们从运动的观点出发，仍然完全合理地指望，要使比赛成为真正的世界冠军赛，必须有最强的俄国选手参加。因此，就发出了邀请。

在最高体委理事会会议上，尽管亚哥达反对，我坚持主张接受邀请。波德沃依斯基叫嚷道："你完全破坏了我们工作的政治路线。"在这方面最卖力气的是运动国际的书记汉斯·林贝尔格，他跑到共产国际去告状。此人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个蓝眼睛的俄籍德国人。5年以前，喀琅施塔得起义期间，我曾同他一起参加过护厂活动。1924年，我作为政治局秘书和最高体委主席团委员，在运动场上同他又会了面。我们两人谈到我关于恢复老的运动组织和发展运动的路线问题，当时他完全支持这些主张。为了能稍加抵销愚蠢而顽固的波德沃依斯基的作用，我通过中央把林贝尔格提升为运动国际的书记。但是，林贝尔格成了一个阴谋家，他很快就投靠到波德沃依斯基和亚哥达一边。

但是，共产国际内部，人们明智地表示不参与这些争论，而答复波德沃依斯基和林贝尔格说，这是应该由党中央决定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向党中央提出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我在中央随时会陈述自己的观点。因而，亚哥达采取了迂回的办法，把最高体委和运动国际两位主席谢马什柯和波德沃依斯基之间的争论，描绘成两个部门领导人之间的冲突，而由波德沃依斯基出面，提请中央监委把这个问题作为“冲突”加以解决。由于中央监委主席团内部有契卡人员，亚哥达的朋友和格伯乌局务委员会委员彼得斯和拉齐斯，所以亚哥达估计，中央监委会断定谢马什柯的主张不正确，因为干预运动国际组织的职责是超越他的职权范围的。

在中央监委开会之前，我去见了斯大林，并告诉他说：“斯大林同志！我是中央驻最高体委的代表，我们与运动国际发生了冲突。我们认为，工人体育运动组织可以同资产阶级的体育组织举行竞赛，而运动国际反对这样做。明天中央监委将处理这个问题。我想了解你的意见如何？”

斯大林回答说：“为什么不能比赛？在政治上我们同资产阶级正在进行竞赛，而在经济上我们同它竞赛得蛮有成就，我们同他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在进行竞赛。为什么在运动方面就不能竞赛一番呢？只有傻瓜才不懂得这一点，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嘛。”

我说：“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明天在中央监委会上引述您刚刚表示的意见吧。”

斯大林说：“可以。”

第二天，中央监委主席团开会处理我们的问题。会议本来应由雅罗斯拉夫斯基①主持，但是他为人狡猾，胆小如鼠。他回避

① 雅罗斯拉夫斯基——革命后任中央书记、列宁研究院院务委员、科学院院士等。

参加这次会议，感到这件事有点危险，而且不了解后台是谁。因此，会议由古谢夫主持。会上，波德沃依斯基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冲突的情况及其原因。然后，谢马什柯陈述了最高体委的观点。亚哥达支持波德沃依斯基的主张。军事部门驻最高体委的代表麦赫诺什为我们的观点辩护。所有有关的参加者都纷纷发表意见。我一言不发。古谢夫一直看着我，显然是期待了解我会说些什么。但是我仍不要求发言。最后，古谢夫忍耐不住了，他说："很想知道党中央驻最高体委的代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我说："我沒有特别必要赘述自己的看法了，我的观点与主席团其他委员们的观点相同，但是，或许会议会有兴趣知道斯大林同志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吧。"

"哎，对啦。是的，当然，当然感兴趣啰！"

"那好吧。昨天，我专门请示了斯大林同志，问他对这个问题有何想法。他允许我在会上如实地转述他的意见，他的准确回答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能竞赛呢？我们同资产阶级在一切方面都在进行竞赛，为什么在运动方面就不能竞赛呢？只有傻瓜才不懂得这一点。"

顿时，亚哥达的脸涨红起来。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们聪明地表示出满意的神情。古谢夫立即表示："怎么样，同志们。我想，问题已经很明确了。如果我提议我们作出下述决定的话，我想大家都会同意的。决定是这样的：会议认为波德沃依斯基同志的主张是不正确的，而谢马什柯同志的主张是正确的，他采取了同党的路线完全一致的立场。沒有反对意见吧？"结果，沒有人反对，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谢马什柯和最高体委主席团说服我，说我应该作为滑冰运动队队长前往挪威。因为在那里要同挪威共产党领导进行微妙的谈话，需要向他们解释运动国际的政策改变（在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里，运动问题，特别是冬季运动——滑雪和滑冰问题具有很重大

的作用)。我同意了。为此，我去找了莫洛托夫，要求中央组织局就任命我担任队长一事作出决定，以防万一。

再过两天就要动身了，可是关系到我终身大事的问题尖锐迫切地摆在我面前，因为我当即断定，这对我是一次出国和留在国外，从而同我的社会主义祖国永远断绝关系的好机会。

但是，有一个极大的难题——我的恋爱问题。

在苏俄期间，我只有过一次恋爱。情况是这样的。

她的姓是安德烈也娃，名字是阿廖卡，年龄20岁。阿廖卡的情况是这样的：她的父亲原是一位将军，担任过普梯洛夫兵工厂的厂长。在内战期间，他和妻子带着女儿逃到俄国南部。内战后期他完全是由于饥饿而死在高加索。后来他的妻子神经失常。当时，有一批要到莫斯科参加代表大会的共青团员，把15岁的阿廖卡带到了莫斯科。小姑娘被分配到共青团，从此她就参加共青团中央机关工作。她长得漂亮出众，人很聪明，但是由于她的不幸遭遇，她的神经需要恢复平衡。

当她17岁时，共青团中央总书记彼得·斯莫罗金同志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后来两人结了婚。她19岁时，调到党中央机关作一些技术性工作。在这里我同她相识，而且我们之间产生了爱情，这使她离开了斯莫罗金。确实，我们两人并没有在一起生活，我住在苏维埃一号楼，旁边就是专为共青团中央领导人用的苏维埃宫，在那里有她的住房，隔壁住着她的女友，她习惯于同她们来往。

当时，我们的爱情已持续了一年半。但是，阿廖卡对于我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毫不了解，她还认为我是一个模范共产党员呢！在此期间，根本没有可能告诉她我要逃往国外的想法。我设想了这样一个战略方案。

最近几个月里，我把阿廖卡从党中央调到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担任行情研究所的秘书。她对这项工作很喜欢，而且很钻研。

我设法安派她到芬兰去出差，以部门工作非常需要为理由，让她就地搜集有关货币改革的材料。我通过财政人委部立即办妥了她出差的事。我本来想，这件事格伯乌也会顺利通过（出国护照需由格伯乌签发），更何况，我是去挪威，而她是到芬兰去。我设想，回程时在赫尔辛基同她会面，到那时候再把我要侨居国外的想法告诉她，并建议她作出抉择：或者同我一起留在国外，或者返回莫斯科。自然，即使她决定回国，对她也不会有任何风险——她还能以此证明，她不同意我的反革命观点，更不是我背弃苏俄的同谋者。

又过了一天，我的运动队已准备就绪。队内有三个滑冰选手：雅·麦里尼柯夫，当时是世界上最强的滑冰运动员，特别是短距离（500米）速滑方面；普·伊波里托夫，是中距离（1500米）速滑能手；青年军人库申，是长距离（5000米和10000米）速滑成绩最好的运动员。当时我们必须立即动身，否则到达举行冠军赛的地方特隆赫姆就会迟到的。但是，我的护照亚哥达还没有签发。于是，我打电话给格伯乌，但是仍拿不到护照，只是回答我说，护照正在由亚哥达同志签批。可是我打电话却找不到亚哥达，甚至我用高频保密电话他也不接。我立即意识到问题之所在。亚哥达是在故意拖延，目的是破坏我的出国之行。可是，如果我们当天不动身的话，到达特隆赫姆时将会迟到的，这正是亚哥达求之不得的。

我去找了莫洛托夫，向他说明亚哥达拖延签发护照，以破坏我们的国外之行。我提醒莫洛托夫说，我是根据中央组织局的决定出国的。于是，莫洛托夫拿起电话机就同亚哥达通话。他严肃地说："亚哥达同志，如果你认为可以用这种办法破坏中央决定的话，你就想错了。如果一刻钟之后不把巴让诺夫同志的护照送到我桌上的话，我就要把你蓄意破坏党中央决议的问题提交中央监委去处理。"之后，莫洛托夫对我说："巴让诺夫同志，你在这

里稍等一会儿，用不了多长时间。"果然，十分钟之后，听到一阵急促的皮靴声，一个格伯乌的机要通讯员来了，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特急件，莫洛托夫同志亲启，请在信封上签收。"打开一看，是我的护照。莫洛托夫得意地笑了笑。

当天我们就动身出发了。在冠军赛开始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到达奥斯陆，但是未能及时赶到特隆赫姆去，因为当时末班火车已开走了。也找不到空飞机，都飞往特隆赫姆去了。后来，我们只好满足于同较弱的工人队比赛。但是，我们的运动队滑出的成绩却比世界冠军还要好。于是，各种报纸展开了究竟谁在道义上赢得冠军问题的争论。

我们驻挪威的女大使柯伦泰把挪威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伏鲁鲍登请到使馆来，由我向他解释，莫斯科是怎样和为什么对运动国际的政策作出改变的问题。柯伦泰还对伏鲁鲍登补充说明了我在党中央的职位，从而消除了他们可能存在的一切反对意见。

体育运动在北欧国家作用之大，是我国无法比拟的。各种报纸大量刊登了我们代表队和我这位队长的照片。我们大家在一起，在冰场上同世界花样滑冰冠军索耐依·艾尼叶见了面，并且谈了话（主要是用手势）。这是一位年仅15岁的迷人的小伙子。

晚上，我决定去歌剧院，欣赏挪威人的《卡门》的演出。我完全不懂挪威文，但这对我毫无影响，《卡门》的内容我甚至可以背诵。演出中间第一次休息时，我出来到休息厅走走，在圆柱前面停了下来。我的衣着不完全是为了到剧院来而穿的，观众们根据当天报纸上发表的照片认出我来，他们说："原来这位就是布尔什维克的队长。"有一位漂亮少女在两位很有风度和有教养的少年陪同下从我身边走过，好象她正在同他们争论什么问题，他们的意见不一致，但都很有礼貌。忽然我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她走到我面前，同我谈了起来。她会讲法文和英文。于是我们就用法文交谈起来。开始时，话题是关于我们运动队和滑冰的事，然

后，这位少女开始提出种种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治和文学问题等。由于我是想留在国外的，所以我转弯抹角地谈话，尽量谈得含含糊糊，讲得俏皮一些，力求用笑话敷衍。这位少女对谈话很感兴趣，所以，在几次中间休息时我们又继续进行交谈。我注意到，一些走过的成年人和那些受人尊敬的人们，都非常有礼貌地向她点头致意。我问她做什么事，是否工作了？她说，沒有，是住在父母家里，正在学习，晚上到这里娱乐一下。

第二天，当我到代表处时，柯伦泰对我说："越来越麻烦了，现在，我们竟然对皇室的公主献上殷勤了。"我尽量保持着党员的风度回答说："谁晓得她竟然是皇室的公主，她脸上又沒有贴上标签！"但是，关于这件事的报告已经发回国内了，所以斯大林后来曾经问我说："你在国外献殷勤的那位公主是何许人？"但是，这件事沒有造成任何后果。

我率领运动队取道芬兰回国。我本来希望能在赫尔辛基同阿廖卡会面，但是她到了列宁格勒，要我一到达就给她打电话。于是，我们通了电话。她通知我说，她出国未走成，因为亚哥达拒绝给她签发护照。

结果，情况变得很糟。如果我一人留在国外的话，从各方面情况来看，她必然会被认为是企图同我一起潜逃的同谋犯。因此，这位可怜的姑娘就会不明不白地被枪毙，因为事实上她根本不知道我有逃往国外的想法。当时，我需要当机立断地作出决定。相反，如果我回国，对她就不致产生任何不愉快的后果了，我还是把这次想流亡国外的不成功的尝试作为一次失挫记在心上吧。于是，我毅然坐上火车返回苏俄。亚哥达已经给斯大林打了小报告，说我打算带着情人叛逃。斯大林象往常一样，漫不经心地把他接到的小报告转给我看。我耸了耸肩说："他（亚哥达）已经成了怀疑狂了。"至少，我的回国使亚哥达处境尴尬，因为事实充分证明，我并沒有想逃走——否则，为什么要回国呢？我这次回国在

人性方面的内在动机，对于斯大林也好，亚哥达也好，都是想不到的，他们连这样的念头都不会有。

这样，情况完全清楚了，不论我想如何逃走，要把阿廖卡带走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了。所以，为了不使她招致任何危险，我除了同她分手之外，别无其它出路。这样做是非常困难，非常不愉快的事，但是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同时，我还不能向她解释眞正的原因何在。而她又是一个骄傲的、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子。她一发现我有疏远她的迹象时，她就接受了我们的分离，也不需要作出任何解释。可是，不断在我身上打主意的格伯乌，决定对这种情况加以利用。她有一个女友叫仁卡，在格伯乌工作，而阿廖卡不知道这一点。仁卡接受了对阿廖卡做工作的任务，并且执行得很顺利。她告诉阿廖卡说："你知道他为何抛弃了你？我由于偶然的机会听人家说，他是另有新欢了。这个人眞是个坏蛋……"他们不断地对她施加影响，说服她，说我是暗藏的反革命；并说，她作为党员，有义务向中央监委控告我是暗藏的反布尔什维主义分子。这次，亚哥达又指望他的亲信彼得斯和拉齐斯出力了，因为他们二人是参加中央监委党籍事件处理小组的。但是，要这样做，就必须事先取得斯大林的同意。可是单为这点事去找斯大林不太妥当。当时已是1926年春天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索科里尼可夫已经是反对派了。出现了一个偶然的情况。我继续不断地同索科里尼可夫会面，斯大林对此并不予重视：既然我在财政人民委员部工作，我总会有些事情需要找他的。但是，有一次加米涅夫要我到他那里去一下。从1926年1月起，加米涅夫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而是候补委员了。我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叫我去，但我没有理由不去看他。后来，我还是去了。加米涅夫企图拉我加入反对派。我对他所谈的纲领性分歧主张，酸溜溜地提了一些意见。我说我并非小孩子，我看得出来，这里面更多的是权力之争，而不是有多少眞正的分歧。但是格伯乌把我到加米涅夫

那里去的事向斯大林作了报告。这样一来，斯大林就改变了对事情的态度，他同意中央监委召我去。他想：不妨听听你所亲近的女人阿廖卡的指控，或许可以得到关于你的有意思的秘密。当然，按照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做法，当时我应该主动向斯大林汇报一下同加米涅夫谈话的內容。但是，我对这一套特务打小报告的制度深为反感，所以，我沒有这样做。

在中央监委，阿廖卡实质上说了一些荒诞无稽的话。她指责我是反革命的论据，无非是我的一些习惯说法："我们通常的苏维埃疯人院"、"我们苏维埃的糟粕"。这些话我确实经常不拘束地讲过，同我对话的人往往是尊敬地一笑置之，因为我属于高傲的大官之列，自己可以随便地批评苏维埃的一些做法，即所谓主人翁式的批评。在她讲完之后，我开始发言，我请求党籍事件处理小组对她不要严加追究，因为她是一个忠诚的党员，她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她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自己作为共产党员的义务，而不是进行诽谤，以便伤害一个与之断绝关系的人。面临的情况很有意思：阿廖卡对我提出指责，并要求开除我的党籍，这对我来说等于是枪毙一样；而我本人不但不为自己辩护，反而为我的原告人辩护。主持会议的雅罗斯拉夫斯基问我，对阿廖卡所提出的指责的实质有何想法。我只是摆摆手说"沒有什么。"党委装出把对我安排她到国外出差一事的严厉指责搁置起来的样子。对此，我丝毫不加理睬，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在做戏，他们需要请示斯大林，是否要对此作出什么决定。因此，第二天，我去见斯大林。我对中央监委的事随便提了一下，说这一切都是无理取闹，是出自一个受了委屈的女人的冲动。其次，我还顺便地告诉他说，加米涅夫同志企图向我灌输反对派的信仰，但是他沒有得逞。这样，斯大林才放心了。而且，看来，对于雅罗斯拉夫斯基关于中央监委应作何决定的请示，他答复说，不要伤害我。因此这件事后来对我沒有造成任何不利的后果。

不过，情况也并非全然如此。由于连续出了这么多事，其中总有点什么东西会有所影响。我早已感到惊奇的是，斯大林是那样一个怀疑狂，怎么会对这一切都置之于全然不顾呢？1926年春，我试图再次安排自己出国，以便乘机留在国外不再回来。这时，我对阿廖卡已经是完全放心了。在她对我提出控告之后，对她再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了。一旦格伯乌要指控她什么，她就可以说："我早已告诉你们了，他是一个反革命，可是中央监委不相信我的话。现在你们看到，究竟谁说的对了。"对这样的话，确实是无可指责的。

我正在写关于行情理论基础的著作。当时在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书籍中，这还是一个冷门。我装出很需要查阅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材料（事实上他们的材料很珍贵）的样子，因而提出，我作为财政人委部的干部到德国出差几天的要求。为此，我有两种可行的办法：或者通过中央组织局作出出差的决议，这未免有些小题大作，对我未必有利；或者索性直接找斯大林，对他说，我要到德国去几天，搜集材料。于是，我去征询斯大林对此事的意见。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意外的和意味深长的："巴让诺夫同志，你怎么总是不断出国，还是在家里坐坐吧。"

这就是说，如今我要想通过正常途径出国已经不行了。归根结蒂，格伯乌不断对我进行攻击，这对斯大林总是有影响的："万一巴让诺夫同志出国后果真留下不回来，那怎么办？他毕竟是满脑子装满了国家机密，如同装满了甘油炸药一样。最好还是不要冒险，还是让他呆在家里为好。"

过了3个月，我再次进行间接的试探，但我这次做得很巧妙，显得与我毫无关系的样子。一次，在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上，讨论苏联派驻法国的财政代理人留比莫夫教授的问题。他是一个非党群众，对他根本不信任，而且怀疑他在进行苏联财政事务的同时，搞了一些假公济私的活动。可是，派谁去接替他

呢？部务委员会中有人提出："是不是让巴让诺夫同志到那里去把工作整顿一下。"我佯装对此不感兴趣的样子，并说："如果时间不长的话，或许还可以。"财政人民委员布留哈诺夫支持这个提议，并表示由他去同中央商量。从各方面的反映看，这件事并没有产生任何后果。我估计，他曾就此事同莫洛托夫谈过（未必会同斯大林谈），而且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还是让他呆在家里吧。"

这样，通过正常的途径到国外出差的可能性，对我来说是完全排除了。但是，我在思想上已经完全是一个流亡者了，因而决定采取一切办法逃走。

首先，需要让人们稍稍忘记我这个人的存在，不再使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厌烦。于是，我逐步地，不引人注目地离开了党中央，然后需要在财政人委部工作一段时间，让人们习惯地认为，我在那里是在静悄悄地、平安无事地进行工作，这需要年把的时间。同时要策划准备潜逃。

我的阿廖卡逐渐平静下来，重又回到自己丈夫斯莫洛金身边。论年龄，斯莫洛金已经不是共青团员。他想去学习，尽管他努力争取，但未能如愿，他的头脑不适于搞科学，所以，他被调到党的工作岗位上。在那里，显然不需要费脑力。所以最后他晋升到列宁格勒市党委书记和候补中央委员的职位。但是，在1937年斯大林搞绞肉机的时期，他被枪毙身死。可怜的阿廖卡也同他一起被送进了这架绞肉机，在格伯乌的地下室里结束了她年青的生命。他们的女儿玛雅，由于当时年幼，枪毙她为时过早。但是当她长大成人时，在战后（似乎在1949年），被流放到集中营。不过后来竟然活着出来了。

第15章 准备逃走

财政出版社　中央财政函授学校　拉里奥诺夫
中亚之行　与莫斯科话别　勃鲁姆金和马克西莫夫
阿什哈巴德　土库曼尼亚党中央机要局

离开中央以后我的空闲时间更多了。在财政人民委员部里，我还负责《财政报》的编辑工作，这是财政部门出版的专门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日报。我对报纸业务和印刷工作很有兴趣，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领导报社工作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我对当局的财政工作方针非常熟悉，至于布留汗诺夫取代索科里尼可夫的部长职位这件事，并没有丝毫改变这一方针。

此外，我还负责领导财政出版社。该社出版财政经济书籍，全社共有184人。在第一次社务委员会会议上，全体领导干部都出席了：业务处、预算处、出版处处长和编辑部主任；还有些天晓得叫什么处的头头、支部书记、机关工会主席，等等。在这次会上，我试图了解一下出版社的工作情况。对我提出的一些业务工作问题，所有负责干部作出的回答都是一些听起来令人疲惫不堪的胡说八道，他们一味强调什么警惕性，党的路线等；而当我坚持要求向我提供事实和数字时，所有的人都一无所知，被提问的人最后都求助于谦虚地坐在桌子边角落的一位老人："马特维耶夫

同志，请你提供数字吧。”马特维也夫同志马上提供了所需要的数字。经过一个小时会议以后，我确信，这是一批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不学无术的寄生虫。他们的主要职业是打小报告，搞阴谋诡计，“按照党的路线”陷害别人。于是，我宣布闭会，把他们轰了出去，只把马特维耶夫同志一个人留下，以便从他那里再得到一些数字。

马特维耶夫同志是一位非党专家。他谨小慎微，怕出头露面，好象低人一等似的。他是全社唯一精通业务和对社内情况了如指掌的人。他的职务是技术顾问，同他谈半个小时后，我对社内的工作情况就有了清楚确切的了解。马特维耶夫同志知识之渊博和水平之高使我感到惊奇。我问道：“革命前你是做什么事的？”马特维耶夫同志踌躇、腼腆地说，他过去是资本家和出版人，他出版的正是这类财政经济书籍，实际上在俄国是这方面的垄断企业。据了解，当时他出版书籍的数量，几乎与现在我们财政出版社相同。我感兴趣地问他，当时他的出版社编制是多少人，他又腼腆地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编制可言。”那么，是谁干事呢？原来，只有他一个出版人和一个女职员，她既是秘书又是打字员，别无他人。“你们当时的办公处情况如何呢？”没有什么办公处，只有一间小房子，房内设有出版人的写字台和打字员的桌子。当时他们所做的工作与现在我们的184人的工作量一样，而现在我们的办公楼很大。对我来说，这是整个苏维埃制度的缩影、象征。

我完成了一部关于经济行情理论问题的著作，我试图创立一些基本理论规范。布龙斯基来说服我，要我把这部著作在他主编的厚厚的《社会主义经济》杂志上发表。教育人民委员部通知我说，他们已把这部著作列为博士论文；以普列哈诺夫命名的国民经济学院新设立了一个经济行情理论教研室，邀请我出任这个教研室的教授。不过，我在这个教研室工作的时间不长，仅仅1927

年的春季。之后，我就离开莫斯科，取道中亚前往自由世界。

我离开了财政经济局的工作，因为我怕将来当我要走的时候，部长可能会由于这项工作而不放我走。于是，我自己创办了一项由我一人独自做主的工作，以便随时可以放弃离开。情况是这样的。

财政人民委员部需要上万名具有高等专门教育水平的干部，去担任财政指导员、检查员、银行专家等等。革命前担任这类职务的，通常是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革命后这批人失散了，有的被驱逐，有的被枪毙，有的流亡国外。这样的干部十分缺少。同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新政策、即“阶级政策”规定，只允许那些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其中绝大部分人的文化水平很低，没有受过中等教育，因而根本不具备接受高等教育的基础。相反，一些文化水平较高的，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青年人，由于他们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而不准许他们进入高等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于是，财政人民委员部在列宁格勒市开办了一个以提高文化水平和业务知识为目的的再教育学习班，专门负责培训那些水平较差的在职的财政工作者。这个学习班办了一年就吃掉了一大笔开支，因为需要免费提供学员、教职员工的膳宿，而在苏维埃条件下，为此又需要增设一套相应的重叠的工会委员会、俱乐部、党支部，以及政治教育、生活管理、房屋管理和维修等部门和人员。可是一年内只能培养出一百来名“已接受再教育的”人，而且，他们的水平究竟怎么样，也是值得怀疑的。一次，布留汗诺夫部长请求我到列宁格勒去了解一下毕业生情况，并对开办学习班的效果如何作出结论。我遵命照办了。我发现学习班白白浪费了大量开支；此外，学习班毕业生的数量与财政部门对专家的需要量相比，也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是，我找到一个解决办法。我对布留汗诺夫说：“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请你从财政部经费中拨给我一笔为数 1 万卢布的贷

款，让我开办一个‘家庭财政经济系’，即采用函授教育的办法。这个系将按照经济核算的原则进行工作，过3、4个月后我就如数还你1万卢布。我将会为你培养出数千名符合你的需要的财政干部，而且为此不需要支出分文。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要作出任何关于无产阶级出身的规定。这样做，我使你能够通过函授教育的办法，让那些由于社会成分的原因而走投无路的青年掌握专业知识；而对你来说，重要的是需要财政专家，至于他们的出身如何，是无关紧要的。”布留汗诺夫是一个聪明人，他立即表示同意我这个办法，按照我的要求拨给我1万卢布的贷款。

很快我就办起了中央财政经济函授学校，即所谓“家庭财政经济系”。与外国不同的一个情况是，在俄国，人们对函授教育几乎是陌生的，在1912～1913年间，在顿河上的罗斯托夫城曾经办过普通教育函授班，但在战争期间就停办了，此后再也没有办过。

开始时，我写了一本关于函授教育的小册子，篇幅约有100页，并且立即交由财政出版社出版发行，每本售价为80戈比。这本小书销路之广出乎意料，仅在3个月之内，销售量已达10万册之多。同时，这本书也为我开办的财政系的成功准备了条件。

我的编制很小：我的副手辛捷耶夫教授和总务主任——前上尉布达维依，他们两人都不是党员，很能干。但是，我聘请了所有在财政专业方面全国知名的优秀专家，共有49名优秀教授，这些都是由于我在财政人民委员部财经局工作关系而十分熟悉的人。函授学校共分四个学部，我分别委托一些优秀专家为各个学部制定教学大纲。受聘的教授们负责写出自己的讲义，打印成册后再分别寄给学员们；然后，学员们把书面作业寄来，由教授们审改后再连同他们的批语退给学员们。函授学校的学习时限是2、3年，学习期限因学科不同而异。函授学校最后举行大考，考试

合格者发给毕业证书，凭此证书他们有权到财政人民委员部所属的各个机构工作，担任财政或银行指导员、检查员等职务。每个学员每月交付学费总共3个卢布，其中包括讲义费和教授的教学辅导费。

函授学校一开张，在宣布招生的头1个月内报名的就有7千人，所有报名的人我全都接受了。我从学费收入的2万1千卢布中取出1万卢布，立即偿还了布留汗诺夫的贷款。我给教授们的报酬也很高，他们都非常满意，很愿意担任这项工作。顺便提一下，他们都是精通专业的专家，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党员。财政人民委员也极为满意，因为这样一来，他的干部问题终将得到解决。

正在这个时候，格伯乌逮捕了我们函授学校的信贷学部主任齐阿胡什扬，他是一位信贷方面的知名专家，国家银行的谘询顾问。由于急需用钱，他不谨慎地把自己珍藏的一幅旧画卖给了日本外交官，可是他不懂得，在苏联的条件下，这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一次，有一位穿着一身黑衣服的矮个子女人来找我，哭得很可怜。这是主任的妻子，她请求我尽力帮忙说情。可是我能做些什么呢？考虑到我同格伯乌的关系不好，加之我已不在中央工作，我若出面为他讲情，这只能对他更加有害。我坦率地告诉她说，我这样做要冒很大风险。但是她对我的意思没有理解，她仅仅听说我是一个党内的达官贵人。我告诉她说，现在我无法向她解释清楚，但是几个月之后她就会理解的。这里我所考虑的是，再过几个月，我就要逃往国外了。于是，我拿起电话，把另一个听筒给她，让她也听到电话里的对话。我给格伯乌的经济局长普罗柯费耶夫打电话。我在谈话中尽量用一种不致使对方感到是包庇的口气，否则只能给可怜的齐阿胡什扬帮倒忙。

“普罗柯费耶夫同志，你逮捕了我的函授学校信贷部主任齐阿胡什扬，这是怎么回事？”

"巴让诺夫同志，我不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属于格伯乌的侦缉工作机密。"

"不过，齐阿胡什扬目前正在为函授学校完成一项紧急工作——为信贷学部制订教学大纲。至少我想知道，案情是否严重；或许你们逮捕他仅仅是由于某件小事情，只不过是为了吓唬他一下而已，如果确实是这样，你将很快放他出来的话，那么，我可以等待一段时间。或许，这个案子情节很严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得不请他人接替他的工作了。"

普罗柯费耶夫劝我另外找人接替齐阿胡什扬的工作，因为案子情节很严重。

齐阿胡什扬入狱后，没有释放出来。格伯乌硬说他同日本人有联系，并给他扣上了为日本人进行经济间谍活动的大帽子。后来，他被枪决了。

函授学校办得非常好。我从事这项工作一直到1927年夏天。由于我在这里是自己主宰一切，我准备离开莫斯科时，就让我的格尔曼·斯维尔德洛夫接替我担任校长。两年以后，我在巴黎从《消息报》上看到了关于函授学校招收新生的广告，署名是格尔曼·斯维尔德洛夫校长，这就意味着函授学校仍在继续办。当我看到这则消息时，我心中深感满意。

1927年夏天，我到克里米亚去度假。在我出发之前，我从中央得到格伯乌对所有负责干部发出的警告：要提高警惕，一个恐怖分子已经潜入莫斯科活动。我到了克里米亚，得知有个恐怖分子在列宁格勒党的俱乐部会议上投掷了炸弹，有数十人死亡和受伤。后来，我在巴黎和柏林结识了这个恐怖分子，他是一个迷人而纯洁的青年，名字叫拉里奥诺夫。

在1927年这个时期，军人总协会会长库切波夫领导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有一些准备牺牲的男女青年前往俄国，模仿俄国老一代革命者的榜样去投掷炸弹。但是，他们不了解俄国新组

建起来的庞大警察机关的厉害，还以为似乎有一个巨大的，强有力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组织——“托拉斯”会帮助他们。实际上，这个“托拉斯”是格伯乌组织的，它的全部接头暗号、地点都是契卡分子安排的，而工作人员都是契卡分子。恐怖分子们一进入苏联国境，就落入格伯乌的魔掌，然后被枪毙。

不仅如此，库切波夫将军是在军人总协会巴黎办公处里领导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这个办公处设在俄国资本家、俄国工商协会(大商人和工业家的协会)主席特列齐亚柯夫的房子里。任何人都不知道，特列齐亚柯夫是格伯乌的间谍。他在库切波夫办公室墙壁里安放了窃听器，所以对库切波夫办公室内发生的一切情况，格伯乌一下子就知道了。关于派遣恐怖分子前往俄国去的全部细节，格伯乌早在他们出发之前就掌握了。

特列齐亚柯夫为格伯乌搞间谍工作一直持续到1941年。他出卖了库切波夫，布尔什维克把库切波夫劫持走了。在他的协助下，契卡间谍斯科布林将军又策划了劫持库切波夫的接班人米勒将军的行动。1941年，德军迅速占领了明斯克，由于偶然的机会，格伯乌未来得及销毁或带走自己的档案文件。俄文翻译在翻这些档案时发现，莫斯科的一份文件中说：“据我间谍人员特列齐亚柯夫发自巴黎的报告……”后来，德国人把他枪毙了。他为格伯乌工作了几乎二十年，但究竟他的动机如何，始终未弄清楚。

我从克里米亚度假回来之后，就着手进行出逃的最后准备。

在这个时候，我已经不能利用出差的机会平安无事地出国了。我只能通过偷越某一段国境线的办法逃出去。可是，通过哪一段国境线好一些呢？经过仔细研究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相当不容乐观的。当时，波兰国境已被完全关闭，安装上了一道道的铁丝网，带着军犬的边防军到处皆是。在这里，格伯乌想尽一切办法使边界线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向罗马尼亚方向逃也不可能，因为作为界河的德涅斯特河，完全处于日夜严密监视之下。

芬兰边界难以设防，因为沿边界线是一片森林和冻土地带，但是这个边界线却很不容易接近，我到那段边界去的借口是什么呢？万一被发现，我出现在这段边界地区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我是企图从社会主义天堂叛逃的人。

但是，在研究地图的时候，我注意到土库曼尼亚①这个地方，那里的居民区延伸到沙漠草原和波斯之间的一个狭长地带，而且首都阿什哈巴德距离国境线仅有20公里。在那里，不可能找不到一个机会合法地接近边境（然而，当时我还没有估计到逃往波斯方向还有另外的困难。关于这一点，以后我要讲到），于是，我决定从土库曼尼亚逃往波斯。为此，首先要到达土库曼尼亚，这个地方是划归党中央中亚局管辖的。

我很容易地从财政经济系脱身出来，因为我是那里的主人。我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给了盖尔曼·斯维尔德洛夫。

然后，我到中央组织调配部去，要求把我调到中央中亚局去工作。虽然我对党中央的一切情况都了如指掌，甚至对那里的全部出口和入口的位置都一清二楚，我仍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按照领导干部管理名单，我属于高干名单之内，因而组织调配部无权过问我的工作问题，为此至少需要由中央组织局作出决定。那里的人们客气地建议，把我的工作调动问题的决定提交中央组织局批准。这种程序对我不利，所以我解释说，我根本不愿去冒这个风险：因为如果组织局某一个委员看中我，就会任命我担任组织局正需要的、而我又完全能够胜任的某种领导工作。我劝说他们这样做：给莫洛托夫打个电话，请示他对我到中亚去工作是否有反对意见，如果他不表示反对的话，组织调配部就可以在取得中央书记和组织局主席同意的情况下，调动我的工作。如果他表示反对的话，我再亲自去见莫洛托夫，争取把事情办的贴切妥当。

---

① 系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位于中亚地区，与伊朗接壤。

结果他们照我的建议办了。幸好，莫洛托夫对我不愿留在中央而坚持要离开这件事，已经感到厌烦了，所以他回答说："那好吧，既然他那么殷切地想去，就让他去吧。"就这样，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请中央中亚局予以安排，担任领导工作。"

我带着这封介绍信到了塔什干，向中央中亚局书记捷连斯基报到。这位就是曾经担任过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3年秋天由于一时疏忽而放过了反对派的那个人。当时三巨头认为，对于全国最重要的莫斯科市党组织来说，他太弱了，因而把他调到中亚局去工作。

捷连斯基对我的到来感到惊讶，甚至有点不安，怀疑调我到这里可能有来头，是否把斯大林的耳目安插到他身边？

我向他解释说："是我自己放弃了中央的工作，觉得自己完全脱离实际生活，所以决定到基层工作。"

捷连斯基说："那太好了，我们任命你作我的助理兼中央中亚局机要局长。请你给我们组织安排一下这些工作，因为你改组政治局机构的情况，我已早有所闻了。"换句话说，他是想让我把他的办公厅整顿好。还要兼他的秘书。

我对他说："捷连斯基同志，让我坦率地说：我之所以放弃了斯大林助理和政治局秘书职务，并不是为了来给你做秘书的。我希望到最基层去，到边远偏僻的地区去工作。在土库曼尼亚这里有位中央书记伊布拉吉姆，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就认识他，请把我派到他那里去分配工作吧。"捷连斯基很快就同意了，因而我又得到了新的介绍信："请土库曼尼亚党中央予以安排工作"。

这次我没有从塔什干直接去阿什哈巴德，而是重返莫斯科，去同朋友们和莫斯科告别。否则，我将来什么时候还会返回祖国来呢？

我不仅需要同朋友们话别，而且要考虑得周密一些，尽力争取把他们可能由于我的外逃而遭受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出

走之后，格伯乌会立即到处进行调查，了解我是否属于某一个反共组织，以及我的联系人是谁。这对朋友们的危险很大。我的朋友有两类人：一类是我同他们经常会面，而且是完全公开的，并把这种密切关系公开加以宣扬。属于这类的朋友有格尔曼·斯维尔德洛夫，穆恩卡·佐尔基，另外还有二、三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格伯乌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我果眞同他们有什么其它的政治关系，同他们有共同的思想的话，我任何时候都不会同他们公开地友好相处。所以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但我朋友中还有另一类人，他们经历着跟我一样的转变过程。在这方面，我一直是愼之又愼地行事。每次同他们在办公室会面时，都故意作出好象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在这一方面，格伯乌就要伤脑筋了。

朋友们给我出了这样一个主意：当你到达国外，写到关于莫斯科和共产主义问题时，你要佯装出不是在政治局里才成为反共分子的，而是在那之前的两年，即在到中央工作之前你已经反共了。这样做丝毫不会影响你写的见闻的价值，因为把你成为反对布尔什维克分子的时间，说成是早两年还是晚两年，这毕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你写的东西的眞实性。这样，格伯乌和亚哥达就会马上抓住你的供词说："你看，我们契卡的嗅觉是多么灵敏，我们一下子就及时断定他是一个反革命。"但是，到了那时，他们将按照虚构的线索去追踪你的组织。既然你早已经是反共分子了，那么理所当然的是，你一来到莫斯科和进入中央时，你必然要在所有人面前极力隐瞒自己的观点，因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也都象政治局一样，受到你的蒙蔽；要调查你的关系和你的组织，就应该到你来到莫斯科之前的地方，即到你的故乡去调查。

显然，这个主意不坏。在莫吉廖夫城，不管格伯乌如何调查，他们将一无所获，因为那里根本没有我的组织。不过，他们也可能把我最后同班同学中的朋友当作我的组织成员：米·阿尼奇柯

夫参加了白卫军；尤·席尔布，已是德涅斯特河彼岸的人，目前在比萨拉比亚，即罗马尼亚，是一个激烈的反共分子。所以，他们已经不会遭到什么危险。这样，将使格伯乌的追查误入歧途。因此，我同意了这个主意，并对朋友们许下了这样的诺言。我对自己的诺言必须信守不渝；不过，后来我对许下的这个诺言感到很后悔，关于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写到这里，我应该再回过头来，向读者们介绍一下勃鲁姆金同志。他就是1918年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起义时，为了破坏布列斯特和约，在莫斯科暗杀了德国驻莫斯科大使米尔巴赫伯爵的那个人。

早在1925年，我就经常与穆恩卡·佐尔基会面，这是他共青团的暗名，真实的名字是艾马努伊尔·李弗什茨。他是共青团中央新闻部部长。他是一个聪明、可爱、诙谐的小伙子。他有一个弱点——对狗怕得要死。每当我和他一起去大街上散步时，如果对面出现一条无害的狗，穆恩卡就会拉住我的胳膊肘，并说："哎，巴让诺夫，让我们到对面马路去走吧，你知道我是犹太人，是不喜欢狗来咬我的。"

一次，我同他一起在阿尔巴特街①上走路，当走到一栋老式豪华的资产阶级大楼前时，穆恩卡说：

"我把你留在这里，在这所楼里三层上有一套格伯乌定下的房间，亚柯夫·勃鲁姆金住在里面，当然，你听说过这个人。我同他通了电话，他此刻正等着我去。哎，巴让诺夫，让我们一起进去吧，你不会后悔的，勃鲁姆金是一个少有的傻瓜，是一个特殊的，名符其实的傻瓜。当我们进去时，他一定会等待着我，他将穿着一件红色丝绸长袍，口里吸着1俄尺长的东方式的烟斗，他面前将摆着一本打开了的列宁全集，顺便说一下，我曾经故意看了一

① 莫斯科市内老区的一条比较繁华的街道。

下，他打开的那本书总是同一个页码。我们走吧，我们进去吧。”

我跟着进去了，一切都与佐尔基所预见的情况一样：睡衣、烟斗、列宁全集等。勃鲁姆金是一个妄自尊大的、盛气凌人的人物，他盲目地深信自己是一个历史性人物。

我和佐尔基嘲笑他的妄自尊大说：“雅可夫·哥里戈里耶维奇，我们参观了革命博物馆，那是有整整一面墙，展出的全是关于你和暗杀米尔巴赫的事。”

“是吗，很高兴，那么墙上展出的是些什么东西呢？”

“有各种剪报、照片、文件、数字；上面通墙排着一条列宁语录：‘我们需要的不是小资产阶级变质分子的歇斯底里行为，而是无产阶级铁一般的营队的坚强步伐’”。

当然，这是我们编造的情况，勃鲁姆金很懊悔，但是他并没有到革命博物馆去核实我们的捏造。

关于暗杀米尔巴赫事件，勃鲁姆金的表弟对我谈过，情况与勃鲁姆金介绍的不完全一样。当勃鲁姆金和他的陪同者进入米尔巴赫的办公室以后，勃鲁姆金把炸弹一丢，就火速从窗户跳了下去，他的裤子吊挂在铁栅栏上，人悬在空中，很难受。陪同他的一个水兵不慌不忙地把米尔巴赫弄死，然后把勃鲁姆金从栅栏上接下来，弄进卡车就拉走了。过了不久，这个水兵在内战前线某地牺牲，而勃鲁姆金被布尔什维克宣布犯了法，但很快他出卖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组织，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他被吸收入党，并参加了契卡。他曾以参与残酷镇压格鲁吉亚起义而著称，后来，他在契卡的官运又把他带到了蒙古。在那里，他当上了契卡头目，滥用生杀大权，任意杀人。最后，甚至格伯乌也不得不把他召回国内。此刻他身上穿的绦绸长袍和烟斗，就是作为对蒙古的留念而带回来的纪念品。格伯乌不知道把他安排到那里合适，就把他作为调干储备起来。

他陪我看了他这套有四间屋子的住宅，我说：“你是一个人

住在这里吗？”

“不，我的表弟马克西莫夫司我住在一起，他为我管理家务。”他把马克西莫夫介绍给我。和勃鲁姆金一样，他也是奥德萨人。马克西莫夫是他党内的暗名，其实他沒有权力使用党的暗名，因为他在奥德萨时曾经是个党员，负责骑兵团的后勤工作，但由于偸盗和私贩公家的燕麦而被开除党籍和军籍。他的眞实姓是毕尔格，住在表兄这里，勃鲁姆金想给他找个工作，但不那么容易，因为谁都不愿接受一个因为盗窃公物被开除出党的人。

“你这里还有两间屋子完全空着无人住，而故去的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弟弟格尔曼却住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楼内维尼阿明哥哥家里，拥挤不堪，根本沒有自己的住房，是不是可以让他住到你这里来。”

“他是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弟弟吗？那我感到很幸运，让他来这里住好了，即使今天来也可以。”

就这样，格尔曼·斯维尔德洛夫就搬到勃鲁姆金家里来了。

当勃鲁姆金到格伯乌去的时候，他以同我相识炫耀自己。亚哥达说：“亚柯夫·哥里戈里耶维奇，交给你一个任务：巴让诺夫仇恨我们格伯乌，我们怀疑，他不是我们的人，请你查淸他的眞面目，这个任务是极其重要的。”

勃鲁姆金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可是2、3个月后，他向亚哥达汇报说，他根本沒有机会经常同我会面，或接近我，所以请求解除他的这项工作。但是，他出了另外一个主意：他的表弟同格尔曼·斯维尔德洛夫住在一起，可以通过斯维尔德洛夫了解巴让诺夫的情况，因为斯维尔德洛夫经常与巴让诺夫会面。这个主意被采纳了，于是，马克西莫夫被格伯乌行政局长弗列克谢尔召见，他终于找到了需要的工作了：对我进行特务侦察，给格伯乌打小报告，直到1927年夏天，他都是靠这个工作过活。

格伯乌仍然不知道把勃鲁姆金安排到哪里工作为好，最后想

把他安插到托洛茨基那里。

1925年托洛茨基同他那个产品质量检查委员会的成员们一起视察各地工厂。勃鲁姆金被安插在这个委员会里。不论托洛茨基如何幼稚，但是对勃鲁姆金到这个委员会来的使命，他是一清二楚的。当勃鲁姆金为首的小组委员会第一次视察某个工厂后，在托洛茨基主持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勃鲁姆金想作报告，托洛茨基打断了他的报告，说："勃鲁姆基斯同志到那里是作党的耳目的，他警惕地注视着党的路线，我们毫不怀疑，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下面让我们听取参加小组委员会的专家们的介绍。"

勃鲁姆金气急败坏地说："第一，我不是勃鲁姆基斯，而是勃鲁姆金，托洛茨基同志，你应当更好地了解党的历史；第二……"

托洛茨基用拳头捶着桌子说："我并没有让你发言嘛！"这样，勃鲁姆金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委员会，同托洛茨基成了仇敌。

为了利用勃鲁姆金对反对派的仇恨心理，格伯乌又想把他安插到加米涅夫身边，那是在1926年，当加米涅夫被任命为贸易人民委员的时候。勃鲁姆金被分配去担任咨询顾问，加米涅夫的秘书们对这位"顾问"的工作笑得不亦乐乎。加米涅夫的秘书们把勃鲁姆金写给加米涅夫的郑重其事地发泄不满的信拿给我看，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加米涅夫同志！我要问你：'我算在哪里？我是干什么的？我究竟是什么人？'"结果，格伯乌不得不再次把他召回去。

不过，勃鲁姆金最后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工作，他被派遣到近东国家去担任格伯乌在国外从事间谍破坏活动的秘密特务头子。我们以后还会同他会面的。

1927年秋天，当我与莫斯科告别时，马克西莫夫非常忧伤。由于我的离开，他失去了轻松而待遇很高的工作。我决定取笑他一番，我知道他向格伯乌打小报告，汇报我的情况，但是他不晓得我本人也知道这一点。由于我积累了各种苏维埃机构的工作经

验，我心里这样想：既然敌人想要搞到关于你的情报，最好的办法是由你自己向他提供情报。你可以有选择地把所需要的东西提供给他。我采取的做法正是这样。我向毫无怀疑之心的格尔曼·斯维尔德洛夫介绍一些对我自己没有任何损害的情况，以便让格伯乌知道。这些东西都是通过马克西莫夫捅过去的。

在我动身前往阿什哈巴德之前，我在格尔曼那里遇到了马克西莫夫，我问他说："你的工作情况如何？"

"仍然不好。"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带你到中亚去好吗？"

"噢，好啊，"他高兴地说，"让我去吧。"他明天就会给我肯定的答复，因为他正在进行什么谈判，必须去处理。我清楚地知道，他肯定要跑到格伯乌那里去请示如何行动。那里会指示他："好极了，当然可以去，还可以继续打报告。"于是，我同马克西莫夫一起来到了阿什哈巴德市。

到达阿什哈巴德市之后，我去找了土库曼尼亚中央第一书记伊布拉吉姆。我在中央工作时就认识他。当我担任政治局秘书时，他是中央的责任检查员。当时他把我看做是大首长。所以他对我的到来感到惊奇。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我到这里来，是否是为了接替他的职位。我作了解释，使他确信：我是自愿到基层从事具体工作的："作为开始，你就任命我担任中央机要局局长吧，这正是我在捷连斯基那里拒绝担任的职务。我将是你的部下，事实将会证明，我对你的职位没有任何野心。"结果，就这样做了。

几天以后，我表示，我是一个打猎爱好者，想去打大的野兽（其实，我应该承认，我是最恨打猎啦）。他给那里负责边防的格伯乌部队第46边防队队长道洛费耶夫打了电话，请他给我送两支卡宾枪来，并给我和马克西莫夫签发一张允许在边境地带打猎的通行证。这些，我马上就都得到了。

我化了2、3个月的时间仔细研究了周围的环境，同时把马

克西莫夫安排到一个普通的总务工作上，他不断地向莫斯科报告我的情况。

伊布拉吉姆是个好人，我同他建立了极好的关系。我领导土库曼党中央的机要室，在土库曼党中央局的会议和中央全会上做秘书工作，我重新又掌握了全部机密，虽然是些不大的地方范围之内的机密。

在同伊布拉吉姆谈话时，我常常问起波斯的情况。我表示，对铁路线——我们同内地联系的主要交通线——紧沿着波斯边界这一情况感到耽心，因为一旦战争爆发，波斯人可以很容易地切断我们的主要交通干线。

伊布拉吉姆笑了，他说："那我们的第46边防队是干什么的呢？"

我反驳说："我所指的是军队。"

伊布拉吉姆说："你记得历史吗？当在一个世纪以前德黑兰发生叛乱中，我们俄国大使格里包耶多夫被杀害的时候，沙皇是怎么做的？从俄国派去了一百名哥萨克，他们就在波斯整顿了秩序。你不要以为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差别。"

另一次，我说："在你们这里，边界线就在旁边，这里可能经常发生偷越国境的事件吧？"

伊布拉吉姆说："正好相反，这种事件非常少。当然，边界线很长，要保卫漫长的边界线是困难的事。但是，要接近边界，就必须先到达某一个居民点，而我们对居民点的监视是经常不断的。任何一个新来的人都不会不被发现。"

我说："那好，但是，这不会适用于党的干部吧。负责干部可以毫不费力地接近边界和越过边界线。你们这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吧？"

伊布拉吉姆说："发生过两次，他们没有什么困难。对逃入波斯去的党的负责干部，我们可以直接到波斯去抓，然后把他们

押解回来。”

“那么，波斯当局的态度如何呢？”

“波斯当局闭上眼睛，装出似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这一切看来不那么令人欣慰。就是说，从这里越过国境还是容易的，但是困难将发生在后面。好吧，只好冒险了，别无出路。

我对边界情况进行了侦察，在距离阿什哈巴德20、30公里的地方，在同波斯相邻的边界线上的山区里，有一所党中央的休养所，叫费留扎。我们曾经和在中央工作的几个干部一起，同一些打猎的爱好者结伙，星期日去那里打过猎。

我沿着山中狭谷走出很远去——谁晓得，可能我已经是在波斯领土上了。

我确信，从这里越过边界线根本不合适。如果在越过这条线时，从狭谷里的某个角落突然出现隐藏在那里的边防哨，他们会说："同志，这里已经是波斯了，你串到这里来干什么？快回去！"

按照地图我选中了柳特法巴德这个地点，这里距阿什哈巴德有40—50公里，这里有个火车站，在正对面两公里处，走过一块空地就是一个同样名称的波斯村庄。我决定1928年1月1日从这里偷越国境。如果说，我此刻仍然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还在写这本书，那么我应该把这一切都归功于当时我果断地作出的1月1日越境的决定。

第16章　潜逃　波斯　印度

偷越国境　波斯　第一次暗杀未遂　莫斯科要求引渡　契卡行动起来——阿加别柯夫　霍什塔里雅和托依穆尔塔什　通过波斯　杜兹达布　印度麦克　唐纳和列纳-戈尔德费尔迪斯公司　我前往法国

12月31日晚上，我和马克西莫夫出发去打猎。其实，马克西莫夫很想留下来，到某一个热闹场所去参加新年晚会，但是，他害怕自己的格伯乌上司会由于他没有跟踪我而强烈不满。我们乘火车到达留特法巴德车站后，立即去找边防站站长，我出示了证件和边境地区狩猎通行证。站长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新年晚会，这种邀请是出于礼貌，我婉言谢绝了，回答说：第一，我是为打猎而来的，很想先睡个好觉，这样明天清晨出发打猎精力充沛一些；第二，显然，他们很想跟同志们欢聚一堂，痛饮一番，而我却滴酒不入，因而也完全不适于参加酒会。结果，我们去睡觉了。

第二天，1月1日清晨，我们出发，直奔波斯的一个村庄。走过1公里的路程，来到野外，从这里可以遥望边防站。在这里我看到了陈旧的界桩：这就是国界线的标志，再往前走就是波斯了。远看，边防站里没有任何活跃的迹象——人们全都喝得死醉。我这位马克西莫夫对地形一窍不通，所以他不知道我们已是一只脚

踏上了波斯的国土。我们坐下来吃早饭。

早餐后，我站了起来，这时候我们每人有一支卡宾枪，但是全部子弹都带在我身上。我对他说："阿尔卡吉·罗曼诺维奇，这就是界桩，那边就是波斯。你怎么办，随你自便，可是我要到波斯去了，我将永远离开社会主义天堂了，让辉煌的共产主义建设继续进行吧，我不参加了。"马克西莫夫惊慌失措地说："我可不能再返回了，他们会说是我有意把你放走的，因而会把我枪毙的。"我向他建议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就带你走，带你到欧洲去，但是我要提醒你：从此时此刻起，他们会来追捕你，象追捕我一样。"马克西莫夫认为，他只好跟随我到欧洲去了，别无出路。

我们来到一个村庄，想要找到地方当局的所在地，我们终于找到了。当局的人们告诉我们说，这个事件超出了他们地方的职权范围，所以紧急派出联络员到20公里外的行政中心去请示汇报，当联络员回来时已是夜晚了，他们说，让我们到行政中心去。但地方当局坚决拒绝安排我们连夜赶路，所以，我们只好在留特法巴德过夜。

与此同时，这里的苏联情报人员越境到对面，想要向边防站报告我们偷越国境的事，可是全站的人都在大醉之中，直到1月2日也没有能汇报成。1月2日一早，我们已很快地转移到区的行政中心了。毫无疑问，这件事如果不是发生在1月1日新年的话，苏联武装部队当天夜里就会立即越过国境，把我们追捕回去。如果这样的话，我一生的命运也就此告终了。

在区中心我得到了一个新的不寻常的机会，这就是我遇到了这里的区长帕斯班，他不同于其他当地的波斯行政人员，那些人都是胆怯、懒惰、贪污受贿、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人；而区长却是一个聪明、有魄力和果断的人。原来，他在世界大战期间曾在德国的学校受过训练。

这位区长要把我送到霍拉桑省的省会麦什特去。他向我介绍说，从这里到麦什特，中间有海拔3千米高的大山，只有一条绕山而行的公路，其中有一段路距离阿什哈巴德很近，要在阿城对面沿着深深的狭谷过去，通过库昌市的山口，然后再转向左的方向才能到麦什特。如果通过这条路去麦什特，就等于去送死，因为自即日起，契卡的汽车队开始沿途巡逻，他们会把我抓回苏俄去。唯一的办法是，从正面直接翻山而过，山里没有公路，只有夏天当地居民有时走的小路。但现在是冬天，到处都被厚厚的白雪覆盖着。他让我们试试走这条路，因为布尔什维克不会到深山老林去冒险的。区长说，他给我们配备带路的人和几匹山马，不过，对带路的人不要完全信任，而对于山马则可以给以无限的信任，它们是认得路的。

在马队行装备齐后，我们开始上山。

我们在山里长途跋涉，周围到处是白雪、崩塌、陷坑、悬崖、峭壁，我们连续走了4天，几乎有20次临难未死，这都应归功于这些聪明的长毛蓬松的山马，它们沿着悬崖峭壁爬山，就象小猫一样灵巧，当它们突然碰到光滑的峭壁边缘时，立刻就卧倒，用腹部着地，四肢向四方伸开，这样就保持了平衡，而不致沿坡滑下去。最后，在第5天，当我们终于到达麦什特的平原地带时，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在麦什特市郊，我们走上了汽车公路，这里有当作公共汽车用的卡车，我们及时赶上了，坐在后排座位上。突然，有两个契卡分子上了车，他们坐在我们前面的座位上，但是，他们不敢动手，可能，他们以为我们随身带有枪支。我们进入麦什特市区，不知为什么，车子把我们拉到了一家旅馆门前，还对我们解释说，这是全市独一无二的欧式旅馆，本地人都住在客栈里①。我们疲惫不堪，很想好好休息一下。睡觉前，我们想

① 指西亚、中亚和高加索一带住驮运商队的客店。

在旅馆餐厅里品尝一杯咖啡。当咖啡端上来时，我的同路人马上就要喝下去，我立刻制止了他，因为我嗅到咖啡里有一股强烈的苦的巴旦杏仁味道，我断定这是氰化钾的味道。我们不再喝咖啡了，上楼到我们的房间去。旅馆经理科奥士赫切夫是个亚美尼亚人，他告诉我们说，旅馆里只剩下一间空房间，他领我们进去。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房间既没有锁，也没有门闩，都被卸下"修理"去了。我看到旅馆里还有一些空房间，但是经理说，都被房客预订了。我们只好用椅子把无法关死的门顶住，然后舒服地在床上睡下了。我们入睡没有多久，就听到很重的敲门声，说是"警察"来了。我们表示抗议，但是他们仍然坚持把我们带到市警察局去，并对我们解释说，这样做对我们是有好处的。警察局长是一个严酷无情而呆板的官吏，并且不懂俄语。他把我们留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自己却走了。他的助手是个富有同情心的波斯人，在俄国学习过，俄语讲得很流利，从他那里我们才知道所发生的情况。原来，在我们一来到麦什特市后，所有这里的苏联机构顿时一片忙乱，负责监视这些苏联人的警察局情报人员发现：苏联军事间谍帕沙耶夫在同苏联密探科奥士赫切夫(旅馆经理)会面时，给了后者一支手枪，还给了一点什么东西，显然是毒药。警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埋伏在我们房间的门后面。到了深夜，科奥士赫切夫带着手枪上楼来，企图把我们搞死，事先他已得到保证，在此事完成之后苏方将让他返回苏俄。但是，他被预先埋伏在我们房间门后的警察逮捕了，之后，我们便被转移到警察局。

第2天早上，霍拉桑省省长接见了我，这是一个老奸巨猾、态度冷淡的波斯人，他好奇地看着我，但很少讲话。他不会讲俄语，我们通过翻译进行了交谈。我对翻译说："请你告诉省长先生，我相信波斯会象一切文明国家一样，自然会向政治流亡者提供避难权的……"。译员没有翻译我的话，反而问我说："是谁告诉你说，波斯是一个文明国家的？"我说："究竟是谁说的，这

无关紧要。请你把我讲的原话翻译给他听。”他搔着自己的后脑勺，说：“可是，省长会认为，你这是在嘲弄他。”我又说：“还是请你把我的原话翻译过去。”

省长听了我的话后回答我说，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由政府决定，他表示将向政府作出详细报告；而现在，他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我的人身安全。他让我等待德黑兰方面的答复。

我们完全搬进了警察局长办公室。警察局建筑物的外形象一座中世纪的正方形古城堡，只有一个大门。局长的助手指给我看，在警察局前面广场上的帐篷里，住着野蛮的库尔德族的骑士部落，这个部落被布尔什维克雇佣收买，给他们的任务是：一俟我从警察局里出去，就对我进行突袭，把我杀害之后立即急驶而去。但是，警察局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让我出警察局，如要出去，就对我严加保护。

同德黑兰的谈判拖延了很长时间。局长的助手向我介绍了情况，实际上，莫斯科和德黑兰之间的谈判一直在拖拖拉拉地进行着，莫斯科要求引渡我。

在那些年里，在波斯和苏联之间的关系上，一直存在3、4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任何一方都不肯让步，坚持自己的立场和权利。这些问题是：关于在里海边界水域捕鱼问题（这里盛产鱼子），石油开采问题，特别是边界线的走向问题，因为它的走向如何将会决定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边界地区的归属。如果波斯方面把我交还苏方，斯大林就会同意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对波斯人作出让步。因此，看样子，波斯政府倾向于把我交还苏方。我的这位可爱的波斯人沮丧地把这些情况告诉我。

在两国政府间的谈判进行的同时，格伯乌自己也在进行活动。1月2日，边防站上的人们清醒之后，把我潜逃的情况向阿什哈巴德作了报告。同莫斯科的电话联络顿时忙碌起来，看来，亚哥

达干得非常卖力气。斯大林下令：或者把我干掉，或者千方百计地把我弄回俄国。格伯乌向波斯方面派出了一队边防军，企图在通往库昌市的路上把我抓到手，但是他们始终未找到我。格伯乌驻波斯的站长阿加别柯夫，从德黑兰乘飞机来到麦什特市，他立即得到了一大笔拨款，让他策划对我的暗杀。阿加别柯夫干得非常起劲儿，他为此进行了全面的准备，而且进行得很顺利（关于这一点，1931年阿加别柯夫本人在一本书中曾经介绍过），当一切都准备就绪的时候，阿加别柯夫突然接到莫斯科的命令：一切停止进行。阿加别柯夫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为何又让按兵不动呢？他不理解。他不知道，这时候莫斯科已经得到波斯方面的保证：一定要把我交还苏方。这一保证是通过他所猜测不到的渠道转达的。

阿加别柯夫以后的一段历史是很有意思的。1930年，阿加别柯夫被调往土耳其接替勃鲁姆金担任格伯乌站长职务。这个时候他对国内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如果他被召回去的话，肯定要被枪毙。此外，当时他正在恋爱，爱上了一个年轻纯洁的英国姑娘，并对她承认自己是契卡分子，是苏联间谍。这位英国姑娘知道以后吓得要死，匆匆离开土尔其返回英国去了。于是，阿加别柯夫放弃了自己的契卡工作岗位，带上伪造的证件去追踪她；姑娘的父母把全部情况向当局作了报告，因此，阿加别柯夫不得不去法国，可是，到达法国以后，事情已经很清楚：虽然他断绝了同苏联的关系，但是在苏联的坚决要求下，他被驱逐出法国，理由是他是凭据伪造证件入境的。最后，他在比利时取得了政治避难权。他写过一本名为《契卡在活动中》的书，用俄、法两种文字出版。书中有一章，用10至15页的篇幅，详细叙述当时他是怎样组织策划对我进行暗杀的情况。1932年，我曾有机会在巴黎见到他，他的外貌和心理状态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契卡分子。

他在比利时定居下来。比利时的警察局长费尔久里斯特男爵

曾经告诉我说，他对阿加别柯夫佩服得五体投地。当然，警察局把他看成是苏联间谍问题的专家，常常向他请教。有一次苏联精心策划了一次事件，结果使比利时的外交邮件落入苏联人手中1个小时。但后来，比利时当局看到这个外交邮件被完好无损地退了回来，邮件仍是密封好的，因此，他们就放下心来了。而阿加别柯夫却说："格伯乌已经把外交邮件看过了。"费尔久里斯特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于是，阿加别柯夫建议说："请你们把某一份文件装入信封，加上密封后交给我半个小时。"结果，按照他的建议做了。阿加别柯夫拿到信后就走开了，半小时之后他回来，把这封信完好无损地原样退给费尔久里斯特。后来，他说出了这封信的内容，与原来的文件内容完全一样。

但是，苏方仍然对阿加别柯夫继续进行追捕。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发现了他的一个弱点：作为一个契卡分子，他在倒卖从教堂里和资本家手里盗窃来的油画方面，也是不择手段的。契卡分子以此为借口，通过冒充的人员把他诱骗到西班牙边境，让他顺利地通过关卡，做成了两笔赚钱的买卖，捞到一笔数字可观的钱。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把他搞死。到了第三次时，他在边境上陷入圈套，被人杀害致死，然后又把他的尸体拖回西班牙境内，抛进山沟里，几个月之后才被发现。

我的这位可爱的局长助手来见我的时候，样子惊慌失措，他接到了德黑兰政府的命令，要他立即把我送到德黑兰去。从一些与这一命令有关的消息判断，这次转移对我不是好兆头。我的这位可爱的波斯人认为，我将被引渡给布尔什维克。

现在该是我转入进攻的时候了。

革命前，波斯有一家俄波银行。我在阿什哈巴德时人们曾告诉我说，后来的国王当年曾在银行里作过武装警卫工作。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银行萧条了，但是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执行，同波斯的贸易得到了恢复，所有贸易业务都通过这家银行办理，实际上

被这家银行所垄断。银行的首脑叫霍什塔里亚，他同苏联的关系很好，经常往访莫斯科，而且都是由当时的国家银行行长皮达柯夫负责接待。霍什塔里亚在一次访问时对皮达柯夫说："贵国政府是否愿意，由波斯政府一位最有声望的部长——而且他还是国王的私人朋友，做为你们的代理人？当然，这要出很高的酬金才行。"皮达柯夫回答说，原则上对此很有兴趣，但这要看条件如何？霍什塔里亚提出了进行这种合作的金钱条件，但是，除此之外他还要求，关于这件事除了皮达柯夫和政治局之外，对任何人都必需保密。由此可见，他的情报很灵通，对苏联真正的权力结构情况相当了解。皮达柯夫问："甚至对格伯乌也要保密吗？"他说："特别要对格伯乌保密，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如果让格伯乌也知情的话，那么，迟早会有格伯乌的人离开你们而叛逃，从而把秘密公诸于世，这样一来，那位部长和我的脑袋都要搬家的。"皮达柯夫答应将此事报告政治局。

他确实照做了，结果所提条件被接受了，主要的条件也受到尊重——关于这个苏联代理人一事，知道的人只有政治局委员们，联系人皮达柯夫，当然，还有作为政治秘书的我。就这样，国王的私人朋友，宫廷大臣托依穆尔塔什成了莫斯科的代理人，而且，酬金是通过非常巧妙的办法支付的。据皮达柯夫报告：霍什塔里亚假冒姓名买下一份巨大的领地，同时买者似乎资金不足，所以把这一领地抵押到俄波银行；然后，他不能按时支付利息和本金。于是，银行建议托依穆尔塔什只按抵押价格贷款买下这一财产，但是连这个不大的数目也不需付款。霍什塔里亚把领地的一小部分财产卖掉，用以还债。看来，这笔交易是做成了。结果托依穆尔塔什成了富翁。

莫斯科从不为一些区区小事而打扰他。他只是把波斯政府最重要的、基本的政策问题的情报告知莫斯科。但是，看来，为了引渡我的问题，他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去说服政府利用这个机会，

因为莫斯科为了我将会付出一笔相当高的酬金。

在得知要我转到德黑兰的消息后，我又等待了一天，到了星期五——在波斯，这一天相当于我们的星期天。这一天，所有单位和企业全都停业关门，所有的人都休息。我要求会见警察局长，可是他不在城里，而是住在别墅。然后我又要求见局长助手，他来了。我告诉他，我要求紧急会见霍拉桑省省长，但他也不在城里，而是在城外别墅里——我正希望他不在城里。由于事关重大，我急需把一个重大机密转告当局，所以我要求紧急会见霍拉桑省的军区司令，他答应立即接见我。

据我了解，他作为波斯人，战前曾在俄国的军事学校学习过，因而当过俄国军官，他的俄语讲得很流利。此外，他同国王的关系很密切。

我对军区司令说："据我看——，当然你也会了解：政府之所以召我去德黑兰，显然他们倾向于把我交还给布尔什维克。我想，你不会同意这种做法。"司令回答说，这是由政府方面主管的事，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他作为一个军人，只管军事问题，因此他与此事毫无关系。

我问他，他能否帮我一点忙。我说："估计，在路上将有你派出的武装人员负责护送，是吗？"司令确认说，他将派出 1 名军士和 4 名士兵陪同我走。我问他："你能否挑选 5 名全是文盲的人？"司令微笑地说，在波斯，80% 的人是文盲，所以这毫无困难，他答应我作到这一点。然后，我说："现在我要向你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正是我之所以紧急约见你的原因。我请求你立即到德黑兰去亲自单独会见国王，并亲自当面向国王一个人转达这件事：宫廷大臣托依穆尔塔什是苏联的间谍。"司令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托依穆尔塔什是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成员，他还是国王的私人朋友。"我说："尽管如此，我谈的情况是确切的。"然后，我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向他作了介绍。

第二天，军区司令乘飞机去德黑兰，向国王作了汇报。国王对此进行了调查，对我所提供的证据进行了核实，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说法，托依穆尔塔什被逮捕，并按叛国罪提交军事法庭审讯，法庭对他判处死刑。

过了几天，我和马克西莫夫在 1 名军士和 4 名士兵的陪同下乘汽车离开，向南驶去。在离开麦什德40公里处，有个道路叉口：向右去——通往德黑兰；向左去——径直向南方，通往印度边界的杜兹达布。

我命令汽车向南的方向开，陪同我的军士感到惊奇地说："通知我说，我们是要到德黑兰去。"

我说："他们这样通知你，是为了迷惑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真正要去的地方是杜兹达布。"

这位军士感到不知所措，我问他："你随身带有介绍信吗？"

"有"，他回答说，并立即把信件从怀里掏出来。

"你看，这封信是写给杜兹达布当局的，你自己看。"

"但我是文盲。"

"那么，就让士兵中什么人看看吧。" 然而，所有的士兵都是文盲。

"那好吧，总而言之一句话，一切由我负责，我们就去杜兹达布。"

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神气的、满载的道吉牌汽车，沿着一条似乎很久以前便熟悉的道路行驶了 4 天。正如波斯俗话所说："上帝迷了路，而司机却找到了。"沿途，我们驶过了羊肠小道，草原，干枯了的河床，最后终于到达杜兹达布。路上有带枪的士兵们护送是很有利的，曾经有些土匪想要拦路劫车，可是，当他们看到带枪的士兵们时就老实了，没敢动手。

杜兹达布省长接到那封可能是写给德黑兰当局、或者是写给军事当局的信后，看不懂信的意思。我请他放士兵们回去，因为

同他们无关，是我让他们送我到杜兹达布来的。他说，需要向德黑兰请示，暂时让我们住在一所不大的，但是相当独特的房子里。由于一般人都认为，在波斯电报是通过骆驼传送的，所以我估计，当省长同首都交换信件时，我会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下一步的行动：再一次越境，越过印度的国境线。当然，我采取这一步，是不准备征得波斯当局同意的。

但是，事实证明我以为还有很多时间的想法是错了。次日早晨，当我们坐在房子前面的土台周围议论形势时，突然开来了一辆小汽车，跳出两个携带手枪的契卡模样的人。我们立即迅速退进房子深处，这时他们又马上钻进汽车，匆忙开走了。可能是由于契卡分子以为我们会从屋内向他们射击的缘故。如果他们当时真的知道我们手中沒有任何武器的话，情况的发展会完全不同。

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了：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当时在杜兹达布有一个英国的副领事，他的主要活动是收购波斯的地毯，然后利用他们免税优惠的方便条件运往英国。同时，看样子，他的间谍和情报活动是依靠那里的布尔什维克进行的。当我提出约见他时，他竟然拒绝见我。以后，当我已经到达印度时才知道，他的布尔什维克情报人员曾向他报告说，我们是德国间谍。当时我们面前是漫长的俾路支斯坦边界，波斯人在边界上根本沒有设防，因为那里毗邻的是一片既干燥，又炎热的俾路支大沙漠。不过，边界线对面的英国人，却搞了部分边防，用的是当地半野蛮的俾路支部落的人。

我们必须迅速找到前进的道路。在杜兹达布市场上，我同一些印度商人谈话，向他们了解，能否从当地经商的英籍印度人中找出一个他们信得过的人。于是，他们向我介绍了一个英国人，我请求他把我领到边界对面俾路支部落的部队去。在天黑之后，他用汽车带领我越过边界线，并且找到了俾路支人。

我很快同部落酋长谈妥了，他为我组织了一个骆驼商队，配

备了3、4名军人，同我们一起出发，穿过俾路支沙漠。这里要说明一下，在我们逃离苏维埃天堂时，随身分文未带，在这之前，我们的全部旅费都是由波斯国王陛下负担的：而从现在起，可要由大英帝国尊贵的国王陛下破费了。至少，我和部落的酋长对这一点都毫不怀疑。

沙漠的气候是如此炎热，致使我们的骆驼队只能夜间赶路。同时，骑骆驼使人翻来转去，关节简直都要扭脱臼似的，因此，我们宁愿大部分路程步行。此外，我的同路人马克西莫夫，中途还同一匹小骆驼闹翻了，他粗暴地用脚踢了骆驼的头部，这匹小骆驼虽然当时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但一路上一直跟在他骑的那匹骆驼后面，保持2、3米远的距离，这样一来，他的脚踢不到小骆驼，而小骆驼却能够准确地往他身上吐唾液。不管他如何用俄文骂它，骆驼都不以为然。这算是我们的第三次旅行：第一次是骑马翻山越岭，第二次是乘汽车驶过波斯的领土，第三次是骑着骆驼穿过俾路支沙漠。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巧合：每次旅行都用了4天的时间。这一次，到了第5天清晨，我们就找到了铁路线，于是，我求助于当地的英国总督。

我讲的英语很蹩脚，我同这位总督的谈话，他是否懂得了我的意思，我不得而知。但是他立即往西姆拉拍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第2天他派了一辆供印度总督和部长们因公出访时使用的专车来接我。在骑了几天骆驼之后，能坐上这样高级的车子，更使人感到异常的舒服，特别是车厢内还有澡盆，而且厨师非常有礼貌地向我们了解愿意吃什么美味*。(原注)

---

* 在我写完这一切之后，我才由于偶然的机会得悉，我之所以能顺利转到印度来，主要还不是由于我自己的积极行动，而是遇上了一位保佑我的天使，我毫不怀疑，这天使就是英国驻西斯坦的领事斯克林，他不费气力地说服了印度行政当局，必须让我转到印度来。

在冬季里，印度的首都设在德里；但由于夏季那里的气候过份炎热，英国人在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在海拔3千米高的山上建立了一座夏季首都——西姆拉市。这是一座专做行政首府用的城市，那里除了政府机关之外，只有一些服务人员和商店，看起来，根本不让外国人到那里去。

英国人对我的接待很好，把我们安排在上等旅馆里。我们在进行了长途旅行之后，衣着破旧不堪，其貌不扬。英国人想出了好办法，让我穿上了优雅讲究的服装：驻印度的英军总部，当时正在对总部军官们进行俄语考试，我作为考官应邀参加了。最后用拿到的报酬我和马克西莫夫不但都买了新西装，而且还有了足够的零用钱。

我们到达印度时，正是4月初。他们立即同伦敦联系，时间拖延了很久。地方当局知道，我手中掌握着大量关于苏俄的情报，而且我对这些不会保密，相反，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向所有共产主义的敌人宣传介绍。但是，他们本身显然不能利用这些情报，而宁愿把这些提供给宗主国的高级专门人员去研究，所以，暂时他们让我平静地生活在这里。

我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而且我觉得在这里很安全，所以常到西姆拉郊区去散步。有一次，在散步时我走进了一座印度寺庙，从庙里出来一批猿猴，向我走来。使我惊奇的是，其中的猴王走到我跟前，并向我伸出了手。这种有礼貌的行为使我受宠若惊，于是我也伸出了自己的手。这时我才明白：当地人到这里来时，都给这种神圣的动物带来各种美食，猴王向我伸手，意在看我手中为它们带来了什么美味食品。

我同印度情报署长艾泽孟捷尔爵士就我继续旅行去欧洲的问题进行谈判。他同样使我感到惊奇，但这次是非常愉快的惊奇。他完全是位绝对正派的正人君子，可是他从事的工作却是间谍与反间谍，像我们的格伯乌一样。把这位先生同格伯乌的混蛋加以

对比，我对他们之间的悬殊差别感到惊叹不已。

在等待来自伦敦的消息期间，我不断读书，只要天气不十分炎热，就去打网球。

艾泽孟捷尔先生含糊地向我解释了同伦敦联系需时很久的原因。我的理解是，英国政府对这件事采取拖延的做法，因为当时英国工党非常亲共，它在其首领麦克唐纳的领导下利用我的问题，企图使政府被动出丑，特别是想在议会里掀起不愉快的辩论，而政府则想避免进行辩论，所以千方百计地拖延我的问题的解决。

我很想在报刊上给激进的亲共人士麦克唐纳和工党泼上一桶冷水，而且我手中确实掌握了他们的把柄。但是，如果我把这些告诉艾泽孟捷尔的话，后果会怎么样，对此我没有把握，所以我决定把自己手中的武器留到适当的时候再使用。关于我所掌握的这种武器，情况是这样的。

当苏维埃政权实行欺骗性的租让政策时，上了勾的公司当中有一家英国的列纳-戈尔德费尔迪斯公司。

在革命前，有名的列纳河金矿属于这家公司所有，十月革命后剥夺了这家公司的金矿，结果金矿生产停工，设备遭到了破坏。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布尔什维克建议把金矿租让出去，于是开始同这家公司谈判，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由公司引进全套新的生产设备，如采掘机等；它负责整顿生产，并且可以优惠的条件得到几乎全部开采出来的黄金，只把其中一小部分按国际市场价格售给布尔什维克。不过，在条约中布尔什维克写进这样一条规定：金矿每月的生产应超过一定的最低限额，如果实际上生产低于定额的话，条约就将予以废除，从而设备就变成苏联的财产。同时，苏维埃政权轻易地向承租者们解释说，他们主要的任务是如何更多地开采黄金，他们要防止承租者出于自己的某种考虑想要“冻结”金矿。公司方面认为这是合

乎逻辑的，所以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条款，因为公司根本无意"冻结"金矿，相反，它愿意使生产尽量保持较高的水平。

结果，这家公司把全套价格昂贵、复杂的设备引进来，英国工程师把金矿生产整顿好，金矿得以全面开工。但是，当莫斯科认为时机已到时，在党内下达了相应的指示，"突然"发生了金矿工人"造反"事件，他们在全矿大会上提出，要求英国资本家给他们增加工资，而且不是提高10%或者20%，而是提高20倍之多。这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此外，还辅之以其它一些同样荒谬无理的，无法实现的条件。结果，全矿宣布罢工。

公司代表匆忙去找当地苏维埃政权，那里人们有礼貌地向他们解释说，我们这里是工人掌权，所以工人认为怎么有利就可以怎么干，当局无论如何也不能干预工人与厂主之间的冲突，他们建议通过协商解决纠纷，即与工会进行谈判。当然，同工会的谈判毫无结果，因为按照莫斯科的秘密指示，工会不能作出任何让步。于是，公司代表只好找中央当局，在那里，他们得到了同样有礼貌的解释：我们的工人是自由的，他们有权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罢工继续进行，时间白白过去了，生产停顿，于是租让总委员会[1]向公司提出：由于违反了上述条款，这一条约将予废除，因而公司损失了一切引进来的东西。

到了这个时候，列纳-戈尔德费尔迪斯公司终于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蓄意进行的诡骗，公司完全上当了。公司要求英国政府出面解决，问题提交英国议会审议，工党及其领袖麦克唐纳当时非常亲共，他们对此欣喜若狂：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国家，那里的工人能够迫使资本家下跪，屈服，而当局保护工人的利益。辩论的结果，英国政府向苏联政府发出了照会。

① 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机构，成立于1923年。

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了这份照会，当然答复仍然是欺骗性的，说什么苏联政府认为，它不能干预工会与厂主之间的冲突，在苏联，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在讨论时，布哈林发言说，他读了英国报刊关于英国下议院辩论情况的报道。布哈林说："最精采的是，工党的批评家们居然对我们提出的论据信以为真；麦克唐纳这个傻瓜，竟然按照这些论据的精神，发表了费力皮卡式的演说[1]，完全为我们辩护，对公司加以指控。我建议委派麦克唐纳同志担任基什蒂姆县的党委书记，而把米·托姆斯基同志派往伦敦出任首相。"由于当时话题已带有开玩笑的味道，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就把会议拉回到严肃的讨论上来，他打断布哈林的话，半开玩笑地说："那么，就请把你的建议用书面形式提出吧。"布哈林不好再继续发言了，但又不甘心，所以索性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写道：

"联共党中央书记处××日决定：

任命麦克唐纳同志为吉什蒂姆县党委书记，向他和乌尔卡尔特同志提供车票一张。

任命托姆斯基同志为伦敦的首相，同时发以浆硬的衣领两付。"

于是，这张纸条在会上大家传阅开了，斯大林在上面写上"同意。斯大林"的字样；季诺维也夫写："不反对"；加米涅夫最后写上"赞成"，然后把字条交给我"办理手续"。我把这张纸条保存在我的文件资料中。

如果把此事在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对这些没有头脑的亲共分子和麦克唐纳来说，将是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件事要干得漂亮，现在还不行。

---

① 指慷慨激昂的指责性演说，源出于古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抨击马其顿王腓力浦二世的政治演说。

有一天，天气晴朗，我在西姆拉打网球，我同一位偶然相遇的伙伴一起，等着前一场结束为我们腾出场地。同我对话的人是一个红黄色头发的爱尔兰人，他知道我是什么人，并问了我一些关于苏俄情况的问题。在5分钟的谈话中我感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思想很敏锐，对苏俄的消息很灵通，对苏联事务很熟悉。我问其他球友此人何许人也，原来，他是印度内务部长奥哈拉。当时我想，如果把布哈林写下的纸条交给他倒很合适，所以，我对他说，我有件重要事情同他面谈，并约定第二天会见。

我到他那里后，把这张纸条拿给他看，我把它翻译出来，说明事情的来由。他问我："你能够把它交给我国政府吗？"我说，我正想这样做。他又问："你能否给我们写一份解释性备忘录，说明一下此事发生的经过？"奥哈拉又说："你自己难以想像得到，你这样做会对英国帮多大的忙呀！"这样，这份文件和解释性备忘录一起被送到伦敦去了。

但是，在这之后，我在印度和法国报刊上连它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我本来以为，英国的托雷党① 政府会对这一事件加以利用，并把它交给报界公开发表，因为这对亲共分子将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可是，报刊上并未出现。

在我到了法国以后，曾有机会同英国情报局长的助理谈话（后面我还会介绍，这个机关曾请求我对格伯乌伪造后交给他的政治局会议记录进行鉴定），我对他谈起我交给奥哈拉那份文件的事，并说，如果这个文件被积压在办公桌里的话，那太使人遗憾了。他说，他没有听说过关于这份文件的事，但是答应回到伦敦后，将向他的上司了解一下。过了一些时候，他从伦敦返回，把这份文件的命运告诉了我。

---

① 托雷党——英国十七世纪成立的政党，19世纪中叶改组为保守党；现为保守党的别称。

这份文件送到伦敦后，直接上呈首相。但是首相没有把它交给报界公开发表，而是采取了更聪明的做法：他把情报局长叫来，并对他说："请你去约见反对党领袖麦克唐纳先生，在你单独同他会见时，请把我收到的这份文件亲手转交给他。我认为，既然这份文件直接涉及麦克唐纳先生一个人，就应该把它转交他本人。"情报局长照样做了。

这份文件对麦克唐纳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印象。麦克唐纳虽然不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但他为人非常正派。他是英国社会党的创始人和无可争辩的领袖，他对俄国的布尔什维克持完全信任的态度，并予以大力支持。他的这种支持是无私的，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移。而现在，他知道了莫斯科对他的看法，而且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是毫无疑义的。这次打击对他的影响极大，因此有一段时间，他离开工作岗位，回到了自己的苏格兰故乡。但是，他在经受了这一切之后，却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并努力去领导他的党。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他同俄国共产主义决裂以后，党内只有一部分人追随他，而且是少数人。但是，在1931年严重的经济危机期间，这种情况却使得在英国能够建立起一个联合政府：以麦克唐纳为首的工党少数派，加上保守党人在议会中构成了多数；保守党人推举麦克唐纳任政府首脑——这是托雷党和社会党在反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空前未有的政府。应该说，经过以后在社会党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麦克唐纳逐渐使党内多数人从共产主义立场转到反共立场上来。

我在印度停留的时间继续被拖延着。突然，令人意外地弄清楚了，这是由于误会所致。8月初，我再也不能忍耐下去，我开始怀疑，英国当局是在长时间愚弄我，他们并未把拖延时日的真正原因告诉我。我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了艾泽孟捷尔。看来，我的怀疑使他感到委屈，于是，他把印度事务部长就我的问题致

总督的信拿给我看，目的是取信于我；其实，他不应该把这份机密文件给我看。它的秘密在于，英国人企图使印度人相信一种神话，似乎总督是一位拥有巨大权威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他完全听从印度事务部长的指挥。但是，我所感兴趣的倒不是这一点。我从信件中看出，反对党在议会中可能利用我的问题给政府制造麻烦，这一点一直在考虑中。但是，究竟利用我的什么问题呢？原来，是因为英国政府要给我到英国的避难权。可是我从未表示要去英国的愿望，也从未提出过这样的请求。艾泽孟捷尔惊讶地问我："怎么会这样呢？你不是在第一次谈话时就表示想要到欧洲去吗？"我说："当然，我是想去欧洲，但不是英国。"当我谈及欧洲时，我并未想到，对于在印度的英国人说来，所谓去欧洲，意思就是去英国。所以，全部的麻烦恰恰都与此有关。

我向艾泽孟捷尔保证说，我丝毫无意到英国去。

"那么你想到哪国去呢？"

"我要去法国。"

"哎，真遗憾，如果你当时马上告诉我们这一点的话，此刻你早就在法国了。"

确实，早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已决定要到法国去，按照战前涅纳舍夫写的那本老的法国概况介绍，我甚至选择好了我在到达巴黎后要住的旅馆。虽然我对巴黎不了解，但是觉得，在巴黎也象在莫斯科一样，住在市中心区更有意思一些，其实，也不尽然。我选择好将来要住在位于歌剧院和交易所附近魏文街的魏文旅馆。

此后事情进展很快。英国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向我提供在法国的避难权，法国政府同意了，所以法国驻加尔各答领事，发给我在法国长期居住的签证。这样，在1928年8月中旬，我和我的马克西莫夫在孟买乘上"波-奥公司"的两万吨级"马洛尤号"巨

轮，经过两个星期旅行之后到达马赛港，然后改乘火车到达巴黎，在里昂车站我一面领受着早在莫斯科已经预见到的这一时刻，一面对出租汽车司机说：

“请开到魏文大街的魏文旅馆去。”

泰菲的作品中有这样一段精采的描写：

“1921年炎热的7月里的一天，从协和广场地下车站走出一个人，他衣衫褴楼，头戴饱经风霜的礼帽。这个人在7月炎热的阳光下眯缝着双眼，用手指敲敲胸墙，然后说：‘这一切都好极了！这该不是铁的牢笼吧？早安！’——一个俄国人流亡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第17章 流亡国外 芬兰 柏林

流亡国外的生活　文章和书　政治局的记录　别谢道夫斯基的潜逃　勃留姆金和马克西莫夫重新出现　芬兰　曼纳兴　俄国人民军　柏林　罗森堡和莱勃兰特　与莱勃兰特的最后一次谈话

我该做些什么事呢？在这一方面，对我来说毫无问题。因为整个苏维埃制度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所以要揭露它的真相，要把莫斯科拚命掩盖的东西写出来公诸于世，特别是关于它的权力机制和我目睹到的那些事件。首先是要把这一切在侨民报刊上发表。

当时，即在1928～1929年间，巴黎有两家侨民日报——《复兴日报》和《新闻日报》。它们都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但两家报纸的政治路线却不大相同：《复兴日报》是右的，对共产主义怀有不可调和的仇恨；《新闻日报》是左的，它的主持人是革命临时政府的前外交部长米留柯夫，他是俄国知识界的台柱子，但他在政治上却是个平庸之辈。这家报纸连篇累牍地向读者们宣传说：在苏联，正在发生向正常的制度进化的过程；布尔什维克实质上已经不是布尔什维克了；共产主义，如果说它还没有完全过时的话，也将很快成为过时的东西，等等。所有这一套宣传都是不真实的，

愚蠢的。我不能够在这家报纸上发表文章，而是在《复兴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之后，我用法文写了一本书。但是，在法国要出版这本书和在报刊上发表我的文章都是很不容易的。法国的左派对苏俄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经验"怀有好感，所以对我写的东西竭力保持缄默。正因为我本人是那些文件的见证人，我写出来的东西都是确凿无疑的，莫斯科深知无法驳倒它们，所以，采取了沉默的阴谋策略。不论是《真理报》，还是《人道报》，或者任何其它共产党报刊，都从来不敢提及我的名字。有一次，罗曼·罗兰①由于缺乏经验，企图就我的一篇文章进行辩论，但是由于他提到我的名字，结果遭到共产党政府的斥责。

当时，出版人也难以找到。到1930年我的书才得以出版，可是被大量删节。我写的东西不大适合别人的口味。在这个时期，左派不肯对"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任何攻击；右派则目光短浅得惊人，他们对世界上发生的事件缺乏正确的认识，竟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和与之相联系的无政府主义的出现，使得俄国脱离了列强的行列，这是绝妙的好事。他们把关于共产主义仍将大有可为和世界性的内战已经开始的预言，以及共产主义是当前人类的主要危险的预言，统统看成是俄国流亡者故意夸张，而且说什么，这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企图教训老一辈有经验的政治家。

对我自己来说，那部书也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不仅是由于书中的全部结论性内容都被删掉，剩下的只是一点见闻材料，而且也是由于涉及我个人的一些原因，当时，我必须实现我对莫斯科的朋友们许下的诺言：硬要说我早在到党中央工作以前就成了反共分子，这样一来，我就成为一个勇敢机智地潜入敌人营垒的冒险家詹姆斯·邦达，可是，实际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不能够如实地说出关于我自己的情况，以及我的思想演变

①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

过程。因此，到后来，我对写书失去了兴趣。此外，有许多事情我当时不能透露出来，因为留在俄国的人们依然健在，如果我提及他们的名字或者引用他们的话，会使他们遭到危险。

现在，当时光已经过去，而且时代已经改变了的时候，我终于能够谈出我的全部见闻，能够如实地把事实情况公诸于世了。

在我到达法国后，过了一段时间，英国情报局的代表来找我，请我协助进行鉴定。里加的格伯乌头子盖杜克（当然这是假名，而不是眞正的名字）把一些政治局记录卖给英国当局，而且英国人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原以为那是眞实的记录。其实，盖杜克从未见过政治局记录是什么样子，他不过是根据想像进行伪造。但是，英国人在这方面的了解少得可怜，他们还以为这都是眞的。由于我曾经整理过大量政治局会议记录，所以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断定，卖给英国人的东西是伪造的。从此以后，英国人就再不买了。

这个时期我在巴黎是住在旅馆里。有一天，有人来敲门，我说："请进来。"一个很象契卡分子的人走了进来，并且平静地作了自我介绍："我是盖杜克，是格伯乌驻里加的头目。我到你这里来是为了一件事。英国人经我手购买政治局的记录，当然，你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些记录是否属实。我听说，而且我自己也完全清楚，他们能否继续买下去，完全取决于你的结论。我不瞒你说，我从中确实得到了很高的收入；如果你做出的结论不是否定的，那么我愿意把出售记录所得收入的一半分给你。"我回答他说："我感到奇怪的是，你在来找我之前，竟然没有在你们的机关里查阅关于我的档案材料；否则那里人们会告诉你，我不是个卖身投靠的人，这本来会使你避免进行这次毫无意义的访问。"盖杜克说："巴让诺夫先生，你要明白，你还是一个新到这里来的流亡者。现在你撰写的文章很受欢迎，一切都很顺利。但是，请你相信我的经验：经过一年，这一切都会过去，到那时候，你

就不得不艰难地混碗辛酸的流亡者的饭吃。如果你同意我的建议的话，不出半年时间，你赚的钱就足够你受用一辈子。"我好奇地说："盖杜克先生，请告诉我，你是否看过马赛·潘尼奥尔的剧作«黄玉»？"沒有，盖杜克先生是不会对话剧感兴趣的。"那么，你听着，话剧中有一个情节，有一位仪表堂堂的老人去向市议会顾问讹诈勒索，谈话的结果顾问请他出去，但不要转身，因为想用脚踢他的后背的诱惑很大。所以我也请你出去时倒着走，否则，我就会用脚帮助你出去。"盖杜克不动声色地说："请便吧，如果这会使你感到愉快的话。"他走到门口时，还是停了下来，又补充说："你不接受我的建议，将来会后悔的。"

但是，他错了。我并不看重金钱，而且凡是能用金钱买到的东西，我都不珍惜。所以，贫困的流亡生活从来沒有使我感到难堪，恰恰相反，我十分珍惜那些并非金钱可以买到的东西：友谊、爱情、信守诺言。

在我悄悄地、不引人注目地来到巴黎以后，过了一个时候，发生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件——苏联驻巴黎代表处的别谢道夫斯基叛逃。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道伏加列夫斯基由于患病而长期休养，由使馆参赞别谢道夫斯基代行全权代表职务。突然有一天，他为了逃脱逮捕，从使馆花园越墙逃走。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报刊对这一空前未有的事件大书特书，倍加赞扬，一位使节竟然为了逃生而越墙从自己的使馆逃跑。但这次逃跑的原因任何人都不得而知。若是别谢道夫斯基自己讲出来，对他个人不利，而了解全部底细的英国政府宁愿保持沉默。

有一个大冒险家博格伍特·科洛米耶茨，经常在苏联驻英国和法国使馆进行活动，为苏联办理种种商业、银行及其它事业。他经办事业的规模很大。当时，世界危机正以经济崩溃的形式展开。博格伍特想出一个主意：建议英国政府向苏联提供一大笔贷款。在这个时期，苏联开始执行工业化五年计划，但是用以引进

所需要的外国技术设备的资金严重短缺。博格伍特想要英国人以长期贷款的形式，向苏联提供工业化所需要的机械和材料，这样可以重振英国重工业，使之摆脱危机；同时，苏联方面需要作出保证，停止在英国的殖民地，特别是在印度进行活动。但是，博格伍特毫无从事慈善事业的感情，他的意图是使整个交易通过他来进行，以便使他从中得到百分之一的佣金。由于拟议中的贷款数字很大，这笔佣金将使他成为一个大百万富翁，可以受用一辈子。但是，他不能自己单独搞这笔大的阴谋生意，所以他说服了别谢道夫斯基参与其事。

这出戏的脚本是这样安排的。神通广大，到处都有门路的博格伍特暗示英国政府说，莫斯科希望取得这笔贷款，但是不愿冒谈判破裂之险，因此甚至不让驻英国的全权代表插手，而是委托驻巴黎的使节别谢道夫斯基进行，必须在绝密的情况下同英国政府谈判并签订条约。只有在这一切完成以后才能予以正式公布。

英国政府对此事兴趣极大，派了一个包括萨木艾里·霍尔爵士等两名部长在内的代表团到巴黎，同别谢道夫斯基进行秘密谈判，代表团与别谢道夫斯基讨论了有关贷款的全部问题。别谢道夫斯基事先通知英国代表团说，根据莫斯科的指示，此事在最后签约以前必须严加保密；甚至如果伦敦正式向莫斯科询及此事，莫斯科也将会佯称苏方没有提出任何建议，谈判便将会随之而破裂。整个英国代表团满怀希望和乐观情绪返回伦敦，但是萨木艾里·霍尔部长却持截然不同的否定立场，认为这一切都是投机活动，其中没有任何认真的东西。霍尔说："我自己是犹太人，所以对于我的教友十分了解，象别谢道夫斯基之流，根本不是正经人，对他的每一句话都不要信以为真。我建议直接了解一下莫斯科的态度，以便通过官方加以核实。"

最后，英国内阁同意了他的建议，并指示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要求契切林对此加以证实。不言而喻，契切林答复英方说：他

既不了解关于谈判的事，对贷款问题也毫无所知，但表示立即请示最高当局——中央政治局。他伤心地跑到政治局，大发牢骚说："你们同英国政府举行谈判，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我这个外交部长打个招乎。"政治局表示请他放心：任何人都没有考虑进行任何谈判。这样，事情澄清了，原来是别谢道夫斯基自己在搞这种投机冒险的阴谋活动。于是，契切林召他回莫斯科。同时，英国人对此事也没有再作出感兴趣的表示，别谢道夫斯基意识到，糟了，事情败露了，因此借口患病拒绝返回莫斯科。过了一些时候，外交人民委员部佯称国内打算召开驻西欧各国的使节会议，命令别谢道夫斯基回国，但是他仍然拒绝回莫斯科。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感到不能再容忍了，于是指示中央监委委员罗依津曼：必须把别谢道夫斯基弄回国，不管死的活的都可以。为此，给罗依津曼办理了相应的授权证件。罗依津曼到了巴黎，进入苏联大使馆，在门口他就把证件出示给那些以看门人的身份值班的契卡人员，指示他们说：

"从此刻起，我是这里的主人，你们只能执行我一个人的命令，具体地说，没有我的特许，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大使馆。"

契卡人员们问道："甚至对大使同志也不准许出去吗？"

回答说："特别是大使同志。"

然后，罗依津曼把全部情况通知了使馆的一个一等秘书，他占领了大使办公室，把别谢道夫斯基召来谈话。罗依津曼对别谢道夫斯基大声训斥，喝骂一通，并通知他：必须立即把他押送回莫斯科，如果需要的话，就对他使用武力。别谢道夫斯基一看情况不妙，立刻向出口处跑去。但是，契卡人员已经封锁了出口，并威胁他说，如果他胆敢强行逃跑，就要对他开枪。别谢道夫斯基只好回来。但他忽然想起，他在使馆院内花园里曾经看到，院墙边有一个花匠放在那里的小梯子。于是，他借助这个梯子，翻墙逃走了。

别谢道夫斯基逃出使馆以后，立即跑到所在管辖区警察局长那里，要求警察局协助把他的仍在使馆里的妻子和儿子解救出来。局长打电话给外交部，外交部秘书长说，大使馆享有治外法权，但是警察局应该根据大使的请求，可以派人进入使馆，后来，别谢道夫斯基的妻子和儿子被解救出来。别谢道夫斯基请求给他避难权，因而警察局设法把他隐藏起来。几天之后，邮差送来一份通知：因别谢道夫斯基被控犯有叛国罪，法院传他回莫斯科出庭受审。其实，他们想借此警告别谢道夫斯基：他是逃脱不出格伯乌之手的，格伯乌是知道他隐藏的秘密地点的。

关于别谢道夫斯基事件，在报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舆论的反应如此强烈，致使格伯乌不敢动手暗害他，但是却千方百计地给他制造种种麻烦。

在别谢道夫斯基逃出苏联大使馆以后，直到战争开始以前，我常常同他会面，主要是交谈安全方面的问题，因为在那些年里，他和我一样，一直处于格伯乌的威胁之下，所以我们需要互相交流关于我们可能受到的威胁的情况。后来他搞新闻记者工作，那个时候他倒没有捏造新闻，但是，他所写的东西没有份量，而且很多是想当然的东西。他在同我会面时，常询问关于斯大林的事情，询及斯大林的秘书室，各位政治委员，以及党中央机关的内部情况。在这些方面，我所知道的情况从不对他保密，我回答了他提出的问题。在战后，他在报道中用上了这些情况，但是作了某些歪曲。

战后，我很少再同他见面。在这个时期，我完全脱离了政治和新闻界，而埋头于技术。别谢道夫斯基说，他仍在搞新闻记者工作。这时，出现了一系列伪造的文件：«克雷洛夫中尉的札记»，«苏联元帅讲话»，«伏拉索夫将军回忆录»。所有这些东西的作者，似乎是叫做什么克雷洛夫、卡里诺夫的人，但实际上这些人并不存在。我对这些三流的、令人怀疑的作品根本不感兴趣，没有读

过其中任何一本，也不了解是些什么人搞出来的。但是，1950年出版了德尔巴拉的《斯大林的真人真事》一书。我不了解德尔巴拉是何许人，但记得此人曾与别谢道夫斯基合作过，因而我对它感兴趣，就读了这本书。我一看，这本书充满了谎言和捏造，于是我恍然大悟，这一定是别谢道夫斯基搞出来的。譬如，当时他把从我这里探听到的关于斯大林和党的上层领导的情况，在书里都用上了，但完全加以歪曲，充满了想象，这是对读者的愚弄。此外，书中多次提到，书中的一些细节（一般全是想象虚构的），作者是从斯大林秘书室的一个成员那里了解到的。这是给我脸上抹黑，因为在国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斯大林的秘书了。当苏联问题专家们读到他这部书时，会以为这是我向别谢道夫斯基提供的材料。

对此，我曾要求别谢道夫斯基作出解释，他没有否认这一切都是他写的，并承认他是在愚弄读者。我威胁他要在报刊上公开揭露他的捏造，他回答说：书的作者是德尔巴拉，因此，在形式上，此事与他，别谢道夫斯基，毫不相干。如果我要对他进行抨击，我就要冒因无端控告罪而受到法院追究的危险。

因此，我让他再也不要来见我，我不愿再看到他。

从那以后，我从未再同他见面。

大约在1930年前后，格伯乌内部发生了很大的人事变动。譬如，外事局局长特里利塞尔由梅辛接替①。因此，格伯乌派到国外的间谍人员及其活动性质，随之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特里利塞尔是一个狂热的共产党员，因此他也是从狂热分子中物色间谍的。这是一批不择手段的危险分子。诸如炸毁索非亚大教堂事件（当时保加利亚国王和全体政府成员都在场），以及在巴黎劫持库切波夫将军事件等，都是他们一手干出来的，这是他们的惯用

① 梅辛——十月革命后在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担任领导工作，后被选入中央监委。

伎俩。但是，到了1930年，这些干部又被赶走了，原因是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同情托洛茨基和反对派，所以，他们得不到信任。随着梅辛的上台，格伯乌里来了一批新干部，他们是一些处事谨慎的官吏，当然，他们是努力工作的，但主要是佯装成非常积极努力的样子，凡是冒险性的案件，他们总会设法找到无从下手的客观理由作为借口。1929年在法国，格伯乌还试图以制造不幸的车祸事件作掩饰谋害我。1929年底被任命为驻土尔其的格伯乌间谍头目勃留姆金，也曾经到巴黎来策划对我的暗杀活动。格伯乌之所以指示他来这样干的考虑是：第一，因为他认识我；第二，是我把他的表弟马克西莫夫带来巴黎的，而且后来还经常同我会面。勃留姆金找到了马克西莫夫。马克西莫夫来到法国后，象别人一样，需要开始工作，他规规矩矩地生活了一年多。勃留姆金向马克西莫夫保证说，格伯乌早已把他忘记了，但是，格伯乌要搞清楚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莫斯科是否潜伏了巴让诺夫的秘密组织，他同什么人保持联系，如果马克西莫夫想回到格伯乌干事的话，就要跟踪巴让诺夫，从而查清他的联系，如果能够得手和有成功把握时，也可以把巴让诺夫干掉，这样他就能够将功折罪，对他也就既往不究了；而他的经费问题就可以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予以妥善安排了。对此，马克西莫夫同意了，他重新开始打我的小报告。但是，他一年以后所策划的对我的暗杀活动，由于他不肯冒任何风险，结果没有得逞。事情已十分清楚，他重又开始为格伯乌干事了。之后，他匆忙躲藏起来，避开我的耳目。1935年夏天，我在特鲁威尔买了一份俄文报纸，从上面看到一则消息说，俄国流亡者阿·马克西莫夫，从艾菲尔铁塔上跌下或者跳了下来；报纸估计他是自杀而死。这是可能的，但是对我来说，这其中仍然有些迷惑不解。

勃留姆金从巴黎回莫斯科以后，向上级报告说，他所策划的对我的暗害活动成功地完成了。实际上，看来，契卡人员是搞错

了对象，被他们从火车里抛出去的并不是我，而是别人。斯大林到处传播我已被搞掉的消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杀一儆百，教训别人不要再效法我去叛逃：对叛逃者，我们是不会忘掉的，我们的手很长，迟早会把你揪回来的。

后来，勃留姆金从莫斯科到了土耳其。这时他对托洛茨基的仇恨早已消失，他同托洛茨基反对派取得了联系。当时，托洛茨基住在土耳其的公主岛上。勃留姆金同意带给托洛茨基一些秘密材料，但是，他手下的女工作人员莉扎出卖了他，向格伯乌作了揭发，结果，格伯乌以汇报工作为借口把他召回莫斯科，逮捕后予以枪决。

对我的另一次阴谋暗杀发生在1937年。有一个西班牙人，显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是西共党员。一天晚上，当我象每天晚上一样把汽车开进车库后回家时，他企图用刀刺杀我。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格伯乌的活动是何等卑鄙阴险！显然，格伯乌的间谍本人不愿冒任何风险，于是让一个不幸的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受了蒙蔽，硬说我是佛朗哥代理人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人物。

在这个时期，格伯乌在巴黎就是用这样的手段进行报复的。当然，还曾经发生过比这更为复杂的事件。例如，他们在布隆斯基森林里杀害了流亡国外的前苏维埃的干部纳瓦申。

在西班牙内战时期，有一大群“左派”坏蛋靠战争发家致富，西班牙的赤色分子抢劫教堂、修道院、资产者，把抢劫到的东西弄到法国去拍卖。有一批黑社会的“左派”协助他们，而且大部分收入都落入中间人的腰包，剩下的部分赃款，西班牙的赤色分子用来购买一些红色的西班牙所没有的必需品。以纳瓦申为首的投机商人帮，策划了这样一个阴谋：他们用赤色分子的一小部分钱买到一批罐头和其他商品，但这些全都是坏的或处理品，他们把这些东西装上船，运送给赤色分子。同时，这个投机帮又通知佛朗哥驻巴黎的间谍说，有一条船沿着什么航线航行，赤色分子当

时沒有海军，而佛朗哥却有，所以白军的炮艇把这艘船击沉了。无可奈何，只好再去弄一大笔钱，准备另一条船。但是有一次，船长那里出了什么毛病，好象是航行测量器发生了故障，所以，他偏离了原来的航线，结果，沒有遇到炮艇，到达了赤色分子的港口。当货物从船上卸下后，眞相大白了。最后，纳瓦申被刺死。

1939年世界大战爆发。当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件有趣的事。几年以来，我认眞地积累了大量关于苏俄情况的参考资料卡片，这对我从事记者工作帮助极大，但是整理这套卡片我需要系统地阅读苏联的报刊，这过多地占用了我的时间。最后我决定把它卖掉。结果出乎我的意外，我为此得到一大笔钱。1939年夏天，我到比利时的奥斯坦德市去休息，当时战争危险已迫在眉睫，所以我把全部钱随身携带着。那几天奥斯坦德市连日下大雨，我决定到天气晴朗的法国里伏耶尔去。为了避免到处住旅馆时随身带着这笔钱，我把它们存入银行保险柜里。在里伏耶尔我陶醉于绚丽的阳光和迷人的大海之中，以致连报纸都沒有看。有一次，我去游泳的时候，看到墙上张贴着画有两面小旗子的海报——动员人们去服兵役，战争开始了。当我返回巴黎时，战争已经打响了。比利时边界已被双方关闭，因而我去比利时的长期有效签证，也和所有其它签证一样，全被吊销了。经过两、三天的时间，我才确信，这种状况将要长期持续下去。在此情况下，我的处境很狼狈，因为我的全部金钱都存在比利时银行的保险柜里，但是我无法到那里去。

我只好冒险硬闯了。我坐上汽车，开往比利时。这时候，法国的公路上已空无一人，我开足了马力前进。当时，所有的汽车都躲藏起来了，因为军队在路上遇到汽车就加以征用。不过，他们內定只征用一些特定的牌子和型号的汽车，人们不了解这个军事机密，为了防止万一，就干脆统统不露面了。当我的汽车驶近边界时，我看到了法国海关的建筑物，附近有几个野战军宪兵军

官在晒太阳，我走到其中一个队长面前，向他说明，我的钱存放在比利时，我要去取出来。军官们友好地笑了，他们说："难道你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人吗？你不知道战争已经开始，边界已经关闭了吗？你居然还想坐你的汽车过去，难道你没有听说，任何汽车除非有军区司令的特许都不得出法国吗？"我忍受了这些讥笑，并说："队长，我象对待军官那样向你请求：我向你作出诚实的保证，24小时后我一定返回这里。"我触及了他们的弱点：军事宪兵军官们在内心里总是感到难过的是陆军军官对他们从不平等对待。我这位队长说："可是，比利时人也不会放你过去的。"我说："比利时人，由我来对付他们。"他被我说服了，最后说："那你就试试吧。"

在对面半公里的地方，设有比利时的边界哨所。在这里，他们打电话请示比利时警察局长费尔久里斯特，由于我认识他，所以他们让我进入比利时。在布鲁塞尔街道上，我行车非常顺利，因为我的车牌号是巴黎的，在这里几乎是唯一的一辆，行人们还以为我是带有重要使命从法国来到这里的。我到奥斯坦德市把我的钱取出之后，第二天就回到法国。当我的车子开近法国边防站的时候，我远远看到，那位队长高兴地跳了起来。他郑重其事地用手指着我说："他回来了！"我完全能够猜想到，这里可能发生的情况，其他所有的军官在过去的这一昼夜都会嘲笑他说：毫无疑问，那个人是被揭发出来的德国特务。为了逃生，他孤注一掷，企图通过宪兵的边防站。他用花言巧语，终于达到了目的。

队长握了一下我的手，为了我重新返回这件事，几乎要对我表示谢意了。

在战前的那些年代里，我在同布尔什维主义斗争方面尽力而为，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但是，我一直不愿做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因此，我根本没有去参加大喊大叫而成效极小的流亡者的政治生活。所有流亡者总是倾向于组织成许多小的黑人王国，它

们互相竞争和争吵。对于这类活动，我都沒有参与其事。当苏联进攻芬兰时，事实证明，我的这种做法是正确的。我是唯一决定就这次战争问题采取行动的人，随后，所有主要流亡者组织都给以我友好的支持，并跟随我一起行动起来。大家写了一封致曼纳兴元帅的信，信中，各侨民组织请这位元帅给我以充分信任，他们表示将全力支持我。在信上签字的有军人总协会、«复兴日报»社，甚至还有最高君主主义理事会主席（尽管我同君主主义毫无关系）。于是，曼纳兴建议我到芬兰去。

我考虑到，苏维埃制度下的人民期望摆脱共产主义，我很想从被俘的红军士兵中组织一支自愿的俄国人民军，这与其说是为了作战，毋宁说是为了号召苏维埃制度下的战士们转到我们方面来，把俄国从共产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当时正是实行集体化和叶若夫迫害引起混乱的时期，我认为自己对人民情绪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如此，我就打算象滚雪球一样，从一千人开始，争取吸收对方的力量，最后形成五十个师的大军进攻莫斯科。

当时法国舆论完全站在英勇的小国芬兰一边。法国当局对我的倡议表示欢迎，并帮助我迅速克服了一些手续方面的困难：外交部政治司长把我带到国防部，以便一次就把全部证件办妥，还有位将军祝愿我一切顺利。

2 月初，我动身去芬兰，我乘飞机通过了比利时、荷兰和丹麦，顺利地到达斯德哥尔摩。从斯德哥尔摩到芬兰去，需要乘坐旧式的折磨人的民航飞机通过波的尼亚湾。起飞之前，我们坐在机舱里等了很久。当时芬兰沒有空军，而苏联拥有强大的空军，它们不停地对芬兰进行狂轰滥炸。在波的尼亚湾上空有苏联飞机巡逻，因此需要等苏联巡逻机飞走，而且飞到远处的时候，我们的飞机才能插空起飞，并开足马力地飞，希望苏联飞行员中途不致出现突然往回飞行的念头，否则我们将会粉身碎骨。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当飞到芬兰海岸线上空时，我凭窗俯瞰，

发现机翼下喷射出火舌。我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便提醒坐在我前面座位上的那个人。他对我耸了耸肩，表示他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后我才同这个人结识，原来他就是芬兰的经济部长恩克里，他是到西欧国家淡判对芬兰供应问题的。这时候我们的飞机已经在降落了。当飞机着陆后，我们到驾驶员那里，恩克里问道，从这飞机机翼下喷出火舌的情况是否正常。驾驶员微笑地说，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如果真的从那里喷出火来，那我们大家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谈话了，而早已沉到波的尼亚湾的海底去了。我们两人只好莫明其妙地耸了耸肩。

2月15日，曼纳兴元帅在圣米克里的总部里接见了我。在我一生中所见过的各种政治人物当中，曼纳兴元帅给我的印象几乎是最好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巨人，肩负着整个芬兰的命运，全国人民完全地、无条件地跟随着他。过去，他是一个骑兵将军，我本来以为，同我会见的人只不过是一位军人，政治上不一定很强。但是，我见到的完全是一位真正的大人物，他完全有能力决定任何政治问题。

我向他介绍了我的计划和制定这一计划的理由。曼纳兴说，不妨试试看：他给我提供机会同一个营地内五百多名被俘人员进行谈话。他说："如果他们同意跟你走，你就去组织你们的军队。但是作为一个老资格的军人，我对此事持怀疑态度，因为这是一些从地狱中逃脱出来，幸免一死的人，他们怎么会再次自愿地返回地狱里去呢？"

当时有两条战线：主要是狭窄的卡罗利河战线，宽40公里。在这一狭小战场上，共产党把一个又一个师的人马赶了过来。这些人踏着堆积如山的尸体冲锋，直到被消灭为止。因此，在这条战线上没有俘虏。另一条战线，是从拉多加湖到白海地区。这里到处被一米半深的雪层覆盖着。在这里，红军沿着交通线进攻，情况老是一个样：苏联的师团突破纵深地区防线，芬兰人把他们

包围起来，加以分割，然后在残酷的战斗中消灭他们，所以剩下来的俘虏也很少。这些人都被集中到俘虏营里。确实，他们是侥倖地死里逃生的人。

我同曼纳兴的谈话，很快就转到其它题目上——战争、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我们的谈话持续了一整天。正象我所说的，所有芬兰人的眼睛都在望着曼纳兴，认为只有他能够拯救他们。可是他的处境相当困难，需要就一些重大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作出决定时，他必须征求那些仅仅对他一个人寄以很大期望的人们的意见。我是一个外来人，我在苏联政府的工作使我取得了治理国家的经验。此外，过去我处理过很多这类问题。因而，我同曼纳兴就面临的各项问题进行的谈话，对他是有意思的。在这一天，苏联空军三次轰炸了圣米克里，总参谋长进来请示曼纳兴，希望他到隐蔽指挥所去，曼纳兴问我说："你是否认为躲到隐蔽所去要好一些呢?"我认为沒有必要，我不怕轰炸，然后我们继续谈下去。参谋长几乎用仇恨的眼光瞪了我一眼。我理解他的意思：如果偶然有一颗炸弹丢到我们房顶上的话，整个芬兰的抵抗行动就完蛋了——全体芬兰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不屈不挠的老元帅身上。但是，这时我已是个军人，因为命运决定让我指挥自己的军队，再说，曼纳兴也应感到，我对炸弹丝毫不恐惧，也不感到紧张。

在被俘的苏联军人俘虏营里情况果然不出所料，俘虏们都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我用他们易懂的语言同他们谈话，结果，五百名战俘当中，有四百五十人表示自愿去前线打击布尔什维主义。其余的五十人中，有四十人表示："我全心全意同你们在一起，但是我害怕，就是害怕。"我回答说："既然你害怕，我们也不需要你，那你就继续留在俘虏营里吧。"

但是，这些人都是战士，我还需要有军官。不过，我不想在被俘的苏联军官身上浪费时间，因为当我第一次同他们接触时我

就看到，他们当中的两、三个华契卡、华斯大林分子已经组织起党支部，并用恐怖的威胁手法控制了其他军官，一旦他们当中有任何人有所表示的话，都将汇报给在俄国的有关人员，那时候，他们的家属将被迫用自己的脑袋对这里家人的行为负责，付出代价。于是，我决定从流亡的白卫军中挑选军官。军人总协会命令把它的芬兰部的人员交给我指挥。我从中挑选出骨干军官，但是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培养他们，还要从政治上教育战士，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我需要对军官们做大量工作，让他们用适当的语言和语气同战士们对话，同他们建立正常的关系。最后，这一切都很成功地解决了。还有许多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部队是按照各种条令行事的，而我们的军队不应该以苏联的条令为基础，必须重新制定自己的新条令。再有，还有一些简单的小问题，例如，大家相互应该怎样称呼，称“同志”，这是苏联的叫法；称“先生”——在政治上又是不可行的，而且，也非人们之所愿。而“公民”这个称呼，战士们倒是都习惯用；对军官，则称为“指挥员公民”，结果行通了。我被称呼为“司令员公民”。

还有一个心理上的问题。我的军官们——基谢廖夫大尉、鲁高伏依中尉参谋，以及其他还有几位，都是骨干军官。他们对我的政治威信非常钦佩。但是在内心里不大理解，一个文职人员怎么能指挥他们作战？在战场上，一切都要靠指挥员内在的坚定性，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靠我的坚定性，而我这个人是否具备这个条件呢？他们对这一点心中无数。这个情况，我是从间接的迹象看出来的：在进行军事训练时，基谢廖夫对我称“巴让诺夫先生”，而不是“司令员公民”。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们在赫尔辛基一座大楼的5楼上进行军事训练。苏联军队每天多次对城市进行空袭。当时正值冬季，云层很低，苏联飞机从爱沙尼亚起飞，在高空飞到离赫尔辛基30公里远的时候，把发

动机关闭，无声地向城市方向下降，降至低空时，突然穿出云层，同时重新开动起发动机，这样，飞机的发动机响声同投掷的炸弹声便交织在一起。由于来不及到楼下防空洞去躲避空袭，我们就干脆在原地继续进行训练。

飞机就在我们的大楼上空飞过，我们听到了炸弹投下的吱吱声和爆炸声。随着第二次吱吱的声音之后，炸弹就在我们的楼前爆炸了。下一颗炸弹会投向那里呢？是向我们投下，还是从我们这里飞过去呢？我利用这个时机继续平静地讲课，但是我的军官们都不安地向空中看着，忽然又一次听到吱吱声和爆炸声，不过，这一次已是在我们的后面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我若无其事地看着他们，并且问道，对我所讲的内容是否都理解清楚了，基谢廖夫大尉回答说："是的，司令员公民。"从此以后，他们对我不再怀疑了，在战场上他们可以指望依靠我内心的坚定性了。

在这里，本来可以用两周时间完成的事，却要花费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需要把全体人员转移到靠前线很近的营地去，还要把人们组织起来。这一切都以乌龟爬行的速度进行着。苏联空军每天都放肆地轰炸所有铁路枢纽。到了傍晚，各枢纽站上一片混乱景象，到处是被炸毁的路轨和枕木，还有炸弹爆炸后留下的深坑。每天晚上，需要把这被炸毁的一切重新恢复起来，争取在天亮以前剩下几个小时让火车勉强运行。第二天白天，这些又会统统被炸毁。3月初，我们完成了队伍的组织工作，准备开赴前线。基谢廖夫带领第一队先出发。两天后第二队人马出发了，然后是第三批。我们的兵营撤消后，我们再与其他队伍一同出发。这时候我接到报告说，第一支队伍已投入战斗，并已有三百多名红军向他们投诚，对这些我未及核实。3月14日晨，我接到曼纳兴元帅驻政府全权代表瓦尔登将军的电话说，战争已经结束了，要我停止全部活动，并要我立即到赫尔辛基市去。

次日清晨，我到瓦尔登将军那里，他告诉我说：

“仗打败了，已经签定了停火协定，我紧急请你来，是为了通知你，你必须立即离开芬兰。因为苏联人肯定已经知道了你的活动，他们很可能提出引渡你的条件。但我们不能把你交出去，所以要给你离开芬兰的机会。此后，苏联会知道这件事，会指责我们撒谎。你不要忘记：我们被苏联人掌握在手里，所以要避免任何使对方提出更恶劣的媾和条件的因素，现在提出的条件已经够苛刻的了。如果你现在不离开，当他们提出引渡你的要求时，我们若答复说你已不在芬兰，他们能够很容易地核实出眞实情况。”

“但是，对我手下的军官们和战士们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把他们丢下不管呢？”

“对于你手下的军官们，请你放心，他们都是芬兰国籍，不会面临威胁。至于战士，如果有的人不听你的忠告而要求回到苏联去，我们当然不便加以阻挠，这是他们的权利；对于那些愿意留在芬兰的人，我们将把他们作为志愿人员留在芬兰军队里，而且他们将享有一切芬兰人的权利。你在这里，对于他们不会有任何好处，还是让我们来管他们吧。”

他讲的这一席话都很有道理，很正确。于是我乘汽车到了土尔库，同一天到达瑞典，然后顺利地返回法国。关于我在芬兰的活动情况，我向流亡者组织代表们作了报告；也在总参谋部俄国军官会议上作了报告，这次会议是在军人总协会第一局局长维特柯夫斯基将军家里召开的，出席的有海军上将凯德洛夫，前俄国大使马克拉柯夫（他是带着助听器来听报告的），还有一位公爵，如果我沒有记错的话，可能是安·伏拉季米洛维奇公爵。在这以后，法国的形势也在迅速变化，6月，德国人进驻巴黎。

我在巴黎平静地生活了将近一年。1941年6月中旬，有一个身着军服的德国人来找我。这里顺便提一下，德国人都是穿军装的，而我对他们的肩章和领章弄不清楚。来见我的这个德国人的

军衔看样子象是少校。他通知我说，我必须到耶恩大街的一个机关去。为什么要我去？他说不知道，有辆汽车等着我，他要马上带我走。我说，我需要整理一下，换换衣服，过1个小时后自己去。我立即利用这1小时的时间，打电话向熟悉的俄国人了解，那个耶恩大街的机关是什么单位。原来，那是罗森堡的巴黎总部。他找我干什么呢？

我自己到了那里，由一位身着将军服的什么大官接待我，他通知我说，德国政府要在柏林紧急召见我，有关的证件几分钟后即可备齐，到柏林的直达列车晚上就开车，为我准备了卧铺。但是为什么要召见我呢？他说，不了解。

我必须在傍晚以前作出是否去柏林的决定。我想，若是不去，我就必须越过西班牙国境到别的地方去。另一方面，既然他们如此有礼貌地邀请我，也不妨去看看是怎么回事，我决定去。到了柏林，车站上有人接我，把我送到一所大楼里，原来这是纳粹党中央总部所在地。接待我的是办公厅主任德林格，他很快安排了我的生活（旅馆、食品和其他票证及餐厅等等）。之后，他通知我说，4点钟有人来接我，莱勃兰特博士要见我。莱勃兰特是何许人？他是罗森堡的第一副手。

4点钟时莱勃兰特接见了我。他原来是个"俄裔德国人"，毕业于基辅工学院，象我一样会讲俄语。他开头说，关于我们的会见和谈话的内容应严加保密；由于我是一位反共人士，一旦苏联知道我来柏林的消息，他们立刻会发来抗议照会，引起其它不愉快的事，这些最好要避免。正当他在谈话的时候，从隔壁办公室里走出一个穿军装和皮靴的人，长相与办公室内墙上挂的罗森堡的大照片一模一样，这就是罗森堡，但是莱勃兰特没有给我介绍。罗森堡把臂肘支在桌子上，开始同我谈话。他也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因为他曾在俄国的尤里也夫（德尔普茨基）大学学习过。不过，他讲得很慢，有时要斟酌他要用的字眼儿。

我预料到他们会提出关于苏联、苏联上层领导情况等问题，因为我被认为是这类问题的专家。确实，他们提出的正是这些问题，不过都是联系特殊的实际背景提出的，譬如，他们问：在我看来，如果明日开战的话，苏联党的上层领导会发生什么情况？类似的问题还有几个，这使我懂得了，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但是，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我身上，询问我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态度等。我很不明白，为什么我竟成了罗森堡和莱勃兰特如此好奇的对象？对他们的问题，我作出了坦率的回答；但是我根本不同意他们的意识形态，譬如，我认为，他们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反共斗争中是很坏的武器，因为它造成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这正是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导致一个国家去反对另一个国家，导致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同时，反共需要整个文明人类团结一致。我对他们的主张持有的否定态度，对他们并没有产生坏的印象，他们还继续向我提出种种有关我个人的问题。当他们终于结束提问的时候，我说："从这里所谈的情况来看，已经很清楚，不久的将来，你们将发动反苏战争。"

罗森堡匆忙说："我并没有这样说。"

我说："我是一个政治上有相当经验的人，所以并不需要把一切都说明我就会懂得的。请允许我向你们提个问题：你们发动战争的政治计划是什么？"

罗森堡说："我不大明白你的问题的意思。"

我补充说："你们发动战争是为了反共，还是反对俄罗斯人民呢？"

罗森堡要我说明，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说："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如果你们是进行反共的战争，即把俄国人民从共产主义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话，那么俄国人民将站在你们一边，而且会赢得战争；如果你们进行战争是为了反对俄国，而不是为了反共的话，俄国人民就会奋起反对你们，你们

的战争就会失败。”

罗森堡皱了皱眉头说，从事政治性的卡桑德拉①是最徒劳无益的艺术。我对他反驳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事态的发展是能够预言的。换句话说，俄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比比皆是，而布尔什维克二十多年来一直在践踏它。现在，谁若是能够唤起这种爱国主义，谁就会赢得战争。如果你们能唤起它，你们会赢得战争；如果斯大林能够唤起它，他将赢得战争。”最后，罗森堡说，他们上有元首，战争的政治计划是由元首确定的，罗森堡本人暂时不了解。我认为这完全是一种遁词。但是，尽管这很离奇，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真实的。关于这一点，只是在两个月以后我同莱勃兰特的最后一次谈话中才了解到，他向我解释了召见我和同我谈话的原因。

情况是这样的。在当时，6月中旬，罗森堡和莱勃兰特都相当肯定地认为，战争开始以后，可能不得不建立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政府，但是他们没有找到任何合适的俄国人。由于我在芬兰进行的活动，或者由于曼纳兴的推荐，他们看中了我这个人选，所以急忙召见了我，以便对我进行观察和估量。从莱勃兰特的谈话看来，他们似乎选中了我。但是，没过几天，战争就开始了。罗森堡得到了早已内定的任命——驻东部被占领领土的部长，莱勃兰特担任他的第一副手。当罗森堡初次会见希特勒接受指示时说：“我的元首，我们统治东部占领区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办法是设立德国的行政机关，总督制政府；第二种办法是建立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政府，它可以成为吸引俄国反布尔什维主义力量的中心。”希特勒打断他的话说：“不能考虑建立任何俄国政府的问题；俄罗斯将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并且将由德国人来进行统

① 希腊史诗中，特洛伊国王普里安的女儿，阿波罗曾授以预言的才能，但因她拒绝阿波罗的爱情，他使她的预言无人相信。

治。"

从此以后，罗森堡对我不再感兴趣了，也没有再接见我。

在同罗森堡和莱勃兰特谈话之后，一连数日我成了特殊人物。由于我知道了重大机密，所以让我过完全秘密的生活。6月22日，我一上街便看到了人们看报纸时的严肃面孔。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报纸上刊登了希特勒的战争宣言，宣言中只字未提俄罗斯国家，也没提俄国人民的解放问题；相反，大谈德国人民需要在东方占有生存空间，等等。至此，一切真相大白。元首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把俄罗斯变为它的殖民地。我认为，这个计划完全是愚蠢的。对我来说，德国必然在战争中失败，这只是时间问题；共产主义一定会赢得战争。在这方面，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对德林格说，我想会见罗森堡，德林格礼貌地答应，他将把我的愿望转告罗森堡博士。几天以后，他回答我说，罗森堡正忙着组织新的部，不能接见我。我呆在柏林，无所作为。我要返回巴黎去，可是德林格告诉我说，这个问题只有罗森堡和莱勃兰特才能决定。我只好等待。

一个月之后，莱勃兰特突然接见我，当时他正在主持整个部，会客室里满是穿着将军服的官员。他问我，我是否仍然顽固坚持自己对事态发展的估计；德军在胜利进军，俘虏数目已多达数以百万计。我回答说，我仍完全确信德国将要失败，因为这场战争的政治计划是毫不明智的。现在已经清楚，德国企图变俄国为殖民地。报界把俄国人描绘成渺小的人民。德国人在用饥饿的办法折磨和虐待俘虏们……。这次谈话以毫无结果而告终，莱勃兰特对我想返回巴黎的要求回避作答，让我再等一下。可是，等什么呢？

我在荣誉的被俘状态中又度过了一个月。一天，莱勃兰特突然召见我。他又一次问我说：德军在迅速进军，从胜利走向胜利；俘虏人数已达数百万，人民在用钟声欢迎德国人，在此情况下，

我是否仍然坚持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我说，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坚信这一点。虽然人民用钟声迎接，战士们在投降，但是2、3个月之后，整个俄国将家喻户晓：德国人在用饥饿折磨虐待俘虏，他们把人民当牲畜。到了那个时候，人民就不再投降了，他们就会起来战斗。人民还要从背后袭击德国人。这样一来，战争的情况就会不同了。莱勃兰特通知我说，他召见我的目的是建议我去领导对战俘的政治工作，因为我在芬兰曾经成功地进行过这项工作。我对此断然拒绝。我说，现在还有什么政治工作可言？到了战俘面前，能说些什么呢？难道去宣传德国人企图变俄国为殖民地，变俄国人为奴隶吗？而且对此要促进吗？这样的宣传员，战俘们会把他赶到……而且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最后，莱勃兰特终于忍耐不住了，他说："归根结底，你不过是一个无业流亡者，而你谈话的口气竟然象是一个大国派出的大使一样。"

我说："不错，我正是一个大国的代表，俄罗斯人民的代表。因为现在我是你们的政府与之谈话的唯一的俄罗斯人，我的责任就是讲出这一切。"

莱勃兰特说："我们可以枪毙你，或者送你去筑路，砸石头块，或者迫使你执行我们的政策。"

我说："莱勃兰特博士，你们错了。你们确实可以把我枪毙，或者把我送进集中营去砸石头块。但是要迫使我去执行你们的政策，这你们办不到。"

莱勃兰特对此的反应使我感到意外，他站起来握着我的手，说："以后我们还要同你谈话，我们认为你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又就战争前途、德国的政策问题进行了争论。我在讲话时，不大斟酌字眼儿，我解释说，在我们当前谈话时所处的这个阶段，可以开诚布公地说话。但是，莱勃兰特的反对意见越来越软弱无力。最后，他鼓起勇气说："我对你是完全信任的，所以我可以把讲出来对我自己都非常危险的东西告诉你：我认为，你的

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我惊奇地问道：“那么，罗森堡的想法呢？”

他说：“罗森堡的想法和我的一样。”

我说：“可是，为什么罗森堡不设法说服希特勒，他的政策完全是毁灭性的呢？”

莱勃兰特说：“这正是你完全不了解情况的地方，不管什么问题，都不可能说服希特勒。首先是他讲话，不允许任何人讲话。对任何人的讲话，他都听不进去。”

“如果罗森堡真的试图去说服他的话，那只会有一个结果：罗森堡就会立刻被作为不善于领会和执行元首的思想意图和决定的人而撤职，并被作为普通一兵送到东线去。这就是一切。”

我问道：“既然你坚信希特勒的政策毫不明智，那你怎么要去执行它呢？”

莱勃兰特说：“这远比你的想象更为复杂，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且是我们运动的全体领导人的问题。每当希特勒开始作出我们认为是愚蠢的决定时，譬如，占领鲁尔区，撕毁凡尔赛条约，重新武装德国，占领奥地利，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等，每一次我们都以为要遭到失败和死亡，可是每一次他都取胜了。所以，我们逐渐产生一种印象，可能这个人善于看出和理解我们所看不到和不理解的东西，因而我除了追随之外，别无出路。在波兰、法国、挪威所发生的情况都是如此，而现在在俄国，我们正在前进，很快就会到达莫斯科了。或许，我们的想法又错了，而他又正确？”

我说：“莱勃兰特博士，我呆在这里无所作为，我想回到巴黎去。”

他说：“但是，由于你反对我们的政策，你会去干反对我们的事。”

我说：“哎，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不会去拥护谁和反对谁。

我不会同布尔什维克们一道工作，我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我也不能同你们一起干，因为我既不赞成你们的意识观念，也不支持你们的政策；我也不能与同盟国一起干，因为他们同共产主义结成了罪恶的同盟，从而出卖了西方的文明。我只好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文明已经决定自杀身亡，因而在这些方面没有我的位置，我要献身于科学与技术的事业。”

莱勃兰特表示同意。我在离开之前，在拉里奥诺夫的住所，我把自己同罗森堡和莱勃兰特谈判的情况向声援派组织的领导成员们——波列姆斯基和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等人作了介绍。他们赶到柏林来，想要跟随德军渗入俄国去。我告诉他们，这样做是毫无希望的，因为那里的人民即将起来反抗德国人，如果同他们在一起，那就是说参加反对德国人的游击战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帮助布尔什维克重新迫使人民服从它们的权力吗？简直是毫无办法。但是，声援派们仍然想要尝试一下。以后，他们很快就感到，形势是没有希望的。

我返回巴黎以后，也向各俄国人组织的代表们作了报告。报告的结论是非常不能令人欣慰的。出席报告会的人中也有秘密警察① 其中有一个人向我提出一个挑衅性的问题：“那么，究竟你认为是否应该同德国人合作呢？”我回答说，不应该，因为这种合作毫无意义。

当然，这个情况会被汇报到秘密警察局② 去，不过，应该为德国人说句好话：直至战争结束，我得以平安无事地在巴黎生活，从事物理和技术方面的研究工作，德国人一直没有动我一根毫毛。

而在战争结束时，在巴黎解放之前，我不得不暂时到比利时去，所以，要来杀害我的共产党歹徒不会在家里找到我。

---

①、② 指德国的秘密警察。

后　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脱离了政治，并在以后的30年中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但是，我在共产主义权力中心期间所积累的经验和由此而获得的共产主义知识，使得我能够在以后的所有年代里继续研究共产主义及其演变的问题。这一研究，证实了我在积极的共产主义经历中的观察和印象，更能使我以某些结论来结束我的这本书。现在我想同读者谈谈我的结论。

我已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是毫无用处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对事件发展的预言也是不正确的，它已为现实生活所驳倒。这里，我要提一下马克思所作的下述分析和预见：随着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世界上正在发生着残酷的无产阶级化和人民群众的贫困化，资本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因此，在最发达的工业国家里必将发生无产阶级社会革命。

实际上，全部情况的发展恰恰相反。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发生的并不是无产阶级化和工人群众的贫困化，而是他们的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资本的演变也是相当突出的，譬如，在主要国家美国，这一过程早已使亿万富翁的阶段成为过去，使得由其经理人员拥有决定性影响的巨大匿名团体的那个阶段也成为过去，目前正处在资本的极其广泛民主化阶段，即大企业的大多数股票已经分散到广大工人和职员群众手里。他们已成为企业的共同拥有者和合伙人。美国比其它国家要先进10～20年，现在美国所出现的情况，以后也将在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发生。

至于社会革命，在任何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里都没有发生

过。相反，那些贫穷、落后和缺少文化的国家倒是充满了这种革命。

我们且不谈马克思主义理论，让我们谈谈实践吧。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也就是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实践。这一实践表明，一个国家越是贫穷、野蛮、落后、愚昧无知和缺少文化，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就越大。如果加以深入思考的话，倒觉得这种情况也毫不奇怪。共产主义的实质，是激发贫穷的人们对较富裕的人们的嫉妒和仇恨。人们越是贫穷，头脑越是简单，愚昧无知，那么，共产主义的宣传取得成效的机会就越多，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共产主义在非洲国家，在亚洲贫困的、群众动荡的地区是能够获得成功的；而在欧洲发达国家里，迄今只能在苏联坦克的威胁下靠暴力来推行。不言而喻，嫉妒和仇恨心理完全被利用来挑动人民中的一些阶层去反对另一些阶层，造成社会敌对局面，使之服务于进行镇压和迫害，从而达到取得政权的目的。然后，这一切又变成为组织严密的囊括全国的苦役营，并由一小撮共产党的上层领导进行指挥。

这种做法的目的是进行世界性的武装掠夺和建立世界性的奴隶式社会，使全世界变成机器人，以便于那些冷酷无情的、脑筋迟钝的"党的"官僚们广泛利用专制的权力，对这个世界进行残酷的统治。

这意味着我们西方文明的崩溃，而妄想取而代之的是死亡和残暴的文明，它的名称就是共产主义。

我可以想象到，这些话将会引起共产主义的青年信仰者勃然大怒。如果这是在我1919年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我会以同样的愤怒对这类话嗤之以鼻。但是，共产主义已经有60年的经历，那么，这席话是否令人信服呢？唉，遗憾的是这仅仅对于那些亲身体验过共产主义实践的人才有说服力；而对那些愤懑的青年共产党人来说，只有当共产主义在他们国家取胜，并继续存在几十

年，而使他们有亲身感受的时候，他们才能通过自己的切身体验，真正懂得这一席话是真理。但是，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到了那时已为时过晚，因为那时共产主义业已存在，已经取得政权并在运用政权，而且，一旦权力到手就会抓住不放。那时已无退路，即使在国家领导层中偶然出现一个杜布切克，他想要建立一个有人性的社会主义以取代豺狼一般的制度，虽然全党和全国人民都予以支持，但是苏联的坦克会立即驶到并迅速使一切恢复原状。

试问，我们的文明是否还要存在呢？是否想要保卫它的精华——自由，生活和创作的自由，人道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友好的相处呢？

在历史上，我们的文明是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在过去的世纪里，基督教是这个文明的基石和基础。但是，这些时代业已过去。现在，它正处于迅速而艰难的突变阶段。同时，生活环境也处于瞬息万变之中。20～30年来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导致现实生活迅速变化，其速度之快超过了过去的一个世纪。与此相反，群众的基本心理状态相形之下变化却较慢，而且日益严重地落后于飞速变化着的环境。人们的政治观点和他们的愿望，都远远落后于现实生活狂风暴雨般的变化。这种情况导致真正深刻的灾难。人们会认为，估计到这些变化，从中得出结论，用自己的头脑来判断群众带有惰性的落后思想、并进而提出符合变化了的形势的对策，——这些似乎是国家政治领导集团的职责。但是民主制的国家治理方式不允许这样做。政治人物必需要得到群众的委任。他们的悲剧在于，如果他们想要使自己的思想超越群众水平的话，他们就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支持，就得不到选票。所以，他们不得不成为群众的尾巴，而不是群众的首领。

当前，有两条道路决定着群众运动的政治方向：一条是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社会主义；另一条则是昨天的道路——民族主义。

这里我们要立即加以说明，民族观念与民族主义，两者是不同的东西。民族观念是正常的。微分方程式的运算方法，在北京和巴黎是相同的，这早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长江两岸人们的爱憎观，却与塞纳河两岸人们的爱憎观迥然不同。文化只能在民族的框框内得到发展，这种框框构成一幅现实生活独特的、无比的和必不可少的画面。民族主义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意味着："我的民族高于所有其它民族"，我所追求的首先是与其它民族利益相对立的本民族的利益。民族主义是一种凶残的民族利己主义。也许在一个半或两个世纪以前，这种主义曾经是合乎时宜的，因为那时各个民族生存在互相隔绝的条件下，它们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是，19世纪带来了迅速的变化，技术、经济、铁路和海上交通，以及国际贸易都向前发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以及军事技术的巨大可能性也得到发展。而到了20世纪初叶，民族主义的主张竟然成为各大国的领导性主张，这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世界性威胁，由此而产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证实了这一点。这次大战成为巨大的灾难，是对我们的文明的沉重打击，它还导致世界秩序的崩溃瓦解，促使白色人种主导作用的下降和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诱发了世界性内战的开始。但是，各国的领导人从这一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呢？显然，毫无所获。因为意大利和德国，为了建立反共的屏障，竟然没有找到较之毁灭性的、不久前为生活的惨痛实践所摈弃了的民族主义更好的武器。更有甚者，他们甚至还使之发展到最高阶段——超级的民族主义。拯救文明的唯一途径是各文明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共产主义。没有比超级民族主义更坏的东西了，因为它不但不能促进联合，反而会挑动一些民族去反对其它民族，从而不仅涣散了他们的力量，而且导致相互之间发生毫无意义的战争。对于共产主义来说，没有比这种民族主义更为有利，更为称心如意的东西了，所以，共产党人竭力予以促进，千方百计地鼓吹民族主义，

因为这是他们取得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各大国的政治领导集团，由于未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汲取任何教训，遂又轻率地使整个世界陷入第二次巨大的灾难之中。促使他们自己和群众这样做的指导思想，仍然是那个民族主义。而共产党人懂得，对他们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认为，继战争之后不可避免地将发生革命。试问：那些领导大国的政治蠢蛋们是否曾经预见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半个世界竟然落入共产党人手中？他们毫无远见，人们只能教训他们，当领导人的政治思想毫无价值的时候，是何等危险呀！

同时也表明，如果文明想要生存和维护自己的话，就必须使另外一种不同的政治思想作为它的领导人的行动指南，这一点何其重要乃尔。殊不知，**被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是永远与所有其它民族的利益相一致的。**如果这个原则为人们所理解，并使之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关系的指导性准则的话，那么，世界上会发生何等巨大的变化呀！如今，民族利己主义只能毁掉自由世界的防卫；只有联合才是拯救自由世界的必由之路。

另一条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越来越大得人心的。当今我们的社会突变的基本过程，是从基督教基础向社会主义宗教基础的过渡。但是，何谓社会主义？有位法国的元帅曾经说过："只有正确地命题，才能正确地理解。"究竟何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要理解这一点谈何容易。这首先是因为，共产党人为了进行欺骗宣传使用虚伪的术语，而且通过长期使用这些术语使它们已成为人们的惯用语。如今，谁人不是操着共产党人的腔调，用"资本主义"的说法取代"自由交换的社会"的提法呢？所以，当共产党人把他们建立的豺狼般的奴隶制度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个虚伪的名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显而易见的是，共产主义为了欺骗群众，是用社会主义的标签来掩饰自己的制度。而真正的"具有人的面目"的社会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者的豺狼般的社会主义不会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们可以这样说：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对于那些信奉社会主义的群众说来，社会主义也只不过是一种对美好生活和更多的社会主义的模糊不清的理想而已。这同样也是自由派的自由社会的一种理想，只不过自由世界的信徒们不采用“社会主义”这个词而已，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一词的名声，已被共产党人及其不受尊敬的同盟者败坏殆尽；第二，这容易被人们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众所周知，宗教是一种信仰的对象，因而明智者的范畴对它是不大适用的。人们同样清楚的是，尽管这样，新的、战无不胜的宗教仍拥有巨大的威力。确实，宗教很快又分裂为形形色色的教派、解释和邪道，它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互不容忍的。社会主义宗教在世界上的传播，不仅仅意味着它作为互相敌对的新形式的出现和发展的胜利。假如社会主义真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那么，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种类之繁多，将会象众多的国家数目一样，如果不是更多的话。因而，它们之间的仇恨和斗争也将更趋剧烈。就以共产主义世界为例，共产主义的俄国对于共产主义中国来说，是一个较之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更大的敌人。

自由派的自由社会思想的弱点在于，它与宣扬那种人们无法切身体验的天堂和地狱生活的基督教不同，它所主张的是建立一种人们能够实际体验到的地球上的社会主义天堂。共产主义解决困难的办法是，不管已有切身体验的人民对此抱有何种想法，他们都丝毫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甚至企图从这个天堂中潜逃那也是妄想，因为这个天堂已用机关枪和铁丝网团团围住。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来说，这样的实践应该是格格不入的，因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前景是艰难的。

但是，与民族主义一样，社会主义也不是我们的文明能够赖以建立自己防卫基础的意识形态。因为，即使是最好的、非马克

思主义类型的社会主义，它的出发点仍然是对我们的文明的批判和否定，它企图并寄希望于用其它某种自认为是最好的东西取而代之。

看来，情况相当不容乐观，而且对于西方究竟能否保卫自己的文明这个问题，尚难以作出令人抱有希望的答案。群众跟随共产党的宣传走，而那些比较冷静的坚定分子，除了过时的危险的民族主义之外，看不到其它的支撑点。当权的政治集团，即那些在20世纪初叶既没有看到，也没有理解到正是它们的民族主义思想把世界引向灾难和革命的集团；同样，现在它们仍然忙于玩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伎俩，因而看不到世界已处在毁灭的道路上。

但是，他们也看不到，世界正处于转折阶段，我们的文明能够转而走上另一条道路，走上解救的道路。

如果这仅仅是一种良好愿望的话，那么它就没有价值。令人庆幸的是，存在着实现这种转折的基础和可能性。然而，当权的政治集团也看不到这些。

让我们认真地回顾一下20世纪的历史吧。这个世纪是在令人欣快的气氛中开始的：技术、经济、国民财富等一切都在飞快发展；人民普遍相信进步是无止境的，生活会不断得到改善，相信会发生能为贫困的、备受压迫的人们带来好命运的美好的社会变革。结果发生了世界大战，这成了世界性的大灾难。帝国崩溃了，欧洲和白色人种的威信扫地，世界性的内战开始了。但是，人们仍然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继续玩弄老一套把戏，仍用老算盘去拨弄民族利己主义和种族仇恨。结果，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性大灾难，尽管发出了关于取得伟大胜利的战报（而取胜的主要是革命和共产主义这种新的异说，而且他们比所有其他人都更多地宣扬光荣的胜利），但是，怀疑开始在世界上广泛传播开来：后果是极端灾难性的，社会瓦解的道路已经是显而易见的

了。

于是，对形势开始重新审查和估计。经过认真观察和仔细统计之后，世纪之初存在的那种乐观情绪和对无止境进步的信心已经烟消云散了。看来，世界正在走向彻底毁灭。奔驰前进的、飞速增长的人口将使得人类今后不能喂饱自己的肚子；薄薄的可耕土壤层遭到野蛮的破坏；原料和能源的天然资源已告枯竭；大自然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作为未来食物储备地的海洋也由于被人污染而正在死去；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一切成果，本应造福于人，但是被用来反对人本身。但是，被人们尊奉如神的却是：原子弹，空前未有的破坏的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彻底灭绝人类的可能性，并且这不是理论上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着可能发生世界大战的威胁，使人类面临原子死亡的军火库正在疯狂地、无休止地发展。那么，更美好的社会生活的光辉前景何在呢？很早以来，关于这种实践的事实真相一直试图要公诸于世，但是都没有得到实现，最后，让真相问世的时候终于到来了，索仁尔尼琴的《古拉格岛》的炸弹终于爆炸了。当人们看到6千万死者的人证时，这种幻想也就随之而破灭了。

假如所有这一切是发生在一个世纪以前的话，那么这会在狭小的上流社会的小圈子里引起痛苦的，长时间的思考和重新估价。现在，广播、报刊，特别是电视，每天每时都把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最新情况直接告知于广大人民群众。因而，这个重新估价的全过程，对威胁的认识，对我们所走的死亡道路的恐惧，都迅速地掌握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各个先进的工业发达国家的人民正处于恐惧和战慄之中。

这种认识，这种对未来灾难的恐惧感，恰恰为当前实行解救转折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这正是使我们的文明能够转而走上另一条道路的基础。

这种转折要求人民群众广泛的参与和赞同。人民群众对于聪

明的公式——纯理性的果实，是漠不关心的。只有情感和激情才是他们的动力。转折需要有激情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是存在的。关于这个转折的问题，是同关于拯救人类的问题相吻合的，这一点赋予它以最伟大的意义。而且，这就可以从政治斗争和自卫以外的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从全球的广度和高度提出问题。应该寻求这样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类将能够摆脱严重的官僚的、奴隶般的共产主义制度。这种制度由于它仇视人类，愚昧无知和思想上没有创造性，不可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巨大而严重的问题；必需寻求一条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道路。

如果说这种转折是必需的，如果说它是可能的，但这也不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转折也许并不会发生。但是转折的基础是存在的，现在出现了30～40年前所未曾有过的可能性，不过还需要确定正确的道路，找出正确的方法；此外，还需要有真正能做到这一切的人。同时，这个运动应当符合于与通常的政治纷乱不同的任务，符合于在性质上、风格上和规模上完全不同的任务。人们面临的这个任务关系到整个人类的未来。